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说不尽的毛泽东
(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说在前面

边彦军：这件事就要做完了。我们先整理出 50 篇，以飨读者。下面的 50 篇，也争取尽快与读者见面。面对这一大堆文稿，说点什么呢？道些苦衷、说些辛苦之类的话，读者也能想象。因为现在干成一件事，都不会太容易。

思来想去，我记起了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曾说过的一句话：“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毛泽东有过敌人么？有过。恐怕最大的敌人是那个“旧制度”，为此，他率领二十世纪的已经觉醒了的最广大阶层的中国民众，干成了他自己认为平生所干的第一件事——最后建立新中国。

他有过私敌么？也许有过，比如他的妻子、弟弟、妹妹被枪杀，儿子被烧死。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恩怨当作私仇，而认为是两个对立阶级间必然搏斗的代价。他有过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更多的是关心普天下受苦难的大众。

中国百姓有条纯朴的信念，叫做：“滴水之恩，当作涌泉相报”。直到今天，当人们说到“毛泽东”这个名字时，还是说：“咱们毛主席”——我看，这就是最好的报答。

然而，毛泽东的确又是一个不容易说清的人物。他建成了一个新国家，希望她长治久安，因此，他又干了他认为要做的第二件事。

这第二件事对中国人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经过十年梦魇，实践作了回答。但事情仍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又带来对毛泽东的一系列议论、一系列之“谜”。

吴晓梅：大学毕业分配，我有幸坐到这张办公桌前。自此，将毛泽东的文稿整理编辑出版成为日常份内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

谁能否认他的魅力呢？他的思想博大而深邃；他乐于迎接挑战，更不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洒脱，却又常为“小人物”掬一把同情之泪；他沉着若定，有时也喜欢出人意料让人措手不及自己却在一旁微笑；他好词曲诗赋，每逢对手便高谈阔论，却脱不掉许多农家的习惯；他尝过受打击遭冷落的压抑，更感受了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他不是神，却是一个非凡的人；他足智多谋有胆有识，是中国乃至国际政治舞台的赢家，但后来输给了自己……

走大街穿小巷，过闹市进书斋，一辆自行车载着我许多感慨。

四季匆匆，每天都会有新感觉。时装精品屋，证券股票交易，跳槽与“炒鱿鱼”，合资的企业独资的公司，还有广告拉锯战与物价指数……

如今，外面的世界一天比一天精彩，是不是？

如今，伏在巨人的身影底下生活，并不是所有的人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这是我们时代的进步。

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毛泽东。只是那个唯一的毛泽东不再醒来。只是我们拥有的今天是他那个时代的延续，这一点无法更改。

我面对着毛泽东，也面对着今天的生活。做你决定去做的每一件事并为此尽心尽力，我这样对自己说，不仅仅是这本书。

张素华：有人说，不了解毛泽东，就无法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

也有人说，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本书。面对他至今还感到对他的认识和理解远远不够。

还有人说，分不清毛泽东的是与非，就迈不开现代化的步伐。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既很伟大又很复杂，有时他距我们很近，有时又距我们很远。但我们必须了解他。这不仅仅因为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因为他还影响着我们的现在。

那么怎样才能更客观更深入地了解他呢？有一天突发奇想，如果搞一部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把各位研究毛泽东的成果，通过交谈的方式，轻松愉快地反映出来，或许对人们深入了解毛泽东有所帮助，这对我们也等于上了一百堂好课。何乐而不为！次日和晓梅谈起，她说好。又找边彦军，他说成。说干就干，我们三人骑自行车，来往于各位之间。他们谈毛泽东的情趣、性格，纵论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误、辉煌和悲哀，瞭望他在中国及其世界的地位，挖掘他的思想渊源，透视他和战友们的关系等等。或深、或浅、或详、或略，积数年之功，述各家之长。如果读者能有和我们同样的感受，首先要感谢他们。

1992年12月于北京前毛家湾

说不尽的毛泽东

访陆定一——

毛泽东和中国的过去与今天

陆定一

陆定一，1906年生，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1942年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恢复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曾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中全会增选），第十二届、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还担任过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著述编有《陆定一文集》。

好事多磨，能采访到陆定一，着实让我们费了一番周折，还要感谢他的秘书宋广为同志。老人已八十有六了，但依然精神矍铄，风趣健谈，反复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缺了毛泽东不能成功，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没有邓小平。邓小平，大好人啊！讲到这，他还拍拍我们的肩膀说，你们有福气，赶上了好时候！

访问人：陆老，明年，即1993年，是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对毛泽东的认识。

陆定一：1983年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时，我曾写文作为纪念，不觉一晃又10年了。这10年，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又取得了巨大成绩。回首往事，感慨万千，给你们谈些什么呢？还是从毛泽东和共产党说起。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导者，他又是党的一个党员。要了解他的生平，需要了解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像世界上一切存在的事物一样，有她的幼年时期和成熟时期。革命时期，在革命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上，我们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这一点是容易懂得的，因为事情已经完成了，回顾一下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以为我们党既然在革命问题上是个成熟的党，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是成熟的党了，不会再有一个由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或者这个过程不会像革命时期那样曲折，可以迅速取得成绩。这是幼稚的想法。虽然我们党曾经试图较早或较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照搬了一些过去在革命时期的经验，如大搞群众运动，以大抓阶级斗争带动生产等等，实践证明那是错误的，走了许多弯路，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一些曲折。

这些曲折，归根结底，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虽然党在革命问题上已经完成了由幼年到成熟的过程，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要重新经过由幼年到成熟的过程。

这是我们党的发展的第二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要从头来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幼年时期的党还要经过胜利与失败，然后才能成熟。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犯些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幼年的党，只要是工人阶级的党、马克思主义的党，她的前程总是光明的，她不会衰败下来，而能以自己的力量，克服幼年时期所犯的 error，取得教训，发展马克思主义，变为成熟的党，走向新的胜利。这是由于我们党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访问人：党的第一个由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是不是就是十三大讲的“第一次飞跃”？

陆定一：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的“第一个飞跃”，也是这次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第一次革命。无论用个什么概念概括，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问题。第一次飞跃也好，第一次革命也好，无疑是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和王明的教条主义分歧在哪里呢？在实际经验吗？从实际经验看，王明一伙当然不能和毛泽东比、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区，亲身经历过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与民情，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他对中国传统的参悟是如此深透。王明在这方面是无知的。在理论方面吗？过去有一种传闻，说王明会背马列语录，他只不过会背而已，借以唬人。他背的那些教条，从概念到概念。“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这是博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写的自我检讨中说的。你看，教条主义就是“两个凡是”。博古做了这样的检讨，说出他的心里话，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就点出了王明路线的根源所在，他就变成了好同志。王明有功劳么？没有。王明有威信么？也没有，在王明的宗派中也有人认为他并不高明。这样的人居然能登台，是因为他对一个俄国人叫米夫的阿谀奉承，和向他“告密”、诽谤和陷害许多中国同志，取得米夫的信任。米夫当了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1931年初秘密来到中国，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迫“选”王明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料想不到的，出乎意外，突如其来的。但问题是这又是合法的。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纪律上要服从共产国际。这又是毛泽东同志和王明斗争所以时间那么长，造成那么大灾难的原因所在。

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我们党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才使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到成熟。“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清楚地划了一道界限。它的意义相比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王明路线统治了4年，革命眼看将被断送，干部中怨声载道。遵义会议还是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内部起了分化的时候开的。他们之间分化了，于是会议上出现了一个多数，赞成毛泽东起来领导。要记得，即使广大干部不满，但不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内部分化的时候，王明路线不会倒。

遵义会议没有请示共产国际，也没有向它报告，因为无线电联络已因电台丢失而没有了。如果不是这样，共产国际出来干预，那结果可能不同。遵义会议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开的。不是生，就是死，没有中间可循。

访问人：但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还是派人去国际汇报了，这是否说明我们党还是没有摆脱共产国际？

陆定一：不能仅看它的形式，要看到实质。我们的组织关系没有变嘛，还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向上级汇报是要征得它的支持（包括谅解）。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给党中央的口信，说：“中国党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同志。全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王明同志不要再玩花样。”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

访问人：是否可以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从幼年到成熟的标志？

陆定一：不仅是可以说，而且是可以肯定他说。在这以前，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是幼稚的，如同一个人的幼年，天真、朦胧，朝气是有朝气。不免常犯错误。在这以后，党在革命的问题上是成熟了，如同一个人的成年时期，对认识和实践的把握比较恰当。从1935年1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共 15 年，其间经历了长征的胜利结束，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成，抗日战争，反对顽固派的斗争，重庆谈判，人民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的胜利，这样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每一个关键时节，全党都得到党中央的及时的正确的指示，当然也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下，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这 15 年，党内也不是没有斗争，不是没有错误东西的干扰的。主要有：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土改中侵犯中农的错误以及延安整风中所谓的“抢救失足者”等等错误干扰。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党成熟了，能够及时认识和排除这些干扰，走向胜利。

辩证唯物主义，把真理分为两种：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认为“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所以，人类只能无限地接近它，而不能达到它。而“相对真理”则是人类能够达到的，而且可以讲得出来的。譬如中国革命的真理，是可以认识并能达到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讲出了中国革命的真理，而且用事实证明它的真理性。这个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相对真理还不是绝对真理，只能趋于绝对真理，所以不可以把它全盘搬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相对真理又包含着绝对真理，我们今天可以照搬的，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她的思想方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访问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有那么丰富的经历，经过多少成功与失败的磨难，人们本来设想，在建设社会主义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可历史实践的结果，曲折仍然没有避免，这是为什么？

陆定一：懂不懂、会不会、坚持不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曾是革命时期党是否成熟的分界线，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党成熟不成熟的界限。1957 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 7 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你看，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是清醒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取得经验的时间那么长（21 年，比 14 年还多），所花的代价那么大（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呢？为什么首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同志，忘记了自己所倡导的思想，直到他身后才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恢复呢？

搞清这些问题，我认为有这么几点：首先是由于全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经验的获得，归根结底要靠自己的摸索和积累，别人的经验再好也是在人家的环境中适用的，何况那些经验我们党较早就觉察到它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党犯错误是在摸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中走了弯路，教训极大。反过来，它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反面经验。再则，由于毛泽东同志骄傲了，自以为是了，听不进反面意见了，他对斯诺的谈话，竟主张需要个人崇拜。三则，因为他老了，人一老，就受到精力及观察能力的限制，即使想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也已经力不从心了。以上三个原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了恰当分析，直到今天，我认为都是对的，很中肯的。

访问人：是否还有另外的原因呢？您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参与了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又熟悉毛泽东的生平和实践，能否谈一谈。

陆定一：我不揣冒昧，提供几点供参考研究。旧中国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是从那时起，多少志士仁人怀着振兴中华的愿望奋起抗争。要振兴中华，就要建设，或者说，要发展生产力。但是，要发展生产力，就须要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的统治，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在清朝，有个“洋务派”，想在清朝统治之下进行建设，失败了。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实业救国”高唱入云，又失败了。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又有一批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以为中国从此可以统一，因而可以建设了。这个幻想被国民党新军阀的不断内战，特别是被“九·一八”的炮声所毁灭。只有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才能建设。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已被事实所证明，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切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没有了的时候，是不是还要革命呢？还要革命的。《共产党宣言》说，在工人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之后，还要“不断革命”，这个“不断革命”，指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对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是工人阶级自觉的改革，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自觉地进行的。我们今天的改革就是这种情况。但是 1957 年反右以后，随着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改变了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左倾思想逐步积累，升级为对各个领域进行“革命”。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个“革命”呢？是主观上臆造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或称“走资派”），对它实行“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就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列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虽然还有“不断革命”，但是再没有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之后的“不断革命”，用不着由“造反派”来进行，而是由工人阶级自觉地进行的，这将是和平地经过合法手段进行的，而不是用急风暴雨、群众斗争的方式进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起来之后，“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无理的，“造反”是有罪的，“天下大乱”是不容许的。不顾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起来这个事实，提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等等，就与社会主义建设背道而驰，而且给林彪、江青这些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在这些口号之下，不能不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也不能不延长我们学会经济建设的时间。

还有一点，就是个人崇拜和终身制。这是制度问题，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政党需要有领袖，没有领袖是不行的。全党还要尊重自己的领袖，不尊重自己的领袖，不仅党没有战斗力，终究会散的。但是不能搞个人崇拜。不管怎么好的领袖，甚至像毛泽东这样领导我国人民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杰出领袖，对他的敬重是应当的，对他崇拜就不对，就要犯错误，甚至付出极大的代价。敬重和崇拜怎么把握呢？这实在是个很难的问题，恐怕除了教育全党提高思想觉悟，就是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也同废除终身制相关的。终身制也是不对的。学习马列主义，调查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这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年岁大了，要三天三夜不睡觉，要一天走路二百里，究竟是办不到了。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准，他提出了很多解决的办法，令人钦佩。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

陆定一：就是我在前面说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还在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

思主义的斗争。假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教条主义和迷信。真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调查研究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靠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不可能做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实际的具体的情况相结合。

我是够得上“四人帮”所说的“臭老九”资格的人。但是，我对于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长期并不懂得。多谢毛泽东同志，他说出了这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我也很久不懂得教条主义同迷信的害处，不大清楚学习理论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服从党的纪律同迷信的区别，是经过长期的实际经验和思考才懂得的。现在我把自己的认识，郑重地告诉同志们，希望今后少走弯路。

访问人：今年春天，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作了重要谈话，以他的谈话为契机，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出现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新局面。党的十四大以小平同志的讲话为指导，并肯定下来。所有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陆定一：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在党的历史上，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这是关系中国命运的两件大事情。十四大表明，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成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形成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完成这条路线，我们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今年的十四大，用了14年。七大、十四大，二七一十四，很有意思的数字。有了这条路线，我们就可以把握前进的方向了。也许以后还有补充，还会有些改正，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曲折与反复，但根本的路线就是这些了。小平说，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依我看，一百年以后还要以它为依据，坚定地走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大有希望。我是赶不上啦，你们好福气呀！这也是全国人民的福气。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好好干吧！

1992年12月24日于北京医院

访龚育之——

两场革命·两次飞跃· 两大理论成果

龚育之

龚育之 籍贯湖南长沙，1929 年生于湘潭。曾任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常委、中央文献研究室兼任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党的文献编辑工作和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主持编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出版的著作有《在历史的转折中》、《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等。

这样一个题目找谁呢？我们找了龚育之，他欣然应允，话匣子一打开，洋洋洒洒，感慨万千。这时离小平同志南巡后不到半年，听说十四大报告正在起草中……

访问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这套新的理论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请就您的研究和体会给我们谈一谈。

龚育之：我们现在讲中国共产党历史、讲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史，通常都是把它划分为两大段，一个是民主革命时期，一个是社会主义时期。民主革命时期又分为五小段：五四运动和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社会主义时期又分为四小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是按这个划分来写的，相应地写了九章。

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胡绳同志同我们一起议论，提出过这样一种意见，即在党的历史时期的划分上，应该更加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就是说，如果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可以考虑把党的整个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党史教科书分为三大篇：第一篇为民主革命篇，写党领导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其间经历两次大的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第二篇为社会主义前篇，写建国以后党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中间又经历两次大的曲折，最后以粉碎“四人帮”、终止“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三篇为社会主义新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现在还很难说。也许是到本世纪末；也许要到下世纪 20 年代建党 100 周年的时候，小平同志今年初在南巡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也许要到下世纪中建国 100 周年的时候，那时，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比较发达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伟大国家。

访问人：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全新的、

很重要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龚育之：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被看作党史上一个大阶段、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而不只是建国以后这个大阶段里的第四个小阶段。《七十年》一书还没有分三篇来写，但在后记中讲了这个观点。去年我在中国现代史学会在遵义召开的讨论会上也讲了这个观点。

现在，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考虑从“第二次革命”的观点来观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小平同志曾经多次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直接提出这个命题，是在1985年。从思路来说，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已经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中也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这次全会前夕，他在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可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小平同志，我们党中央，就从现代化和改革相统一的视角，提出了新的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问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起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更高、更大的跨度上来概括我们党71年的历史：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历史飞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历史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为了实现现代化而进行深刻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历史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访问人：这套理论现在还不好说完全成熟了吧？

龚育之：是的。但是，应当承认，这套理论已经开始形成。十三大报告的估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轮廓”已经构成，这个估价是有份量、有分寸的。今年初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又进一步用新的观点、新的发挥把这个理论提高到新的水平。

访问人：“两”代领导，“两”场革命，“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这样几个“两”，是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体进程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同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龚育之：还要进一步分析一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强调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讲一条不行，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第一条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理论

和实践的错误。

访问人：您最近发表的《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在说到这个关系时，是先讲继承这一条。

龚育之：那也是一种写法。那种写法的目的，是强调我们党领导的事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从历史转折进程的实感来讲，第一条当然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从“文革”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勇气、魄力和本领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处理好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凡是”，出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归根结底，就因为那时的中央领导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缺乏扭转和把握历史舵轮的魄力和本领。你说他当时就不想解决一点问题？还是想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被抓的那些人还是放了嘛。但是要给由毛泽东定性的天安门事件平反，说它不是反革命的，而是革命的，那就没有这个勇气和魄力了。还有，在“落实干部政策”的题目下，解放干部，多少改善一点被打击的干部的处境，还是可以做的，但是，碰到由毛泽东定案的大的问题，要作为冤假错案来平反，就没有这个勇气和魄力了。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看来，如果指出和纠正这些大的错误，毛泽东的旗子就丢了，刀子就丢了。就是说，在纠正错误和高举旗子之间搞了个简单化的对立——要高举旗子就不能纠正错误，纠正错误就会丢掉旗子。

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魄力和本领就显示出来了。小平同志敢于明确地指出和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才能真正举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旗帜。当然，讲错误，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情况。一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片言只语，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后来才讲“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就不只是片言只语的问题了。这里既有认识的过程，也有引导的艺术。遵义会议纠正当时中央领导的错误，最初也只讲军事路线错了，后来才逐渐指出王明的整个路线错了。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说明清理错误要有个过程，决不是把王明同毛泽东相比。王明根本不能同毛泽东相比，且不说王明后来的演变，在历史上他也说不上有什么功绩。毛泽东就不同了，他对党、对中国革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有那么大的历史功绩，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有那么大的创造，他的问题是在晚年发动“文革”，离开了他自己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所以，新时期要从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从“拨乱”开始。小平同志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二条，就是继承。“反正”就是继承。拨乱，纠正错误，决不是全盘推翻过去，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的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访问人：我们看到一些材料，说当时有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后来黄克诚同志出来讲话，发表了文章。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历史决议，要求全面评价毛泽东，要求在历史决议中专门写一章“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当时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是有那么厉害吗？

龚育之：要分几个层次、几个范围。一个是来自国外、来自港台、来自社会上的某些议论，那是很强烈的，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以至于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党内的某些议论，尽管有的语言也很偏激，有的意见也很错误，究竟同前面那种性质不同。不过，对待历史问题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而是采取激愤的、绝对化的态度，那是不足取的。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讲了许多话，批评和拒绝了某些观点，是有针对性的。此外，有些搞理论的人主张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认为如果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一种思想，就应当把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也算在内，如果错的不算，只算正确的，他们认为讲不通。这种观点，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我们党用了这么多年，现在一笔勾销，政治上不利，也不合乎历史。而又合乎历史，又合乎科学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科学的理论成果。难道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至于这个理论成果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倒是第二位的问题。既然过去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来称呼这个理论成果，而毛泽东的确在创造这个理论成果中作出了最大贡献，现在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取消这个称呼。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据实践来检验过去的许多观点，看哪些是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的，哪些是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所创造的科学的理论成果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把它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当然，在讨论历史问题的过程中，有同志提出那样的意见和主张，不好说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可能是在斟酌怎么处理这个复杂问题时的一种不成熟的思考，而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作种种思考，是正常的。在历史决议通过后，遵守历史决议，不再宣传那样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就不是什么问题。

这些说的是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我们明确指出和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的确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是不是能够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成果和科学理论成果。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把握不住，坚持不住，发生动摇，那么，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就可能被否定，我们党的整个立足点就可能被动摇。苏联出现的情况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党历来不赞成；进一步否定列宁，否定整个苏联历史和十月革命，结果如何，不是很清楚了吗？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苏联历史上的列宁加斯大林。斯大林的错误和黑暗必须否定，但是斯大林也有功绩，也有光明，不能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更不能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成果决不能否定。对待党的历史，人民革命的历史，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决不可以一笔抹煞，决不可以因为要纠正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它的基本成果，当然也不能因为要维护它的基本成果而没有魄力去纠正错误。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

的影响。而且有些人不光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光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也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本来就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继承和推进。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位年轻人说，中国搞现代化，最有希望的时候是慈禧太后、袁世凯那个时候，坏就坏在辛亥革命把中国搞乱了。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

访问人：他们认为洋务派是对的。

龚育之：对洋务派的历史评价，也许还有需要讨论的地方，过去可能有评价不足的方面。但是，认为只有慈禧太后加袁世凯，中国才能搞成现代化，这真是匪夷所思！否定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一股世界性的思潮，他们认为革命不好，革命只能造成动乱，动乱只能造成破坏。他们不了解革命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不可避免性，不承认革命为历史进步打开闸门的伟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当然拒绝这种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了解近代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尊重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选择的人们，也当然拒绝这种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而要肯定、要坚持中国人民革命的基本成果，就必须肯定作为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和坚持为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真理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

1983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时候，我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其中写道：“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经过“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情况下，小平同志毅然出来说：两个“凡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且是重大错误，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出现了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小平同志又站出来，“力排众议”（“力排众议”这个词我没有写进文章中去），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肯定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所谓“力排众议”这个“众”，当然不是“大众”，不是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是党员的大多数。党内的大多数和人民的大多数是赞成小平同志这种主张的，这种主张并不孤立。但是，也的确是“众”，是“小众”，因为当时确实有相当一些人不赞成，或不很赞成、不全赞成，并不只是个别人的无足轻重的意见。所以要“力排”。“力排”这样的“众议”，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是在巨大的历史转折的环境中显示出来的。由于小平同志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使我们党在这样巨大的历史转折中转得比较顺当，比较平稳，比较健康。没有第一条，就无所谓历史转折，或许还是在原路上徘徊，没有第二条，转折就可能转不好，转成混乱，那些完全离开革命轨道的东西就会泛滥起来。这两方面又都面对一种相当强烈的潮流，都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需要有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掌握住历史的舵轮。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我们的确感觉到了掌舵是什么意思。

访问人：这就是伟人的魅力，寻常人做不到的。

龚育之：而且还要说出道理。魅力、威信，加上道理，道理就是理论。小平同志处在有影响的地位，又有这样的魄力和魅力，又讲出了一番道理，

同全党一起讨论，集中全党智慧，不仅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对毛泽东思想加以科学的解释，对历史是非作出科学的判断，对今后的道路作出科学的规划。这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历史背景。

访问人：《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制定和通过的，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但有种观点认为，《历史决议》是一时需要的产物，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龚育之：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个决议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是全党讨论、民主集中的产物。当然不是说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已经达到绝对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够发展了，那样的东西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个决议是认真的，是根据事实努力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决不是简单的一时的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我认为，宣传这种观点就为两种思潮开了门。一种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下，把历史决议说成是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是为了动摇这个决议，以便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另一种是“左”的思潮，认为作决议时的那种情况，困难甚多，积怨甚多，所以着重讲错误，光注意“病理解剖”，结果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重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说重了，现在看来否定过多，主张要恢复。恢复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想恢复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这两种思潮来自不同的方向，却走到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历史决议》不是科学认识的产物，因此都想动摇决议。

访问人：这就是您在马鞍山会议（第五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提出要维护《历史决议》的权威性的由来吧？

龚育之：我认为，讲《历史决议》的权威性包括两条，一条是组织权威，一条是科学权威，这两种权威相结合，才是最大的权威。光讲组织权威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党是追求和服从科学真理的党，党的每个决议都具有组织权威，决议通过以后，如果发现有不妥当的地方，不合乎科学真理的地方终归还是要加以改正。

访问人：改正也要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

龚育之：对，组织权威就包含这个意思。组织权威并不能保证党的决议必定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党的决议所确定的观点，即使错了，或者你认为它错了，也得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由党组织作出新的决议，才能改变。不通过组织程序，随便讲一通违背党的决议的观点，就破坏了纪律，破坏了组织权威。当然，归根到底，组织权威应该是由科学权威来支持的权威。如果没有科学权威的支持，不合乎科学真理，组织权威终归站不住脚，组织决议终究要改变。而《历史决议》，我认为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决议，是有科学权威支持的组织权威，有组织权威支持的科学权威。动摇这个决议，既违背组织纪律，又违背科学真理。

访问人：前不久我们访问金春明教授，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提到您的这个观点。

龚育之：当时为什么非作历史决议不可？就是需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非作结论嘛。要把“文革”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个结论，判断下来，确定下来，在党内取得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个凡是”首先和主要的是三件事：一个天安门事件，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文化

大革命”，宣布这三件事情不能动，因为都是毛主席定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两个凡是”，把头两件事情解决了，但第三件事情，“文革”的是非，当时还搁着，没有解决。后来作《历史决议》解决了第三件事情，明确指出了“文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根本错误，分析了导致“文革”的“左”的错误的由来和发展。这样，可以说基本问题都解决了。剩下一些比较次要的，没有那么大的全国影响的问题，比如说电影《武训传》批判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和方式去解决。

所以，《历史决议》一是拨乱，就是明确判断和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一是反正，就是在纠正错误的同时，肯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基本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历史决议》通过后，党中央宣布：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访问人：从新时期党的事业的发展来说，只有这两条似乎还不够。

龚育之：只有拨乱、反正这两条，还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之内。无非是根据实践检验，将其中的错误的东西改过来，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新时期还要创新。

访问人：这就是您讲的第三条，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层关系？

龚育之：纠正，继承，发展，这三条，头两条的组合，就是拨乱反正，后两条的组合，就是继往开来。全面改革，就是开来，就是开拓，创新，发展。新时期遇到许多新问题。所谓新问题，就是毛泽东的时候没有面对过的新形势、新需要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或是毛泽东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但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从内政到外交，改革开放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去加以解决。开拓、创新的问题，这不止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内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就能解决。正确地认识和创造性地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需要使毛泽东思想得到新发展。

访问人：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到十三大时，对理论上的新发展概括了十几条。

龚育之：十三大概括了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当然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归纳和概括方法。总之理论上确实有许多新的东西。十三大已经讲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访问人：现在理论界有人主张把这些新发展称为邓小平思想。

龚育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确有了新的发展。如实地了解和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它既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继承，同时又在新时期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有了新发展。

访问人，即是说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理论的框架了。

龚育之：或者说，已经开始形成。至于用个什么概念、语言来概括，这要中央下决断。十三大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提法。今年初小平同志的谈话后，我看到的党中央的文献，有提“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有提“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进一步突出了小平同志在这个理论的创立中的地位，我看，这样的提法很好。缺点是作为一个术语，长了一点。好处是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要内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

为什么要单独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它？就是因为它不只是在毛泽东同志已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几点枝节的东西，而是相当的重大阶段的前进，有一系列新的探索，新的开拓，新的创造，开始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理论，所以要有新的概括。

党的七大时候，确认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用它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那时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同志当时接受了这个提法，又说明，只是把他做个代表，并不是说他都正确。后来有人建议提“毛泽东主义”，他不同意，为此专门有一个电报给吴玉章同志，《毛泽东书信选集》上登了这个电报。建国初期，由于一些原因，一度规定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的一篇大文章，原来题为《论毛泽东思想》，后来重版后改题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八大党章也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再以后，中央决定还是提毛泽东思想，在那时确定的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它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总之，这样的事要由中央从政治上考虑和决策，不单纯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

我觉得，一方面，的确需要有一个新概括，因为开始形成了新理论。另一方面，同“七大”时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新概括，并不是不要马列主义一样，现在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新概括，也并不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可以找到新理论的根源和准备，存在着贯通起来的精神，这些贯通起来的精神表明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继承和发展。

访问人：刚才您谈到贯通起来的精神，这是不是说，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呢？

龚育之：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一番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我看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强调“实事求是”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小平同志讲毛泽东思想，讲得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自己说，我就是实事求是派。这次他在南巡谈话中又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就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有人不大赞成这个提法，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好几本，讲了那么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文化思想……，怎么可以只讲“实事求是”四个字呢？其实，毛泽东思想其所以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那么多适合中国情况的创造，根源就在于他能够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本本和外国。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新的情况，自己去创造新的理论。

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当然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当年得出了许多具体结论，从那时到现在，经过了一百几十年，情况的变化是很大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不能要求马克思提供具体结论解决他去世之后成百年、成千年所产生的问题。列宁也同样不能承担他不在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出现的事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扬马列主义。这是他在1989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说的如果后人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只限在前人的具体结论的框子里，就会束缚住自己的头脑和手脚。还是当年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时讲的，不是照搬具体结论，而是要掌握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这个方法面对中国实际，解决新问题。前人

的科学成果要学习，也要研究，不能没有知识。归根结底，要拿到今天的客观实际中去运用，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结论，一是苏联提供的模式，一是毛泽东后期的设想。小平同志不因袭这些，而是抓住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所有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结论，重新拿到实践、拿到时代发展中去检验，这样他才能有创新，才能有突破思想樊笼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而开创出这十几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又比如，邓小平和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也有很大的共同点。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到农村去建立了革命的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辟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艰难的，首先就难在它是一条新路，不是传统的路，不是俄国革命已经走过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走到农村去，似乎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恰恰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找到了突破口，开辟了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农民结成同盟以发展自己的力量的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始终占有中心地位。今天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在他的战略思想中，农村和农民在中国改革中也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不大赞同沿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来形容今天的改革，因为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两种政权、两种敌对力量，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但从战略上讲，从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来讲，邓小平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到农村。中国的人口 80%在农村，农村是否稳定，生活是否改善，关系中国大局。某种意义上，农民的改革要求也最迫切，而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比较简单，改革起来不像城市那么复杂。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着手，取得了成功。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和推广，然后又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可以说，8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吃的是农村改革这碗饭，80年代市场经济的酝酿和发展，也是由农村改革启动的。

访问人，我们的市场，首先还是靠农产品丰富。通过这个问题，是否能说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呢？

龚育之：我看，在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改革战略中，抓住农村和农民这一点，就抓住了中国特色。不理解中国国情的人，不能理解这个战略基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有透彻的了解，他们和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村有血肉联系，因此知道农民在中国的地位，知道怎样把握住这个基点去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再比如，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时深刻阐明过的。他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犯革命急性病，急于实现全国革命高潮，是看不到中国这么大个国家，革命在不同时期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地区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源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中国建设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年份的不平衡，就属于这个方面；另一个是不同地区的不平衡，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放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推进，就属于这个方面。从战略思想上讲，这就是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地理环境等等的的不平衡，从这

个基点出发，在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最有效的发展方式，通过不平衡发展带动共同发展，求得将来相对的平衡发展。

访问人：这是不是说要从总体上把握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小平同志说，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又说：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龚育之：如果过早设想拉平，不仅本来可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上不去，全国的发展也给拖住了。像这样重大战略的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很多相近相通的地方。

访问人：您还能举几个别的例子吗？

龚育之：比如及时退出第一线的设想。毛泽东在 1956 年就提出过请党中央考虑让他不再当国家主席，甚至也不当党的主席，当时党内外不少人不同意。1957 年黄炎培、陈叔通两位党外人士还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以为此议不可。毛泽东为此写了一封信，批了好几段话，说服党内的同志，又说服党外的朋友，最后在 1958 年初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这个问题向广大党员吹了风，在 1958 年末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和公布了不再提名他为国家主席的决定。当时还为此而考虑了修改宪法限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的问题。限任制最早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中的好东西，它比封建王朝的世袭制、终身制强。资产阶级一是通过选举，一是限定任期，限制连任。当然资产阶级也有不限制连任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华盛顿是很开明的。

访问人：我觉得不光是开明，还有政治远见，没有华盛顿树立这个榜样，美国的政治不会稳定两百年。

龚育之：毛泽东 1957 年的信中还谈到退出第一线，不当国家主席，甚至不当党的主席，还是可以发挥政治作用。“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应该说毛泽东这个设想是有远见的。发挥不发挥政治作用，不在于非要有什么样的职务，而在于是否拥有真理，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拿出正确的主张来。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的设想，1959 年照做了；不再当党的主席的设想，当时没有决定，后来也没有这样做。我觉得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当党的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同毛泽东 50 年代的设想是相通的。十三大他不再参加政治局常委，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不再任中央军委主席，也是一个思路。

访问人：小平同志这次南巡谈话，经中央讨论认为是正确的，并且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印发，发挥了很大的政治作用。您认为这个谈话在哪些方面发展了他的思想？

龚育之：这可是个大题目，今天不能多谈了。南巡谈话，有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新论断，还有对过去讲过的观点、论断的新发挥。比如：“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一场革命”，这是他讲过多次的，但是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次谈话，以非常鲜明的方式，从改革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地提出了还要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这就引起注意了，而且深刻他说明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道理。

访问人：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我们体会是从改革的深刻性以及它带来的广泛影响的角度提出的。

龚育之：还有改革的紧迫性、发展的紧迫性问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大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也是坚持两点。一方面，他要求发展经济讲实事求是，实际上正是他强调要改变 50 年代以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一讲发展就是压指标、鼓虚劲的“大干快上”。另一方面，他又从观察世界发展的形势出发，别人在发展，我们周边的国家也在发展，而且发展得相当快，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警醒，不按照实际可能实现有效益的较高速度，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球籍”问题。“球籍”问题其实也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在八大一次会议上的预备会上提出的。但那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还不是有太大的危机感，毋宁说，是用一种特殊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一种自信。现在提这个问题就有很实在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了。因此，小平同志认为老是慢慢腾腾地发展不行，要抓住时机，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

访问人：过去讲发展是波浪式，您觉得台阶式和波浪式这两种提法哪一个更好？

龚育之：我觉得用台阶式比波浪式好。从物理学上讲，波有纵波和横波，纵波是疏密波，横波是起伏波。疏密波的比喻倒很不错，可惜人们不大熟悉，脑子里没有图像。人们熟悉的是横波，起伏波，而起伏波给人的图像是高上去，又落下来。而经济发展，总的说，应该都是向上，只是不同时候“上”的坡度不一，有时上得陡，有时上得平缓些，这就是台阶式，不应该是起伏式，不应该有落的阶段，特别是不应该有大落的阶段。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使中国快一些富强起来，毛泽东、邓小平都有领导我们实现这个民族愿望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冒进了；这使小平同志能够总结经验，既注意不要冒进，不能搞得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又注意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还是要尽可能发展得快一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求实实在在的快一点，一百几十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奋斗牺牲、艰苦努力，也是希望实实在在的快一点。

总而言之，把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一番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里边有共同的东西，有贯通起来的东西，有继承前人又超过前人的东西。后人继承了前人的遗产，又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应当比前人看得更清楚，步履更矫健。

1992 年 6 月 21 日于北京万寿路

访石仲泉——

毛泽东邓小平：现代 中国的两位历史伟人

石仲泉

石仲泉 1938年生，湖北江陵人。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科研局局长。主编《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和《毛泽东研究述评》等，主要著作有：《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合著）、《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导论》、《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合著）等。

他的工作、著述颇忙，或是室里、或是外出。忙归忙，还是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刚好是党的生日，我们围绕着毛泽东、邓小平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要建立“毛泽东学”

访问人：这几年您一直在倡导要建立“毛泽东学”，这个问题的提出，你是怎样考虑的呢？

石仲泉：我提出建立“毛泽东学”，是在1989年写《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一书前言时。我想，对毛泽东的研究不能仅仅从政治上来考虑，当然这是需要的，但也应该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更有利于毛泽东的研究，并使这个研究走向世界。

访问人：您是否认为，“毛泽东学”要比其他相关说法更好呢？

石仲泉：这里要说明几个问题。首先，我提出建立“毛泽东学”（也可简称“毛学”），丝毫没有要取代毛泽东思想的意思。从意识形态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坚持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能含糊与动摇，这点要明确。其次，政治上的坚持与科学上的研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但又有密切联系。从科学研究而言，它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甚至还要起某种服务作用。这是由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就毛泽东思想而言，它是一门科学，毫无疑问对它要加深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够了，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继续研究。就开展研究而言，提出建立“毛泽东学”，也不是为了要取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也是需要明确的。第三，提出建立“毛泽东学”，不仅不是要削弱或取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恰恰相反，是为了更有利加强和拓宽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因为它涵盖面广。平时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往往局限在毛泽东的思想方面，生平活动就不是其主要部分了。而且研究毛泽东思想，主要是研究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他的早期部分，只能作为他正确方面的历史背景来研究，他晚年犯的错误只为以后偏离的陪衬来研究。不能不说，这样的格局和思维定势影响对毛泽东的全方位的研究。如果变换一个角度提出“毛泽东学”来开展研究，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因为作为“毛泽东学”我们既可以研究他的思想，也可以研究他的生平；既可以研究他正确的，也可以研究他错误的；既可以研究他晚年的，也可以研究他早期的；总之，统统有关毛泽东的，包括对毛泽东研究的研究，都可以容纳在“毛泽东学”里研究。当然，现在不一定有统一的看

法，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事实上“毛泽东学”已经作为一门学问建立起来了。不管是否同意这个概念称谓，其研究是全方位的展开，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时间长了，“毛泽东学”的说法自然会流传开的。这个概念终究会被承认的。

访问人：我很同意您的观点，但要真正建立起来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面我想请教一下，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错误呢？

石仲泉：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不是能经常出现的，是要隔一段时间才会有的。不管他晚年犯了多大的错误，他的错误也是个社会现象，是历史现象，不是单纯的个人现象。所以我们应当对他的错误抱着分析的态度，从中去借鉴，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研究毛泽东为什么会犯错误，深挖他犯错误的根源，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正确分析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样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党的基本路线，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如果对他的错误不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是负面性质的）来对待，不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来研究，而是简单地像倒脏水那样地加以否定，那结果将是另一个样子。正如像在有些国家所发生的，把错误单纯地归罪于某个历史人物，把这个人一棍子打死就算完了，这不是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这种宣泄是没完没了的。其结果就是不断地追究责任，不断地否定历史最后变成了全盘否定自己。

我国这么多年能稳定下来，能不受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大气候的影响，除了改革开放的路子正确以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采取了辩证分析的态度，用《历史决议》的形式，做出了比较科学的结论。尽管也经常冒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精英”们不断地要否定毛泽东，但都被挡住了，遏制住了，没有形成大的气候，造成大的思想混乱。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历史决议》虽然做出了比较科学的结论，但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和毛泽东发生联系，产生怎样看待毛泽东的问题。

石仲泉：我认为主要反映在新时期如何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问题。这是我目前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党在思想理论的指导上要出问题，就出在这个问题上。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大多数人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也有一部分人不能正确对待。从前一段来看，发生的思想偏向主要有两方面，一种倾向是以邓非毛，即把小平同志这些年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看成是与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把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也加以否定，好像毛泽东一无是处。这种倾向在个别出版物中是有反映的。另一种倾向是以毛非邓。动乱之后，这几年大家都在反思过去，包括苏联、东欧发生巨变逆转之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这种反思是必要的。小平同志也在反思，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错，因此要继续坚持，强调党的基本路线 100 年不动摇。南巡谈话可以看成是反思后的新认识。但是有一种观点通过反思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不抓阶级斗争了，不讲反和平演变了，偏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看法虽然不可能公开谈论，但明里暗里还是有的。对南巡谈话，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转不过弯子，就与这种看法有密切关系。所以我认为，当前研究毛泽东

也好，研究邓小平也好，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不把毛邓关系摆正确，我们党、我们国家在指导思想就可能发生问题，不是这种倾向就是那种倾向，左右摇摆，极大地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党的思想方面也将会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建国后的历史，是目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各种观点都有，请问您是怎样看的。

石仲泉：首先要承认他伟大的一生是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尽管他晚年发生严重错误，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从其主观愿望说，他还是想在中国大地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让社会主义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如果放开视野，从宏观来看，我认为可以分为五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28年的民主革命是他对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里怎样进行革命的准备的探索时期。在我国当时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在我国搞民主革命，马列主义的书本上并没有现成的模式，要靠我们党去研究去探索，所以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民主革命阶段事实上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准备的阶段，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以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准备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探索时期。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这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建国后头7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4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建国前后制定的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策，以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对于这个时期的探索起了重要作用。尽管1955年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严重偏差，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取得的成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第三个时期：是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探索时期，即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之前。这段时间是比较好的。这时是毛泽东建国后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富有成效，有很多很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

第四个时期：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有9年左右时间，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发展的阶段。就是说不断地犯错误，又不断地纠正错误，曲折地向前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反复大，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交错发展，比较复杂。在我们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不能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犯了错误当然不好，没有彻底纠正错误是个遗憾，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能发现错误，采取措施制定政策作某些纠正，使损失尽量减少，把错误的势头加以遏制，这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因为他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就认为他纠正错误的措施也不值得肯定，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那就太简单了。正像救火一样，投有把大火扑灭，但火势越来越小，造成的损失就要少一些，就减少损失而言，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这段时间包括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

庐山会议前期这 9 个月，尽管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纠正路线问题，但是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肯定他一些好的思想，不要不加区别地和其他犯错误的时期一样看待。再如从 1961 年 1 月八届九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通过八字调整方针，到 1962 年 9 月八届十中全会前也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如果我们对他在这 9 年左右时间的思想轨迹进行描述的话，大体是“S”形的曲线。1957 年 11 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是他由指导思想的总体正确走向错误的一个关节点，这就是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一次郑州会议后 9 个月纠正错误，庐山会议后期和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又犯更大错误，八届九中全会再纠正错误，八届十中全会后又犯错误。在这里，八届十中全会是他的思想变化的又一次关节点，其指导思想开始定型化，基本确立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即认为通过 10 多年的摸索，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是要对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就搞四清，不仅农村搞，城市搞，还要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按照这个思路下去，发动“文革”也就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了。不过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应看到，尽管他错误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是接受了“大跃进”、庐山会议的教训，把抓阶级斗争局限在县团以上干部层，没有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去冲击经济建设。这样也就保证了八字方针在“文革”前能够得到贯彻，使我国的经济能够在 1965 年、1966 年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基本达到 1957 年的发展水平，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 1957 年，使全国经济出现复苏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势头。

访问人：我感到您的观点和有些学者不同，他们认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从 1957 年反右派时就确立了。

石仲泉：我认为这种观点讲的不准确。因为从毛泽东的思想情况来看，是一步一步地并且是有反复地向错误方向走去的。1957 年他提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涉及经济领域的建设，搞“大跃进”从主观愿望上说还是想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呢！只是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在抓经济建设的工作中犯了“大跃进”的大错误。后来在 1958 年底的武昌会议上，他才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分阶级的问题，1959 年庐山会议进而提出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但 1961 年八届九中全会又慢慢地纠正错误，对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绷的那么紧了。由于在困难时期，政策放宽了，“休养生息”嘛。这本来是好事，但在毛泽东看来，是刮起了“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是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于是在 1962 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才从总体上加以概括和抽象，随后在 1963 年的“四清”文件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

访问人：“文革”大概就是第五时期了。

石仲泉：是的。这个时期也可以说他是在探索，但是不成功的探索，是失败的探索。

访问人：我感觉您这样概括问题，是首先肯定了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好的。

石仲泉：这一点必须肯定。他还是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在他看来苏联等国已经发生了根本制度的变化之后，对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他思考的更多。不过他的思考、他的探索在理论上偏离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在错误路线上进行的探索，所以造成的

危害就比较大了。

访问人：从毛泽东投身革命到去世，您认为他的一生都是对社会主义追求探索的一生，并且提出不少好的思想。您是否归纳过他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大体有哪些？

石仲泉：我在去年底写的《当代毛泽东研究概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毛泽东研究述评》一文里，曾把他在这方面的好的思想归纳为 13 条，最近通过研究，我想还应该再加上：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这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中介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这些都属于他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的理论贡献。因此，从理论上说，至少可以归纳出十六条。

访问人：这十六条是您概括的毛泽东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那么他在这方面的错误您能概括一下吗？

石仲泉：我认为主要有两大理论错误。一是经济建设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论，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到“文革”时期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访问人：您关于超越社会发展的空想论和有空想成分这两种提法有区别吗？

石仲泉：没什么区别。空想论是十三大提出的。空想论和空想社会主义是两回事。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空想社会主义或乌托邦，对毛泽东基本持否定态度，我不同意。因为那是讲的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性质，而不是讲的错误部分。就整个思想体系言，毛泽东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这已有如前述。十三大讲的空想论是指他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犯的错误的而言的。比如说，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他片面追求所有制的品位越公、越纯越好。不仅个体所有制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就是小集体所有制他也不满意，要搞大集体。所以初级社还没有巩固就要搞高级社，高级社没有巩固就要搞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还不行，还规划在若干年后要搞全民所有制。这一切都说明，他不断地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孤立地要求改变所有制。他想通过这个办法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这是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的。因为我们国家从总体上是落后的生产力，需要有相应的所有制形式，太急了不行。在分配问题上也是这样。此外，不顾我国实际情况，过早地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片面强调发扬风格和精神鼓励，否定物质利益的作用。这也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要求。

邓小平实现了三个超越

访问人：我一直在想毛泽东是一个伟大而又具有悲剧性的人物。说他伟大，是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取得了辉煌成绩，而这个成绩又是他同时代人不能比拟的。说他具有悲剧性，是他在建国后没有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成就。尤其 1957 年以后，“左”的思想不断上扬，到“文革”时期误入歧途，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损失。这使我想到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他是按毛泽东的思路来考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了一套崭新的观点。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这在实践中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因此有人说，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上下两篇，上篇是毛泽东唱的，下篇是邓小平唱的。您是否这样认为呢？

石仲泉：邓小平在新时期有很大的功绩。他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拨正了我们党前进的航向。开始了第二次伟大革命、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来讲，应该说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具体说来，我认为邓小平在新时期实现了三个超越。

第一个超越，是超越了个人本位的“自我”。千百年来，“自我”都是以个人为本位来认识的，也是用其来审视历史的。小平同志在这一方面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他在处理和毛泽东的关系上完全把自己的荣辱置之度外，从党和国家的利益、民族利益来考虑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尽管在“文革”中，他本人受了那么大的冲击，几起几落，但他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更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做什么“秘密报告”。相反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比较厉害，否定毛泽东的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捍卫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领袖地位，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他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这样做的结果，越来越清楚的表明，对国家起到了政治安定的作用。这对他个人来说是超凡脱俗，是思想的净化。这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访问人：从我们党当时的情况来看，小平本来可以当第一把手，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位置让给了年轻人，这在无产阶级政党史上，恐怕也是难于找到的。

石仲泉：老了就让位，率先传、帮、带，这是他的伟大风范其实那时他的精力还很充沛，也不是不能胜任。他主要是从党的事业要后继有人这个伟大眼光出发，不希望把国家的命运完全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这很不容易。目前很多人对这点还认识不清楚，对它深远的历史意义还没有充分估计到。

访问人：请您谈谈第二个超越。

石仲泉：第二是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多少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但他毕竟不是神仙，尤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由于他的崇高威望，特别是“文革”树立起来的个人崇拜的绝对权威，如何克服他的错误，把全党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冲破重重阻力，批判两个“凡是”，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做这件事情。他号召全党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提出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一方面要否定毛泽东的错误，一方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区别就不可能摆脱他的错误，也不可能坚持他的正确思想。过去我们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和正确的思想搅和在一起的，一说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感觉毛泽东思想没办法坚持，是邓小平把这个结解开了。他以一个全新的思路，一方面大胆、坚决、毫不留情的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一方面又理直气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毫不动摇。但我们有些同志往往用外国的或历史上的一些旧的思想方法或思维定势来套，总是对这个问题理解不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是我党的特殊党情。这不完全是个理论和学术问题，首先是政治的需要问题。因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做学问的思想理论观点的简单总汇，而是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指导思想作为一面旗子，就不可能把错误的东西包括进来指导党，所以就只能是正确的东西。历史已经表明，由于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前提条件，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认识基础。也只有否定了“文革”，才有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才有十三、四年这样生机勃勃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

第三个超越，是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这一点应该大书特书。我们说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并不在于它提出了不可变更的三条五条原理、原则，而在于它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总结新的经验来修正过去的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观点，包括一些重要的原理来创造新的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只有不断地发展、完善自己，才能具有活力，永葆其科学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就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说像中共这样以农民为主体成分的党，能保证其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也没有说要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解决了这个问题。小平也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思路，总结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摒弃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摒弃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也摒弃了超越我国历史发展阶段要求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等，这些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超越，有些人目前还没有接受下来，当然认识总是有个过程，应该允许看，但这个理论的价值不容忽视。如果我们要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科书的话，就应该把小平的这些重大的理论都包括进去，否则就不完全。

访问人：那么您对南巡谈话如何评价呢？

石仲泉：这是我正要讲的话题。南巡谈话表明，小平的思想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是对他过去思想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南巡谈话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发挥的理论作用，我在这里冒叫一声，相当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我们当代的《新民主主义论》。

访问人：60年代，一些省委的领导同志曾写报告给毛泽东，觉得社会主义如何搞无所遵循，建议毛泽东写一篇像《新民主主义论》一样的大文章。

石仲泉：对，毛泽东很想写。他1958年就提出过要发展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是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的。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说：不能躺在老祖宗的书本上，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著作；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了，仅仅靠《实践论》、《矛盾论》，不写出新的著作是不行的。到60年代初，在一些小的范围里他讲得更多。当时全国掀起了学毛选的热潮，他说感到惭愧，这都是些老古董了，很想写点新东西，但自己老了，精力不济了。他始终想发展自己的思想。他不当国家主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想摆脱行政事务干扰，着重考虑理论问题。但他没有完成这个遗愿。他在晚年搞“大跃进”、搞“文革”，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主观和客观相脱离，实际上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他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任务由小平同志接过来实现了。如果说小平在南巡谈话以前的其他

文章和谈话，对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谈的多是单个专题性的问题，那么南巡谈话则是综合性的，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和总结的。所以我认为它的理论价值，相当于《新民主主义论》。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很多基本问题都解答清楚了。比如：从路线到重大方针，从经济到政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抓重点到两手抓，从基本的方针政策到领导工作方法，比较全面地回答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此外，毛泽东在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前，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谈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目标、革命的道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前途等等，但还没有一篇完整的文章进行总结。毛泽东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可以与此相类比。小平的南巡谈话是新时期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总结。这些情况向我们表明，小平同志的思想确实已升华到新的高度，是对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我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历史将证明这个论断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同时，也要指出，正因为小平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使一些同志一下子适应不了，接受不了。这需要加强理论宣传教育，帮助“换脑筋”。

访问人：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体会，感觉人们对谈话不能接受的程度比对其他谈话更多，困惑不解的程度也相对多一些尤其在高速度和姓资姓社问题上，不少人表示担心。

石仲泉：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几年小平同志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而我们的一些同志还在原来的框框里打转转。总是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纠缠不清。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把毛泽东的思想和小平思想完全叉土立起来了。对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把他一贯正确的东西和小平的主张进行比较，而往往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当成正确的思想来参照，或者说把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某些思想，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在现在看来就不再正确的思想来参照，所以形成对立。关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尽管《历史决议》已作了明确论断，但由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影响或一些过了时的思想的影响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一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就自觉不自觉地把那些东西当成正确的来看待。既然毛泽东的东西姓社，邓小平的思想就自然姓资了。这个情况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小平的南巡谈话。事实上这样理解问题是对小平南巡谈话的曲解。

访问人：那么请您谈谈怎样理解小平的南巡谈话才算正确呢？

石仲泉：首先应该肯定，小平的南巡谈话的实质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的谈话，一方面重点在讲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讲了要扼制腐朽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强调政权的作用，还谈到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打击经济犯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说南巡谈话的前三个问题是强调改革开放，那末后三个问题则是着重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因此，南巡谈话既是鲜明的重点论，又是全面的两点论，不能搞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完全可以说，它是坚决捍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献。

访问人：谈到这里，您是否能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再比较——下呢？

石仲泉：可以的。比如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大思路来看，撇开毛泽东晚

年的错误不谈，他们两人的大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大思路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正确的思想理论，并取得伟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反对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破除了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和限制，才闯出了一条全新的成功之路。同样，小平也是这样一条思路，不受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从现实的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基本理论。小平说得很清楚，他读书不是很多，但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四个字。过去打仗靠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和改革同样要靠实事求是。离开了实事求是，那就什么也不可能搞好。这也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当年参加革命也是这样，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对别的印象不深，也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因为宣言里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他得到了“阶级斗争”这个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结果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钥匙。这表明当年的毛泽东也不把马列主义看作玄奥的教条，而是抓住了它的精髓，抓住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当年的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是怎样搞革命的具体方法，把它提高到思想理论上认识，也是符合当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其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从这点说来，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不存在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对立问题（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犯错误时的情况）。

访问人：您的意见告诉我们，当人们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不要只看到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要注意从根本点上、从宏观上来把握分析，这样才能清醒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否则就容易目光短浅，陷入泥潭。说到这里，我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邓小平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能在毛泽东那里找到渊源吗？

石仲泉：从根本点上看是可以的。比如市场经济问题，这是南巡谈话很重要的突破。这个观点，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没有直接谈到，他不可能产生这个思想观点。但是毛泽东在1958年讲商品生产的那些话，认为商品生产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它和资本主义结合就是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应该乖乖地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思想是很好的。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商品生产换成市场经济来思考，同样的，它也不是某个社会形态所固有的，跟谁结合就为谁服务，其思路是完全相通的。计划问题也是一样。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毛泽东也曾批判过计划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说计划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计划做得好是反映了客观的情况，计划不好是脱离了客观实际，会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事实上也是这样，在1958年，整个国民经济都乱套了，没有任何计划可言。我们搞计划经济，其计划经常不符合客观市场的实际需要，这样长此以往，生产能高速高效的发展吗？这是；日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毛泽东并不迷信计划，这是可取的；但他有时有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导致“大跃进”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小平是吸取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的积极的一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如上台阶呀，要敢于试验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方法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

访问人：最后，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您能用几句话概括一下吗？

石仲泉：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对南巡谈话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把它放在新的高度上来认识。我们抓住了它的基本精神，就能正确把握毛泽东和邓

小平的关系。邓小平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毛泽东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和发展者。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处理好了，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否则，出现某种反复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任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阐述毛泽东思想和小平新时期思想的关系，包括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也要做好这篇文章。只有这样，对毛泽东的纪念才能有新的思想高度，也才能达到新的高度。

1992 年 7 月 1 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访张静如——

宏观把握毛泽东

张静如

张静如 1933年生，北京人。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共党史学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等。

从社会整体研究历史，从宏观上把握毛泽东——这是张教授近些年大力倡导的。当面听听他的宏论，早就是我们的夙愿。“因为家里有点事，我大半年不接受采访了，对你们是个例外”，教授见面如是说。于是跟着他的思路，我们上了一堂机会难得的课。只是先生说得兴致，一个半小时竟未喝杯茶。

访问人：张教授，请您就如何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张静如：这些年，我有一个总的观点，就是认为不论研究人物，还是研究历史，一定要从整个社会的总体上来看问题，因为不论一个政党，还是某个历史人物都是在这个社会产生的，并且在这个社会中活动，他不可能离开社会。只有深入地去研究整个社会，才能够把政党（无论是他的人物还是他的实践）研究深透。

访问人：你觉得现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状况如何？

张静如：从发表的文章以及论著看，在量上是很大的，你们不是有个统计：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文有6000篇，著作有400多部。但我不客气地认为，过去的研究相当程度上停留在宣传上，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开展研究是太差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跟党史的研究联在一起的。而党史的研究又跟党史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有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进行这种研究，它需要适应直接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政治宣传，那么，关于党史问题它就总是比较简单他说一下历史背景呀什么的，然后是直接的政治宣传。建国后条件有所变化，但也要一般地向群众灌输党史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就无需乎说什么研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党史这门学科比较过早地进入教科书化。许多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规律，就是在它自身发展之后，进入教科书的模式，但这有个酝酿和发展过程。而中共党史这门学科比较早地进入了教科书化，这也不能赖谁。因为在建国初出于对形势的需要，对党员和知识分子的教育，需要有个教本，这就促使这门学科过早有了教科书。有了教科书就有了一定的模式，再深入就有了困难。我觉得”，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回过头来，就应该研究它形成的弱点，尤其是展开对于社会的研究，这是深化党史研究的一个途径。

那么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我们说应该宏观把握，这就是说，要研究人物，就一定要从他处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来考虑。而所谓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要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一直到包括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社会的侧面来研究。考察一个人物，还要考察包括他的家族的变迁，人物的变迁等等方面，只有从这些方面考察了这些问题，然后才能看出一个政党，一个人物，他是怎样活动的，他的思想是从哪里来

的。

包括毛泽东这样的大人物，对他的研究也要从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因素去加以考察。我们现在的研究，还缺乏整体的考察。比如，毛泽东出生以后，整个社会和他的思想的产生是什么关系？他的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是什么？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对他有哪些影响？在我的研究中，我比较强调社会心理的影响，就是说，社会心理对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是什么关系，以及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社会意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社会意识形态，一个是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是属于系统化的社会意识，而社会心理则是一种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社会上的质的属性，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它并不首先反映并形成社会意识形态，而是首先反映为社会心理，形成简单的东西，社会意识形态是高于社会心理的，它是从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总结和升华上去的，成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而社会存在反映到社会心理，又表现为社会的群体心理。

访问人：这是不是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自觉不自觉地就从社会心理上认识和探索中国国情了？

张静如：我没有查到毛泽东是否曾用过“社会心理”这个词，但同时时代的李大钊是用过这个词的，他说，要注意农民的意识，“此种基础社会之心理，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故“不可漠视”。对毛泽东，我没有深入的研究，但从宏观上看，他是有这种基础的东西的。所以，要深化毛泽东的研究，我想，一个是从整个社会去看，另一个是注意社会心理对他的影响。比如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当时的社会心态到底有怎么样的特色，这些特色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有什么关系，如能进一步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访问人：研究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挖“源”，现在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之源，一个是从西方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本土生长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他又首先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因为毛泽东生在湖南。而你刚才讲的从社会心理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张静如：我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作用，包括湖湘学风也是这样。问题是传统文化发展到近代，它也要跟整个世界的发展相联系，并跟随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不断总结社会心态并使之升华。比如，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要跟社会心态相联系，社会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愿望、要求、情感等等，这些都属于非系统化的意识，好、坏、美、丑，都是一些比较模糊的东西。

访问人：就是说，从它的表面看是初级的？

张静如：对。工人运动开始也是一些初级的东西，主要表现为反抗意识。

访问人：反抗意识能不能说已经包含有意识形态的层次呢？

张静如：仅仅是社会意识，还没有升华，升华就成了意识形态了。作为社会意识，从社会心理上讲，有民族的，阶级的，职业的。相同职业有相同职业的心态，相同阶级有相同阶级的心态，各阶层有各阶层的心态，整个民族有整个民族的心态。

访问人：到了近代，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心态是什么呢？它对毛泽东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静如：我认为，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一个是接受和吸收了外来的

文化，这主要是西方的东西，那时，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介绍到中国来，都予以接收。另一个是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从社会心理方面具体说有以下几个：一个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慢慢在全民族中形成的反抗意识和救国意识。这两个是相通的，既是反抗侵略又是救国。但这种反抗意识还不是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这是意识形态了。对外国的压迫我就反，这是普遍存在于群众中的意识。它们之间就差这么一格。不要小看差一格，这是客观的事实。假定没有这种普遍的群众性的东西，你那个意识形态或者思想体系，准是坐在屋子里脱离实际想出来的。这是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东西。

第二个，是不满现实的情绪。这种情绪怎么来的呢？就是力图改变现实生活状况的愿望。当然，“不满现实”各阶级有各阶级的不同，各阶层有各阶层的不同，但从总体上看，都是要求改变现实，存在一个不满情绪，这种要求和愿望，也是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

由这两点，又决定了在社会心态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焦急情绪，焦急、迫切、赶快、急迫等等；和焦急情绪伴随的还有一方面，即失落感，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失落感非常强，为什么？因为干了一次革命仍然没有成功，社会还是那样，压迫被压迫依旧。在这种情绪下，有的人就沉沦下去了，而有上进的人就产生了竞争意识，因此，失落和竞争又是焦急情绪的两个方面，既有失落，又有竞争。

访问人：知识分子中不甘沉沦的人们，或者说觉醒的人们，是不是就产生了要寻找真理、寻找图强自新的愿望？

张静如：这种东西在群众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我这里讲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普遍的社会意义，当然社会性也要体现在个人身上。所以由这种民族心理、各阶级阶层心理决定的特点，在总结上升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种迫切性、焦急性、竞争性，再上升一步，也就产生了适用性、应用性、功利性、开放性和实践性。

访问人：要有用的？

张静如：对，只要有用，拿来就试。这是在社会心理基础上必然要达到并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特点。

这些特点，就造成并决定了当时社会的基本心理基础。我想毛泽东在他青年时期，在接受各种思潮过程中也是首先遇到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就要从客观上把握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一般社会心理基础。我再重复说一下，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社会意识，包括两个部分，即非系统化意识构成的社会心理和系统化意识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范围内，存在着大量没有系统化的思想要素、某些片断，如关于“好”与“坏”、“公平”与“不公平”、“美与丑”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半自觉”的模糊概念；种种日常生活习惯和风俗；有关社会生活的类似快乐或悲哀、赞赏和不满、渴望或绝望、期待或担心、支持和反抗等意向和念头。所有这些现象，在社会意义上称之为社会心理。当然，社会心理依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群体而不同。所以，社会心理有民族心理、阶级心理、集体心理、职业心理等等之别。简言之，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特定的民族、阶级或其他社会共同体中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它包括人们的要求、愿望、情感、情绪、习惯、风尚、情趣等等。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的社会心理是另一种形式社会意识形态

的思想源泉，或称之为素材源泉。前者犹如一座文库，储存着大量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材料，后者依不同需要任取一种或者若干种经过不同程序的加工而制成成品。所以，也可以说，意识形态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结晶体。因此，我认为要深入研究毛泽东，也要从这个角度挖一挖。

访问人：那么，具体到毛泽东这个人，他有什么特点呢？

张静如：从毛泽东本身讲，他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性格特色有以下几点：一个是求实，求实在毛泽东身上是很突出的，这同他生长在农村有关系，农民本来就是求实的。再一个是求异，所谓“求异者不苟同”。这里的求异不是说毫无根据的求异的，毛泽东的求异是在求实基础上的求异。求异的特征就是发展起来不满足现状。农民很容易满足，毛泽东不满足，他一生中都有这个特征，是很突出的。同时他要创新，就必须实践，所以他总是经过实践之后加以总结，然后推广。从毛泽东的学风上说，在他的早期是求大本大源，他自己说：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所以，他又比较重视理论思辨，这跟湖湘学风以及清代汉学有关系，比较重视实践，这两个方面，既注重理论思辨，又重视实践，两种风格同时并存，交织在一起。

但单纯地求大本大源是要脱离实际的，容易陷入空想，在毛泽东的早年也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他就曾研究过克鲁泡特金的学说，认为应搞不流血的革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从当时的社会看，不只是他一个人，知识界就是不大喜欢暴力，这也是个传统，认为暴力是低下的东西，包括李大钊，开始也不主张暴力革命，他就搞了工会互助团。暴力总是简单的，如果革命能用和平的方式搞成功，何必去流血？所以，那个阶段他们从思想上是拒绝的。那一代人，一开始是绝对不能接受马克思的暴力学说的，只能接受非暴力的社会主义的学说。这一点，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特点，也要看到整个社会的共性的东西。后来经过争论，经过实践，才弄清暴力有两种，这才接受马克思主义。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的转变问题上，为什么他成功地转到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转到无政府主义或其他方面去呢？

张静如：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注意他个人的性格上的作用、个人学风上的作用，也要注意社会整体的作用。从毛泽东个人性格上讲，他注重社会实践，他善于在实践中做比较，他搞新村实验时是真心实意的，而且搞得很热闹，但经过实践总结，那样做是不成功的，行不通，还是走马克思的道路可行。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有段话，说得中肯，表现了他那时的心境，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封信可以说标志毛泽东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封信中还是认为俄国式的道路是恐怖的，从心理上还是不能完全接受。

访问人：认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张静如：不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是没有辙了。时隔不久，一个月后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发言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陈书农）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说白了，这话的意思就是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最有用，别的没用。毛泽东没有往无政府主义道路去转变，我觉得还跟他个人的性格特点有关，他求大本大

源，这个大本大源求错了，再另求大本大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专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就是大本大源，别的方法、别的道路走不通了，自然也就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这也就是实践性的，所谓“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就是他敢于去接受现实，别人不敢的他敢。所以，在毛泽东身上。“求实”“求异”两个性格加在一起，就造就了他的历史作用。

1992年4月2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访李锐——

一个“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

李锐

李锐，1917年生，湖南平江人。1937年武汉大学工学院肄业，后去延安。1951年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次年进京任能源部水电总局局长。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秘书。此后历尽坎坷。1979年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主要有《早年毛泽东》、《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十余部著作。

有段时间，不见李锐的大名：没有文章发表，不出席什么学术会议。自今春始，他又活跃起来，先是关于三峡的讨论，后有市场、关于改革开放诸问题意见的发表。大概也是因了南面春风的缘故吧？此次我们访问百名学者，自然不能缺他。身为高级干部，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又长期坚持对毛泽东的研究，如此身分，他会说些什么？话题是从一个深奥，但对中国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开始的。

访问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得益于“阶级斗争”四个字，失误也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李锐：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取得1949年革命的胜利，从历史范畴上讲，应该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取得胜利的漫长过程中，我认为最困难的还不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这些尽管艰难万险，包括长征这样的史无前例的艰难，从一个方面说，这都好办，因为敌人是明摆着的，不仅全党全军目标一致，广大群众也好动员。最困难的是同党内的错误，特别是错误路线做斗争。其中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达4年统治的斗争，是异常困难的，因为这个路线背后有个靠山，这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原则上讲，必须绝对服从“国际领导”。王明路线那些人是打着国际的旗帜，而且还有个具体的李德其人在，直接指挥军事，是莫斯科派来的。这样就可以吓唬人，也可以迷惑人。井冈山时期也有党内斗争，那还是比较好办的，后来经过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统一了认识。自1933年初中央从上海搬入苏区之后，毛泽东就受到完全的排挤，最后演变到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开始长征。因此，毛泽东同王明路线的斗争最艰难。

过去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战争，完全新式的农民战争（毛泽东自己讲过是农民战争）。我国历史上最后最大的一场农民战争是太平天国，失败主要是由于内江——自己把自己搞垮了（李自成的失败也是进城后内部腐败了），历代农民战争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党虽然有统一的思想信仰，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产自西方，不中国化，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还是不解决问题的，还是会非“左”即右的。要知王明路线也是反帝反封建的，这个大目标并不错的。我们党也几乎把自己搞垮，幸亏有毛泽东的领导，不然，长征就到不了陕北，就可能在长征途中变成石达开。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将已对错误有认识的张闻天、王稼祥两人争取过来，这样在遵义会议中才形成了多数。遵义会议虽然还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但在军事路线上作了总结，批判了王明路线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撤销

了李德的指挥，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并逐渐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所以从历史上讲，毛泽东的伟大，应该这样来理解，就是党内斗争，同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中央错误路线作斗争，并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真是太不容易、太艰难了。

访问人：那么，以后在延安，毛泽东领导全党取得了全国胜利，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李锐：我认为主要是他正确地运用和把握了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和方法。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个伟大的创造。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理论是无产阶级在城市暴动，取得革命胜利。中国阶级斗争的主力军是农民，农民战争必须在农村搞土地改革，发动农民并动员农民参军，才能壮大革命力量。在土地改革中，不能侵犯工商业，不能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尤其不能侵犯中农，也要给地主分地（这些问题，王明都犯路线错误）。转到抗日时期，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土地改革变为减租减息（要争取地主抗日）。这种阶级斗争就更复杂了。于是就出现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时党内不少人跟着走了一阵。毛泽东从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1921年初他给蔡和森的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那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一般也都认为唯物史观就是阶级斗争。这是一个新的方向，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事物。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一直是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很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很难发展，无产阶级就自然弱小。那时有一点工业，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到蒋介石统治，也多是官办的，包括安源煤矿也是官办的，而且有帝国主义的资本在里面。中国的民族资本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控制，发展困难；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两面性，有民主和革命的一面和妥协性的一面。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用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来同外部敌人作斗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看得更清楚了，他总结了一套正确的斗争策略，在全局上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蒋介石国民党联合而不忘斗争，联合中有斗争，斗争中有联合，分寸掌握得很好。如有名的在具体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适可而止。对地主阶级也是实行打拉政策，又打又拉，拉中有打，打中有拉，非常高明。在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为主的情况下，掌握好阶级斗争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整个抗战的领导，表面上是国民党蒋介石，但蒋介石是动摇的，他时刻不忘借抗战削弱、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他的阶级立场是非常之坚定的。我们既要抗战，又要用斗争来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情况非常复杂。抗战时期出现过几次反共高潮，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都化险为夷。新四军曾经受过一些损失，后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长江北岸更发展了。华北的反磨擦，都是我们取得胜利。

访问人：再往后来呢？

李锐：抗战初期不克服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正确的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因而在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中始终不忘阶级斗争这根弦，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解放战争这一场好戏了。对蒋介石的亡我之心不死，毛泽东是看得最清楚的。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7年初和谈最后破裂，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战争前线中度过的，对蒋介石谁也不存有任何幻想，都知道只有阶级战争——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才能解决问题。

访问人：抗日战争后“究竟应当出现怎样的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应该怎样建设，怎样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

李锐：毛泽东将中国的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别于辛亥革命和西方的民主革命。他的有名的理论著作是 1939 年底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谈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阶段。

1945 年《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并且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1947 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反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1949 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10%，而 90% 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从这一总的情况出发，重申前言：“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应当注意的是，在报告的前部分，即谈到“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这里的“资产阶级”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显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因此，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不仅这个报告本身，而且进城之后，到底中心工作是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心到底是发展生产，还是搞阶级斗争？我觉得就这个报告本身讲，你说是这个也可以，说是那个也可以，字面上看似是前者，也可以解释为后者；随后的实践，从三反五反斗争到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很快完成，则无疑是后者了。不知你们看过黄克诚的回忆录没有？

访问人：看过。

李锐：黄克诚是政治家，正反经验很多，一生谨慎，是遇事极用头脑的人。有件事他和我谈过，也已写在《回忆录》中。就是在他任天津市委书记时，大概是 1949 年 5 月间，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问他：“你认为

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不及格。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要抓阶级斗争的。所以建国后运动不断。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从江西到延安，从内战到抗战，他很注意反“左”防“左”。最后一次反“左”是纠正晋西北土改时“左”的政策和做法。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反右，而很少反“左”了。这固然同客观形势有关，但同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也有关。因为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便以资产阶级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三反五反从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来讲，就有过头之处，几十万中小企业都变成了资本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统战部有结论，给予平反了）。镇压反革命是应该的，但也有不准确的。这些当时也难免。

访问人：对镇压反革命方面，我想与毛泽东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有关，早在1926年他给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学员讲话时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镇压反革命不彻底。这个思想是一直灌下来的。

李锐：应当说，毛泽东的“左”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大革命时期就有“左”的东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向完全正确，但也有“左”的东西，如原文本有“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些话的（这种大标语，当时长沙满街都贴着）。对农民的愚昧与过火行动那么支持，矫在过正，反对洋学堂等，他都赞成。李维汉的回忆录写到这些，当年李是当事人。那时也存在统战环境，很多北伐军高级军官的老太爷都在后方。例如长沙将叶德辉杀了，其人是劣绅兼学者，引起震动。

访问人：农民运动触及到国民党将领的一些利益。

李锐：至少可以说不策略。农民运动起来了，过火难免，但领导应当清醒。国民党叛变革命这是很次要的原因。

访问人：建国后，阶级斗争总扩大化，情况又怎么样呢？

李锐：新中国成立后，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还是把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是有失误的。总的看，还是沿用阶级斗争的做法，阶级斗争不仅沿用在政治斗争方面，而且经济建设，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是为了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但是用了政治挂帅的办法，将主观意志的作用推到无限，因而遭致三年困难，反而倒退了，经济受到很大损失，不得不重新调整。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阶级斗争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到最后发展到一个完整的纲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就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终于，他一生的成功在很好地运用了阶级斗争；晚年的失误也在错用了阶级斗争。这当然是一个大悲剧。

这个悲剧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我认为同他的哲学思想有关系。在他早年有三句很有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又把“斗”和“动”相结合。“动”是整个宇宙，他的宇宙观是动的，变化无穷的，“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他的人生观是斗，永远战斗下去，无日终止。终其一生，斗与动相结合，可说是他的一种哲学思想。强调斗争性，忽视同一性；只有实践出真知，都可归于这个范畴。我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对。到晚年，常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最能体会这个思想的是阴谋家林彪，弄个“红宝书”到处摇，变成宗教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抓阶级斗争，各条战线，政治、文化、思想，最后到经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访问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以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是不是也有合理的地方呢？

李锐：《共产党宣言》上讲过“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我认为在三大改造中，我们过去机械地，也可说教条地执行了这一条。在这方面没有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办。马克思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关系最后容纳不下生产力、阻碍生产力而写的。《矛盾论》有一点超过了马克思，就是讲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其中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然，《矛盾论》中的论述，并没有违反唯物论，且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但是，这里“主要的决定作用”同“反作用”两词，究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始终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决定整个人类状况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政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只能起一定作用。革命完了就应该搞建设，不能总是没完没了地搞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是搞斗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一个叫“一分为二”，他实际上是认为矛盾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统一是暂时的，对立是永恒的。特别是把阶级斗争运用到一切方面，运用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所以我认为他后来失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哲学的指导思想。

访问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正确地把握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取得了很大胜利。那么为什么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过头，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过头了呢？

李锐：民主革命时期也有过头的，这就是王明教条主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没收地主工商业，最危险的敌人是中间派，等等。毛泽东一直纠正这些“左”的东西，他始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从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出发，来制定政策、方针、路线。当时，客观上有三座大山压在头顶上，能随心所欲、乱说乱动吗？日本帝国主义占了大半国土，蒋介石几百万军队，还有另外一座，就是斯大林这座大山，有意见也只能“腹诽”。所以说，当年能做到实事求是，除开主观因素上要了解中国情况外，也有客观的制约力量。毛泽东认识到这种力量，不能乱说乱动，也没有本钱乱说乱动。如军事上，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考虑决战。在政治上非常谨慎，军事上也是非常谨慎。1949年之后，三座大山解决了，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随后抗美援朝打下来，美国也不过如此。斯大林盖子揭开，可以吐出多年的“闷气”。在党内更是鹤立鸡群，人人高唱“东方红”，喊毛主席万岁，还有什么阻力呢？无所顾忌，唯我独尊，用不着再谨慎了。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思想根源是他的斗争哲学，还有其他原因吗？

李锐：从中国的实际看，他对中国经济基础的薄弱，以农民为主体的几亿人口文化素质低，即所谓“一穷二白”，这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方面，

可以说认识不够深刻；相反，反而认为“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对我们党来说，主要是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党的干部基本是农民，这就有一个要让绝大多数干部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变成适应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的的人才的问题。毛泽东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并无相应措施，发展到后来，首先是知识分子，通通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49年进城之前，他就说过：“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得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是很谦虚谨慎的，了解到全党最大困难所在的。可是这一精神未能坚持贯彻下去。

访问人：毛泽东本人也是知识分子。

李锐：当然，是大知识分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产自西方，产自资本主义社会，产自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何等不易，这是他的最伟大之处，永远载之史册的功绩。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他所最熟悉的中国国情，取得革命胜利的那些经验，就远远不够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存在一个天然的弱点，不熟悉西方，没有去过西方，不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以及全部有关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是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仅仅改变了生产关系，包括消灭了私有制，而没有相应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建设不好社会主义的。这已为我们从“大跃进”到“文革”二十年的实践所证明。过去二十多年，毛泽东没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而是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中心不放，因此造成国家也造成他自己的悲剧。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全党都没有经验，如果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那我们也不会犯过去他错误。

从经济来说，我们过去仅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样的经验，这在战争年代够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不能沿用了。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过去有过许多糊涂观念。这也有苏联的教训，苏联过去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影响过我们。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我们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但是也还需要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才能解决“姓社、姓资”这样的问题。那些“左”倾思想很顽固的人，不是对改革开放一直设置障碍，不是想沿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批资批修”吗？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恩格斯晚年的一些文章，我们并没有真正读懂。例如股份制的问题，《资本论》和马恩其他著作中都说过，股份制的扩大，资本主义就会起变化，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办法，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可以利用的。毛泽东熟悉中国，不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的情况，不能不令人感觉是一种遗憾。

访问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的经济书很少。

李锐：他把重点放在读古书上。首先要标点的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我去过他的卧室书房，他睡的床上一半边都是摆的线装书，厕所的凳子上还摆有线装《红楼梦》。他大概对外国书不感兴趣。“大跃进”失败后，他才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也不是光讲斗争，还讲过统一战线，比如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上是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包括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百家争鸣是从苏联李森科的问题引起的，这件事他干预了。但匈牙利事件一发生，中国也有些学生闹事，就严重影响了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于是转而搞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双百方针也就搁下了。思想斗争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也能找到。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实践中是列宁发展的。专政是对阶级敌人而言，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尤其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不能搞专政，只能采用双百方针来解决。

访问人：西方文化中一些好的东西，对毛泽东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李锐：什么叫西方文化？我没有研究，说不清楚。西方文化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导致中世纪黑暗时期的结束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三色国旗），彻底地肃清了封建主义，等等。古罗马那个元老院内部是民主的，不同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皇帝圣旨跪着听（跪着听从哪个朝代开始搞不清楚）。你们知道满清的服装是马蹄袖的吗？跪下说话，把马蹄袖口拉下来，表示自己是牲畜、是奴才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非常彻底。英国容许马克思在那里生活几十年，写《资本论》，成立共产国际。德国就不彻底，所以它会产生希特勒。在法国、英国就出不了希特勒，美国也出不了。毛泽东也说过，斯大林那样的专横，肃反杀干部，在西方英美法等国，就出现不了，我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践西土，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熟悉程度。在他的文章中讲话中，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可见他对中国旧籍浸润之深。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常常要起消极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文化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的突出的思想特点“斗与动”，就造成了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

访问人：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吗？

李锐：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

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漫长而艰巨的中国革命，曾经走着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从胜利到失败，又从失败到胜利，即他在延安常讲的，中国革命走了一个“之”字路。在他本人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走了一个“之”字路呢？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初七、八年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很少失误（如有失误很快就纠正）。可是到了1956年，特别是1957年之后，他一生事业达到辉煌顶峰之时，这个“之”字却逐渐曲折地走向下坡。反右派，“大跃进”，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时进时退终于步步下滑走到了他的终年。到了1975年、1976年，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希望有所更改，可是这时已积重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他已经无力走上这个“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这个任务就留给他的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了。

1992年5月27日于北京木樨地

访赵福亭——

毛泽东的几次重大抉择

赵福亭

赵福亭，1924年生，山东金乡人。1945年参加工作。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参加编辑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方面的主编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年谱》副主编之一。

他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组组长，几乎参加和主持了新时期以来所有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由他来谈毛泽东，当然是驾轻就熟的事。

访问人：您多年从事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的研究，对毛泽东的文献和资料很熟悉，就您的研究，您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过几次重大的抉择？

赵福亭：这个问题很大，也难以有确切的定说，只能谈点个人的看法。

毛泽东是20世纪的伟人。就近代中国来说，从20年代到70年代，可以称作是“毛泽东时代”。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毛泽东唱了主角，每个历史阶段的关键时刻都留下了毛泽东的印记。这不是夸张，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学生时代在湖南就是一位突出的很活跃的人物，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以后，很快就显露出他那对中国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非凡之举。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独立的、统一的、人民生活有根本性改善的、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是多少仁人志士的梦想，而实现这个梦想的领头人是毛泽东。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一整套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使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你们提出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几次重大的抉择？我认为，可以说有五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重大抉择，对于推进中国革命运动，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次抉择：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访问人：那末就先请您谈谈第一次的抉择吧。

赵福亭：第一次，是20年代初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说他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书读得并不多，只从中汲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这是极而言之了。他说从这里开始，就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进行许多寻找革命真理、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尝试。他在青年时代就把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个透，独创性地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搞学生运动，搞自治运动，甚至搞新村式的试验。经过反复比较，他得出结论说，看来用老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是不行的，要搞俄国式的革命。走俄国人的路，“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说他一旦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为之奋斗终生，从没有动摇过。

访问人：毛泽东的这个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他显示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

赵福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并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的过程中，如前面所说，毛泽东与其他许多同代人相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掌握

上，并不具备多大的优势，但他悟性高，能很快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并且运用得好。毛泽东是一个农家子弟，他所处的社会天地并不宽阔，但一上场就显示了他那才华出众的伟人气质，他在青年时代就曾说过，要救中国就要有“奇杰”，有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这表露了他的雄心大志，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就是这样的“奇杰”，这样的“大家”。

访问人：这么说，一定有好多的特点了。

赵福亭：是的。我认为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他有惊人的洞察力、想象力和独创精神。他的思想永远是开放的，永远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开拓新的思路，像他说的那样：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具有极其强烈的创造精神，一接触新事物、新情况，就提出一种新观点、新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他青年时代就认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有“具体、鲜明、热烈”的创新观点。他说“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具有创造性，不同实际相结合，即使他的马列主义学富“五车”，也是没有用的。

其次，毛泽东是一位大思想家，但不是空中楼阁的空想家。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确认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注重研究中国，研究东方。这也是他具有的第二个特点。毛泽东从踏上社会那天起，头脑中就装着三个东西：一个是要强国富民，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统一的中国，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是要搞民众大联合，要依靠群众创造世界，早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就认识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民众大联合，缺少工农两界群众参加；一个是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这三条可以说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实践之中。毛泽东坚持认为实践出真知。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迷信本本。他搞革命，同有些革命领袖人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大量地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去找出在中国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和道路，而是在实际斗争中，像他说的老老实实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去学习、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成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日益地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上，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主张、方法和政策，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虽然他所论述的问题，马列主义的本本上可能没有具体地阐述过。我们通常说的，毛泽东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地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这样说，并不是说毛泽东不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说怎样学、怎样用。应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是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他曾说我们党有一百个、二百个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中央的几届领袖中，一个主要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第二次抉择：上井冈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访问人：您刚才讲的是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时所具有的必然性和特点。毛泽东第二个抉择又是什么呢？赵福亭：这应该说是上井冈山了，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个抉择也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

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曾设想中国革命和俄国不同，不能先总解决后及一般。他说，俄国那时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可靠的党众，可以一举成功，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能先抓全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能先总解决，要从基层做起，从各省做起，然后来个总解决，总革命。青年毛泽东想试一试，他搞过自治运动，但由于条件不具备，用的又是资产阶级的老办法，结果失败了，只好“另辟途径”。但有一点萌生的看法是可取的，这就是从一省做起，从条件具备的地方先解决而后及于全国。后来，毛泽东参加了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大革命运动，这可以说是从一省做起的。但那是以城市为中心，党的组织和领导的重心在城市不在农村，没有认识因而也不可能发挥农民这个主力军的作用，没有找到能够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的革命场所。

在中国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个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1925年“五卅”以前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农民问题认识并不深刻，“没有人研究过”，“党里也很少有人注意”，那时也说农民重要，但重要在哪里？关键问题何在？并不十分清楚。农民问题的概念很宽泛，有好几个阶层，依靠谁团结谁，才能真正把农民的作用发挥出来。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的，在中国应该首推毛泽东。他说，所谓农民问题，主要的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群众，贫农是革命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把农村各阶级、阶层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分析和认识十分重要，否则阵线不清，无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另一个是中国各派军阀的统治因帝国主义分割而不统一。这种各派军阀分割斗争的局面，给开展革命斗争以很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阀统治的认识比较早，打倒军阀一直是个大目标。但中国各派军阀割裂统治所造成的极其反动极其混乱的局面，必然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而成为推进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也是毛泽东最先阐述清楚的。他早在1923年《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作过专门的论述。毛泽东抓住农民和军阀统治不统一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最基本的国情，就找到了革命军的主力所在。找到了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反动统治薄弱的地方也在农村，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战场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一条新的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访问人：这个抉择的意义的确非常重大。如果没有它，中国共产党也许还会在黑暗中摸索。但是对这个抉择产生共识，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赵福亭：可以这么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起义的目的还是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包括当时党的领导核心和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都是这样看和这样做的。毛泽东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被全党认识并接受有一个过程，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统一。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苏区以前，党中央执行的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排斥毛泽东，批评毛泽东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说以农村包围城市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

念”，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等等，致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大挫折。

第三次抉择：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

访问人：在贯彻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上，还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吗？

赵福亭：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仅仅开创并确立了这条道路，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形势，没有革命的客观条件，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出的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个抉择，就是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在北中国求发展。抓住北上抗日，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抓住了革命的契机，掌握了能够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从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固然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北上的原因，但是即使不被迫长征，照中国当时政治发展的总趋势也有一个要考虑在哪里可以得到发展革命势力，逐步走向胜利的问题。我认为，那时北上抗日，把革命领导重心转移到北中国是一个具有决定中国命运的大的战略方向的问题。

访问人：关于抗日，应该说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权。只强调毛泽东的抉择，重点是在北中国抗日，在北中国求发展上？

赵福亭：是的。你们都清楚，1931年，特别是1935年以后的中国。日本侵略军妄想霸占中国，妄想由东北而华北，进而灭亡全中国。在这种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领导全国人民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才能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势力，中国人民才有出路。那时，中国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农、小资产阶级坚决抗日，固不必说，民族资产阶级也起而抗日，国民党内部的英美派、各地方实力派，特别像东北军、西北军中，抗日的声浪日益高涨。毛泽东抓住这个革命的大好形势，大好时机，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两项决策：一个是政治上有可能也有必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组成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是军事上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猛烈扩大红军”，使红军成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队，提出并确定作战指挥上的各项基本原则，分步骤地巩固发展苏区、扩大抗日力量。

要抗日，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地盘，有一个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江西是呆不住了，到哪里能够迅速地开展革命斗争呢？我前面说过，日本是从北中国大肆侵入的。从中国的全局来看，这个革命的主要战场，只能在北方，在能够直接对日本作战而又靠近苏联当时可能给予支援的地方。选择这样的地方，还要考虑到：第一物产比较丰富，能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第二人口比较众多，可以扩充红军，可以发展革命力量。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北上抗日，后来又有东征和西征，其目的都是为着找一个能够发展革命势力，能有一个“在发展中求巩固”的地方。如果在一个敌情、地形、人口、气候、粮食等都难以解决的、难以存在的条件下（如张国焘主张的那样）革命势力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提出并确定在陕甘宁，特别在华北大大发展革命势力的主张，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这样的地方就可以对日直接作战，政治上占有极大优势，而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有条件发展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力量。事实证明毛泽东北上抗日这个抉择的无比正确性，西安事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各实力派都赞成抗日，从而形成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卢沟桥事变，全国全民的大规模抗日战争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抗日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三个战略性的决策，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的持久

战，坚持红军游击战的战略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这三条，在抗日战争中人民革命力量大大地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大胜利。

第四次抉择：和蒋介石统治集团最后决战

访问人：审时度势，抓住革命形势，革命机遇，在这方面毛泽东确有过人之处。下面请您说一说另外两个抉择吧。

赵福亭：毛泽东的第四个抉择，就是确定中国人民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最后的大决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中国共产党人是积极主张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的。但蒋介石亡共产党人之心不死，借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机会，积极准备内战。其实毛泽东早就看穿蒋介石的用心，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是要打内战的，这是蒋党反动本质决定的。到1946年，蒋介石已经拥有420万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120万。蒋介石有美国庞大的军事、经济援助，有新式的武器装备，而人民军队则是小米加步枪。那时，蒋介石气势汹汹，扬言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怎么办？是打还是退让妥协？当时国内国外也确实有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处于劣势，而对强大的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能不能取胜，打了个问号，有些悲观和信心不足。而毛泽东则像柳亚子说的表现出一种“弥天大勇”，提出要同蒋介石斗一斗，来一个历史性的大决战。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不是有点冒进和冒险呢？不是，是有根据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磨难，积累和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又有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而蒋介石统治集团则腐朽无能，彻底地脱离了人民大众。在解决战争开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提出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是因为他通晓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能把握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全局，从而作出大决战的这个抉择。为了保证大决战的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出一系列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各项具体政策。他以那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中外少有的军事指挥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到4年的时间，就摧毁了蒋家王朝，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各族人民的历史。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使中国人民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屈辱，抛掉那种悲惨的生活，而走向光明的未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第五次抉择：快点跨入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第五个抉择，可以说要中国快点跨入社会主义，找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抉择是前面说到的四大抉择之后的必然结果，也是毛泽东努力去实现强国富民愿望的继续。新中国的成立，人们欢欣鼓舞，但面前摆着的的是一个烂摊子，要改变这个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困难重重的，民主革命中遗留的问题还很多很多，而蒋介石反动派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要妄想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站住脚，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建设好这个国家，人们心目中也会有一个问号。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决心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先解决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开展土改、镇反等项大运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在我国国内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敢于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勇敢地担当起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大任，从而也就大大地显示了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显示过的国威，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了。在几大运动胜利之后，接着搞三大改造，到 1956 年，把中国还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国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制，农民、手工业个体私有制，也基本上转变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社会性质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提出了许多有远见的主张，如要处理好十大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农轻重的关系等。但是毛泽东在寻找中国建设的道路上，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面，要求过急过快，搞了大跃进，出现失误。毛泽东晚年违背了他一贯坚持的好作风，调查研究少，有时真实情况了解不到，处理问题不够实事求是，不够谦虚谨慎，骄傲了，甚至听不得不同意见，再加上把他熟悉的搞阶级斗争，搞群众运动一套办法，继续推广到建设中去，后来又搞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们对毛泽东这位伟人非常敬仰，但对他晚年犯的错误也甚为惋惜。

最后，说到毛泽东的一生，他有过失误，但他还是一位伟人，人们称他是“绝代风骚”，不为过誉。前面说的几个重大抉择，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而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性意义的，还在于他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就民主革命来说，我认为他的理论贡献，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一条道路，两条路线，三个法宝。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土地改革的总路线，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此外，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也都为我们党留下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评价是非常恰当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二十世纪一大半的中国历史，理所当然地应当用重笔写下毛泽东的光辉名字。

1992 年 8 月 5 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访陈晋——

我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陈晋

陈晋，1958年生。籍贯四川。1982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1986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曾工作于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文艺评论与毛泽东研究。有《文艺的观念世界》、《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悲患与风流——传统人格的道德美学》等专著。

陈晋近几年的研究颇受人注目。年龄的优势更使他的思维敏捷而活跃。由于我们和他挺熟，聊起来也就很随意。话题是从他新出版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两本书开始的。

打开另一扇窗户，你看到些什么？

访问人：最近看到了你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本是《毛泽东与传统文化》，都与“文化”这个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你没到文献研究室以前，主要是搞文学评论的，从文化个性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在你除了“因地制宜”的原因外，还有对毛泽东研究本身的一些考虑吗？

陈晋：如果说我来这里搞毛泽东研究是意料之外的事，那么，从文化个性的角度写毛泽东，正如你们所说，则在自己意料之内。熟悉党史、哲学史或经济学史的人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角度和模式，这是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的。就我来说，选择文化个性这样的角度，有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的切实考虑，也有创新的愿望。从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研究较早的汪澍白教授取得的成果就是一个例证。

访问人：从文化个性的角度来剖析毛泽东，是不是也意味着可以避开或功或过的硬性定论？

陈晋：可以这么说，取一个软性的视角，这对读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新意，哪怕是同样的内容。比如，对于“大跃进”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共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明确的阐述。而我的研究视角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处在什么样的心态之下？举个例子，他那时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喜欢读《楚辞》、喜欢读《离骚》，浪漫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读了以后还给江青写封信，说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心中喜悦，有所领会之类的话。这就很值得玩味。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对发动“大跃进”运动举足轻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去读《离骚》，读得那么晚还要给江青写信，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到底领会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又是怎样进入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充满驰骋想象的那种诗境，与几千年前的诗人对话的呢？有人统计过，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读过好几遍《离骚》。又比如这时期，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和外宾的谈话中也似乎不着边际地问道，我们到底是住在天上还是地上，这个问话，他还拿到中央的会议上说过；他读《光明日报》发表的介绍苏联火箭之父成长经历的文章时，在充满幻想的一段文字描写之下画了很多的着重号。这都是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的。我力争把这些描述出来，挖掘出来，归纳之后作这样的表述：在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毛泽东的始终是他的浪漫性格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在一个诗人、哲学家身上，是

充满魅力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不单是诗人、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管理者，优势扩大了范围，用错了范围，就变成了劣势。我就是这样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接近毛泽东的主观心态，一方面有利于了解他的主体特征，另一方面对他在现实实践中的一些功过作新的层面的剖析。

访问人：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就必然离不开研究毛泽东的社会实践和中共党史，这中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我们现在的研究状况来看，比较习惯的思路是从重大的党史事件中看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或者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去研究毛泽东思想，这方面的成绩不小，研究起来也驾轻就熟，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落入了某种研究模式呢？意味着忽略了毛泽东的性格本身的研究？

陈晋：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研究一伟人，当然要和历史事件及其思想路线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上面；而且，通过事件折射出来的也是他的个性，因此，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去看毛泽东，可能会更直接一些。打个比喻，如果毛泽东研究是个房间，大家都从这扇门进去从南往北看，那么我就绕到后面打开后面的一扇窗户从北往南看，这个角度不一定比从南往北看好多少，但至少弥补了从南往北看所看不到的东西。

访问人：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看起来这样的窗户还不少。比如毛泽东的人际关系，他和他的战友、朋友、下级，甚至他的对手、敌人的关系怎样？从这其中表现的毛泽东的性格又怎样？这样的研究恐怕还不够。缺少这种种角度，不打开这一扇扇窗户，就很难说是全面地走近了真的毛泽东，真正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认识他，理解他。

陈晋：可供研究的领域的确很多。举个例子，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0年淮北地区发大水，受灾严重，毛泽东看到一份报告里说有些灾民为躲水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伤心地掉了眼泪，很感人。我又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地区受灾严重，淹了好些地方，毛泽东听后说：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觉得，这并不有损于毛泽东什么。恰恰这两个例子反映的是毛泽东性格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同劳动人民的天然的感情联系，另一个是他那种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访问人：也就是“不破不立”。

陈晋：毛泽东叫好，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吓倒，这就毛泽东的个性来说，是很自然的反映；就像他1959年在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一个报告上批示的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另外，他想得更远，旧的去掉了，新的建设有待我们的加倍努力。这两个例子一个感伤，一个叫好，孤立起来看是对立的，但放在一起仔细琢磨，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方面互补起来，才是完整的毛泽东。

天然的现代型个性与中国传统文化

访问人：厦门大学的汪澍白教授也是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似乎角度不一样。他主要从哲学、政治上探源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你是更着重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那么，文化性格到底是指什么，你能不能作一个概要解释？

陈晋：这很难说清。我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本书的后记里，说自

己写作的侧重点是：人格道德、社会理想、政治革命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毛泽东的主体个性及诗文意气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等等。所谓“文化性格”大体就包含了这些内容吧，不知道能不能表述准确。中国这片文化土地给了毛泽东什么？毛泽东从这片土壤中又吸收了些什么？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和表现出来的？前一个问题具体他说，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渗透到毛泽东血液里的是哪些东西，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状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环境又给了他哪些东西，这是文化；后两个问题，毛泽东怎样吸收以及吸收的方式，他有别于他人的表现，这就是个性。把“文化”和“性格”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用得不多，也不一定规范，但它有两个好处，一是明确性，指明我研究的主题在文化与它的主体这两个范畴之内，二是含混性，用它来避我所短，扬我所长，使用材料能够说明他的个性特征的就用，反之不能说明的就不用，自由度更大些。

访问人：那么，就你的研究来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是怎样的？

陈晋：我谈些随感吧。有些说法我过去没有表述过。单从个性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换句通俗点的话说，是最时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是往前看的。纵观他的青年时代到晚年岁月，他一生厌烦的就是陈词滥调，墨守成规，而对新生事物不但乐于叫好而且乐于接受。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文明的崇敬者、追求者、构想者乃至描绘者，但是（这里有个但是）由于客观因素——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社会现实状态乃至中国革命具有的特点的影响，以及他的知识背景的局限，又妨碍毛泽东成为具有彻底的科学理性的现代型人物。人，总是不能超越时代来塑造自己的。

访问人：那么，现代型个性与传统思想的影响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在毛泽东身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

陈晋：它们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是相背的，有的时候则显现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进行剥离。

访问人：能举个例子吗？

陈晋：比如说民主与革命。毛泽东从小就反抗父亲严厉的管教，求学时期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后来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光辉成果，它的精髓之一就是反对阶级压迫，反对不平等的制度，求得全人类的解放。毛泽东自始至终是抱着这个信仰的，包括他晚年，看不得小人物受压制，总替他们说话。这既是他天性的表露，也是他后来接受现代文明发生的效应。追求民主，追求平等，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相当核心的两个方面。以现代性的民主、平等来反对专制、压迫，这样的事在毛泽东一生奋斗的过程中是很多的。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由他来为中国革命掌舵时，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和目标，然而他最终所选择的方式都是以暂时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永久的平等民主；以对一部分人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更多人的长远的平等与民主。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仍然用这个方式，就未必妥当了。这是从实行民主、平等的手段和方式上来说的。

另外，从毛泽东对民主、平等的构划描述来看，他是过多地强调结果的平等。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袱。“平等”两个字在中国不是新鲜词，哪一起农民起义没有提出劫富济贫的有均贫富思想的口号？这类口号要求的是平等，但它和西方现代文明所讲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平等不同，它不讲

起点而要求同时到达的结果。如果说这在封建剥削制度下没法让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来追求平等的情况下，是势所必然的话；那么，在已经完成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进程以后，就不能这样了。毛泽东后来在民主、平等问题上有所失误，恐怕就在这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做法就是这样。

“五七指示”也是一个例子。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其实这种思路在延安时期他就有，他对劳动模范们讲话，说你们也应是军人；他对抗大学生讲话，说你们是军人，在这里读书，又能开荒生产。这种思路给人的感觉就是谁不能比别人强，也不能比别人弱，每一个人都应该担当起社会的全角色，身分、能力都要一样。1958年和“文革”两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权利），不是偶然的。

访问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在学术界多有讨论，没有对中国这片土地深刻的了解，就无法实现对它真正深刻地变革，这是无疑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负效应呢？传统的羁绊，是不是也限制了现代型个性毛泽东的眼光，限制了毛泽东向前迈进的步伐？甚至有的时候在拖后腿？

陈晋：毛泽东是一直向前迈进的，但他有时却用传统的方式迈步，他对前景的勾划也有很深的传统的烙印。

访问人：可以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现代型的个性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同时作用在他身上，那么他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他更多地得益于自己性格的哪一方面呢？

陈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是需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切实深刻的了解的。我觉得，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四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有意思的是接受西方文化更多的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孙中山是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但他却无法驾驭辛亥革命，被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篡了权。蒋介石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很多，在军阀混战中他却站了28年，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政权。周恩来很受西方文明熏陶，但他最终只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批“反冒进”以后，很难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毛泽东成功了，他很明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搞起来的，要达到胜利的目的，不可能不借用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手段，“八七会议”后他带兵上井冈山，就是一个这样的选择。

访问人：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与周旋中，也非常熟练地运用了中国的谋略。近代以来，有许多仁人志士从西方从苏联留学回来，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但最后的成功者却是从来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仔细想来，这里边的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问题上来吧。

时刻可见的“对立统一”

陈晋：我现在正构思写一篇文章，内容是写在毛泽东身上时时刻刻可见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东西。这里借用毛泽东常说的“对立统一”，表达的意思是说，在毛泽东身上时常同时存在融会了两个极端相反的气质。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现代与传统是一个，此外，还有现实与浪漫；“虎气”和“猴气”；政治家与诗人：逞强与懦弱等等。

比如“猴气”，就是道家的灵活性，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追求人生与世界的最终价值。“虎气”，就是儒家的庄严，威武，

统一。毛泽东一身兼具这两种气质。其实，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存在。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提出过反儒反孔，但我认为，实际上他是在最深刻地接触儒学之后才反儒的。对儒家的那一套，他吃得最透，而且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融化到血液之中去了。人常有这样的情形，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所瞧不起的，而对不熟悉的东西反而恭敬有加。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一直是持很恭敬的态度，他反儒，但他的言谈之中，书信之中，却随处可见孔子孟子的原话。他熟悉诸子百家的著作，运用时随手拈来，炉火纯青。青年时代，他曾立志要做圣贤之人，探究人生的大本大源，崇尚运筹帷幄，而对纵横疆场，野战千里的人不以为然，认为只是豪杰而已。这都反映了他与儒学之间的联系。晚年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讨厌孔子，是很耐人寻味的。

访问人：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发表过不少反对尊孔的文章。

陈晋：是的。但那只是追随着时代的潮流，反对当时尊孔的思想气氛。他不是说过吗：我们反孔不为别的，单为他独霸中国的思想。至于反孔到底反些什么，他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细读他的这些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讲过，他是一个现代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处在“五四”这样的时代，他肯定会大喊反孔而不是去做别的。那时他大喊反孔，却没有触及儒学的实质性东西，他写反孔的文章，而不久前他还在谈圣贤之人与圣贤之事。他反对孔子，目的只在于促进思想自由，而不是反孔子本身。他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这本身就带着儒家的色彩。其实不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都有反映，拿来为我所用，并且融为一体。墨家是与儒家反其道而行之的，强调务实、勤苦、节约、禁欲、集体主义与献身精神，这是从下往上走的小生产者的人生哲学。中国革命的力量是由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组成的，因此，对于墨家学说的影响非常易于接受。毛泽东对墨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墨子是比较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看上去相反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却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还有做政治家又做诗人。做政治家与做诗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诗人当政治家往往是失败者，政治家写诗往往很干瘪乏味，但毛泽东既能当政治家还能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他把这两个范畴的东西统一起来，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既成建国大业又写诗的曹操评价很高，也很爱读他的诗。相反，他批评坐享其成做了帝王后来又丢了江山的李煜，说他只会写诗不懂政治。毛泽东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他自己做诗挥洒自如，政治上也驾轻就熟。这是他独具魅力的个性，也是天才的显露。

访问人：要不怎么说这样的人几百年出一个呢！

陈晋：还有逞强与懦弱在毛泽东身上的统一。所谓逞强，就是不但不信神，不怕鬼，而且要打鬼捉鬼。看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往往是越处于逆境当中他的才华就发挥得越充分，他喜欢在压力下生活，日子过顺了，好像反而没意思，有时免不了人为地制造点压力。

访问人：说到这里，使人想起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有过的一次谈话。那次，毛泽东讲到自己时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些。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不骑马，坐汽车、火车、飞机。……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他还说：简单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一些。这是毛泽东的生活态度，表现在宇宙观上，他就强调世界的不平衡的一面，动的一面，强调斗争的一面。

陈晋：是这样。这是逞强的一面，他的另一面就是懦弱，非常同情、照

顾、扶持、抬高那些小人物，有时甚至不太讲原则。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随处可见。

访问人：这大概多少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上学时，富家子弟看不起他这个农家子弟。革命初期，在党内留过洋的，学过军事的又看不起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在江西的时候，就曾有人针对他说，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

陈晋：他给小人物们做思想工作也是很有特点的。1959年时，他告诉农村的那些穷队，穷要有志气，王国藩不是靠三条半驴腿办起了合作社吗？搞出点样子来给富队看看。他就这么做工作。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性格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的思维方法也是什么事情都习惯于一分为二。他的成名作，《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打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富有个性的政治生活的开端，也是反映他政治思维方式的开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就是这么把世界劈成两半的，不属于这一半，就属于那一半，并且一旦作出选择，就一生以这一半去反对另一半。

访问人：这种思维方法是中国式的？

陈晋：不是。中国人喜欢调和，搞中庸，不善于搞非此即彼。打倒一方树立自己是西方的思潮。就拿文学来说，最早是古典主义，是浪漫主义把古典主义打倒了才起来，后来是现实主义打倒浪漫主义以站稳脚跟，再后来又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国人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四书五经，就那么一点点，几千年来注家纷呈，把它们的内容越说越多，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反儒的人，也要借注解经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思想方法上应该说，西方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毛泽东习惯于把世界劈成两半更多的是从西方的文化思想中来的，但同时毛泽东本人又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所以我说他的思维方法是中西合璧。

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是在什么起点上用什么方法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并没有读多少马恩著作的原文，他读的只是仅有的几本别人的翻译本，他抓到了其中的一条核心，这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他最早理解的唯物史观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一大贡献，但毛泽东抓住了它后把世界劈成了两半，“一分为二”。毛泽东找到了这个方法之后，延伸到意志上来，便是他的目标是无穷尽的。他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不到黄河不死心，到了黄河心也不死。不断革命，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共产主义，传统的表述是平等大同，仁。这是人类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一个理想，但这种几乎永恒性的目标一旦被当作阶段性的目标来实现，最后就会出现像“大跃进”这样的失误。毛泽东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奋斗目标的无穷尽。把世界劈成两半又没有穷尽的目标，这使得毛泽东习惯于斗争，习惯于压力，如果一旦没有压力，他就会不自觉地人为造成一种压力，去进入下一个阶段，去接近他的永恒目标。可以说这是造成“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错误的毛泽东性格上的原因，这就又回到他的个性分析上来了。

访问人：看来，对毛泽东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

陈晋：好的。

1992年7月27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访高路——

毛泽东与中国文史典籍

高路

高路 1954年出生在安徽省颍上县。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编辑和研究工作10个年头，现就职于《经济日报》理论部。主要著作有：《生活中的毛泽东》、《西方政治思想史》等，以及《毛泽东与逻辑学》、《毛泽东与新闻工作》、《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转变》等论文。

高路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因此谈起来很随便。他是我们采访中较早的一位，这不仅因为住处较近、相约方便，而且对他十余年的研究情况也熟悉。

毛泽东读过哪些中国书

访问人：毛泽东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自己说过，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书不可以不读，那么，他到底读了哪些中国书？

高路：关于毛泽东读中国书，我认为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关于中国的书，主要是历代典籍中记载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状况方面的书；二是中国人写的书。后者比较宽泛，内容涉及的也多。我仅就前者谈一谈。

中国的文化遗产反映在典籍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集中在文史方面。这和西方文化有些不同，西方的传统文化从古希腊开始，都有比较系统的学科，如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就专门作了分类研究，罗列了一百五十多种政体。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开始，主要是修史，因此，就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在社会学领域，而社会学领域又着重在文史方面。关于经济的、法学的专门著述比较少。

毛泽东读书，大体可分为三类。首先，他读得最多，对他影响也最大的是史书。中国的史书是特有的，中国的政治学就主要反映在历代的史书中，而史书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正史，一类是稗史，再一类是演义。正史的主要典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毛泽东都读了。《二十四史》从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写《史记》开始，一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写《明史》，共撰写了一千多年；书中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也跨了二千多年。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读得最早的是《史记》，大约他在湖南省立高级中学读书时就开始读了，还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也读了一生，直到晚年他还在读。这里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史记》、《汉书》、《三国志》、《晋史》、《明史》。关于稗史，即人们通常说的野史。稗史不是官方的，主要是当朝文人的笔记集。毛泽东读这些野史是当作研究历史的材料读的，是作为正史的补充。演义，主要是历史小说。有材料介绍说，毛泽东读过历代的通俗演义。毛泽东看这些书主要着眼于里面透露出的信息，很有特色。他不像严格遵循考据学的史学家那样看待这些演义、稗史，很明显，他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政治家，从历史财富里面获得智慧并吸收知识营养的。

第二类是文，这个文是广义的文，即文化，主要是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等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这一类中最主要的是他读《四库备要》。《四库备要》概括了《四库全书》的精华。逢先知同志著文说《四库全书》毛泽东全读了，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从他的知识的涵盖面也可以看

出来，有时他讲话的引文从《四库备要》找不到，而在《四库全书》里面才能找到。毛泽东也非常喜欢读中国的传统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等等。《红楼梦》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部书，他自己说读了十几遍，显然他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来读的。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诗词是毛泽东读书的第三大类。从《诗经》开始，历代的诗词曲赋，毛泽东都有涉猎，都感兴趣，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我体会，最使他震撼心灵也最使他热血沸腾的还是楚辞、宋词，是屈原、辛弃疾的那种慷慨悲壮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有人说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他们也许能说出道理，但我不那么看。关于散文，毛泽东也喜欢，这里面他最欣赏的是柳文，从他给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作序可以说明这一点。

访问人：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三大块，其他方面的书籍毛泽东是不是也喜欢读呢？

高路：那当然还有好多，也是毛泽东喜欢浏览、阅读的，比如杂书。外界人们不太了解的是毛泽东还爱读笑话一类的书，他喜爱幽默。幽默往往是智慧的结晶，有头脑有智慧的人才能有幽默，才能理解幽默。还有兵书，毛泽东曾系统地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国的《孙子兵法》。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读《孙子兵法》，曾听到一些传说，说是在遵义会议上，当时还持教条主义观点的何凯丰曾质问毛，你打仗不就是靠《孙子兵法》吗？

高路：是有这个说法。据后来毛泽东自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孙子兵法》这本书当时他还真没有看过。他当时机智地反问凯丰，你知道《孙子兵法》的内容吗？其实，何凯丰也没有看过。关于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现在掌握的材料，是在到了陕北之后，1936年他曾写信给在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专门提到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毛泽东读书特点是广泛涉猎，什么书都读。他从史书中吸取的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智慧，可能要远远超过专门的传统的军事著作。

访问人：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政治活动家的著作是否也在毛泽东读书的范围？

高路：这可以说又是一大块，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以及孙中山、鲁迅的著作他都读过。他早年崇拜康梁，就是因为读了他们的书，才引发了救国救民的理想。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曾用笔名“子任”。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曾成为毛泽东的思想启蒙读物。毛泽东早年创办的新民学会，其中“新民”一词也来自梁启超那里。

访问人：有人说，毛泽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个说法不一定完全恰当。我想知道他读过关于天文方面的书吗？

高路：读天文书，具体是哪些，不一定说的准。但有一件事，60年代，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时曾问到关于物质观方面的问题。后来李政道回忆说，毛一问，我自己也愣了，还不知道。可见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很广。还有其他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只要有可能，他都找来读，比如冶金、机械、农业等方面的就是如此。

他读书干什么？——认识中国，改造中国

访问人：刚才我们谈了关于毛泽东一生读书的情况，大致有三大类，还

有一批归不了类的,看来也差不多了。你能不能谈谈毛泽东读这些书的目的?

高路:概括他讲,毛泽东读中国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建设新中国,包括改造和完善他自身的主观世界。

访问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高路:我使用“中国”而不使用“世界”这个词,因为“世界”含有多意,而“中国”更能明确表达毛泽东的读书目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一个观念,要改造中国,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他没有去出国留学当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主观上,却是这个观念在起作用。这个观念他一生中从未动摇过。他终生偏爱读有关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书,根本目的也在这里。

访问人:能不能谈得具体些?

高路:毛泽东的读书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匡时济世”。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理论联系实际。围绕着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读书,读书与实践相结合。这种读书目的作为一种学风,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结晶。经世致用的学风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经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大力倡导之后,清代以来逐渐在文人学士中形成主流。毛泽东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发生在湖湘文化的氛围中。湘士学风中经世致用的色彩尤为浓重。对青年毛泽东学风影响较大的曾国藩、谭嗣同都有这个特色。而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即是:自由是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认识与实践、学(读书)与用紧密结合。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的目的在于使用。”他形象地用“有的放矢”来比喻正确的读书和学习风气。回顾一下毛泽东读书的经历不难发现,他是伴着实践的需要安排读书生活的。战争年代读马克思基本原理和有关军事的书偏多,建设年代读有关资政、经济、治国的书偏多。30年代末和50年代末60年代初重点读哲学方面的书,是为了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40年代初和50年代末重点读有关经济方面的书,是为了解决经济建设问题。长期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显然是想从历史中寻找兴衰治乱的智慧或启迪,目的是在资政治国。西方的思想家培根就说过,读史使人睿智。从历史中吸取智慧也是中国的传统。毛泽东曾与黄炎培探讨过历史上的“兴亡周期律”问题。他读史书就想寻找跳出历史上“兴亡周期律”的途径。以上是说毛泽东总的读书目的,或根本目的。这并不排除其中读某些书是为进德修业、陶冶性情以及欣赏消遣等其他目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有改造、丰富、完善主观世界的任务和目的嘛!

读书对毛泽东的影响

访问人:你能不能再谈谈读中国书对毛泽东的影响?

高路:毛泽东在世时人们就有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读书多偏重在文史方面,特别是用很大精力读《二十四史》,似乎这是个缺点,并以此来非议他。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从知识结构这方面来说,确实是个缺陷。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尤其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决策者,他的知识结构,不能不影响到决策的质量。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偏重于读中国书,受益是主要的。一个人爱读某类书好不好,取决于是否管用。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对自己一生的功业做过一个概括,他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完成了民主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这是毛泽东创立的一代伟业。此功此业中包含着读中国

书的正面效应。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烂熟于心，他的文章、讲话中对中国历史典故信手拈来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能不使人佩服。这帮助他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创了建立新中国的伟业。

访问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高路：从他所处的时代，从他肩负的历史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三者结合起来看就会清楚。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历史转型时期，同时也是文化转型时期。五四运动带来了一次真正的中国文化的革命。可以说具有改天换地的味道。但在这个时期，即使倡导新文化的胡适，到他死为止，他的著作、文章也没有能够彻底地达到通俗化，即白话。这个时代的文人，要想立足，不能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对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如果没有深刻把握的话，就难于驾驭这个时代。应该说，毛泽东的确了解这个真谛，并得益于这些。没有这一条，单靠背诵马列的词句，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内经过反反复复的比较之后，最终选择了他，这里面必有必然的东西。其中毛泽东本人的中国文化功底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使他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也就是说，他用中国的通俗的语言、中国的历史事例乃至故事，成功地向各阶层的中国人民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他那里已经不是一些条文，一些现成的词句，而是作了很好的加工和发挥，变成为广大中国劳苦大众所熟悉的、喜闻乐见的、可以接受的东西了。这一点，王明等人至死也没弄明白。从这一点上看，即使再给王明一次机会，他还是不行。

访问人：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个很深奥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也就是怎么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交融的问题。

高路：对。中国的劳动人民多数是不识字的，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通过文字进行传播的知识层次，一个是由普通常识、生活习俗等等凝结起来的通过口头、行为进行传递的知识的层次。后者同样包容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所遵守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乃至价值观等等，即包容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访问人：就是说，毛泽东读书，吸收传统文化，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主要得益于这里。

高路：对。毛泽东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并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成功的改造，最终达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际的结合。说到结合，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理论和行动方案，另一种就是作为文化的结合，这种文化层次的结合更深刻，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为什么偏偏是毛泽东完成了这个结合呢？因为毛泽东真正领会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哲学的真谛——知行论。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意义。中国哲学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代哲人都离不开探究知行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之前的孙中山起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在知行关系上，历史上争论不休的是知难还是行难的问题。孙中山一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提出“知难行易”。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跳出中国哲学的传统圈子。毛泽东在知行观上来了一个飞跃，他不在这个层面上谈问题，而是另换了一个层面，就是专门讲如何知，如何行，完全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谈知和行的关系。他

讲的知行，不是那些抽象的“理”、“道”，而是具体怎样干，用什么样的办法搞革命、救中国。从这个角度说，就是实践论。

访问人：为什么毛泽东在哲学上能达到这个高度？

高路：因为毛泽东把中国书读活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他创造性地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但他又不是机械地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成原理、现成体系、现成词句。这样，他把马克思主义也用活了。我们读毛泽东关于哲学的论述，会感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对本体论谈得较少。除1937年为讲课需要而写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曾系统他讲过外，别的时候，不曾见到他专门用大段篇幅专门谈本体论。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这些在毛泽东那里被视为是已经清楚明白了的东西。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他们专门写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拿出那么大的篇幅谈论物质第一性的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那时需要对以前的哲学作一个彻底的清算。到列宁时代，就深入了一步，比较多的讨论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问题。列宁在作哲学笔记时，就提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是一致的。到毛泽东，就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这样，辩证法就具体为认识的方法、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由此讲到“实事求是”这个词，我们一直是把实事求是作为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来概括的。这四个字来自中国的传统哲学，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次上来讲的，把它深化了。陈云同志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非常有道理。

访问人：这是不是说，因为毛泽东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

响很重，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部门注意的差一些，主要放在辩证法、认识论问题上？

高路：在这一点上，他使哲学与实践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如果哲学不走向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话，哲学永远是玄的、虚的、毫无实际用处。所以这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反复强调学哲学？他强调学哲学绝不是学古典意义上的哲学，既不是学中国古典哲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全部哲学。而是要大家学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明晰化了，走向了认识论、方法论。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论、实践的方法论。这样才能使哲学走向实践，才能使哲学从玄学中走出来变成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一条是非常了不起的！当代中国人大讲学哲学，外国人是不理解的，觉得那么玄妙。外国人不懂得，毛泽东创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工具。

访问人：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你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能构成体系吗？

高路：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觉得，如果说哲学家的哲学一定要有体系的话，问题就复杂了。首先要分清著作体系还是思想体系。如果是指著作体系，那么人们可以反问，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一个哲学体系？《反杜林论》成不成体系？

访问人：构造体系，说白了，就是自圆其说。

高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思想体系的逻辑问题。另一个方面涉及到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哲学家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这里。如果说没有构出一个著作体系就不能称为哲学家，只有构造了体系才算哲学家，这是不公道的。我们看哲学史可以知道，许多在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定地位的

人，不是因为他构造了什么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恰恰是他在某个问题上有很独到的见解，人们才承认他的。在西方，构造了大体系的人，从古至今，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三人。还有很多人也去构造体系，面面俱到，实际上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见解的，也就是一二点而已。假如毛泽东也按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样子去构造一个哲学体系，我看对他来说也不难，或许一二年的时间就搞出来了。

访问人：如果是这样，就走向反面了。是不是？

高路：对。从著作上讲，毛泽东没有构造出一个面面俱到的体系；从思想内容上讲，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还是能理出一个体系的。一个人能否配称哲学家，在哲学史上有无地位，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构造出了体系。举个例子，讲到中国哲学史，不能不提到开创魏晋玄学的王弼，可王弼有什么呢？也就是发挥老子的“道”，认为“道”即“无”，“道者，无之称也”。不过如此。西方哲学史上的休谟，也不过只探讨了人类理智问题，提出人们是不可能知道知觉之外的客观存在的，也就是“不可知论”。他的特色就这一条，但谁也没有否认他是哲学家。

访问人：这一点我赞成，我想只要是看问题不偏颇，稍有一点常识，是不会否认毛泽东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的。扯远了，我们是不是把话题再回过来，还是谈毛泽东读书对他的影响。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特别大，从消极的方面看，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毛泽东读关于经济的书比较少，对5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建设上的失误也有影响。

高路：消极的影响也有，主要是知识结构不合理，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结构问题。前面讲过，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关于经济的学问就比较少。但反过来，假如1952年以后，毛泽东不读《二十四史》，而是读《资本论》，西方古典经济学和一批现代经济理论的书籍，情况又会怎么样？我看也未必能改变那段历史。这个问题应放在更大范围来看，即放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来观察。在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时的经济怎么搞，采用什么样的体制更好，这些问题是世界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探索的问题。都在探索之中。实际上，正是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毛泽东集中读了一批关于经济的书，他带领一些高级干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但究竟如何呢？书读了，也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但终究代替不了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遇到的是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设想的情况不一样。不一样怎么办？就是走自己的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这个问题在当时还不可能彻底解决。

访问人：对，实践在先。

1992年3月8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访任继愈——

不研究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

任继愈

任继愈 1916 年生，山东平原人。1938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等著名学者研习中国哲学和佛学。1956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64 年受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担任该所所长达 20 余年。现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华大藏经》、《道藏提要》等。

任教授已届高龄，却很繁忙，不仅行政事务缠身，学术活动也排得满满的，我们去的那天，还有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在等他。说好 9 点，准时赶到，于是“见缝插针”，开始了我们的采访。

访问人：任教授，我们今天来想请您谈谈在您和毛泽东的交往中关于宗教研究问题的一些情况。

任继愈：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 年 10 月 13 日他把我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写的那些文章我都读了。接着他就讲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性，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他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我说除我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他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三字，他的口音我听不大懂，他见我不懂，说了两遍才听懂是问福音书，指的是基督教），我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他说，那可不好。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我说师生加起来有 500 人，他说，500 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这是 1959 年他在中南海把我找去说的一些情况。

大约到了 1963 年冬，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四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国现在的地位和从前不同了，在国际上是个大国，人家很重视我国，我们也应该了解他们，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有非洲、拉美、美国、日本等，苏东、拉美、美国、日本研究所就是在那时开始建立的，另外，中央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就是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 1963 年 12 月 31 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正因为有毛主席这个批示，1964 年成立的众多研究外国的研究所中增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

访问人：是您筹备的？

任继愈：我参加筹备，当时设在北京大学，先由中宣部负责，具体工作

有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同志，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同志，还有国务院宗教局长肖贤法同志。具体筹备工作由我负责，如调干部等。北大东方哲学史的全部教师拨归世界宗教所，这样，我们的基本队伍已有十来位，编制和经费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时社科院未成立）。我国的世界宗教研究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访问人：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继愈：对，现在叫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我一直做这个所的领导工作。那时就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了解和研究外国宗教情况。原来曾考虑是叫“国际宗教研究所”还是“世界宗教研究所”？后来决定还是世界宗教好，因为世界上几个大的宗教都是国际性的，外国的宗教中国也有，如三大宗教中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现在研究所设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研究室，还有宗教理论研究室。

这些工作开展起来后，又办了一个刊物，叫《世界宗教研究》，这个刊物在国外有影响，我到北美、欧洲看到一些大的图书馆都有这个刊物，外国朋友评价说，在中国出口的书刊里，《世界宗教研究》是有学术水平的。

访问人：您能不能谈一谈研究世界宗教的意义。

任继愈：宗教是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没有宗教，人类社会从没有宗教到有宗教是一个进步，低级的社会不产生宗教，这同小孩的生长发育一样，几岁的小孩就没有宗教意识，鬼神观念是大人灌输给他的，光是他自己就不会相信有上帝。但到了一定程度，有了自我意识，发现了自己的存在，这时才产生宗教意识，宗教意识可能最早是生死意识，从灵魂开始。你们到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猿人遗址参观过吗？

访问人：参观过。

任继愈：北京猿人遗址上面还有山顶洞人遗址，里面摆的殉葬物品中，有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生产用具，如钓鱼的钩，缝衣服的针，这说明他们认为人死后也要过生前的生活，他要没有这个观念，放那些东西干什么？这说明他相信人死后的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在的现实世界差不多。西安的半坡村遗址，是原始社会的村落，村落中出上了陶制的瓦棺，其中有一种花盆样的东西，是装死了的小孩尸体的。盆底下有一个小洞是留给死者灵魂出入的。古时候小孩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离不开母亲，死后就埋在住地附近。宗教起源于相信人有灵魂。人类相信灵魂，才有了祭祀、上供、祭典宗教等活动。

访问人：人们还解释不了看到的自然现象，是不是也是产生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比如说神。

任继愈：在古代，阶级社会以前的神，不具备后来赏善罚恶的性质。古代的神，如盘古、伏羲、神农都是为人类造福的，是民族英雄，为人民做好事的，所以大家怀念他，把他尊奉为神，这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平等、自然的社会关系。

出现阶级以后，出现了国家，有了法律。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了监狱，神也具备了赏善、罚恶的性质，它是现实社会的虚幻歪曲的反映。

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历史唯物论就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历史的产生也要历史的消灭。这一点我们和虔诚的宗教家不一样。他们认为在人类以前就有上帝，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是永恒的，没有了人类也还有上帝，地球不存在了也还有上帝。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宗教是一

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文化现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这个东西，再发展到一定程度。宗教也会消失。这是很长很长的过程，但现在是不会消失的，要承认它，尊重它。过去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认为既然把宗教看作是虚幻的不实在的，就消灭它，取消它算了，所以“文革”时期干了一些砸庙宇、教堂，毁坏神像的蠢事。

访问人：把它归到四旧之一，予以消灭。

任继愈：结果适得其反，砸是砸了，但是没有消灭宗教，宗教是社会意识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反映，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是抹不掉的，也是不可能的。

访问人：实际上破坏了很多珍贵历史文物，是非常可惜的。

任继愈：还伤害了一些教徒的感情，譬如在“文革”中有些造反派强迫教徒们干他们教规不允许的事，这是很不应该的，也是违背我国宪法的。不能这样做，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这么做，认为宗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信是个人的事，不信也是个人的事，我们的宪法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当然也保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宪法规定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保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一点宗教界不大感觉得到，比如在单一宗教信仰的地区，居民都过着同一种宗教的生活，有一个人出外多年，他改变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再回到自己家乡，有时会受到歧视，有的人欺负他，可见不信教也要有自由，才能充分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还比如，在天主教徒的家庭，生下孩子要洗礼，起教名，就算成了教徒，这不是小孩子自己选择的，是父母加给他的。

访问人：在这方面，是不是我们宣传得不够。

任继愈：有宣传的问题，但也不全是。在执行政策方面，还要进一步去贯彻。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符合宪法的精神。这也是宗教改革面临的问题。

宗教本身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现在到了文明社会，对于刮风下雨，有没有雷神一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凡是念过中学的人都会明白这些自然现象。可社会上还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比如老实人常常吃亏，有的吹吹拍拍的人却吃得开。社会应该是合理的，人们也知道怎么样才是合理的，可现实生活中有些现象不尽合理，甚至很不合理怎么办？宗教就站出来解释这种现象。相信“来世”的人，认为今生所没有得到的，来世可以得到加倍的补偿。现实世界的不合理，可以不必计较。历史上的佛教，道教，包括基督教，培养一种驯服的性格，所以历代帝王或当政者提倡宗教，就欣赏这一点。

访问人：儒教是不是稍微有点差别，他还提倡一种进取的精神，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的？

任继愈：儒教也讲忍的一面，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总之，忍让，驯顺是世界上几个大宗教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宗教还把一些合理的，不合理的东西搅合在一起，比如道教，把道观大多建立在深山里，修身养性，处在那种环境，生病到哪儿去看医生。所以很多道教大师同时又通晓医道，懂得养生、健身，以长寿。保持长寿无可厚非，如果由此推衍下去，要求活一百岁，二百岁，三百岁，永远不死，就走到荒谬方面去了。道教就有这个东西，希望长生不死，于是炼仙丹，唐朝有七八个皇帝希望长寿是吃仙丹中毒短命死的。

访问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到中晚唐开始？

任继愈：初唐就有，李世民就是吃药吃死的，以后不断有。秦始皇、汉

武帝都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英明皇帝，也打不破神仙这个关，作为一个现象是可以好好研究的。

访问人：现在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发展了，再没有多少人信这些了。我们研究宗教，是否仅限于宗教本身，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

任继愈：研究宗教，不能陷入宗教中去，应该从了解世界了解各国人民的文化传统的高度去认识。比如我们现在是改革开放，就要同西方打交道，如果我们对西方的宗教不了解，共同语言就不多，甚至在做生意方面，也会发生困难，比如一批货是赶在圣诞节卖的，你连圣诞节这个日子也不知道，不赔才怪呢。现在世界各国对宗教研究都很重视，日本原来是没有伊斯兰教的，日本缺石油，石油来源主要是在中东，他必须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就开展伊斯兰教的研究，并开始培养自己的阿訇。美国也是这样，本来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以后才有了佛教，佛教是一百多年前日本的后裔带过去的，美国原来也没有伊斯兰教，他要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于是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大约是 1959 年就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教中心。他们要插手阿拉伯的政治事务，也要学习一点伊斯兰教。

在现实条件下，宗教只是一个外衣，在这个外衣里面，西方各国都有政治目的、经济目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过纯的宗教。有时宗教内部的流血斗争不比一般政治的、军事的斗争伤亡少。所以研究宗教不能离开实际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光从教义上去讲，那是书生的研究方法，不能抓住它的本质。

访问人：毛主席重视宗教研究，是不是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任继愈：我想他是从文化、意识形态，也从政治上考虑的，他要求我们不要耳目闭塞，要了解外国，其中也包括宗教这个方面。

访问人：您和毛主席几次接触，除了上面讲过的政策方面以外，对宗教本身有没有谈过一些看法？

任继愈：纯宗教本身的问题，不记得他说过什么看法。

访问人：您和他探讨过一些宗教研究方面的问题吗？

任继愈：1959 年会面那一次，除谈到要加强宗教研究，他还提出研究宗教不能让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他说研究宗教要“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为对象来研究，因为有信仰的人，如果研究他所信仰的宗教，有时不免受到局限性。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另外，所谓“外行”，也不是绝对的，一个人信仰这个宗教，对于这个宗教是内行，对另外的宗教就是外行。永远找不到一个信仰一切宗教的教徒。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

1992 年 6 月 11 日于北京图书馆

访吴亮平——

学个唐三藏实是功德无量

吴亮平

吴亮平（1908—1986）又名吴黎平，浙江奉化人。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张闻天等翻译了《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192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环球》周刊主编，1930年在艰苦的环境中翻译了《反杜林论》。曾历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陕甘宁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化工部副部长、中央党校顾问等职。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小史》、《唯物史观》、《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等。

这是一篇“老”的访谈录，在笔记本上躺了近十年，偶然翻出，感觉很有价值。那是1983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们为弄清两封毛泽东书信的背景情况，去拜访吴老。老人很热情地谈了两封书信涉及的问题，还谈了党史和党的翻译工作的一些重要情况。然而，斯人已矣，尚存此篇，今予发表，以存后人。

访问人：我们收集了两封毛泽东书信，一封是写给您的，一封里面提到您，所以想请您提供一些情况和背景，并鉴定书信的年代（看毛泽东6月15日给吴亮平信：亮平同志：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谈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如何，盼示！敬礼！毛泽东）。

吴亮平：这封信是1938年的，“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内容记不起了，只记得是从美国来的，是位女士写给毛主席的信。

访问人：毛主席经常保持和外国人通信吗？

吴亮平：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36年斯诺到保安访问，大概在这年的8月，斯诺来陕北，当时因为我是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也懂英语，所以就由我接待了他，后来他采访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张闻天等同志，写成《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读者的强烈反应，当时写信给陕北的很多，有的直接写信给我党毛主席，有的信转来转去，经过关系才能给陕北，一般这些信先由我收下，再给毛主席，如他考虑可以回信的，再告诉我。这封信就是这个情况。给这位“美国同情者”回信，我按照毛主席信上的指示，讲了八路军抗战的情况，那时我们很穷（已经是1938年了），但我们抗战的信心不减，八路军需要援助，让我们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抗战。这封信写好后，给主席看了，他说很好，然后译成英文寄出去了。至于她收到信后怎么样，下文不清楚了。

这里我想多说几句《西行漫记》，《西行漫记》的出版对党的形象及对外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外面好多人，包括西方和国统区的人民，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西行漫记》才知道红军和共产党的，知道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块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日的根据地，不仅引起了世界的同情，而且吸引了广大国统区的青年向往红军，向往陕北，导致后来1937、1938年大批青年学生去延安形成一个高潮。我记得，周总理传达过，说是毛主席说的，这件事的功劳，如同“大禹治水”，叫“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访问人：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还有一封毛主席1942年9月15日给凯丰

的信，里面提到您“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不知你过去见过没有？

吴亮平：这封信我最近才看到，以前不知道。我想说明两点。一点，毛主席在信中说我“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这是指我翻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是1925年到苏联上中山大学的，当时我已入团，在上海大厦大学读书。我们同去的有沈泽民、张闻天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读书条件并不好，马列的许多书没有翻译过来，仅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等，教员也是俄国教员，一上课，好多人俄文不懂，只能干瞪着眼睛，那时不仅生活困难，学习上也很困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瞿秋白、向忠发给代表团布置任务，说，到莫斯科没有书读，英文只有少数人懂，俄文更少，代表团应建立一个翻译组，把一些懂英文的、俄文的组织起来，一面口译一面笔译。参加这个组的有张闻天、沈泽民和我。实际上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马列著作是从这时开始的。我记得当时翻译出来的有《法兰西内战》、《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反杜林论》就是在这时准备资料，酝酿翻译的，但正式翻译是在我回国后。

我于1928年冬回国，那时党中央还在上海，分配我到中宣部工作，搞两件事：一件是编《环球》杂志；另一件是参加中央文委的工作，书记是潘汉年，当时文化工作很活跃，成立了许多左派文艺团体，有“左联”、“社联”，也出了不少刊物，如《新思潮》、《萌芽》等等。正当国内的工作做得有劲的时候，王明回国了。王明也是1925年出去的，这个人品质不好，喜欢拉拉扯扯，我在苏联时就对他看不惯，提过意见，因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当秘书，那时共产国际的远东部副部长米夫很器重他，他有后台，因此一到中宣部就讲了一大堆帽子，对我也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把我从中宣部撤掉，下放到地下支部，搞写标语、喊口号、发传单等工作。当时我有气，心说：你王明撤我的职，撤不了我的决心。1930年春，我开始翻译《反杜林论》，记得是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翻的，整整干了一个夏天，挥汗翻译《反杜林论》。从这年4月干起，到8月完成，将近5个月的时间。书翻出后，我拿到和我们关系的地下书店去出版，11月就出来了，是“江南书店”出的。这是第一次翻译《反杜林论》，在那种情况下，可想而知缺点是很多的，我是根据俄文，参考英文、德文翻译的。现在看来挺有意思，倒是王明对我的迫害促成翻译了《反杜林论》，没有他，我还不定哪一年才能翻成。坏事变好事。

《反杜林论》刚出版，我在租界被捕了，这是1930年12月，随后判刑两年。关押一年，国民党要引渡，还没引渡，发生了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气氛高涨起来，公共租界被捕的几个人趁这个时机，找人保释出来。我也被放出来。

从监狱出来后，我和地下党接上头，请求分配工作。党中央让我到中央苏区，到达中央苏区是1933年阳历二三月间，被分配到红军学校当宣传部长，校长是叶剑英。

我第一次碰到毛主席是1933年的4月，他问我：“《反杜林论》是不是你翻译的”，我说：“是呀，我还与过一篇骂蒋介石的文章”，毛主席说：“骂得好，有空我找你谈谈”。那时毛主席是中央政府主席，林伯渠是中央政府自良经济部部长，让我当副部长，后来林老改作财政部长，国民经济部就让我管。毛主席经常找我去谈话，不仅谈哲学，还谈经济学、军事形势等

等。有一次谈话中他跟我说，他有一部《反杜林论》，是打漳州时得到的，战争环境，有时要轻装，别的东西可以丢，这部书不能丢，始终保存在他那里。

到了1934年，苏区的情况已经不好，福建十九路军发生事变，提出反蒋抗日，成立人民政府，但博古等不采取和十九路军联合的政策，又打不破第五次“围剿”，红军只有长征。我们是9月间出发的，我骑的骡子还是叶剑英送的。我在三军团担任宣传部长。到遵义开会，正式清算了王明路线在军事方面的错误，改组了中央机构，后又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指挥军事，我们高兴得很，因为没有毛主席指挥，能不能过大渡河都是有问题的。自从毛主席指挥红军后，生龙活虎，很灵活，我军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后来和张国焘斗争，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毛主席是很注意翻译工作的，他说：“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可能我在这方面没有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意思，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为什么这样呢？就是那时很愿去做地方工作，这里也有原因，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是中央书记，罗迈（李维汉）是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要我当，但王明来后又把我撤掉了，我心里有气，不想在上面工作，要求去做地方工作，后来到了晋西北中央局，任中央局党委委员、第一地委书记。毛主席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也非常注意，他总觉得翻译书太少，质量也不高，到达陕北以后，我们一方面建立了对内对外的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利用暂时较稳定的环境做好马列主义的研究，培养和扩大我们的队伍。因为当时我没有见到这封信，也没有人给我传达，所以后来我还是去了晋西北。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遗憾。

1983年4月13日于北京

访臧克家——

毛泽东的诗有“三新”

臧克家

臧克家，1905年生。山东诸城人。1934年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193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次年出版《罪恶的黑手》，闻名诗坛。60年来，先后出版了《淮上吟》、《古树的花朵》、《臧克家诗选》、《臧克家旧体诗稿》、《臧克家文集》（诗一至三卷）等60种著作。建国后历任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协书记、《诗刊》主编。现任中国写作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四合院摆满花草，会客厅放着一尊诗人自己的塑像。这就是臧克家的居所。他的名字人们都熟悉，他和周振甫合著的《毛泽东诗词讲解》，及他1990年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读者也不陌生。今天，臧老兴致很好。

访问人：毛泽东是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诗人。说他的诗好，好在哪里呢？您是诗人，和毛泽东又有过接触。我们想，您谈这个问题最合适。

臧克家：我已87岁，年龄大了。同时，我对毛主席诗词缺少研究。这不是客气。我很尊敬毛主席，他去世后，我多次痛哭流涕。他是一代伟人啊！我看文章、写文章，有个特点，对一般化的、大而空的、人云亦云的、拖拖拉拉的东西不喜欢。我喜欢欣赏，高兴时手舞足蹈。搞研究就不同，要有科学性，要有材料，有分析，有观点，是很难的，这方面我太不够。我写的东西大半都是即兴走笔的。今天，我只能发表点个人感想。

访问人：您能不能先谈些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现状的看法呢？

臧克家：从现在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来看，每首诗的写作背景大体清楚了。同一首诗，几个人介绍，背景都差不多，都在重复。过去见解不一样的，也统一了。比如《忆秦娥·娄山关》，原来郭沫若同志谈这首诗时，认为是写1934年秋和1935年初的事情，有人则认为是写一天的事情。现在报纸披露毛主席自己解释是一天的事情，情况也就清楚了。又比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枯木朽株齐努力”一句，是指我们自己，有人曾经就认为说不通，现在知道是反用司马相如的“枯木朽株尽为害矣”一句。60年代，叶君健同志翻译毛主席诗词，涉及对一些诗词中大家看法不一致的句子如何理解的问题，水拍就约了我和君健对毛主席诗词作了一番研究，把有异议的问题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7个问题。水拍写了个报告给毛主席。主席约他谈了，对每一句都做了解释。比如，“莫道君行早”，“君”，指谁？毛主席说：是指作者。他从主席那里回来后，亲自到我这里来，口头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当时，我把写着请示问题的三张绿字白纸拿出来，他传达的时候，我就在我们理解正确的一说后面打“√”，在不正确的一说后面打上“×”。现在我还珍藏着这三张纸，已经是海内“孤纸”了。回头再说这些年来对毛主席诗词的研究，我认为是有很大进展的，出了许多有关的书。但我想，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欣赏水平上，什么背景啦，字面解释啦，这些当然要讲，但总是重复不行。要鉴赏，就要深入地去体味。对毛主席的深刻了解和正确评价，有助于去深入地进行对他诗词的研究。过去有人认为，毛主席是革命领袖，似乎他的情绪就不能有起伏。这是不对的。离开了情感，怎么写诗？不体味诗中的情感，怎么评价诗？

访问人：现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臧克家：现在一些研究毛主席诗词的文章，你这样写，我也这样写，有点重复。毛主席的伟大要讲，但套话太多，就没有新意了。我提倡研究毛主席诗词要有感而发。一般性的，长篇大论没有自己独特看法的路子快走到头了。对毛主席诗词作科学性的研究，就必须研究毛主席的思想、生活、性格和修养、情趣等等，还要和他的感情进行沟通，心心相印。在这个基础上对作品做出的评定，才会有价值，不一定非要写几万几十万字。要评论也要有风格，有趣味，不要大学院气。毛主席自己就一贯反对八股文章。毛主席的诗词意境很高，写评论他的诗词的文章，也应该是美文。去年，香港出了一本《毛泽东诗词全集》，是刘济昆编的。他把毛主席的诗词收得较全，又作了评点。他的评点，有时尽管三言两语，我以为还是中肯的。比如《沁园春·雪》，他认为是毛泽东最出色的作品，称赞它“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扫空万古，横绝六合之作”。我们评论毛主席的诗词，也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倡凭对诗词本身的体会，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作者的原意与你的体会不完全相同，也不必强求一致。毛主席的诗词从总体上来看，水平是很高的，但不能因此就说每一首、每一句都是高峰。如果全是高峰，也就没有高峰了。

访问人：我很赞同您的看法。您能具体一些谈谈吗？

臧克家：据我看，毛主席的诗与词比较，词写得比诗更好。毛主席的诗词气魄很大。表现手法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讲。实际上，他的诗词的一部分，是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都应该是植根于生活。革命浪漫主义不是空想的，随意发挥的。毛主席的想象力很强，很丰富，比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充分，一会儿在人间，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又见吴刚、嫦娥。其实，这些都离不开对生活的体验。有人说，毛主席的诗词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的结合，这话不错。但如果进一步加以分析，就觉得这个说法太笼统了。毛主席的诗词就总体而言，艺术性很高，但不是每一首都这样。我认为，也可以从艺术上具体分析一下毛主席的诗词：比如说最好的，像《沁园春·雪》这样的某些杰作，“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样的句子，有哲理，也很有诗味；有的偏重于政治思想内容，艺术上有点欠缺，诗味少些；还有一部分是毛主席本人不愿意发表的。这样三种类型，是侧重对他的诗词本身从艺术上加以研究分析相比较而来的。我们看到，好诗好词都是浓烈的感情蓄积很久，喷发而出的。

访问人：作为毛泽东，他的诗词创作有哪些有别于他人的特点呢？

臧克家：毛主席诗词的水平很高，思想性、艺术性很强，不但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喜欢它。我认为毛主席的诗词所以写得好，水平高，有两点：第一，他是在中国革命曲折艰难的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领袖，生活经历异常丰富。第二，他喜欢读书，好研究，学习根深入，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18岁时写的文言文《祭母文》，就写得那么好，那样动人，恐怕现在有些大学文科老师也不一定能赶上他。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又注意刻苦读书，同时他有天资，有诗才，又热情，具备天资、诗才、热情，也是诗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毛主席写诗，学古不泥古，富于创造性，不是都说毛主席喜欢三李吗？他喜欢李商隐的缠绵，李白的浪漫，李贺的丰富想象力。这三种风格，在毛主席的诗词里都体现出来了。但是他有创造性，不像

学院派旧体诗作者那样，刻意讲求典雅。毛主席用典很少，也不完全受格律的限制。现在有人写旧体诗，重用典，讲平仄，性灵不多，诗味觉少。民族化，是毛主席诗词有创造性的另一个方面。他对民歌很重视，他的诗词吸收了许多民歌的营养。如“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样的句子就是口语。他的有些句子，比老百姓的话还要俗，像“不须放屁”就是。这些东西，别人不愿写，他写了，又不是刻意求之的，表现出来，很自然。毛主席诗词的语言风格很有特色。我主张写诗要有三新：第一，思想新。思想不新，跟不上时代，也就没有时代感。第二，感情新。感情新，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有新意。毛主席谈他个人思想感情变化的那些话，人人皆知。参加革命后，他和劳动人民的关系近了，思想感情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第三，语言新。现在我读到不少旧体诗，但能让人赏心悦目的不多，主要是语言太陈旧。我们应以毛主席为榜样，好好向毛主席学习。说到底，作诗和人的经历、思想、学识、修养、品德有密切关系。人大，诗才大。毛主席有豪迈的革命激情，丰富的生活经历，勤奋读书的精神，所以才能写出内涵那么丰富、那么有气魄的诗。这些年，我更多地了解了他的读书情况以后，心里更加佩服他。所以毛主席的思想之新，感情之新，语言之新，是从学习中得来的，是从生活与实践中的得来的。另外再加上天分。天分不是抽象的，是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特殊感觉，特殊爱好的体现。

访问人：诗格和人格的关系如何？

臧克家：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创作关系重大。现在有些诗人，不深入生活，关在屋里写诗，小有成绩，就高视阔步，自大得不得了。诗，是人的心灵表露，不与时代同步，人民同心，能写出真正好诗来吗？！我认为，我们写诗，做人，都应该向毛主席学习，学习他的美德——谦虚，平易近人。有些写诗的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很淡，追求名利的心很强。毛主席写诗，从未想过发表，他也从未想成为一个诗人。他写诗，就是情之所至，有感而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在马背上吟诗，诗情充溢于中，不吟出来不痛快。这种美丽高尚的感情，喷勃而出，才能写出好诗来。我们知道，毛主席的诗，决不止现在知道的50多首，有些诗，他写好了，可惜没保留下来。解放后，我们办《诗刊》，再三请主席让《诗刊》发表他的诗，他回信，并且附来旧体诗18首，态度十分谦逊。我记得50年代周扬同志曾经在大会上谈到这么一件事：他起草的关于文艺方面的一个报告，其中有一段谈了毛主席的诗词创作，毛主席审阅时全给勾掉了。我听了感动极了。毛主席1957年1月12日给我们的信中也讲，他的诗“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他说：“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他还谦虚他说自己的诗“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所以我想，毛主席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大诗人。他的诗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品德更值得我们学习。

1992年5月8日于北京南小街

访蔡清富——

毛泽东的诗既要鉴赏又要研究

蔡清富

蔡清富，1935年生，河北魏县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毛泽东诗词研究。著有《冯雪峰文艺思想论稿》、《现代文学纵横谈》，与黄辉映合著《毛泽东诗词大观》。是《毛泽东诗词鉴赏》、《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的副主编之一。

蔡老师挺谦虚，一再说只跟我们聊聊。于是我们也就放下学生听课一样的拘谨，和他侃起了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诗词研究，还有其他……

访问人：这几年，有关研究和诠释毛泽东诗词的书出了不少，大体说来，介绍、讲解、鉴赏、宣传的多，当然这是非常需要的。但是相对来讲，对诗本身研究得不够。那么，如何把它引向深入呢？

蔡清富：据我了解，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978至1991年有关毛泽东诗词的书大约出版了17本，包括《毛泽东诗词研究》、《毛泽东诗词研究资料索引》、《毛泽东诗词论稿》、《沁园春词话》、《〈沁园春·雪〉考证》、《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和诗》、《毛泽东诗词笺析》、《毛泽东诗词全集》、《毛泽东诗词鉴赏》（臧克家主编）、《毛主席诗词精讲》、《毛泽东诗词鉴赏》（王臻中等主编）、《毛泽东诗词注释》、《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毛泽东诗词探索》、《毛泽东的诗词艺术》，还有一本听说是大连出的，我没见到此书，名称不清楚。以上成果很可观。这些年研究的特点：一是毛泽东诗词本身越来越多地与读者见面，现在已经有52首。这个数字不一定全，但确实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方便，开拓了研究规模。二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诗词研究内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清理。三是从多角度多侧面地开展研究，有一些新的突破，有的是注释性的，有的是赏析性的，有的是综合研究。从研究趋势来看，也越来越重视艺术性。

访问人：成绩很大，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蔡清富：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个是对争议较多的问题还没有深入开展探讨，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特别是对1976年以后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得更少，对诗词本身研究不平衡。另外，对毛泽东诗词的美学内涵研究得较少。

访问人：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毛泽东诗词研究引向深入？

蔡清富：对今后的研究我有这样的设想：第一点，应该组织人写一部《毛泽东的诗歌生活》。这是毛泽东的诗歌生活传略，要把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放到他整个人生中去反映，使人们看到的不是单篇独立的篇章，而是伟人生活的立体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第二点，毛泽东诗词研究到今天，应该开展对毛泽东诗词研究史的研究，就是要有毛泽东诗词研究史略这样的书。从1937年斯诺的《西行漫记》首次披露毛泽东的《长征》诗，到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时他的《沁园春·雪》引起风波，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

访问人：《沁园春·雪》通过柳亚子在重庆问世，当时立刻引起很大的轰动，而且波及全国，唱和的很多，争论也很大。有的赞不绝口，有的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很是热闹了一阵。

蔡清富：是这样。如从《长征》诗披露开始算起的话，有半个世纪了，我认为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状况应该有个总结了。研究史既进行综合性的概述，也要对每一首诗词发表以来不同时期的研究情况详细介绍。进行这样的研究会在今后的研究起促进作用，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我要说的第三点，就是应对毛泽东诗词的美学内涵及其理论意义开展深入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美学内涵是很丰富的。他的创作实践与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体精神是一致的，但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这不一样的地方恰恰说明诗人丰富和发展了《讲话》精神。比如《讲话》强调现实主义，而他的诗词浪漫主义风格比较突出。又比如《讲话》特别强调作家要改造思想，对怎样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讲得较少。但毛主席自己的诗词创作却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这也是与《讲话》精神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又比如《讲话》比较强调文艺的普及与大众化，可他的诗词创作比较偏重于提高，这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一致并不是说二重人格，而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用创作实践丰富和发展了《讲话》的思想。他在《讲话》中提出现实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唯一源泉，这种唯一源泉的思想他没有进一步发挥，其实从毛泽东诗词创作来看，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直接生活是主要的，也有间接生活，还有古代文艺作品起码也是创作的一个流吧。如果把毛泽东的这些实践经验加以归纳，就能使他的文艺理论更丰富、更完整。

访问人：你是说，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应该忽视他创作的那一部分，只有把他的创作和他提出的理论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互为补充，全面把握。

蔡清富：看来你理解了我的意思。现在的研究好像缺少这样联系，各说各的。毛泽东谈到过许多有关艺术技巧的问题，比如形象思维、赋比兴，他在给陈毅的信中就提出过。

访问人：很明确地肯定了。

蔡清富：对。不能说过去的研究对这些一点没谈，但研究时没有把这些同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构架联系起来，往往理论是理论，创作是创作，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给它们搭上桥，统一起来，达到理论与创作的互补？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这里我还要说一个想法，就是要利用多种手段开展毛泽东诗词的学习与研究。过去比较多的用的是文字手段，现在科技发展了，可以用音像手段。最近电视台播放的《无极之路》，不就是把报告文学搬上了荧屏？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了一些尝试，如广电部的中国唱片公司要搞系列毛泽东诗词赏析音带，中央电视台要搞一个关于毛泽东诗词的大型艺术片，还有毛泽东诗词演唱会等等。中国是个有诗歌传统的大国，从诗经开始，一贯重视诗歌的教育作用。毛泽东诗词有它的特殊地位，它的丰富的思想与艺术内涵，对今天的青年人是部很好的教材。

访问人：它跟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密不可分。

蔡清富：是史诗嘛！第四点，是关于毛泽东诗词研究的队伍，现在搞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是四部分人，各有特点：一是作家，他们创作经验丰富，能体会毛泽东的诗词艺术境界，但对中共党史、毛泽东生平著作不熟悉，某些研究未得要领，带有主观随意性；二是古典文学研究者，他们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与诗词典故，对毛泽东诗词与中国古典文学理解得比较透彻，但对现代史和毛泽东本人缺乏系统了解，有些研究缺乏时代气息，有学院气；三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他们研究的作家作品与毛泽东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在把毛

泽东诗词与同时代作品比较上有优势，但有的古典文学根基不厚，对诗词格律缺乏实践经验；四是党史专家与从事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熟悉党的历史与毛泽东生平，能将把毛泽东的诗词放在其整个活动中加以考察印证，对作品内容理解得比较深刻，但不足的是他们对作品的美学内涵很少涉及。假如有集中了上面说的四方面优势的人去进行研究切磋，那将会取得很大的进展。这是我所希望的。

访问人：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现在大学中文系课程中还讲不讲毛泽东诗词这一章节？

蔡清富：教材里有，但一般不怎么讲。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还开一些有关的讲座，有许多人比较感兴趣。

访问人：有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吗？

蔡清富：还没有。

访问人：我很赞成您刚才的谈话。如果我们不对毛泽东的诗词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很难对他的诗词作出科学的评价。如果抛开他政治家的身分不谈，仅作为一名诗人，把他放在中国许多著名诗人的行列之中，用同一个艺术标准去衡量，那么毛泽东的诗词艺术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样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更客观，更有说服力，也才能真正树立起毛泽东诗人的地位。

蔡清富：你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我想恐怕到最后也很难不联系到作者的政治家身分，想完全撇开不太可能。

访问人：过去从政治的角度强调得多，我想现在应着重于艺术角度的研究。譬如说，毛泽东很喜欢“三李”的诗，李白、李贺、李商隐。“三李”都属浪漫主义一派，但风格不一样，李白诗奔放雄奇，融进了他豪迈不羁的性格，李贺诗奇美诡异，在诗坛有“诗鬼”之称，李商隐诗则精丽而意境朦胧，抑郁感伤。那么毛泽东的诗词艺术个性是什么？我赞同您的看法，研究毛泽东的诗词完全视而不见作者的政治家身分是不行的，但我们暂时（是暂时）把政治放在一边，探究它的艺术性的话，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概括呢？前几年有人说毛泽东的诗里有一种“霸气”，霸气这个词可能不恰当，有贬意，如果我们把它换成“巨人气”呢？无论毛泽东的战友、朋友还是毛泽东的敌人、对手，都无法否认毛泽东是一个巨人，一个伟人。那么作为巨人的毛泽东的诗自然非同一般人。毛泽东的诗里的确充满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巨人意识，巨人气象。我认为没有比诗歌更能真正反映毛泽东的个性与心绪了。

访问人：我看到基辛格讲的一段话，评论什么样的政治家才是优秀的政治家，第一条就是要有“勇气”，所谓“勇气”，就是光有丰富的知识还不够。还要有理想，有远见，有决策力，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去实现他的理想。知识丰富的人很好找，但知识丰富同时又有“勇气”的人很难找。毛泽东的诗词风格基本是浪漫主义的，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勇气。用“勇气”两个字是不是更恰当些？

蔡清富：我认为无论“霸气”、“勇气”还是“巨人气”，都不是针对诗词艺术风格作评价的。我感到毛泽东诗词中对时代本质的概括是中国任何一位诗人都无法比拟的。这同他所处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领袖的地位分不开。就艺术风格来说，毛泽东是豪放的，但豪放之中有婉约，如写在1923年的《贺新郎》体现婉约就比较充分。赵朴初从四个方面概括过毛泽东诗词

艺术的特色：气势磅礴而含蓄深厚，飞动而沉着；情深而超脱；美丽而自然。他的概括很有启示。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尽管免不了会有评价高低的不同，但无论如何它都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访问人：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涉及毛泽东诗词研究，就是怎样看待作者对自己诗歌的注释？一般说来，作者自注是最有权威性的，但恐怕也有例外的时候，我感觉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公开解释也不一定全部切合诗词的本意，也许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又处在领袖的地位，有时会从政治意义、政治作用的角度考虑得多一点。

蔡清富：怎样理解毛泽东自己的一些注解，并把这些注解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是一个难点，比如毛泽东解释《念奴娇·昆仑》的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怎么理解？现在有几种看法，一种认为“昆仑”本身就象征帝国主义，一种认为昆仑山很高，积雪很多，雪一融化就带来灾害，用灾害来代表帝国主义。但这两种说法怎样与主席诗中的“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一句联系起来？另一种认为“千秋功罪”一句说明的是一分为二，反帝的意思主要在最后几句，“环球同此凉热”表示最后消灭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三种理解谁对谁不对？还有待研究。

访问人：这可能就说明毛泽东的自注与他诗歌的本意(行话说叫“底子”)之间有距离，贴合不上。

蔡清富：有的结合得比较紧密，如《菩萨蛮·黄鹤楼》，的确如作者所说表达了一种“苍凉”的心情；有的则确实有距离，比如《清平乐·会昌》，诗中的气氛比较开阔明朗，但毛泽东自己却有心情郁闷的注解，如何理解？著名诗人臧克家就认为，对毛泽东诗词可以有自己不同于作者的理解与认识。

访问人：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蔡清富：好的。我的谈话是脱口而出的，当然很不成熟，仅供参考吧。

1992年3月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访陈涌——

毛泽东文艺思想之我见

陈涌

陈涌，1919年生于广州。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艺理论研究室研究生毕业后，曾任《解放日报》副刊部副主任。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贵。1987年担任《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现任《文艺报》主编。主要从事鲁迅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有《陈涌文艺论集》等。

说起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陈涌当为一家。他表述自己的观点时系统而颇具理论色彩。为了不增加我们的工作量，他对我们的访谈整理稿作了修改后，特意请人誊清一遍再送来，其待人之谦和诚恳由此可证。

顺应中国文艺运动发展，
建立无产阶级文艺队伍

访问人：我们知道您写过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论著，包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您是否可以就您的体会谈几点看法？

陈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和认识。一种是怀疑甚至否定的，这是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出现的；另一种是维护、肯定的态度，在这个大前提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意义怎么估计还是有些不同的。我的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我们通常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看作是党在文艺方面的方针、路线，这当然是对的，但仅仅这样认识还不够。需要考虑到，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代表党所制定的方针、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为依据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正是在这个结合过程中，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别的方面是这样，在文艺方面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也需要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高度来研究，使我们认识它在文艺理论和美学上哪些重要的方面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一句话，需要从理论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作出分析和评价。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访问人：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谈谈你的看法。

陈涌：第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表现在文艺战线上，首先要有一支真正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应该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核心，并且团结广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文艺家的。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根本最核心的一条。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在文艺战线上就布不成阵。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可以说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其实，有些人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为应付战争环境制定的政策，我看这么说不。毛泽东提出的是百年大计，是现在也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建立这样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的问题，是过去马克思的时代也没有提出过的。

访问人：能具体说一说吗？

陈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虽然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但资本主义还在向前发展，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当时欧洲大多数作家都囿于中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其中也有少数是同情工人运动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当时，文学

作品的读者主要也是资产阶级的读者，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着重强调的是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暴露资本主义矛盾，当时恩格斯对于像明娜·考茨基这样属于无产阶级的党内的作家，也是这样说的：“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他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可以看到，文学在当时主要还不是直接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服务，社会主义作家还很少，建立一支直接为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服务的，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核心的文艺队伍的条件还不成熟。

访问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列宁对文艺的论述涉及了文艺队伍建设问题了吗？

陈涌：到列宁时期，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列宁有篇有名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其中就第一次提出文学和出版物要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把文学工作看作是党的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为千千万万的人民服务。提这样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要在文学队伍里进行革命的思想建设，要建立一支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文学队伍的问题。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无产阶级迫切需要有自己的文学队伍。这就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访问人：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文艺，是不是也涉及了文艺的党性问题？

陈涌，是的，列宁说：党性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具备了的。列宁是更加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到毛泽东，文艺的党性问题，如何建立一支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队伍问题，他就讲得尤其具体、透彻、充分了。1942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文艺运动，也走过了不下20年的曲折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同时也有失败带来的深刻的教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心点就是提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个讲话内容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这样提出问题？一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二是毛泽东自己善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革命文艺工作的经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在文艺领域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文艺队伍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在中国是有特殊意义的。中国是个小生产特别发达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占大多数，很多文艺工作者也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现代中国文学从“五四”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追求个性解放。历史地看这个问题，这在当时是积极的，是和广大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共同要求有一致性的。但同时，它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个性解放，在过去，大都带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性质，它的积极意义恰巧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中国人

民革命运动越发展，它的积极意义就越缩小，甚至会走上反面，脱离了整个人民群众的运动的个性解放，不会有什么出路，这点，鲁迅在“五四”时期便敏锐地觉察到了。他的作品《伤逝》，还有《娜拉走后怎么样》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许多作家还只知道用个性解放来向旧世界抗争的时候，鲁迅便站在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反映被压迫人民的生活痛苦、愿望和情绪了。鲁迅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出类拔萃的作家。到30年代，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崛起，中国文艺运动开始产生变化，一批年轻的作家，开始努力反映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物和事件，表现他们的痛苦，要求解放的愿望和斗争。但对多数作家来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这个问题是没有彻底解决的，首先是思想感情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建立一支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核心，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文艺队伍，是顺应中国文艺运动发展趋势的。需要文艺工作者转移立足点，改造世界观，把立场站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来，是中国革命发展和文艺自身的发展的需要，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同时这也是中国文艺运动面临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革命依靠的却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前所述，中国大多数作家，包括共产党员的作家，也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共产党员的作家，不但要组织上入党，还要真正做到思想上入党。对一般小资产阶级作家，也需要逐步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如何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是一个不但需要有毛泽东那样坚定的方针，而且需要作长期的艰苦的耐心的工作。只有改变小资产阶级占领文艺阵地，小资产阶级思想支配文艺创作的状况，文艺才能真正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文艺队伍才能真正成为党领导下的真正的革命文艺队伍。

毛泽东长期和小资产阶级打交道，经验丰富，又很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及时抓住了问题，把列宁曾经原则上已经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剖析透彻，论述得具体、充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各种心理和思想状态理解、描绘得那么深刻，恐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己也未必那么清楚，未必能够做到。

其实，建立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文艺队伍的问题，不只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同存在的问题。近几年来，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风云变幻，文艺领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也得到了证实么？

访问人：这应该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发展。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解决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陈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贡献，还在于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来解决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个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作为解决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明确的充分的论述，但毛泽东把它运用到文艺和美学理论领域之中是最透彻的一个。他认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是一个坚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语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里，过去还没有看到过像毛泽东这样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论认识论，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作出这样深刻的科学的论断和明确的表述。但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他在肯定生活

是第一性的，文艺是第二性的同时，又充分地阐明文艺可以而且应该比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文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前几年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以及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在文学艺术上的应用，都视为“直观反映论”，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看看毛泽东自己有关著作，就可以知道，他不但肯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个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他也是充分肯定文艺反过来对于生活的能动性，肯定作家创作的主体性的。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及其在文艺问题上的应用认为是否定主体性的直观反映论的人，即使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有意歪曲，至少也是对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没有真正理解。

访问人：说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那么，到底什么叫生活，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呢？

陈涌，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解释。例如表现自我，这算不算反映生活？不能不算。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表现自我”，问题是什么样的“自我”。任何阶级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他的“自我”，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他的“自我”，和人民结合的作家的“表现自我”，和人民的感情情绪自然是相通的，我们不是接触过不少这方面的好的抒情诗和抒情歌曲么？我们不赞成，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脱离人民以至和人民对立的“表现自我”。这类“表现自我”过去有一个时候确是出现过不少的。这种“表现自我”，不可能表现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这不是毛泽东自己凭空提出来的，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的文学是真实的，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便不能不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历史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时代，更不能不是这样。这对于一个人民的作家来说，和表现他的自我并不矛盾、不相容的。

访问人：在中国过去历代的文学创作中，是有一些作品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感情和愿望的，我们称之为“人民性”。

陈涌：中国过去的文学，诗歌方面，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痛苦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小说除了《水浒》等作品之外就很少。鲁迅就提出过这个看法。除了《诗经》和以后的民间诗歌以外，比如白居易、杜甫，也写过不少表现民间疾苦的作品，但都无法避免以封建士大夫自上而下的眼光去俯视、同情、怜悯贫苦人民的痛苦，这样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而且，并不是只有直接去表现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才有“人民性”。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狭隘地理解。但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表现了农民形象的还是鲁迅，像祥林嫂、闰土。他们是真的中国农民，而不是过去封建士大夫阶级眼中的农民。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表现新的工农兵的生活，这应该看作是一个重大的文艺思想的革命。后来毛泽东称赞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也是从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讲的，他说过去反映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现在是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

毛泽东不仅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决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个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把这个观点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认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活动分不开。文艺要反映生活，首先，而且主要就要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所号

召的“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不只是一个时期的需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只是“战时文艺政策”，或者只适用于过去的农村环境，这是党在文艺上的根本路线，这个根本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作依据的。自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文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党在文艺上的根本路线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要看到毛泽东对文化遗产的重视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中，应该看到毛泽东对文化遗产的重视。

访问人：您是不是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说的这一段，就是：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借鉴，有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除涌：毛泽东对文化艺术遗产的态度也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原则精神的。在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上，列宁有过十分透彻的论述。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里谈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这是从无产阶级文化的历史地位，从无产阶级文化是过去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更高阶段这个高度来观察和解决文化遗产的问题的。毛泽东 1938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这个报告里，谈到学习问题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在这里着重强调是马克思主义和自己祖国文化遗产的关系。这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继承自己民族的优秀遗产，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毛泽东对问题的提法，和列宁的提法的精神是一致的。

毛泽东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他面对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前所说，是从思想上建设一个革命队伍的问题，以及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待文艺与生活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文艺创作的来源的问题。他在他的《讲话》里，也谈到“我们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这毕竟不是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首要问题，因此，不是他的《讲话》着重解决的问题。

但从整个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和过去的文化艺术不但有不同的世界观的基础，而且在文化艺术本身也应该是过去文化艺术已有成就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应该超过前人，应该达到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新的水平。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但对要改造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说，是需要有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需要朝这个目标努力的。正是因为这样，是否继承，或者说借鉴过去的文化遗产的问题，从根

本上说，便不只是《讲话》里所说的，“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着重强调文化艺术遗产的问题，像列宁和像他自己过去一样，把文化遗产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原则上加以解决，没有从文化遗产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意义来论述这个问题，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我们就有必要从毛泽东的全部论述更完整地掌握他对继承过去文化艺术遗产的思想。要看到，继承文化艺术遗产的问题，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正是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就成了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时期产生的一批大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等，应该说他们都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他们都从旧的营垒中反叛出来走向进步、光明的，他们的文化功底深厚，非一般可比。在他们之后，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曹禺、巴金、老舍等等，则深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旧的包袱比较少，但同时他们也有较好的传统文化的根基，到后来，革命斗争中左翼文化运动培养的一批革命青年作家，他们同革命斗争的联系很密切，有更多的机会在实际斗争环境中经受过锻炼，这是他们优越的地方。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文化修养，一般地说较之上面讲到的两代作家，就差一些了，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访问人：从文艺工作中这几十年的发展状况看来，确实有个对优秀文化遗产继承不够的问题存在，你是否可以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陈涌：我们不是看到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出了像鲁迅这样的《阿Q正传》的伟大作品么？但以后，就很难说产生过像阿Q这样有根高的概括性和有很大的普遍性的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这不但有思想水平问题，对生活的认识问题，而且也有文化艺术修养问题，正如刚才所说的，鲁迅、郭沫若、茅盾他们都是过去优秀文化的继承者。每一个真正伟大的杰出的作家，都不能不是这样。中国和外国都没有例外。我们不少作家，文化艺术修养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家大都在一个动荡的战争环境里生活和工作，事实上很少可能坐下来提高文化艺术修养；建国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往往把政治和业务和文艺对立起来，埋头业务，努力读书，提高文化艺术修养的人很容易被扣上“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帽子。这是现在许多岁数大一点的人都记得的。到“文革”时期，“左”的那一套就走到了极端，知识越多越反动，艺术规律的存在不被承认，现实主义思想抛掉了，艺术真实，形象思维都是资产阶级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怎么会有真正文艺的繁荣，怎么能产生真正的艺术作品呢？更不要说伟大作品了。不错，在建国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中，我们也产生过不少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但应该这样认为这实际上恰好是违背了抵御了当时“左”的思想的结果，另一方面，十七年有不少好的作家也难于完全避免受到“左”的思想的侵蚀，在自己的作品里留下概念化，不愿意或者不敢正视现实生活的矛盾，真实性不充分等缺点。

现在文艺的指导思想有了根本变化，但仍然很有必要认识继承过去文化艺术遗产的迫切性。不要以为只要思想对头，有了生活，便可以写出好作品。不是有不少下乡下厂一二十年仍然写不出什么重要作品的么？这里当然会有多种原因，但读书少，艺术准备不足，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原因。一个有艺术上准备和一个在艺术上准备不足的人，同样到生活中去，收获就会不一样。

前者无疑更善于用艺术家的眼睛去观察生活，感觉更敏锐，也更富于艺术的想象力，他更懂得生活的各种现象中对艺术创造说来，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

“深入生活”的必要性是大多数作家都承认的，报刊上经常出现这方面的号召和报导，却很少有人研究一下作家应该怎样深入生活，怎样才算深入生活。有高尔基的生活经验的人千千万万，高尔基却只有一个，如果用这点来证明深入生活并不重要，是错误的，但如果用它来说明，有了高尔基那样的丰富的生活，还需要有高尔基的艺术才能，特别是有高尔基的文化艺术修养，才可能成为高尔基，这却是不错的。

1992年7月10日于北京万寿路

访李树庭——

文如其人书如其人

李树庭

李树庭 1946年9月出生於湖北天门市胡市镇六合村。现任天门市《天门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书协湖北分会会员、湖北省书学研究会理事。出版有《毛泽东书法艺术》、《毛泽东书法墨迹鉴赏大观》等。

初识李树庭 还是1991年初夏在北京西山的一处招待所里。那时他的《毛泽东书法艺术》已出版。闲谈中还知他对中国的茶文化有研究，只是当时时间匆促，未讨一杯好茶喝。现在有关于毛泽东书法艺术一题，又想到李先生，然而路途遥遥，不得机会，只能笔谈。

访问人：现在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李树庭：1976年9月毛泽东故去后，对于他的思想的研究迄今已涉及到方方面面，无论深度和广度，都已达到相当规模。近年内，对于他的书法的研究，也开始形成高潮，北京、湖北、湖南、河北、四川、浙江、山东等地，相继推出大部头；更有热心者，酝酿成立毛泽东书法研究会，创办毛泽东书法研究丛刊，举办毛泽东书法学术报告会，举办毛泽东书体书法展览，大有“毛书热”的势头。

访问人：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在当代书坛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李树庭：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谈。一方面，毛泽东是当代中国书坛在继承的基础上，跳出藩篱，锐意创新，追求个人艺术解放，形成独特风格的第一人。要学书，必须讲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书学修养，更谈不上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的书法就有二王的秀逸、孙过庭的俊拔、张旭的狂韵、怀素的放肆、苏黄的深厚、董其昌的洒脱……，极尽法度，不失变化。但是，要学书，又必须讲究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风格，也谈不上继承了。然而，唐代大书法家李北海（邕）曾经说：“学我者病，似我者死”。这里就有一个“似是而非、不是又是、是与不是”（李尔重论毛泽东书法语）然后“自成一格”的问题。毛泽东的书法正是在这方面实现了突破，他的书法在早期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为继承传统打下了基础后，即跳出常轨，另树一帜，一反以方笔入手的常规，而以圆笔入手，开始创新；继而，他又以侧势结字10余年，这在中国当代乃至整个中国书史上又属罕见；随之，他又一举跳出碑、帖兼习的遗风，专习帖学，从书体、书具、结字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

与尝试，终于熔铸出自己奔腾流畅、俊丽洒脱、别具风采的书体，毛泽东的这一非同常人的书法历程就奠定了他在中国书坛的基础。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书法及其实践开辟了以书法艺术表现丰富的现代生活的广阔天地。中国汉字，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书法艺术，又是表现丰富社会生活的形象载体。然而，数千年来，书法只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如虞世南、董其昌；只是帝王将相的专利，如李世民、宋徽宗、蔡襄；他们所表现的只是对封建统治者的粉饰，如颜真卿（毛泽东直至晚年亦不爱颜体也出于此）、赵子昂；只是对剥削阶级的曲意美化，如蔡京；只是对才子佳人花前月下情感流露的线条表现，如唐寅等等。时至今日，仍有书法界知名人士认为，书法不可能表现时代，不可能反映时代精神。毛泽东打破了传统的禁锢，无论是他的书法的内容还是书法作品的流向，都充分反映着时代脉搏，充分服务于现代生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励人民奋发向上，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的一种有力武器，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一种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手段。1946年8月，毛泽东得知刘、邓大军六天以五万兵力歼敌四个旅的捷报后，兴奋得卷起袖子，饱蘸浓墨，尽情挥洒：“庆祝大胜利，增强我信心！凡能歼敌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字越写越大，如江海奔流，龙飞凤舞，仅这一墨迹就给前方将士极大鼓舞。此外，我国淮河、海河的治理，青藏、康藏公路的建筑、荆江分洪、葛洲坝工程的完成等等许多生动的事例，无不与毛泽东的书法墨迹相联系。

访问人：说毛泽东是书法家，应该不算什么问题了？

李树庭：关于毛泽东能不能称为书法家的问题，我浅薄地认为，构成书法家的条件，不仅仅是因为某人的字写得好，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有没有深厚的书法艺术修养。毛泽东从八岁开始学写毛笔字起，至1976年逝世，其间七十余年，波澜壮阔，叱咤风云，不忘临池，仅他书房中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的碑帖即达600余种，经他披阅临写过的就有400多种，其修养不可谓不深厚；二是有没有传世的有影响的墨迹。目前，除去民间珍藏的毛泽东书法墨迹外，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毛泽东墨迹即达数万件，其中建国前的就有9,060件；毛泽东逝世后，国家正式出版的毛泽东的墨迹即有6个版本共搜录刊载书法墨迹近千件，这些书法作品都属于传世的有影响的墨迹。三是有没有系统的书学思想，毛泽东对于书法理论，虽没有专门论著，但在他的一生中，对书法理论、书学思想也发表过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这些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民族书学思想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这些思想大致有八个方面：关于书法必须为时代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点；（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红墙内外》）；关于重视书法理论和书史研究的观点（见《毛泽东的书房》第9页）、《毛泽东书信选集》）；关于重视书法的筋骨和灵魂的观点（见《红墙内外》第150页）；关于书法可以修身养性的观点（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0页）；关于对历代书法碑版法帖的保护、收藏和鉴赏的观点（《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红墙内外》）；关于学书必须广采博取、穷而后工的观点（见《书法报》1985年6月26日）；关于书家必须自以为非的观点（见1987年第7期《知音》、《毛泽东书信手迹选》）；关于学书必须先从楷书学起的观点（见《学习毛泽东》）等等。毛泽东具备了上述条件，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是当代杰出的书法家，这是不容置疑的。

访问人：毛泽东书法有哪些特点和风格？

李树庭：毛泽东的书法分为早期（1915—1935年）、中期（1936—1949年）、后期（1950—1969年）和晚期（1970—1976年）四个时期。早期书法的特点分纵长型、扁平型、方整型三类。如1908年的还书便条（见《老一辈革命家手迹选》）属纵长型；1919年9月5日给黎邵西的信（见《毛泽东书法艺术》）属扁平型；1912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墨迹（见《中央档案馆丛刊》）属方整型。

中期书法的特点是前段扬左抑右，如1937年11月27日给文运昌信的墨迹（见《毛泽东书信手迹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后段扬右抑左，如1945年10月4日给柳亚子信的墨迹（见《毛泽东书信手迹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

后期书法的特点是由侧势结体改为正势，1949年至1954年这一时期的书法反映了这一特点；由正势结体改行书，1954年到1958年这一时期的书法反映了这一特色；继而由行书向草书发展，1958年到1966年以前的书法绝大部分为草书。晚期书法的特点是由草归行，内行归正。

其风格大体是早期讲究形质，中后期讲究气韵，晚期复归自然。其风格可用奔放、流畅、洒脱、清劲来概括。如60年代手书《千里江陵一日还》墨迹、1961年11月手书高启梅花诗等一类则属于奔放流畅的杰作；1958年9月为安徽大学题写校名的附信（见《毛泽东书法艺术》）和1950年12月为《瞿秋白文集》的题词（见《毛泽东题词墨迹选》），可以作为洒脱清劲的典范墨迹。

访问人：毛泽东书法的大概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发展演进过程？

李树庭：毛泽东书法的发展演进过程是一个随着书法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书家心神情绪、不同时代的不同书风等因素的变化而逐渐演进的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这种演进有时表现得比较急骤，有时又表现得比较缓慢，往往呈现跳跃式、波浪式、回复式等形式。如毛泽东早期的书法就是一种跳跃式演进，比较急骤；中期和后期的书法却是一种波浪式的演进，比较舒缓；而晚期也包括中期的某个阶段的书法则是一种回复式的演进形式。这个问题我在前面两个问题中都间接的涉及到，这里就不必重复了。

访问人：那么，你从毛泽东的书法中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毛泽东？

李树庭：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从与书法艺术相关的方面去谈，我没有对毛泽东作离开书法艺术之外的全面研究，因而也不敢妄加臆断。

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在《书概》中说过，书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书家的字；反映了书家自己的学识、才华、志趣、人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如其人”、“书如其人”。因此，从毛泽东七十余年的书法实践中，至少可以反映出毛泽东的如下品格。

毛泽东是一个追求个人艺术解放、不受任何羁绊的人。毛泽东作为革命家，他是旧的传统秩序和规范的不屈不挠的挑战者、叛逆者和反抗者。作为艺术家，他终身追求个人艺术解放，勇于打碎羁绊。习字的传统程式是以方笔入手，他偏偏从圆笔入手；结体的传统程式是正势，毛泽东却取侧势，完全不受这些传统程式的束缚。这种超常规的艺术轨迹又是同他那种叛逆、挑战、反抗旧世界的刚毅与顽强的性格相一致的。

毛泽东又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人，尽管毛泽东在指

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有过不少失误甚至错误。但他的思维和观念始终是向上的、是新的，直至晚年仍在大声疾呼：“不进则退”。这种品格在他的书法艺术生涯中，也有充分的反映和体现。1958年，我们国家探索、创新、变革风云际会，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字也与他前后时期的字体能保持相对时期的稳定大相径庭。1月12日，他写给广西负责人刘建勋、韦国清信的手迹宽大疏散，不拘章法，“勋”、“国”两字的结字线条竟如仿宋，“国”仅有从左下而右上的方框，这在他的墨迹中和中国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又如1961年9月9日，毛泽东手书的他的庐山仙人洞诗手迹（见《毛泽东墨迹鉴赏大观》）中的“无”字，既非行，又非草，是繁体正书，中间四竖笔压了第一、二笔，笔笔出头，这又是在书法实践中的罕见的在结体上追求新的视觉美感的一种探索与创新，令人拍案称绝。

毛泽东还是一个知识渊博、胸罗万有的学者。清代书法理论家杨守敬在《学书逸言》一书中说，书法家“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无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毛泽东作为书法家，所具备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关于书法美学、关于书学理论、关于文字学、关于文学诗词、关于中国历史、关于碑版篆刻、关于音乐舞蹈等等与书法创作有关的知识毛泽东均有广泛的涉猎、有独到的见解。以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为例，毛泽东就精读了从《诗经》以下至元、明、清的诗别裁集、《词综》、《曲选》等，对其中的许多佳词丽句、绝妙篇章段落更是背诵如流，《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收入毛泽东手书的上至远古的宋玉、下至清末的林则徐等创作的诗词117首，其中大部分为背诵默写的。有一次，毛泽东一连为身边工作人员张仙朋默写了近20首古诗、古词、古曲。

毛泽东更是一个在感情上既炽烈豪放又细腻丰富的人。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豪放派和婉约派词人，毛泽东曾说过，他“崇尚豪放，不废婉约”。这两种绝然相反的情愫在毛泽东的书法墨迹中也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1964年，国际上反华势力猖狂肆虐，毛泽东率领中共坚决反抗，决不退让。这年二月他手书的唐·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墨迹（见《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铁划银钩，斩钉截铁，“不斩楼兰誓不还”一句墨酣笔劲、笔笔如剑如刀，字字如岩如磐，刚烈之气，力透纸背。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病逝，毛泽东得电后，写给其兄杨开智的信墨迹（见《韶山毛泽东旧居纪念馆》）笔势舒柔，犹如肝肠寸断，墨迹中更有“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一句，其情其意，通过轻柔回婉的墨迹线条表达得淋漓尽致。

总之，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是当代的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留下的书法墨迹是我们民族艺苑中的一份瑰宝，他的伟大的书法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丰碑。随着历史的发展，毛泽东的书法在中国民族传统艺术中所占的地位将愈加辉煌，所产生的影响将愈加深远。

1992年8月1日于湖北天门市

访庄福龄——

讲个大题目： 如何建设当代中国哲学

庄福龄

庄福龄，1929年生，江苏镇江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和研究。主编和撰写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已出五卷）、《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体制改革的哲学探索》等。

见到教授，人如其名：庄重厚道，和蔼可亲，一位受尊敬的长者；说到生动处，手足挥动。作为哲学史学界一家，他的意见是有建设性的。

访问人：庄教授，我们中国是一个有哲学传统的民族，尤其到了现代，出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大哲学家。但如何建立当代中国哲学，现在的理论界和哲学界似乎存在一些不一致的认识，我们想请您就这些问题谈一谈您的看法。

庄福龄：这几年来，我也在考虑这些问题。现在理论界包括哲学界都在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如何建设。从这个命题上来讲，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应该有既能反映当代先进思想又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但是现在思想界和理论界众说纷坛。比如前一时期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主张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复兴儒家的思想，根据是儒家学说似乎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振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认为儒家的学说没有过时，对现代化还有指导作用。这些观点，不仅国外有，国内也有，曾流行一时，主张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哲学，就应该走复兴儒学的道路，有些学者，还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结合起来。

访问人：李一氓同志对这个议论很有意见，他写过一篇文章予以驳斥。

庄福龄：不管是结合也好，复兴也好，总而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应该把儒家学说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代中国哲学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如何来建设。除去这种主张，还有另一种，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应该走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道路，有人就主张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西体中用，要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引进到中国来。具体说，就是走符号哲学的道路，走语义哲学的道路、分析哲学的道路，走西方科学哲学的道路等等。总之这些观点虽有各种各样，但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认为中国自己的哲学不行，尤其是近现代的哲学更为贫乏，应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来建立我们的哲学。

还有一种主张，认为我们应该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走那些以学者身份出现，以建立学派为目的，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或是走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而不是走坚持和发展的道路。

访问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只能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来研究。

庄福龄：他们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流派，一个学派，否定它的进步性和科学性，持异端的态度去研究它。

所以多年来在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关于自己的哲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应

该如何来建设，可以说五花八门，各有各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归根结底不外是两大类，一类是要复兴过去的东西，一类是要全盘引进西方的东西。

访问人：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我们自己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哲学？

庄福龄：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当代中国哲学必须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来建设。为什么？第一，从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来看，他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人，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遗产有透彻地了解和研究，在知识素养上也有相当深厚的积累和准备。他在吸收中国哲学优秀遗产上具有特殊优越的条件。第二，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最了解，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如果说毛泽东对国外的东西接触比较少，也许在这方面有他的局限性，但他在中国这块大地上风雨兼程，奋斗不息，对于中国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这是许多人难以具备的。第三，他是在中国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基于这几方面，我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是结合中西文化的优点、精华而形成的。因此，中国当代哲学应该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既不应走复兴儒家学说的道路，也不应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既不应走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教条主义道路，也不应走对马克思主义持挑剔批判的异端道路。毛泽东恰恰就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不断地斗争、比较中走过来的。我们不当再重复那些错误道路，而只能以经过实践检验和选择的成功道路为基础和出发点，在毛泽东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在中国，从五四开始，各种西方哲学都曾介绍到中国来，各种各样的哲学学说都有人试验过，比如康德主义，实用主义，柏格森主义，但都没有成功，诸子百家的学说也有人搞过，也没有成功，只有马克思主义成功了，这个成功并不是教条式的成功，而是毛泽东式的，把它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功。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唯一的经过几十年时间检验，而且经过几十年酝酿和人民的选择、党的选择形成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建立当代中国哲学，只能以它为基础建设起来，而不能离开这个基础。这是我的一个意见。

另一个意见是关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我以为重要的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看作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理论，而不要把它封闭起来，同时代的发展隔绝开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代人虽然绝大部分已经过世了，但以他为代表的这种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精神，就是发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这是不会过时的。它不会随着某一个代表人物的过世而过时，正如马克思主义不会随着马、恩过世而过时和列宁主义不会随着列宁的过世而过时一样。这个发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永远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时代的前进中选择自己的代表和后继者。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他的思想由第二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始终在困扰着人们。社会主义能够推翻旧世界，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解决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能不能建设好，从今天来看，中国提供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在这一点上应该说邓小平同志贡献巨大，他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从这点来讲，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后继有人的，是处在建设和深化之中的。毛泽东从建国之初就在不断地苦苦探索社会主义怎么搞，从《论十大关系》到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甚至到发动“文革”，他都思考着如何把社会主义巩固下来，解决一个政权建立后怎么巩固和发展的问題，但始终没有解决好，在生前历经曲折，不能说他没有提出好的思想，也不能说没有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十多年的时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思想路线到具体的方针政策，有了一整套的办法，这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被人们坚持下来了，而且有所发展，有新的建设和丰富。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讲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就没有资本，就不理直气壮。所以不论从毛泽东生前来说，或是从毛泽东过世后的情况来说，不论从民主革命时期来说，也不论从社会主义时期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应该成为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当代中国哲学要建设要发展要能够担负起历史给它的新的使命或新的任务，只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上才能实现。

访问人：建设中国哲学，或者说使毛泽东哲学思想有所发展，重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

庄福龄：我的想法有这么几点：第一，建设当代中国哲学应当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更多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矛盾，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趋向。这一点是过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那个时代所不可能充分展开的，民主革命时期不可能要求他们把社会主义的问题超前作全面的研究，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曾被提到日程上来，但由于历史的因素，曲曲折折，也不可能全面地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东西。现在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今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只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研究透了，而且研究出具体可行的办法，找出人们可以遵循的理论原则，得出科学的论断，那么毛泽东哲学思想才不愧为当代的中国哲学，也才不愧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重点，这个重点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重点，中国哲学应该更多地研究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变化。这一点在过去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是不够突出的，今后我们应该投入更大的力量，更多地研究这个方面。因为二十世纪乃至下个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就讲过，人和自然界的斗争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他当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自然科学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问题当然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所以我们的哲学应该更多地研究科学技术。从毛泽东关于重视生产力的社会作用到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说明了当代中国哲学合乎历史需要的发展，也给我们揭示了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必由之路。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代世界形势下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最近接见大学毕业生代表时讲到的问题，我们过去较多地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没有看到它还有借鉴的一面、利用的一面和学习的一面。在当今世界新的格局和新的形势下，矛盾的同—性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注意，这就是今后我们的哲学如何利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包括我们自己过去所认为是对立面的东西用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这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

看到了，他特别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但列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生活了7年，而且当时的条件主要是和资本主义斗争，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和进攻，在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在实践上大规模地提出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也不会提供这种学习和利用的机会。而今天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这个方面，研究这个方面，真正使我们的哲学能集古今中外之长，屹立于世界之林，或者屹立于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哲学本来是在世界前列的，时代要求我们吸收一切古今中外的长处来创造自己的哲学，我们还是应该立于世界的前列，所以当代中国哲学只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建设、丰富，而不可能走其他的途径。这当然对于我们也是很艰巨的任务，对我们搞哲学的人，或者广大的实际工作者，都是一个艰苦的任务。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不是现成的可以拿过来就用的，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它更多地体现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如果不能真正掌握它的精神实质是难以把握的。哲学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当代的精神，那么这个当代的精神怎么把握？这就需要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善于分析比较，善于不断总结，善于开阔思路，善于解放思想打开自己的视野，更新自己的观念，才能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时代得到发展，建设好中国的哲学。

访问人：建设当代的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工作者，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努力？

庄福龄：建设当代的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需要在基本功上下苦功夫。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打好基本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学深学透，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都没有弄懂，怎么能讲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哲学？前一个时期有些人一讲中国的事情就大谈该怎么样怎么样，一讲马克思主义就百般挑剔，然而恰恰是这些人对马列的原著都没有读过几本，对毛泽东的著作也知之甚少。试问，这样的指责根据在哪里？对中国的事情又能有多大的发言权呢？在前一时期的动乱中某些精英振振有词，说什么中国要倒退几百年才能进步，这种论调就是对马列、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国情无知的典型表现。所以我觉得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建设中国当代哲学，首先要把马列主义的东西踏踏实实地弄懂，这特别是当代青年的基本功。其次，还要把中国的国情踏踏实实地了解清楚，因为我们既不能走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也不能走“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些人搞异端和批判的道路。而是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像毛泽东那样，把中国的国情吃透。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对中国能有什么发言权？比如：有人天天讲人性，讲人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抽象的。讲人，也许是西方的人，不是中国的人。中国的人性、人情是什么？中国人的需要是什么？中国人的生活现状是什么？对这些都不了解，还谈什么人性？所以这第二个基本功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实际，了解中国发展变化着的实际。

第三个是要想办法把这两个了解结合起来，像毛泽东那样成功地结合起来，包括像邓小平同志这样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要结合好，就必须在做到两个了解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开阔眼界，打开思路，广泛地分析比较，不断地总结。舍此没有别的办法。这当然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丝毫不亚于毛泽东当年在生死斗争中创立、发展自己哲学的状况，所不同的，

是现在处于一种和平的特殊的的环境，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肩上。

访问人：我们要在中国建设当代哲学，除了您讲的三点意见外，是否也要对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哲学思想有深入的了解，才可以互相比较、借鉴，以至发展？

庄福龄：对。我在第三点谈到的广泛比较，就包含这个意思。不是说西方的东西不要学，对西方的东西我们要了解，而且要求了解得很深、很透。比如有人说皮亚杰的认识论比毛泽东的认识论高明，萨特的存在主义比马克思主义高明，等等。对于这些议论当然不能简单地处置它，而应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比较，既要把毛泽东的认识论研究清楚，也要把皮亚杰的认识论研究清楚，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研究清楚，也要把萨特的人学研究清楚，而后对两者进行分析、比较，再进一步谈中国的哲学，中国的认识论应当怎么搞，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就比较有说服力。不然就是空谈，就会陷入片面性和绝对性。有人前些时候讲，中国的启蒙要补课，因为启蒙这一课没上好，然后又说要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我觉得这样讲就犯了片面性，第一，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已不是一年两年了，从五四运动启蒙开始，到现在好几十年了，这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怎么传播的？在实践中怎么传播的？书本知识怎么传播的？理论怎么传播的？中国的面貌怎么改变的？对于这些作过过细的研究没有？积累过扎实的资料没有？如果没有，那就只能从一种想象出发，从想当然出发，似乎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缺点，都和我们当时的理论不完善有关，因此要补启蒙这一课，这样的逻辑推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建设当代中国哲学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是一个艰苦的研究工作，而且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才能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向前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应该向前发展的，但是不是能够发展，这要看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小平同志在这点上成功的。他在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不仅解决了毛泽东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毛泽东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今天十一亿人口的大国社会主义搞的不错，虽然不能说没有缺点，但在世界各国讲还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建设自己的哲学，我们也要踏踏实实地来做这个工作，而不是停留在想当然发表一些空洞的感想，做一些抽象的议论，或者简单地做一些浮浅的比较，这都无济于事。这需要我们一代人两代人，甚至好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中国的哲学才会真正重新放出光彩，改变某些简单地把中国哲学归结为孔夫子的哲学，否定当代中国哲学的看法。

访问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庄福龄：那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但这也说明了一点，我们建设中国自己的哲学，并使它真正的放出光彩，一要靠实践，二要靠理论。哲学是实践的概括和升华，如果实践本身做的一团糟，概括升华就谈不上。我们要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又要把正确的实践概括为科学的理论。

访问人：您觉得中国哲学的发展和突破最主要的是在哪一点上？

庄福龄：还是刚才我讲的那几条，其中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要很好地研究，因为这些问题不是过去书本上的东西所能够解决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即使科学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的也只是一般的理论，因为马克思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的实践也只有7年，斯大林虽然有几十年，但有很多僵化和错误的东西，毛泽东在实践中有探索，但那是在曲折中

的探索。如果中国哲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突破和贡献，为人们观察和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将会对人类、对理论作出划时代的贡献。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书出了不少，您觉得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完善和丰富？

庄福龄：对体系的问题我一直是这样看的，如果就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讲，不应当用教科书式的体系来要求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更多的是政治哲学，而不是一种纯书斋的哲学。他处的时代和马克思的时代也不同，马克思既是学者、理论家，同时也是革命家，是在野的革命家，不是执政的革命家，所以他能在书斋中构造他自己的体系，比如《资本论》有它自己的体系，《反杜林论》也有它自己的体系。毛泽东的哲学体系不能用教科书的方式来要求，他的体系应该有他自己的特色，他的特色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在实践中来创立自己的哲学。所以我觉得今后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要从实际出发，比如说要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科学文化成果上，在向世界开放上来形成自己的体系，而不要人为地制造一些框架，什么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等。“文革”前我在人民大学给全校的研究生讲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就强调这一点，我不赞成用这种办法来构筑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比如说辩证法有三条规律，你一定要把毛泽东在辩证法上的论述都纳入三条规律的框框，这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只写了《矛盾论》，主要研究了对立统一规律，这当然不是说他没有肯定否定的思想，也不是说他没有量变质变的思想，但他没有在这两条规律上作系统的理论上的阐发和研究，所以说毛泽东并没有把辩证法归结为三条规律，这不是他的体系。

我们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不能用一般教科书的框架来要求他，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和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有它独具的特点。

访问人：还因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庄福龄：对，他首先不是个教员，也不是个纯粹的学者，他主要的任务不是讲课，而是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创造性运用本身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访问人：他的逻辑思路是不是在实际中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再回答这些问题。

庄福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以为应当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来进行。比如说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了三个基本经验，我们是不是可以围绕着这些基本经验中的问题来研究他的哲学思想，我看这样可能比用研究唯物论的几个基本特征，辩证法的几条规律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实际些，更符合它本身的特点。

访问人：是不是说，应该把它变成活的？

庄福龄：对，正如今天人们要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一样，最好不要把邓小平的思想简单地纳入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框架里。因为小平同志并没有到哪个课堂上专门讲唯物论辩证法，他的许多哲学思想是包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量实际问题之中的，是和这些问题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

访问人：在他的讲话、文章中包含了这些哲学思想。

庄福龄：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个很突出的思路是讲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讲怎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的哲学思想应该体现在这

些问题中，而不是我们用一个框架把所有思想都塞进去。

访问人：刚才您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应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经过许多革命实践的检验，集中了中西优点，那么您能不能谈谈他集中了哪些中西优点？

庄福龄：他集中了中国唯物主义的传统，因为在中国曾学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很显然，毛泽东是集中了唯物论的传统，这点可以说他是比较突出的，包括他在文章中举的一些例子，用的典故，大量地都是继承唯物主义的传统。西方哲学他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最深，运用最活。根据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这个特点来看，他有很多东西是和西方哲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不谋而合的。比如我经常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军事思想就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精神。但他在写那些军事著作时，未必就读了很多西方的军事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当然不能说一点没读过，如延安时期他曾请何思敬等介绍过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哲学，他自己也曾读过这方面的东西。此外，延安时期出版过恩格斯的军事论文集，他也不会不看到这些东西，他还认真反复地读过《反杜林论》，其中就有恩格斯的军事思想，但像他那么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系统他讲军事辩证法、军事唯物论、军事认识论，今天看起来则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前辈，甚至超过了恩格斯，比恩格斯讲得更系统更深刻更生动。他的军事思想不是从西方来的，是他植根于自己的土壤上，总结了实际战争经验得出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它和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是很自然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唯物论，而且也继承了西方从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一切好的东西，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传下来的好的东西。

访问人：您讲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集中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哲学思想而形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坚持它、发展它，不能走复兴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的道路，请问这些哲学的弱点和不足是什么？

庄福龄：这是很明显的，儒家的哲学是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事实证明后来历代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都是出于自己的需要，作了种种修改，就像鲁迅讲的儒家变成了敲门砖，孔夫子也变成了敲门砖，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就把儒家装扮成什么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儒家的思想作为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统治思想有很多历史局限性，但也不是说没有一点可取的东西。毛泽东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吸取其中合理的有用的东西。合理的东西往往是同糟粕交织在一起的，就像皮和肉长在一起一样，把真正好东西剥离开来，要做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而且要有耐心，不能损害内部的好的东西，这是个很艰巨的过程。

西方哲学也是这样，西方哲学有很多很不像样的东西，但西方哲学也有很多好的东西，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注意不够，我们只是认为西方是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便一概排斥，没有注意它有合理的成分。但关键问题是我们要首先自己有了武装，然后才能有正确的思想去分析判断和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融合西方的学说也是很困难的，对于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加以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任务也很艰巨。

访问人：听了您的谈话，我认为您的中心意思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庄福龄：这可以说是主要思想，但还不是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全部工作。

对我国哲学的传统，对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趋向，还要作很多分析和研究。

访问人：最后，您能不能给当代中国哲学下个定义？庄福龄：当代中国哲学还在建设中，可以不忙于下定义。但是这种哲学应当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应当具有时代风貌，应能和世界各种哲学进行对话和较量，又有中国特色，并能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科学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访问人：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992年5月2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访雍涛——

毛泽东的哲学构成体系吗？

雍涛

雍涛，1936年8月生，广西桂林人。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经济体制改革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

九省通衢的武汉，有个著名的武汉大学，在武大，又有个全国闻名的哲学系，他们是和我国当代大哲学家李达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雍涛老师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由他来解答这个问题，固然因为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学有成就，同时也回答了长期以来在国内外流传的一种观点。

访问人：你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构成体系吗？

雍涛：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叫体系。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体系，简单地说，就是“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具体地说，一门科学的体系，一般由这样三个部分构成：（1）有关这门科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2）建立在这些概念或范畴之上的基本原理；（3）同这些原理相联系的其他一些较为具体的理论。这三个部分又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有着前后一贯的严密的逻辑联系。这种联系不是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也不是仅仅依靠纯逻辑的推论得到的，而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并且是随着人们对事物的内在联系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体系的基本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一切反科学的体系，并且无情地嘲笑和抵制了那些动不动就宣称自己已经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思想体系的人，把这些人看作是吹牛家和骗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丝毫不轻视科学体系的意义。认为某一科学体系的创立，实际上标志着人们对某一事物在某一阶段的内在联系的认识的完成。我们当然不能说凡是有条理性、系统性的东西就一定是科学的东西，但凡是科学的东西就必定是有条理性、系统性的东西。科学只有当它构成体系的时候，才能全面地或比较全面地揭示出某一领域的事物的内在联系，也才易于为人们学习、掌握和运用，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的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恩格斯在他同杜林论战的著作《反杜林论》中说，“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并一再强调这一体系“极其彻底而严整”。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反科学的思潮，之所以能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所掌握，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彻底的科学的体系。我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不论是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学习。毛泽东要求我们“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访问人：那么说，毛泽东的哲学是成体系的？

雍涛：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体系的基本观点来衡量，应该说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创作中已经构成了一个哲学体系。理由有三条：第一，毛泽东的哲学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不是对个别哲学问题的零碎的论述，也不是对某些哲学争论问题的孤立地研究，而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第二，尽管它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致的，但它又是中国化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性体系；第三，现代中国革命是一个由各种内在的社会矛盾所推动的合乎逻辑（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因而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逻辑在理论上系统地、正确地反映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必然要形成一个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哲学体系。这一切说明，毛泽东的哲学是有体系的。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是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所以，从哲学领域来研究和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是哲学工作者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只有把毛泽东的哲学作为一个体系来学习和研究，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防止用片言只语来割裂和歪曲它。至于这个体系如何表述，我认为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也是应当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的。

访问人：毛泽东的哲学究竟是怎样一个体系呢？

雍涛：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哲学其基本范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体相同的，但它显出它自己特点，如更多的是使用“主观和客观”、“知和行”、“自觉能动性”、“矛盾”、“一分为二”、“社会基本矛盾”、“群众路线”等等范畴；毛泽东的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样，是由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这样一些原理构成的，但每一个原理又都有它自己突出的特点。这里我们不来详细考察这个体系各部分的内容，只是概括地说明，那些同中国革命的成败密切相关，同时又是经过实践考验的基本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简要地说，这个体系的基本构成是：以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以群众路线为特征的历史唯物论。这些基本观点之间的关系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实践观点、矛盾观点、群众观点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所谓实践观点，就会变成背离客观规律而盲目行动的实用主义和唯意志论；所谓矛盾观点，就会变成主观臆造和玩弄矛盾的诡辩论；所谓群众路线，就会变成违背群众利益的命令主义或尾巴主义，甚至会成为野心家、阴谋家欺骗和利用群众的幌子。不仅如此，实事求是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其他观点归根到底是从不同的方面解决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反过来说，不坚持实践观点、矛盾观点、群众路线，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的“是”，即客观事物的规律，只有在实践中，坚持以矛盾规律为指导去分析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这几个方面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其基本特征是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访问人：有人说，从体系上看，毛泽东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无根本区别，它们都同属于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没

有必要，也不可能构成一个单独的体系。

雍涛：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的哲学虽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而在内容的侧重点和表述方式上又有自己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性的体系。同样是一种哲学体系，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形态，这在哲学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唯物论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不能互相代替。他说：英国曾经出现过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十八世纪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者；德国的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并不因为有了英国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要法国的，也并不因为有了英国法国的，就不要德国和俄国的。同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也应有不同的形态，它们是不能互相代替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能代替列宁的哲学。没有列宁的哲学，就不能解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问题，不能解决俄国革命的新问题。同样地，列宁的哲学也不能代替毛泽东的哲学。没有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解决在列宁之后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碰到的新问题。

访问人：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雍涛：考察了毛泽东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容易了解毛泽东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历史地位了。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在列宁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说明和发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宝库增添了若干新的宝贵财富；最为突出的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充分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这是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体系，同时又是一个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我们应该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充分发挥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

1992年5月23日于武汉

访周抗——

毛泽东的辩证法有什么特色？

周抗

周抗，原名周鸣韶，1914年生，浙江诸暨人。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主编、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主要著作有：《关于经济法制的客观性质》、《求是论集》、《社会主义民主论》，主编的论文集有：《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

周教授曾很客气地对我们的相邀表示感谢。其实，当他数次来信表示一定按约寄出稿件时，我们的敬意油然而生，要知道，周教授已是一位年近八

旬的老人了。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来源

访问人：你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同我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周抗：按我的理解，这是批判继承的关系。因为传统哲学的历史遗产，不论是古代的文王、孔子、老子、孙武子等人所留下的，还是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民主改革的先行者所留下的，其中实际上都存在着，真智同谬说相渗透，精华与糟粕相结合这么一个内在矛盾。我们若不掌握马克思的分析批判的科学武器——唯物辩证法，而只靠大量阅读古籍，那是绝不可能达到扬弃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先秦各派学说以及后来的玄学、理学、心学等等学说中的糟粕而继承其辩证思维的精华的。因此，在谈到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来源时，我对国内某些学者所提出的“两源说”，就稍有不同看法。虽然他们明确地指出，马列主义哲学是个主要来源；而传统哲学则是次要来源，但我认为还是不够确切。

访问人：您的观点呢？

周抗：据我看来，只有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哲学原理，才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辩证法思想的来源。而毛泽东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则仅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或带有民族形式的来源。毛泽东早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时，就说过：“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长期都是亲自带头，把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放到了他所规定的“三大学习任务”之首位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号召红军指战员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时候，也还是竭力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在这篇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论著中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当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不仅指明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对于完成其他两项学习任务的特殊重要作用，而且更揭示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定要努力去学马列主义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绝不可满足于仅仅熟悉了一些词句——这么极端重要的道理。

毛泽东所规定的第二个学习任务就是“学习历史”，即学习历史遗产。这个任务之所以被排在第二位，并不是因为它不够重要，而是因为，若要真正有效地学好它，那就一定得借助于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本人虽然早于青少年时期就熟读不少古籍，但是当他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之后，显然是把自己所有的古籍知识统统都拿到马列主义“显微镜”底下去扬弃了一番。这样一来，他才真正获得一座随时可以应用的历史遗产的“宝库”了。想当初，他虽处在极度紧张的战争年代，可是每当应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时，总忘不了还要参考传统哲学，采取其中辩证的精华，用来丰富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凡是用心读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论著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在那里不但有例如巧妙地借助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样的朴素辩证法的警句，准确地阐明我们的，为了前进而先后退，为了扩大地盘而先丢失地盘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还有，借助于传统哲学精华积淀形成的语言，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具体分析方法”的重要原理。这就是被称为“十六字诀”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这么一个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辩证分析方法。毛泽东的这些高水平的学习成果，岂不就更使我们认清这两个方面学习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了吗？

毛泽东所规定的“学习任务”之三是“研究现状”，这不但表现为某项计划制订前的调查研究，而且表现为计划实施全过程中的继续调查，以及结束时的工作总结。毛泽东曾再三再四地著文指出了这一点并非一般重要，而是十分重要！就因为理论只有在同实际结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力；历史传统也只有继续不断地摆到现实斗争中去鉴别，才能把弃糟粕而存精华这件事越做越好。例如，毛泽东认为：红军在总的战略上，只能坚持以弱御强、以寡敌众的持久战；而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上，就必须尽一切可能，集中三倍、五倍甚至十倍的优势兵力，并选择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时机和地方，坚决去打以多胜少、以强击弱、一举歼敌的速决战。在这里，毛泽东对老子的军事思想和孙武子的军事思想都进行了有批判的继承与应用；而且枪是从现实条件出发，恰如其分地把这两派的军事思想放在不同的位子上进行灵活运用。在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光辉灿烂的具体表现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它同我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岂不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特色

访问人：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有何特色？

周抗：据我看来，它显然表现出一种颇能引人入胜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可以说是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标志。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毛泽东研究的是具体的矛盾，而不是思辨的矛盾。这只要把毛泽东的《矛盾论》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对照就可以看清楚了。所谓具体矛盾，简单地说，就是具体事物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思辨矛盾中，存在着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但不存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而只有在具体矛盾中，才有一个一个的各自特殊的矛盾，才有必要研究其中的个性与共性、相对与绝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是在革命实践中研究和应用矛盾学说的，所以就必然要涉及这些问题。

访问人：你怎不能具体地谈一谈？

周抗：好的，下面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毛泽东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是如何具体而细致地去探索辩证矛盾的具体情况的：

第一，从统一中求对立统一。具体说来，也就是把作为统一体的某事物分解为它的构成因素或组成部分，并从这些部分中考察其相互之间的既差异又联结、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正如毛泽东爱说的一句颇多传统味的话：“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就拿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来说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早在二十年代就通过细致的考察和剖析，把它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这样的既统一而又对立的两个部分了。这也可说，是从一中发现了二。但这决不是像切西瓜那样，简单地一刀，将它切成两半。而是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指导下，对它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从而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并且看清了双方之间那种根源于经济利益上的相互关系，是既有彼此磨擦、对立的一面，又有彼此依存、统一的一面。此后的社会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毛泽东的如上分析，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中国革命来说，又是极端重要的。

第二，从对立中求对立统一。这种探索比前一种又复杂一点。它不是从“一”开始作研究，而是从“二”开始，即从分裂着的或很少联系的两个事

物开始来作研究的。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关键并不在于发现对立，而是在于探索统一的可能，亦即探索具体地联系、合作、配合或结合起来的可能，并且要求确切地掌握那些必然导致形成统一和巩固统一的具体条件。例如，从1927年直到1936年，人们大都把共产党同国民党看成绝对不会握手言和的死对头。但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等人则不同，他们经过长时期的探索和研究，认为固然两党之间剧烈对抗的现实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却是可以变得缓和一点的；又认为虽然要求双方之间的和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而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也不是毫无可能的。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就指出：形成国共两党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各自独立而又合作抗日局面是完全可能的。其主要条件大致是：（1）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日益向关内深入；（2）中华民族大难临头的形势激起了全国工人、农民以及各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3）在国民党里面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以不同方式日益更多地向我党表示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4）我们党一次比一次更明确而具体地提出，创立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一项为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所热烈拥护的战略决策。就在这些条件日渐形成的情势下，1936年12月发生了张、杨“兵谏”的西安事变以及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寇突然进攻的芦沟桥事变，这一事变促使我们展开了团结抗战的伟大旗帜。从那以后的一系列事变进程，更明确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从对立中寻求对立统一的做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是成功的。我们从这一成功中认清了，“相反”的两个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成”的。或者说，是可以“合二而一”的。而在这件事的实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就在于所谓“一定的条件”。如果没有如上所列举的这么一系列具体条件的齐备和成熟，那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具体的对立统一。

第三，从统一的历史过程纵向地寻求对立统一。有些初学《矛盾论》的同志，往往不了解毛泽东所谓“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从而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互相贯通”，这些话中作为矛盾的彼方与此方，是历史过程中纵向地存在着的，而且是先后相继地出现的。例如，毛泽东多次分析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坏事与好事的矛盾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既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着的方面，都是纵向的。就拿战争与和平的矛盾来看一看吧，这里既对立而又在一定条件下统一着的矛盾结构，实际上是既相反而又联贯的两个历史阶段所构成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毛泽东正是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分辨出显然有其本身独特现象和独特本质的特殊阶段（例如抗日战争阶段），并同它的过去阶段以及将来阶段联系起来，在辩证法一般原理指导下，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哲学概括，再经实践反复验证之后，才把这个不仅完全符合矛盾规律，而且显出了一点作者的独创性的结论写进了《矛盾论》的。因此，当着斯大林的严厉“批评”突然袭来之时，这个独创性的论断始终巍然不动。这就因为，它本来就是实事求是的，无懈可击的嘛！

我想，从上述三点探索中，人们不难领会，毛泽东矛盾学说中的中国特色，不但表现为理论形式上的民族风格等等；而且更表现为理论内容上的具体化和中国化。诚然，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一般原理是从马克思和列宁等导师那里学来的，当然也参考过许多古籍的。但绝不是像鹦鹉学舌似地，从前辈或祖先那里搬过来就算数的。而是学来了精神实质，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并通过在实践中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再当先生，再当学生……这样一种螺旋式的循环上升的长期过程，才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这个泉源之中，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的，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具有中国特色的，亦即里里外外都中国化了的，一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花。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访问人：毛泽东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周抗：是的，我在回答上面两个问题时，已经表明毛泽东在应用唯物辩证法去批判继承传统哲学时；在应用唯物辩证法一般原理去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都显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开拓，有所前进。下面我想着重谈两点：

第一，在对“应用辩证法”研究方面的创新和开拓。毛泽东善于在实践中研究和应用唯物辩证法。他主张不仅要研究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而且尤其要揭示它们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开拓了“应用辩证法”方面的研究。就说打仗吧，他不仅研究一般的军事学，而且更热衷于结合研究军事活动中反映出来的辩证运动规律。从而揭示出了：隐蔽身体与发扬火力，防御与进攻，后退与前进，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持久与速决等等一系列既相反而又相成的辩证关系，创立了被称为《军事辩证法》的“应用哲学”的学科。再说进行政治斗争吧，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又作出了高水平的敌我分析，从而把中国资产阶级分解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依据这两部份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把前者归入敌人之列，而把后者归入人民内部。这一具体分析的实际价值，就在于：使面临的敌人大大减少而朋友和战友则大为增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中，其“专政面”就大为缩小，而其“民主面”则相应地大为扩展。这岂不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政治辩证法”方面获得重大开拓前进的光辉成就吗？此外，还有“党的建设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辩证法”等等，其中有些方面，可说是硕果累累；有些方面虽也有错误和失败，但其中也还存在着颇有价值的，例如《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的某些探索。

第二，在对唯物辩证法原理及其体系研究方面的深化和开拓。列宁曾经强调，唯物辩证法要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来进行研究；同时还说：这个问题要有人来加以发挥。据我看来，正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积极响应列宁的号召，站出来做了这一“研究”和“发挥”的工作。首先，毛泽东认为，矛盾的同一性，不仅表现为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而且还表现为，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他进而具体指出，例如生与死、福与祸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等，在性质上相反的两个阶段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同一性，因而才能相互转化。这个著名论断，虽曾遭到过苏联哲学界的非议，但它符合客观的历史规律，而且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早有这种辩证思维天才萌芽的反映。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它提到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加以阐明。这岂不是他对哲学基本理论上的深化和开拓的一例吗？

其次，他认为矛盾学说的“精髓”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首先简要地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同时就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道理；紧接着就以大量的篇幅详细地阐明了矛盾特殊性原理。在阐述矛盾特殊性问题的过程中，不久

就联系矛盾的普遍性问题指出了：人类的认识运动，总是先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都可能使认识提高一步的关于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紧接着又展开了矛盾特殊性问题的阐述，并用来论证了“对具体的事物，必须作具体的分析”这一貌似平凡而启发性极大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原理；此后，再一次联系到矛盾普遍性问题的时候，才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它的共性和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即它的个性和相对性。而共性即寓于个性之中，也就是说，在相对性的东西之中，存在着绝对的东西。显然，我们如果不研究这个毛泽东称为精髓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不但不能掌握上面已经指出的一系列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道理，而且也不可能弄清楚后面的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同一性和斗争性等等的辩证关系的。据我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哲学基本理论上有所深化和开拓的又一例。

再次，毛泽东关于矛盾学说的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和唯物辩证法诸范畴的辩证统一；而且还体现出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辩证统一，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唯物辩证法的新体系。据我看来，这也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发展或创新的难能而可贵的成果。

总而言之，我认为毛泽东对哲学的确是有所发展的。而且如上所述的这些主要的发展之点，都要经过实践从正反两面检验之后，被认为是很成功的。如果要问毛泽东的成功之路是怎样的呢？我认为这条成功之路，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要点：（1）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其立场、观点、方法，而不足仅仅学其词句；（2）坚持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不是丢掉马列主义进行盲目实践；（3）坚持在实践中既当先生，又当学生。这也就是说，既指导实践，而又虚心接受实践的检验。我认为谁如果能真正抓住这些要点，那么也就抓住了这条成功之路了。

1992年10月5日于上海

访谭双泉——

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谭双泉

谭双泉，1930年生，湖南安仁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南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湖南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红叶初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论文集）、《中共党史论集》等书，曾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简编》。

谭教授这次是以笔答的形式与我们交流的。或许以后我们会有当面向他请教的机会吧？

访问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八个字，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谭双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首先是一个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就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找到有自己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同时，它又是一个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一个内和外、个体和群众、自力与外援的关系问题，要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独立自主正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独立自主侧重于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自己创造，可借鉴外国经验但不受外来干涉；自力更生侧重于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艰苦奋斗，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强盛，需争取外援但不依赖于外援。前者是指如何决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后者是指如何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保证；自力更生以独立自主为基础。

访问人：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呢？

谭双泉：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共产国际开始成立时，列宁很注意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他说：“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3页）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的专断作风渐渐支配了共产国际的许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以至苏联的一切都神圣化的倾向极为盛行。一方面，共产国际一些正确的主张对中国党起了不少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提出的脱离中国实际的主张，则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的损失。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的右倾错误和十年内战时期连续犯的“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抗日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都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分不开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同上述一系列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自觉提出并完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书，明确认定：“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单纯依靠“本本”。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我们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唯书”、“唯上”都是应当反对的。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大声疾呼：“必须洗刷”这些唯心精神，强调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当时能这样地提出问题，实在是不容易呵！要知道，“反对国际路线”是一顶多么不寻常的政治帽子。这不仅反映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真知的见，而且也表明他具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极大的理论勇气。

访问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一经提出，必然要对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又是什么呢？

谭双泉：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不断地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从危难中挽救了革命。

早在大革命时期开始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就是撇开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结果，已蕴含着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干革命的思想。尤其是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日益严重，曾导致中国革命于最危险的边缘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这种“左”倾错误的长期斗争中，终于打破了“城市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开辟了一条中国人民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根据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国内外形势，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而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克服这种投降主义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它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建什么国”的斗争中，毛泽东站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一方面嘲笑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显然是徒劳的；另一方面又顶住了国际上的交枪逆流和原子弹的恫吓，冲破斯大林不让我们打过长江去的阻挠，在短短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打败了美蒋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上曾照搬苏联的做法，犯了一些错误和走过一段弯路。但总的说来，还是基本上执行了毛泽东 1958 年 6 月一个批示中所说的建国路线，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正是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不断地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了今天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理论体系。

访问人：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条思想路线最主要的代表人。从毛泽东一生的实践来看，也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个精神、原则，那么，这八个字同毛泽东本人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呢？

谭双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确与毛泽东本人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主内”、“贵我”的思想十分赞同，对三纲五常这种混灭个性和人格的奴隶主义思想表示异常愤慨，他说：“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他认定这种纲常伦理观念表面看来是利他的，实质上却是一种极端虚伪的利己主义者，他说‘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他说，墨家“兼爱

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因此他得出结论是：“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见《（伦理学原理）批注》）甚至说，“有独立心，是谓豪杰”。什么叫“独立”？即“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踞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讲堂录》）这种朴素的独立自主意识，对于他后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独立自主观是有联系的。

这个思想同中国本上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我们这样由封建专制统治数千年的东方古国里，一部观念文化史，就是注经、释经的历史。统治者调节人伦关系的轴心，是“皇权至上”的“官本位”。在这种文化心态和社会风尚的沿袭下，“唯书”、“唯上”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近百年来，由封建制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是处在仰人鼻息的境地，“言必称尧舜”、“言必称希腊”的崇古媚洋氛围十分浓烈，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问题上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实践力量，大多数出身农民，这使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和军事战线上的斗争一样，极其艰苦而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继承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内”、“贵我”的精神，并形成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观，引导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因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在中国革命中产生、形成、不断丰富和完善，是根据中国本上的具体国情规定的，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访问人：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但争取外援的思想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看，都未能充分展开，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两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谭双泉：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经过实践检验并得到充实和发展的独立自主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但争取外援的思想未能充分展开，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外部曾遭到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随即又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干扰，无法向外开放；第二，内部较长时期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左”的东西被林彪、“四人帮”推向极端，把争取“外援”看作“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第三，对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标准的理解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这种格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这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又相互转化。从根本上说，自力更生是争取外援的基础，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而争取外援则是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条件，是矛盾的非主导方面，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转化为矛盾的主导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分割不开的。

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思想以后，1936年初冬，他在保安的窑洞里向斯诺表示过：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甚至“欢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比如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明确认定：我们应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互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

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与手工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在接见外国来宾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到这点。比如 1965 年 9 月 30 日，在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谈话时，当外宾讲到现代科学技术已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毛泽东兴奋地指出：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

大家知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同美国敌视态度的斗争中，从 1955 年 8 月至 1970 年的 15 年时间里，曾举行中美大使级谈判达 136 次。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在美国对华政策稍有松动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抓住有利时机，以邀请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引起连锁反应，迎来了 70 年代我国外交关系发展的新高潮，这就为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全面地改革开放创造了新的重要国际条件。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可见，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致的。

1992 年 9 月 1 日于长沙

访苏星——

毛泽东不懂经济吗？

苏星

苏星，1926年生，原热河省建平县（今内蒙古敖汉旗）人。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求是》杂志总编辑。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著有《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城市住宅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等书，并出版了《苏星选集》。

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有很高的行政职务。原想一定很忙，请他谈毛泽东可能要费些时日。谁料想，苏教授既很爽快又很谦虚！

不是因为不懂经济

访问人：从毛泽东的知识结构来看，他文史著作读得多，经济理论、科学技术方面的书读得少一些；此外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建设上有不少失误。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太懂得经济。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苏星：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毛泽东是懂经济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照耀中国革命航程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了哪些阶级是革命对象，哪些阶级是革命动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这些阶级力量如何改组和变化，并据此制定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著作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出这些著作来的。

访问人：据我们所知，毛泽东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前，还没有读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书籍。

苏星：不容否认，本世纪初，马克思的经济学原著翻译到中国来的还不多，但介绍这些理论的文章和书已经不少。例如，1919年11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全译本在1920年8月发表）和考茨基著《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大部分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前，上海报刊集中刊登宣传剩余价值论方面的文章有7篇左右，译文4篇左右。这些书和文章，对渴望寻找中国前途的毛泽东，都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说他当时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可能就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和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坚持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根据吴亮平回忆，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其中第二编是政治经济学）。在延安，读过《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重要著作。

正因为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有可能对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战争问题作出那么透彻，那么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毛泽东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由于中国革命的特

点，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他还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问题作了创造性的研究。在井冈山，他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在延安，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些著作，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结构、建设方针、工作方法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基本原则，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访问人：可不可以这样看，这些理论都是针对根据地建设来讲的，它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不一样？

苏星：当然建设社会主义，光有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时，毛泽东就及时告诫全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毛泽东自己就是这样作的。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1954年，他又一次阅读《资本论》，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著作。1958年“大跃进”中，为了纠正当时出现的“左”的观点，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9年冬，又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比苏联和中国经济建设经验，讲了许多意见，其中有许多意见是独创性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很强调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由于一直刻苦学习，才有可能写出像《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有深远影响的著作。

当然，毛泽东也说过：“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不过，他在经济建设上出现失误（最大的失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不是因为不懂经济，而来源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认识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个人主观专断。

他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什么位置

访问人：“八大”前后，毛泽东注重经济建设，后来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经济建设不那么重视了。从总体上说来，您认为毛泽东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什么位置？

苏星：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是注重经济建设的。在大会以前，1956年初，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毛泽东同一些地方领导人酝酿形成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和建设社会主义又多、又好、又快、又省的方针；4月，毛泽东向政治局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调动积极因素；在此期间，根据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号召，国务院历时数月，制定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以后，毛泽东也还提出一些根据中国国情探索自己道路的可贵的思想（如利用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的看法有了变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等于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

访问人：我认为毛泽东很重视经济，但在他的心里有个结，就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事常常困扰着他。所以表现在工作方式上，一会儿抓经济，一会儿又抓阶级斗争，就这样来回摆动。

苏星：基本情况是这样的。1958年初，毛泽东认为，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7年整风反右，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种说法，看起来和“八大”精神比较一致，但由于这种转移是同反冒进结合在一起的，又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把“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抛在一边，终于导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1958年底到1959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着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纠正这些错误，但很快又被“反右倾”打断了。1960年9月，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以后，才下决心调整，使国内形势逐步好转。在此期间，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主持农村政策调整，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在形势好转以后，加上开展中苏争论，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阶级斗争上去了。在1962年8月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提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问题，而且说，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就变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不过，毛泽东在会上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还能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前，还没有成为支配全局的错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当时，毛泽东一面抓阶级斗争（这是主要的），一面也在考虑经济建设问题。例如，1963年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964年底他在修改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又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此期间和以后，根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抓了三线（战略后方）建设，并且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特别着眼于发展农业和调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1965年初，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报告，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如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方面，对经济建设就很少关心了。相反地，当时推行的一套“左”倾错误政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经济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也有进展，但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历史的局限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其历史作用如何？他的思想有无局限性，原因又何在呢？

苏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根据你提出的问题，下面我列举几个重要经济思想。可能不全面，也可能不准确。

一、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毛泽东在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论证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此，它们就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

二、关于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47年毛泽东指出，“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垄断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泽东认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有两重性质：反对它的买办性，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毛泽东把它比喻为主体和两翼。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毛泽东就提倡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在过渡时期，他亲自抓农村工作。对个体经济，我们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必经之路。他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正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一系列过渡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

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这个思想，今天依然是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五、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多次强调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六、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958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还对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作用表示怀疑，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抛弃了这些正确观点，提出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倒退。

七、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认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他反对对人民竭泽而渔，赞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主张精兵简政。这个思想，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的原则；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和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重要思想。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访问人：那么请您谈谈它的局限性。

苏星：我认为最突出的就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提出过许多“左”倾观点。这些观点的产生，在客观上是受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某些错误实践的影响，主观上则主要是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误解和教条化的结果。当然，这些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了分析，我就不多说了。

1992年6月18日于中央党校

访姚杰——

毛泽东百战百胜吗？

姚杰

姚杰，192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0年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司令部机关做参谋工作。1951年开始从事军事历史研究，曾任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室主任。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解放战争卷），还与他人合写《谋略制胜》等著作。

谈起解放战争，姚杰如数家珍。今天我们不谈毛泽东打了多少胜仗，却请教他毛泽东是否打过“败仗”。姚杰说：战争情况瞬息万变，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万无一失，除非他是神访问人：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有传奇色彩的是，毛泽东身经百战，却没有在身上留下一块伤疤。这使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拒的毛泽东，指挥过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它是不是百战百胜呢？

先要弄清“胜仗”“败仗”

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姚杰：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主要在概念上要有统一的说法。

比如，什么叫胜仗？什么叫败仗？弄清这个前提，就无从谈起什么是百战百胜。根据我的体会，从我军历史上讲，胜仗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消灭了敌人，一个是虽然没有消灭敌人但达到了预期的战役战斗目的。如苏中七战七捷，这七捷中有五仗是消灭了敌人，当然是胜仗，有两仗不是消灭敌人，但完成了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这也是胜仗，所以叫“七捷”。败仗，也有两种涵义，一种是被敌人消灭，如解放战争时期的金门战役，9000多人上了岛一个也没回来，毫无疑问，这是败仗；还有一种是消耗仗，我们没有被敌人消灭，但伤亡不小，没有达到作战目的，这在当时来说也叫败仗。如果被敌人完全消灭掉才叫败仗，那么整个解放战争，只有一个金门战斗。如果把消耗仗叫败仗，那历史上就多了，无论何人都有。如1946年的大同战役，我们歼敌8000多，但都是杀伤的，很少俘虏。自己伤亡也很大，城没有攻下，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我们说这是消耗仗，也是败仗。

访问人：把消耗仗称为败仗，您的把握程度如何？

姚杰：这种消耗仗比较难下结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可以称之为失利战斗或败仗。因为作战目的没有实现，伤亡较大，当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比如长征路上我们有很大的消耗，损失极大。毛主席说，如果说这是局部的失败，暂时的失败，我们是承认的，但张国焘说，长征完全失败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到了陕北，胜利了。其实消耗仗不能叫做真正的败仗，因为我们的主力还在手里，没有被消灭。比如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就有一条“打得赢就打，就不赢就走”的作战原则。你能笼统他说“打不赢就走”就是吃了败仗？因此，毛泽东是不是百战百胜，不能笼统讲，要分析，是什么样的胜，是什么样的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比较难说清楚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战略指导和战役战斗的指挥范畴不一样。作为毛泽东来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亲自指挥过许多战役战斗，如第三次反“围剿”，六战五胜，一仗打成消耗战，这样的胜或败自然同他的指挥有直接关系。但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全军统帅，重要的战役战斗他当然要过问，

但主要的精力放在战略决策上。如果说他有失误，那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不是一般战役上的失误。当然某个具体战役战斗的失利，可能是受了毛泽东某个电报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场指挥员。同时毛泽东在战役指导上总是强调下级指挥员要临机处置，不要事事请示中央。所以要看毛泽东是否百战百胜，在这些问题上必须弄清楚。

第三，战役战斗失败的原因很多，有决策的问题，也有指挥的问题，还有各部队动作的问题。如果笼统他说是不是毛泽东打败了，那就说不清楚。因为原因很多嘛，比如，大同战役的失利，应该说与作为统帅的毛泽东有关系，但同战场指挥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要谈毛泽东的失误，还要看他的失误是在哪一个方面？哪一个层次？要进行综合考虑、分析与研究。

失误之一

访问人：当您谈了这些问题之后，就请您谈谈毛泽东是不是百战百胜？有没有失误？我们想，这也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姚杰：我主要搞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我就谈谈解放战争中的情况。

据我看，总的来说，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战争艺术进入巅峰状态的时期，也是他军事思想最成熟的阶段。解放战争只用了四年多时间，就消灭敌人八百多万，解放了全中国，这样大的胜利，世界范围内也少见。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这是前提。必须肯定。然后我们再问，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上有失误没有？我们说，“失误”并不等于“失败”，整个解放战争，失败的是蒋介石，不是毛泽东。据我看，有失误，有不符合客观实际之处，但是不多。

第一个失误是 1946 年初，对形势是向战争还是向和平过渡的判断上。从时间上来讲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对以后的战争应该说产生了一些影响。当时的失误不在于要不要和蒋介石谈判。谈判是正确的，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认清敌人、教育群众、争取暂时的和平，也才能赢得自己准备所需要的时间。问题是 1946 年 1 月 13 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后，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对和平肯定过多。据我看，毛泽东对蒋介石是很警惕的，失误出在对美帝国主义的判断上。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曾一再说到，如果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不能成功的话，美英苏可能出来干涉，干涉后还可能出现和平。毛泽东过去直接同美国打交道并不太多，况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英和苏联总体上还是合作的，因此，毛泽东觉得经过美英苏三国的共同努力，以国际力量的压力，是可以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我分析失误主要在这方面。当然没有什么材料，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讲过，这只是个人的分析。

访问人：认识上有这样的失误，表现在决策上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当时有哪些决策上的错误呢？

姚杰：一是部队复员多了些。1 月，国共达成停战，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五项决议。1946 年 2 月 25 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双方军队整编方案，毛泽东认为和平希望较大。准备执行协定。3 月 6 日他提出部队分两期复员，第一期复员 1/3，第二期再复员 1/3。当时我军共有 130 多万人，如经过两期复员，就只剩下 40 多万了。

访问人：有种说法，晋察冀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够得力，其原因就是按中央的意图复员太多了。

姚杰：晋察冀复员几万人，应该说与中央决定有关系。但军区本身不能说毫无关系。中央的指示是面对全军的，为什么其它野战军没有缩小，相反

有的野战军还扩大了。

访问人：这个问题有点儿不太好理解，说是晋察冀很好地执行了中央指示，还是他没有更多的理解中央的意图？

姚杰：我看开始是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但后来当形势已经变化了，毛泽东又发出了好多作战指示，晋察冀转弯子慢了一些，野战军没有迅速恢复、扩大，所以打大同、集宁时，就兵力不够用。兵少，仗就很难打了，当然，大同、集宁没有打好，其他原因还很多。

访问人：我们在想，毛泽东如果没有那个复员的指示，就不会产生晋察冀这样的后果了。

姚杰：所以我们说他有失误。但话说回来，毛泽东在复员问题上还是留了一手的。同样在3月6日的指示里，他还讲到要很好地安排复员，把人员和武器放到农村里，以备形势万一变化。3月以后，随着蒋介石面目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就提出要立足于打，用打来争取和平。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曾考虑把党中央机关搬到淮安淮阴去，这也是基于对和平的考虑。

访问人：是确有其事，还是一个传说？

姚杰：有电报说明确有这种考虑。

访问人：我记得好像毛泽东和赫尔利说过，搬到淮阴，不知那儿的气候怎么样，习惯不习惯。

姚杰：他还说我不去南京。我在淮阴住着，淮阴离南京不太远，在那里工作起来也挺方便。毛泽东确实是有这种想法的。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是很乐观的。

访问人：为什么？

姚杰：重庆谈判前，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3日、8月26日开过两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将来国民党要搬到南京去，全国的中心会在南京，抗战的两个中心重庆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党中央机关搬到淮阴，也就是考虑，在国民党恢复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参政党把机关设在淮阴是便于处理各种问题的。淮阴地处苏北平原，如果从战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会选中淮阴这个地方的。

访问人：这个搬迁计划实施了吗？

姚杰：没有。时间很短，形势变化也很快。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还把重点放在和平上，到3月15日的指示，就既强调争取和平，也强调道路是曲折的，要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前后不过两个多月。还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从1945年11月，因劳累过度生病开始休养，直到12月底才慢慢恢复工作，以后一直到三月份，都是半工作半休息。那段时间主要是刘少奇在主持工作，所以后来有些责任算到刘少奇头上。其实问题不在于谁有责任谁没有责任，中共中央是集体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应该说对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是一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共同的认识，有当时一定的历史背景。所以，对当时决策上的某些偏差，我认为同样应该这样看。

失误之二

访问人：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较大的失误，还有其它失误吗？

姚杰：有的。第二个失误就是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从力争打胜仗以争取和平这个观点出发，布置了南线和北线作战，这是一个不太符合当时实际情

况的作战计划。南线计划，我们通常叫做三军进击津浦路，即晋冀鲁豫，山东、华北三支部队在津浦路两侧作战，第一个阶段以山东野战军打徐州到蚌埠之间；晋冀鲁豫野战军打陇海路的开封到徐州段，华中野战军打蚌埠到浦口之间，然后再视情况晋野、山野出到淮河以南作战。这个计划是进攻性质的，他的目的在于争取大的胜利，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如果说，我们后来采取的是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打的积极防御方针，那么 1946 年 6、7 月间毛泽东考虑的是主动打出去，是进攻的方针。所以我们说它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我们那时的力量还不足以打到外线去，敌人是很强大的。

访问人：南线计划造成损失没有？

姚杰：没有。南线计划实际上没有执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南线计划制定后，粟裕有个建议，他说，根据他手上的兵力，到淮南作战（蚌埠到浦口段东西地区）有困难。一是淮南情况不熟，二是那里太穷，大兵团无法活动。相反粟裕在苏中活动了八年，情况非常熟悉，打仗根本不用地图。群众条件很好；同时苏中很富，人口多，所以他建议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出击津浦路时，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告诉陈毅，你们先停一停，我们再考虑考虑。可见毛泽东在考虑原来的计划能不能完全执行。随后，又接到周恩来的情况通报，说蒋介石马上要发动全面进攻，不光进攻中原解放区，还要进攻其它解放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我们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在政治上更主动，同时还可以看出敌人的弱点。这正是战争初期要掌握的两个基本问题。政治上有利，可以赢得民心。看出敌人的弱点，因为蒋介石到底有多大本钱，特别是美械装备的部队，能不能消灭掉，我们心里没底。这样一来，南线计划就有所改变了。后来逐步看到我们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很多，因此毛泽东对粟裕说，你们就在苏中打，苏中打了胜仗，对其他地区作战配合作用很大，其他计划先不考虑。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看法已经变成哪里能打胜仗就在哪里打了。1946 年 7、8 月份的苏中七战七捷，再加上其它地区内线作战的胜利，更使毛泽东认识到实行内线作战、积极防御更为有利，虽然要丢掉一些地方。但丢掉地方并不可怕，关键是消灭敌人。到 10 月 1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个月总结》，就明确指出：过去三个月，已歼敌 25 个旅，今后要继续按照现在的办法打下去，歼灭敌人第二个 25 个旅，“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

访问人：我个人看法，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作战原则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毛泽东强调要消灭敌人，蒋介石强调要占领地方。

姚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打运动战。运动战最能把人的灵活性、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高程度。运动战的目的就在于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灭敌人为目的。蒋介石占领延安后很得意，毛泽东却说，那是蒋介石失败的开始。所以，南线计划的制定，是一时的失误，而南线计划的很快改变，却是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思想的。同时说明毛泽东善于从下面吸取合理的建议来修正、充实自己的决策，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这一点也是蒋介石所不及的。蒋介石是个很刚愎自用的人。

访问人：北线计划指什么，它造成损失没有？

姚杰：北线计划又称三路四城计划。三路，指要占领平汉路的一段、正大路与同蒲路。四城，指要攻下石家庄、保定、太原和大同。这个计划造成了一些损失。主要反映在打大同问题上。大同战役从 1946 年 7 月开始，先在

外围打。打应县时，很长时间没有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8月1日毛泽东就有电报问晋察冀军区，说应县久攻不克，究竟是什么原因？请你们考虑一下打大同的把握如何？如果大同打不下来，结果会如何？希望你们赶紧研究答复。这说明毛泽东也在考虑，因为打应县都很困难，那么打大同有没有把握呢？2日，晋察冀军区召开高干会议研究，认为目前最有利的还是打大同。打大同还是有把握的。于是正式决定打大同，结果没打下来。大同失利，我军开始陷入被动，很快张家口就被敌人占领了。

大同失利怎么看？我看与三路四城计划有关，因为大同战役是在执行三路四城计划的情况下发起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军还缺乏攻城的经验，装备也差。三路四城计划是以攻取城市为主，所以这个决策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是不是光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呢？我看也不是。因为晋察冀的电报里说得很清楚，大同敌人虽然有18000多人，但基本都是由国民党地方部队与伪军编成的，七拼八凑，战斗力并不强，只是工事修得好。如果战场组织得好，指挥得好，打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大同失利，同战场指挥员也有关系。

访问人：三路四城计划是否贯彻到底了？

姚杰：没有。大同之战，打了一个多月，才肃清外围和城关守军，这时，由归绥出援的敌人已逼近集宁。大同前线指挥员决心停攻大同，改为包围，转移主力迎歼进攻集宁的敌人。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成歼敌目的，集宁失陷，包围大同的部队也只好主动撤围休整。大同、集宁之战失利后，毛泽东实际已经放弃三路四城计划，改为实行内线歼敌方针。9月18日，他给晋察冀一份电报，指出：要争取歼灭进犯张家口的敌人，但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进行动员，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此后，我们虽然丢了张家口，但开始了在更广阔的地域里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进行有效地消灭敌人的作战。南北两线积极防御战略的及时确立和执行，逐步缩小了敌我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的差距，为我军尔后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打下了基础。

失误之三

访问人：毛泽东还有失误吗？

姚杰：第三个失误是1948年初毛泽东要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挺进江南。当然这个决策是否正确，目前党史界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失误。1947年7月至9月，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到10月全面展开，把内线的敌人调到中原战场。使我军在山东、晋南、陕北等内线地区形势好转，并逐步转入反攻，收复了许多失地。毛泽东从这个经验里认为，如果把战场继续引向蒋管区，中原地区的局势也可以改观。因为当三军在中原地区完全展开后，蒋介石把主要兵力又都集中到中原，中原出现了僵持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毛泽东要求粟裕准备带领三个纵队渡江开辟新的战场。两个半月后，也就是1948年4月18日，粟裕经过慎重考虑，发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建议暂时还是留在中原地区打仗，利于消灭敌人。这时，中原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根据地已逐渐巩固，并开始打一些中等规模的战役，如洛阳战役等。所以，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要粟裕和陈毅来中央再研究一次。实际上，毛泽东也在研究原来的计划究竟行不行，不然他不会叫粟裕到中央来。5月初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粟裕的意见，放弃了原先下江南开辟新战场的计划。

访问人：看起来毛泽东作出要粟裕下江南打到蒋管区的计划，是没有预见中原战场形势的改变。那么，如果中原形势不改观的话，这个计划是否就是可行的呢？

姚杰：也不能这么说。我个人认为，把蒋军吸引到中原地区以改善内线战场的形势，这是条好计策。但想让粟裕南下深入蒋管区以吸引敌军一部分主力随之南行的计划就不同了。第一，江南多水网地区和山区，活动起来不像在中原地区那么容易；第二，中原地区已经由我军经营了几个月，逐渐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江南则没有；第三，中原作战可以依托后方的支援，江南则远离后方，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发动群众、经营地方的过程；第四，原来中原战场蒋军的有些精锐部队到江南后因受装备限制，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不一定会跟着到江南。所以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时南线战场的实际的，所以我说他在这个决策上有失误。当然，我们不能说粟裕带了三个纵队南下后一定会出现如何如何不利的局面，因为历史是不能凭想象假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整个战局不会有后来那样的顺利发展，有没有豫东、济南、淮海战役都很难说。

访问人：这个失误也像上面谈到的那样及时纠正了吗？

姚杰：是的，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只是决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偏差。在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而且确实是个伟大的统帅。但局部的失误，局部的不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决策也是有的，因为战争中敌变我变，双方都在动，都力求保密，所以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可贵的是，当他做出决策之后，还时刻注意前方的变化，时刻倾听下面的意见，逐步修正自己的决策使之更完善、更正确。我想这是比作出一个正确的决策更重要的，也是他很少失误，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访问人：解放战争后期的金门战役失败，是毛泽东的失策吗？

姚杰：打金门失败，我看主要责任还在战区指挥。当时刚建国，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毛泽东没有精力多过问作战问题。金门没有打下来，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战前准备不充分，战机没有掌握好，战场指挥没有高度集中统一，战区指挥员的精力也没有都放在打金门上。这都影响到这次战役的失败。发起进攻很仓促，一味想赶在蒋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拿下金门。渡海登陆时，原来设想一个晚上能够过两批部队，但实际上，第一批部队渡海到金门岛时，天已经快亮了，而且又是退潮，结果船搁浅在沙滩上回不来，被敌人飞机都炸沉了，又没有后备的船，第二批部队没有船跟进，上不去，上了岛的三个团苦战三昼夜，全军覆没。

访问人：轻敌了，而且对渡海作战缺乏经验。

姚杰：如果说，中央对此有些责任的话，就是对金门之战不够重视，对渡海作战的特点没有考虑充分。所以金门失利后，再打海南岛就接受了教训，各方面的准备都很充分。毛泽东也亲自过问此事。结果一鼓作气打下海南岛。

访问人：解放战争的胜利的确是毛泽东千里疆场运筹帷幄的大手笔杰作。相对应的，是蒋介石的惨败。形势的改变这样快，那么，作为蒋介石他的失误在哪里呢？

姚杰：这方面我没有系统的研究。我的感觉是单从军事思想上来说，蒋介石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蒋介石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命脉”。他认为我们不能占都市是个“致命弱点”。所以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第一步要占领我们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第

二步纵横延伸，控制全部交通线，最后再消灭敌人。当然，这是从军事上说的。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蒋介石集团政治上的腐败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访问人：就军事上来说，山沟沟里走出来的毛泽东还是比科班出身的蒋介石技高一筹。

姚杰：的确技高一筹。

1992年9月27日于军事科学院

访廖国良——

毛泽东军事思想 还有指导意义吗？

廖国良

廖国良，1936年生，四川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毛泽东军事思想概述》等。

去洪山口拜访廖教授，本来光路程就够我们受了，可偏偏天公不作美，走到半路，下起小雨。待访问归来，雨仍未住。踏车而行，倒也有一番情趣。

访问人：不久前发生的海湾战争，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战争图画。它使人感到，现代战争主要是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较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发生了种种疑问：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今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否还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过去主要以陆地作战为研究指导对象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空间不断拓展的情况下，是否仍然适用？

廖国良：我认为，产生这些疑问是很自然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没搞清楚：一是人们只强调了武器的重要，没有看到战争是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能力的综合较量，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二是人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刻的理解，没有看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所揭示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长远的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仅适用于过去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战争，而且适用于现代的高技术战争。

海湾战争：毛泽东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访问人：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廖国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点，毛泽东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仍是正确分析和认识现代战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对战争的起源、本质，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根源，对待战争的态度，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以及认识与运用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等问题，都做出了正确而又深刻的阐述。譬如：在阶级社会中，战争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战争产生的根源，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人类社会只有进步到消灭阶级和消灭国家的时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争是有规律的，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研究特殊战争的规律，不仅要研究战争的客观规律，而且要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军事的规律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研究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指导规律，应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运用于自己的行动，要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争取战争的胜利等等。这些反映一般战争规律的基本理论，是我们正确研究和认识战争的理论基础，是正确指导和解决战争问题的钥匙，不仅对我们研究现代战争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其中的许多原理、原则，可以说直到战争消灭以前都是适用的。

访问人：您这样讲有何历史根据呢？

廖国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争历史和海湾战争都证明了上述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譬如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尽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使用高技术武器最多的现代化战争。但这场战争仍然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美国出兵海湾的真正战略意图是要控制中东的战略要地和海湾石油基地，推行全球战略，谋求世界霸主地位；而伊拉克的主要战略目的也是控制海湾的石油资源，争当海湾霸主和阿拉伯世界的盟主，所以美伊之争实际上是大小霸权主义推行强权政治的继续。海湾战争以伊拉克失败美军胜利而告终，高技术常规武器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伊拉克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入侵科威特，在政治上失道寡助，得不到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军队士气低落，地面战争开始之后，就军心瓦解，一触即溃。在经济上，伊拉克孤立无援，又受到联合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困难重重。在地理环境上，开阔的沙漠地带，光秃秃的一片，便于高技术兵器发挥优势，易攻难守，对不掌握制空权的伊拉克是非常不利的，虽然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燃烧油井，利用烟雾来掩护自己，但这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在战略指导上，伊拉克屡屡出现失误，地面战争仍沿袭两伊战争的打法，构筑了约 200 公里长、3 公里纵深的障碍地带，并与其后阵地工事相结合，构成了纵深约 10 公里的防御地带，这就是所谓的“萨达姆防线”。地面战争开始后，局限于这条防线，实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而当多国部队突然快速地向西机动 300 多公里，在伊军侧后的最薄弱处展开，就使这条防线立刻置于无用之地。伊拉克的失败，恰好说明了毛泽东关于战争根源、战争性质、战争指导、战争胜负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我们观察和分析认识现代战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如果我们违背它，就会被复杂的表面现象所迷糊，看不清楚战争的根源和本质，就不能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人民战争思想过时了吗？

访问人：面对现代战争，有人认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已经过时，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廖国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对现代战争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围绕着人民战争展开的。其战争观和方法论是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人民军队是人民战争的工具和骨干力量，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人民战争的方式和方法，国防现代化建设是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准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人民战争是我国未来反侵略的指导路线，也就肯定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表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根本指导意义。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坚持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其基本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

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开展以军事斗争为主，并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等各条战线、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的全面战争。

访问人：人民战争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今天的时代条件变了，这个问题仍很重要吗？

廖国良：时代条件虽然变了，但并未改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马克思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性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仍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规定了我們可能进行的战争只能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这种战争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仍然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

访问人：现在的高技术兵器是电脑控制，命中率很高，在此情况下，人民战争到底有多大的制约性和取胜的可能性呢？

廖国良：我认为，现代战争并未改变人民战争一定能取得胜利的规律，战争的正义性仍然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譬如，1961年到1975年，美国的侵越战争达15年，它在越南的军队最多时达到54万，除了原子弹，所有的先进武器都用上了，但越南人民在正义战争中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采取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竹尖战等多种战法，使美国侵略军到处被动挨打，最后灰溜溜撤走。又如，苏军当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当它入侵阿富汗时，虽然也使用了最先进的武器，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问题在哪里？就是因为它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再如，越南曾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下，运用人民战争取得了抗法、抗美战争的胜利，但当它丢掉了这面旗帜，实行地区霸权主义，入侵柬埔寨时，就遇到了当年法国、美国侵略军同样的难题，遭到了柬埔寨人民的顽强抵抗，优势兵力和现代化武器装备发挥不了预想的作用，陷入柬埔寨人民战争的泥潭中而一筹莫展，最后被迫撤军。这些告诉我们，为保卫国家主权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仍然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正义战争也会受到一些挫折，甚至遭到暂时的失败，但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访问人：人民战争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这关涉到人和武器的关系问题。

廖国良：对人和武器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发展很快，如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开发技术、航天技术、核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都出现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人工智能、航天和超导材料的研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加速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高精度、大威力、全天候突击的新式武器相继装备军队。去年的海湾战争，多国部队大量使用了现代化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新式坦克，反坦克直升机，新型飞机、舰艇都出现在海湾战场上，多种侦察技术手段提供了及时而又准确的情报，各种强大的电子干扰和压制及电子制导技术的熟练应用，完全掌握了第四维（电子战）空间战场的主动权，等等。对这些高技术常规武器的作用，我们不可低估，但也不能过高估计。譬如，海湾战争初期，伊拉克采取坚固的防御工程和巧妙的战场伪装，尽管多国部队平均每天出动2000多架飞机，空袭20多天，发射和投掷各种导弹、炸弹30多万吨，相当于美国当年在广岛投掷原子弹当量的20多倍，但萨达姆仍然能通过通讯网络保持同他的部队联系并指挥作

战，飞毛腿导弹发射架大部分保存下来了，机场仍可使用，隐蔽在地下机库的飞机仍对多国部队构成威胁。这表明高技术兵器也存在着弱点和局限性。我们设想，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技术优势如果在中越边境的山岳丛林地带，或在中印边界人烟稀少、山很高、雪很大、道路艰险、高原缺氧的情况下使用，也一定会出现死角。如果在正义战争中能够充分发挥广大军民的主观能动性，总会找到战胜高技术武器的办法。我们不能用伊拉克的失败来说明一切，因为它不具有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所以，毛泽东讲：“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还讲：“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就拿抗美援朝战争来说，当时美军掌握着制空权，投入到战场的飞机最多时达 2400 多架，平均每天出动近 800 架次。在敌人飞机大炮的逼迫下，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创造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许多办法。我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坚持了二年零一个月的阵地战，最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占有重要战略地位，而铁路运输又是后勤保障的大动脉，因此破坏铁路运输就成了当时美军狂轰滥炸的主要目标。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共向朝鲜北部 1000 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投弹 10 万吨，在我通车线路上平均每 7 米就投弹一枚。1951 年夏季，美军还发起了持续近一年的空中绞杀战，重点封锁几座重要的江桥和运输的咽喉的“三角地区”，关键地段平均每两米投弹一枚。在反轰炸、反绞杀战中，我铁路运输战线的指战员和职工发扬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以集体的智慧创造了一整套抢修抢运的有效措施，形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就连倡导绞杀战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出惊人的奇迹。”这说明在敌人的先进武器面前，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根本优势，总是有办法对付的。

访问人：这是否就意味着武器不重要了呢？

廖国良：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武器。其实毛泽东在强调人的因素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列宁也讲过：“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现代战争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较量，在战争中武器和人的因素是辩证统一的，如果不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军队战斗作用的发挥就会受到很大局限，遇到很大困难，遭到很大的损失和破坏。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发挥以军队为主干的人民战争力量，打败优势装备敌人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其他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及时地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军队和发展国防科技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作出了发展战略核武器的重大决策。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现在我

国已经建立了能提供各种具有一定先进水平的武器技术装备和其它作战物资的强大国防工业，初步形成了包括航天工业、核工业、电子工业、飞机和舰船制造业、常规兵器制造业等门类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科研体系，为独立自主地依靠人民的力量，建设和巩固国防，打败一切侵略者，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我军的现代化水平也不太低呀，我们有洲际导弹、原子弹、氢弹，还有比较先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过去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人民战争，现在我们有了这些现代化武器，再打人民战争，就如猛虎添翼，就能更好地战胜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

访问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使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特点，看来这些新特点不仅没有使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失去往日的光辉，而且会更加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廖国良：是这样。现代战争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总体战、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不仅是作战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综合较量，需要各条战线、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党和政府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力量。立体战不仅是在地面打，而且在空中、海上各个层次展开，涉及的空间大，方向多，需要动员广大军民共同参战和支援战争，在各条战线上自觉地不遗余力地打击敌人。合同战不仅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还要求各种武装力量（武警部队、预备役部队、民兵）各个战场各种作战形式之间的密切配合，我国三种武装力量相结合的传统作战体制，在现代战争中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幅员辽阔，边境线漫长，周边“热点”地区较多，各个地区风土民情、气候地形条件差别悬殊。因此，在未来边境地区反侵略作战中，从根本上讲，离不开当地地方部队（如省军区、军分区、守备区等）和广大民兵的配合。否则，只靠“远道而来”的野战部队，是无法顺利进行作战任务的。

访问人：这样说来，因为现代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不但没有减弱人民战争的威力，相反为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优势提供了更宽广的领域。

廖国良：事情很清楚，现代战争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以军事斗争为主并与其它斗争形式相配合，就更为重要。从政治上讲，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战争的正义性和得道多助，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万众一心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取得战争的胜利。从经济上讲，现代战争物资消耗很大，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很难进行。同时，在经济上的封锁与反封锁、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将会空前激烈。这些都离不开广大群众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援。从外交上讲，我们现在已同世界上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或贸易关系，我们可以利用世界人民的舆论力量，对敌人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他们在人力、物力、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并分化瓦解敌人。总之，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的内容将更加丰富，更加需要人民战争，人民战争也能更好地适应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要求。

访问人：在局部战争中，一般说来战争规模比较小，战场纵深比较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战争还有没有作用呢？

廖国良：现在对人民战争的糊涂观念很多。譬如：有的人孤立地、片面地从战场作战的表面现象看问题，认为“没有民兵和人民群众直接参战，就不是人民战争”，“空中海上作战人民群众无法施展力量，也不是人民战争”

等等。应当指出，战争规模的大小和不同的表现形态，并不是判定是不是人民战争的标准。最根本的是要看这个战争的政治目的，看它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是拥护还是反对这个战争。在人民战争中，广大群众支援和参加战争的内容、形式和手段是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除军事斗争外，还包括与之配合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斗争。局部战争和全面战争相比，虽然规模有所不同，但同样需要而且能够进行人民战争，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也是不可缺少的。譬如：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藏族人民群众在十分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艰难而成功地为我军提供了物资保障。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期间，海南地区财贸、交通部门，十天之内就为前线提供了 40 余万公斤的物资，并组织了 5000 余民工支援前线。在对越南自卫反击作战中，仅广西隆安县的三个民工队就为前线抢运了大批的弹药、粮食和干粮，有力地保障了前线的需要。在全国人民中广为传颂的“老山精神”和普遍开展的“献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活动，使前方将士受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事实告诉我们，如果离开了政府和人民群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配合，军队就失去了根基，就会寸步难行。在现代条件下，任何局部战争从规模上看，虽然是地区性的，只是部分动员，但都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都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无论是全面战争还是局部战争都将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的战略战术原则

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访问人：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现代战争中是否仍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廖国良：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现代指导意义的第三点内容。

战略战术的物质基础是武器装备，它的制定和运用必须适应武器装备的发展状况，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战略战术还要受其他条件的制约。譬如，它必然由一定的哲学观点作为理论基础，为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政治目的所支配，受一定的军事思想所指导，由一定的军队和人员去实施等等。所以有些国家武器装备先进，但并不意味着它的战略战术就一定先进。相反有些国家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也并不意味着它的战略战术就一定落后。在过去历次战争中，我们的武器装备是相对落后的，但是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军的战略战术是高明的。我军的战略战术从本质上讲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无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还是从总体上和基本内容上看都是先进的。

访问人：毛泽东的一些战略战术对现代战争还有哪些具有指导意义呢？

廖国良：譬如毛泽东提出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三种作战形式紧密结合，适时进行以改变主要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关照全局，把握关节；力争主动，力弃被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每仗要有准备，力求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胜利的把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实行作战指导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等等。这些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战略战术原则体现着灵活机动的显著特点，反映着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指导规律。尽管未来战争有着许多新特点，但仍然是我国的国土

上，以人民军队为骨干进行的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只要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把它们和变化了的新情况相结合，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能把战争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

访问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军事理论，对现代战争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任何科学的军事思想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和发展的，因此我们应从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它，应用它。

廖国良：是这样的。我军建设和作战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是我党我军的历史选择，是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需要。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采取“过时论”或“两个凡是”“顶峰论”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它们都是违反毛泽东军事思想本质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则反映了一般军事活动的客观规律，不会因为某些具体条件变化而过时。但是在运用时也不能照搬照套，而是要从实际出发，用它来研究现代战争，认识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并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坚持正确的结论，改变已过时的具体结论，补充新的结论，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军事思想本身包含着科学的发展观。它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绝对真理”，而是认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在实践中运用，在运用中发展，并通过新的发展指导新的实践，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显著特点，也是指导现代条件下我军作战的客观要求。创造性地运用它，我们将不但能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而且将通过战争实践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1992年4月5日于国防大学

毛泽东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

张家裕

张家裕，1932年生，四川重庆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工作，参加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军事文集》等书，是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撰稿人之一。著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十一讲》，发表论文、文章50余篇。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约定了第一个采访对象，就赶上了一场大风，出租车是坐不起的，只得顶风骑车一个半小时。看来干成一件事真是不容易。

访问人：我们曾听到这样一件事情，前几年某部队对战士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一项，当回答最崇拜的军事家是谁时，结果不少战士说，崇拜巴顿。这个问题我们有些奇怪，毛泽东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军事家，一生指挥过数百次战役，而且就在我们身边，而巴顿只是美国一个方面军的指挥官，我们有的战士却崇拜他，这是什么原因呢？

张家裕：你们谈的这个情况我也听说过，其实不只这些。1988年我遇到一位地方司机，闲谈时他对我说，毛泽东哪有什么军事思想，仗都是别人打的，只是下命令时他签个字就完了。很滑稽的事情。

访问人：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张家裕：我认为同前些年的宣传有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那些年对毛泽东的错误讲得多一些，对他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贡献讲得少了。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战士，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对毛泽东了解的也不多。开放了，他们看了一些外国电影，看到巴顿带兵的样子，腰间挂一把刀，走起路来咋咋响，打起仗来很神气。他们想，将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奇怪的。

访问人：这实质上涉及一个毛泽东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问题。虽然毛泽东很伟大，但是把他放在世界这个广大的空间里比较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事家呢？

张家裕：其实，由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获得的伟大胜利及其在世界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国外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评价是很高的，称毛泽东为天才的军事家。我说的国外，包括第三世界的国家，也包括西方的发达国家。比如：英国的巴特曼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部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了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天才人物。……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这就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毛泽东”。一位美军少校说：毛泽东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他说“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一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说得更加形象，他说：“图书馆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举不胜举。

访问人：国外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评价是很高。近现代以来，世界上出了不少著名的军事家，毛泽东和他们比较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张宗裕：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军事统帅、战略家，甚至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列宁、斯大林在内，毛泽东和他们相比，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结合方面，是最完美的典型。理论上，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系统地提出了军事辩证法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进行人民战争思想和一系列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军事思想体系。在实践上，从他对战役战斗的指挥直到战略的指导上，基本都是成功的，没有大的失误。一般他说，都达到了预期目的。他所指挥的作战，只有战果大或小的问题，而不存在成功不成功的问题。

至于说世界上的其他军事家，如世界公认的伟大军事家拿破仑，他一生作战 20 年左右，打了很多胜仗，数得上的会战就有 50 多次，胜多败少，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世界风云人物。他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但他自己在理论上留下来的东西不多。后人研究拿破仑的军事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战例来研究，由别人来把握提炼，不是他自己概括出来的。这种东西就不如毛泽东自己总结出来的理论价值高。

克劳塞维茨，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他的主要著作《战争论》，是他死后由他的妻子整理发表的。克本人在部队当过兵，打过仗，先后任过普军总参谋长和军参谋长，在军校当过校长，后晋升将军。他的军事理论，主要是他在任军校校长期间，通过潜心研究战史和若干战例，分析总结而成的。

访问人：列宁对《战争论》评价很高，在延安时毛泽东也托人买来阅读，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研究。

张家裕：对。《战争论》的影响很大。其中关于战争、军事的某些基本原理很有价值。其军事思想对世界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这一点，列宁、毛泽东都极欣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抓住了战争的实质。但从战争的实践来讲，他和毛泽东无法相比，克劳塞维茨只打过一些仗，不像毛泽东从带一个团起，一直到成为全军统帅，指挥几百万军队，有丰富的军事实践。就军事理论本身来说，国外学者也认为：“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许多用途更为广泛的军事原则”，比起克的战争论来，“是政治性更强的战争论”。

访问人：若论战争的生涯，大概只有拿破仑和毛泽东可以相比。

张家裕：是这样。至于巴顿，他只是个局部的，一个战略方面的指挥员，和毛泽东根本无法相比。

访问人：那么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呢？

张家裕：他们虽然比巴顿的指挥地位高，也都是很有名的军事人物，但相对毛泽东说来，他们不是一个层次的。

访问人：斯大林呢？

张家裕：斯大林参加领导了十月革命，特别是领导了反对德国法西斯进攻的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当时的德国不可一世，很多国家沦陷了，苏联国土也被攻占了 500—700 公里纵深，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不仅顶住了德国的进攻，而且最后打败了德国，为消灭法

西斯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斯大林的战争指导主要是进行重大的战略决策，具体指挥，尤其是战役指挥，则主要是通过统帅部大本营来进行的，就是说他的指挥多是间接的。毛泽东不同，他和各个战场通过电报直接联系，直接指挥，并亲自起草作战电报。根据我看到的档案材料，很多前方来电，毛泽东当天或几小时内就能把中央或中央军委的意图反馈回去，快得很！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留下了大量的军事电报，恐怕不下 500 万字。

访问人：我们粗略统计过，到 1955 年，毛泽东的文稿大约有一万件，军事文电约 6000 件，占他文稿的近三分之二。

张家裕：所以像毛泽东既有长期的军事实践，又有丰富的军事理论这样的军事家，世界上确是少见的。

访问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内容丰富，且自成体系，那么，他对世界的影响如何？

张家裕：相当广泛而又巨大。首先他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求解放提供了斗争经验，或者说提供了理论武器。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斗争热火朝天，他们都把中国当作范例，许多国家派人到中国“取经”，学习游击战争的经验。然后用于他们本国的实践。其次，西方一些国家认为，他们在印度、在越南、在东方，甚至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遭受的失败，是因为不了解或不懂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们说古巴、越南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式的”胜利。

访问人：我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60 年代，一位名叫冈村昭彦的日军记者，写过一段观感，他说：“最近我到中南美跑了一趟，行前访问了五角大楼，他们告诉我，起初，美国国务院认为，多米尼加革命是卡斯特罗搞的，可是美军到了多米尼加，才知道多米尼加革命的精神支柱是毛泽东思想。当时，我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中国是地球背面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多米尼加不受古巴影响，而受中国影响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多米尼加的革命部队。哪知道那里的战士一见我这张东方人的面孔，就以为我是中国人，兴奋地把我高高举起，欢呼‘毛泽东来了！中国人来了！’”

张家裕：由此说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游击战争战略是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这一点对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战争可能很有用。不仅如此，对西方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美、法、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日本、美国，因为他们深有体会。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对毛泽东的人民游击战争体会极深，所以日本不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机构和学者很多，而且还在军校开设毛泽东军事思想课。

美国也有深刻体会。解放战争时期他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给蒋以大量的军费、武器装备和物资援助，结果蒋打输了，美国成了我们的运输队长。朝鲜战争他纠集了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武装力量，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和装备，结果还是被打败了。当然国外看法不一样，有的说是打平了，有的说他打败了。

访问人：这个问题看从哪个意义上讲。如果从表面上看双方对峙不下，谁也吃不了谁，那是打平了。如果从另一角度分析，优势装备的美军，打不赢劣势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那么是谁败了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是美国败了。

张家裕：所以美国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很重视，1961 年，肯尼迪下令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开设了毛

泽东军事思想课。1989年上海一家报纸介绍，就连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还要求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

其次是英法。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曾把英国的军舰赶跑了。他多少也有些体会。尤其他们在东南亚看到了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厉害，说毛泽东的军事学说能代替坦克、飞机、伞兵和凝固汽油弹。因此他们各自为了完善自己的军事理论，当然更主要是为了对付我们，纷纷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的主要军事著作成为不少国家军事家必读的经典，甚至有的要求军官晋升时必须撰写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论文。英国巴特曼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研究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而且还要研究正规军如何打游击战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路线，研究游击战，强调群众纪律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当然他们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他们对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军事学术还将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

访问人：听了您的介绍，感到毛泽东军事思想已成了世界的财富。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世界级的军事家，或者说只承认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军事家还不够，因为根据您刚才的比较，毛泽东是把实践和理论结合的最好的军事家，那么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世界冠军级的军事家吗？

张家裕：我认为毛泽东的确是一个军事天才，当然，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一是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靠全国人民的支援和斗争，但毛泽东却是党和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多少年出一个”，这个话用在军事上赞扬毛泽东是不无道理的。

访问人：退一步讲；我们不说毛泽东是世界冠军级的军事家，是否可以说他在某一方面居领先地位。如运动项目，有跳远冠军、跳高冠军，像军事理论也有各个层面。能否说毛泽东在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方面是世界冠军级的呢？

张家裕：这是肯定的，但不仅仅是。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环境下，也就是说长期战争形式是游击战，给人印象毛泽东只是游击战专家、实际上在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是正规兵团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像战略决战中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每役歼敌四、五十万，在世界上少有。特别是朝鲜战争，我们的阵地战打得相当好，有相当大的发展。完全靠阵地战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上甘岭战役，我们只有3.5平方公里，却打退了敌人先后投入4万余兵力的900多次冲击，歼敌27000多人，我军阵地则巍然不动。所以主要是阵地战。此外美国除了原子弹，包括细菌战，所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用上了。难道这不算现代战争，什么才算现代战争。假如我们也有和他们同样的武器，大家在一个现代化水平相等的条件下作战，我想消灭他是没有问题的。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常常把敌人包围，因为敌人机械化程度高，而不能完全歼灭他，甚至在坦克、飞机的掩护下，很快就逃之夭夭，不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所以给毛泽东只带上一个游击战专家的“帽子”是不合适的，那是一种偏见。毛泽东不但是游击战专家，而且在正规战，在现代战争来讲也是专家。三大战役打得多漂亮，按说蒋介石在政治上就够狡猾，在军事上也是够精的了，他为什么输在毛泽东手里，当然与战争性质有关，我们实行的是革命的人民战争，但在战役战术的指挥上，在

战争指导艺术上，他确实逊毛泽东一筹。

该问人：不过还是有人说，毛泽东打的仗是小米加步枪的经验，不一定适用飞机、坦克和导弹的现代化战争。

张家裕：我们说小米加步枪是形象的比喻，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优势装备，并不是说我们的仗，就完全是小米加步枪的落后的理论。实际上到解放战争后期三野、四野都有了坦克、炮兵。淮海战役，坦克也甩上了。1948年济雨战役前后，战争形式转变了，毛泽东反复强调加强纪律性和组织性，提出要适应当时的正规战争，朝鲜战争就更现代化了。而关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是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基本规律和基本指导规律的科学。毛泽东在每一个战争时期或终结阶段都有经验总结，有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如十年内战结束时，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初期，有著名的《论持久战》等四篇军事名著。解放战争又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和十大军事原则，遗憾的是他对自己一生中战争指导上在敌我双方斗争最紧张，较量最激烈、指挥艺术最精彩的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阶段的经验没有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加以总结，否则，一定会产生很多辉煌的思想。因为他当时作为统帅，东南西北一起指挥，很多重大决策和战略战役思想别人不可能完全领会到他是怎么想的，现在无论你怎样学习，分析研究，都不会产生和他所创造出来的理论有同样的效果。因为你没有他那样的地位，经历和体会，他若是亲自总结出来，一定是无价之宝。这是后话了。

1992年2月23日于军事科学院

访周逸——

毛泽东一生的愿望： 建设好一个党

周逸

周逸，女，1920年生，湖南长沙人。1937年6月参加工作，1954年毕业于中央马列学院。现任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党建理论研究，著有《马克思党的学说、党的建设教学大纲》、《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

也许中央党校的院子太大，我们问了几次路才找到周逸的家。她七十多岁，满脸透着聪慧，讲起党建理论滔滔不绝时常打着手势，显得坚毅自信。

访问人：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他们又遇到了不少新问题，如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官僚主义等等。这些年我们党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一直不能根治。人们一方面十分怀念过去的优良作风，一方面也不断地思考，毛泽东在建党问题上是否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其建党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呢？

周逸：这些年也不断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的教条。中国党70多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就在于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中国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建党学说。”

至于当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党风不正、官僚主义等问题，中国党一向是反对的。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加强党风建设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党风和学风，而且创造了加强党风建设的有效形式，即整党整风运动。党执政以后，党的领导地位、历史任务以及工作环境都发生根本性变化，端正党风、克服官僚主义更加重要。中国党把它看成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来看，存在这些问题，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克服与纠正也有一个过程。特别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看的更清楚。转变领导作风、改进工作方法，以至健全领导制度，完善领导体制与经济建设任务相适应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涉及面广，关系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坚持毛泽东建党思想，加强党的建设理论教育，就是要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新内容、新发展，而不能认为是已经过时的理论。

访问人：过去我们党确实表现得生龙活虎，从上到下形象非常好，威信很高。当然人们现在也普遍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但是人们也感觉到干群关系不像过去那么融洽，有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严重脱离群众，等等。这些现象的发生，如何解释才好呢？

周逸：这个问题比较现实，也比较复杂。有些共产党员和干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严重脱离群众，是没有摆正共产党人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服务于人民和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翁的关系。他们站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命令

群众做这、做那。乱用人民交赋的权利。他们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这样，不但不能带领人民群众共同致富，相反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势必同人民群众疏远、隔离。这种个人利己主义的发展，将会使共产党人的党性丧尽，对党的事业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对于党群关系的不融洽，也要具体分析。有些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不满、有怨言、为党担忧，在感情上同党有隔阂。但从他们内心来讲，还是希望中国党的党风健康发展，党内政治民主生活正常化，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继续发扬光大，以带动社会道德风尚的好转。因此，要加强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宣传教育，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党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才能领导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其全部力量。毛泽东把这种正确关系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为党的群众路线，成为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都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创举，今天仍应坚持。

访问人：有人提出，在当前改革开放大潮中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有什么现实意义？

周逸：这是关系人们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为一种理论首先是一门科学，有它内在的规律性，是解决本质问题，而不是解决表面的现象问题。

所以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就是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直到现在都具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伟大成就，突出表现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少而战斗力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了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首创奇迹。

同时，毛泽东的建党理论又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总结中国党执政以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丰义、毛泽东建党思想。但是基本原理、原则仍具有指导作用，应继续坚持。

访问人：请您具体谈谈毛泽东建党思想还有哪些现实意义？

周逸：第一，毛泽东无论领导革命还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制定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状况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依据，具体分析了这一时期党内外、国内外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提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为什么能够从小变大，从弱到强，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就是因为有一条全党可以遵循的正确政治路线。列宁说，路线是一面旗帜；毛泽东说，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旗子也好，生命也好，都是强调路线的重要性。今天小平同志讲，要全面领会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小平为什么这样讲呢？无非也是强调路线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条路线吗？有什么了不起呢？不是呀！这条路线应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它的制定的过程，也是决策的过程，既要看到眼前，又要兼顾长远，要高瞻远瞩，有很强的预见性才行，还要有非常现实的可实施性。所以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供全党遵循，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相比之

下，苏联就因为没有这样一条路线，所以他改来改去改散了。

第二，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要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这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理。因为路线提出来了，关键还是落实。如何落实，就在于党如何服务于这条路线。战争年代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比作三大法宝之一。说它是掌握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我们党把这些斗争搞好了，党本身就会随之发展壮大，反之就会灭亡。党的建设服务于这些斗争的目的，就是达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践已经证明，这个思想是正确的，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那么对今天来说，党的建设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环节掌握好，为了一个目标就是经济建设。而经济上去的最终目的还不是为了经济而经济，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的、文明的、自由的、幸福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说到底，这也是党的建设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党的任务是搞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搞不好，说明党本身也就没有建设好。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也一直适用于今天。

访问人：理论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它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自身建设来完成的。

周逸：前面谈到，党的建设理论是反映党的建设实践中一些带有规律性问题，所谓规律，就是党的建设中本质的东西。这种本质是有形式的，而不是空谈。是通过党自身建设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本质的东西必须弄清楚，否则容易被一些表面、假象的东西所迷惑，目光短浅，就担当不了大任，更谈不上腾飞。我认为毛泽东对于党自身建设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第一，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又侧重解决领导思想。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中国的问题。井冈山时期不就有这样的问题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等等，妨碍着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壮大。毛泽东看到这许多现象就从理论上给予分析和批评，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领导党。到古田会议这个问题就全面展开了。延安整风时期又深化了，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重申了这条思想路线，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际上这句话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讲到的。联系小平同志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只有坚持一条这样的思想路线，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在今天看来，在党的自身建设上真正实事求是做工作不容易，实事求是是要有勇气，有大无畏的精神，从实际出发，敢于讲真话。根据了解的下面情况看，有的为应付上面说假话。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到头来受损害的是国家是人民。所以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向重视人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包括党的领导骨干，成为保证党的政治路线正确贯彻执行的决定力量。早在战争年代，党处于农村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有大批工农、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积极投身革命根据地，或到前线参加战斗。毛泽东提出了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教育双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党重视干部教育，一方面举办党的各级党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增强党性，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另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组织干部深入群

众实践，无论上前线或到工厂、农村，都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知识分子下乡，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群众语言不熟悉，同群众感情有隔阂，怎么办？认真学习，不懂生产知识就问，不会就学。生活再苦不叫。同时，组织群众学文化，举办识字班、扫盲班，教育他们支援战争，为什么能这样做？大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从我们自身的经历来讲，在当时头脑中对党确实有一个美好的印象，坚信党领导中国革命无往而不胜。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全党的楷模。加之，党的严格的党性、党的纪律的教育，使我们能够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中国党的干部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时的延安革命根据地以及前方各革命根据地，尽管处于战斗的环境。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在准备迎接全国胜利时，从根据地输送大批干部到新区开辟工作。迅速建立了民主政权。

建国以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分配一大批干部转到工业部门工作，在大专院校举办工农速成班，培养工农干部懂得科学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培养教育干部是有中国特色的。

访问人：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培养干部方面贡献很大。现在的干部队伍如何建设，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是否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呢？

周逸：现在的干部队伍如何建设？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有新的进展。首先，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从科技系统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研究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其次，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增加了干部德才兼备标准的新内容。再次，提出干部制度包括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要密切结合现代化建设进行，清除在干部路线上任人唯亲、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思想。至于毛泽东，他在50年代后期，由于指导思想产生“左”的失误，多次发动政治运动，进行批判所谓右的思想倾向，使党的中心工作长期未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影响干部在这方面的成长。解决这个问题，有领导思想问题，也有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制度问题，应作历史分析，加快改革干部管理制度，而不宜归之为个人的过失。

访问人：除了这些，是否还有民主意识的问题呢？

周逸：关于民主意识，事实上毛泽东也很重视，他曾经感到中国党家长制太厉害，但他没有在理论路线上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体制上给以完善。

我们党内存在有民主意识不强的现象，这得从两方面讲，一方面作为领导者没有解决好，习惯于一个人说了算。一方面被领导者怎样运用民主权利也没有解决好，处于领导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的状态。这些问题如果从深的层次来说，实质上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领导体制基础是从苏联学来的，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东西。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来了，而且讲了很多。但这是一个大工程，因为它涉及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领导权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同时我们再想想看，这个体制问题为什么不仅中国，甚至其它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呢？我认为是和这些国家现代化经济不发达，文化素质不高、法制不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中国也无例外。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但是小生产的经济基础，旧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仍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再

加上战争年代我们实行了供给制。建国初始，国家实行全包下来的政策，当时也是需要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出现新情况，却没有及时加以改进，现在表现出来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级观念、官僚主义等等都和这些情况有关。所以民主意识是和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毛泽东对这一方面的中国国情注意不够，制度上没有解决好，思想上没有解决透。

访问人：我认为，反封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党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加强民主意识，加强法制建设。

周逸：现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不太得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形式主义读读报纸，写个提纲念念，好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其实和群众的心理状态，切身利益贴的不紧，理论教育脱离实际，使党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特别是经济工作脱节。如何克服这种两张皮的现象，还是党的思想建设中要认真考虑，及早加以解决的问题。

访问人：毛泽东建党思想还有哪些我们一定要坚持的？

周逸：还有一个三大作风问题，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 1942 年就曾提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他总结中国党风建设经验，概括指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也包括批评）是中国党的三大作风，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总的来说，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坚持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把它看作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关系党自身的巩固和发展，也关系党的事业的成败，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党执政以后，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的一切活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失关系极大，而这种领导地位又很容易使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所以，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陈云、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执政党的党风好坏，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前途命运问题，更加说明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

毛泽东建党思想内容丰富，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展，但其基本原理仍不失其重要指导意义。

1992 年 4 月 27 日于中央党校

访黄铸——

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得好

黄铸

黄铸，1921年生，云南勐腊人。研究员。1948年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统一战线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统一战线、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参与过不少这几方面重要文件的起草。曾出版《新时期统战民族宗教论文集》、《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等著作。

我们曾打电话给中央统战部的同志，问谁能谈一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问题？对方说，你们可以去找找黄铸。于是就有了这篇访谈录。

访问人：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很重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遵循什么原则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黄铸：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人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人口众多是汉族，地大物博则是少数民族。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中间也经历分分合合，但基本格局没变，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你看，古埃及王国、巴比伦王国、波斯王国、罗马帝国不是都不存在了吗？唯有中国延续至今。过去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都是实行大民族主义统治，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就是近代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也带着排满反满的色彩。所不同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对少数民族采取了全新的政策。192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中央在对国民党全国大会的意见中就提出对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少数民族之压迫。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就是接受了我党意见。因此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出发，一开始就提出了各民族平等联合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平等与联合，可以说这是中国各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民族平等，才有民族联合，同时，只有各民族的联合，才能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的外来压迫，求得民族的解放。

访问人：这个各民族平等联合的基本原则，又是以什么方式去实现的呢？

黄铸：采取的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民族区域自治形式。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就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回民和蒙古族人民的民族自治地方。1947年，又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决定在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内实行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访问人：当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国家，而他们实行的则是联盟制。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采取联盟制？

黄铸：因为我国的实际情况和苏联不同。第一是民族关系的情况不同。十月革命前，俄国少数民族人口多于俄罗斯族。十月革命后，由于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分离出去，少数民族人口有所减少，但距俄罗斯族人口还是相差不远，而且这些少数民族的分布又多数是一个民族聚集在一块地方。我国的情况是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并且多数是大分散小

聚居，有的还是杂居或交错聚居。第二是革命发展的情况不同。十月革命是在大城市夺取政权，然后向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同时，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使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成了不同的国家，多数是经过战争成为苏维埃型国家的。为了把这些国家统一起来，原先都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列宁、斯大林才不得不转而采取联盟制。中国革命是由农村到城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动员和团结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各民族平等联合共同战斗，没有民族的分离，而有各民族的凝聚与团结。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党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并且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它适应我国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而最显著的特点和优越性是便于正确处理自治和集中统一的关系，既利于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发展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又利于国家的集中统一，实行全国“一盘棋”。可以说，对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我们党是成功的。我们党一开始制定民族政策，就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时又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相适应。走向成功有一个探索与发展的过程，特别是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党接触、了解少数民族多了，结合深化了，在实践之中纠正了一些不适当的说法与做法。

访问人：请您具体谈一谈？

黄铸：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的宣传问题。因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压迫，所以党曾经宣传少数民族独立。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不论哪个少数民族独立出去，都实际上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外国的附庸。到1929年，中共中央对云南省委的指示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纠正，讲到民族独立的口号对于我党在苗民中的工作并不恰当，因为现在云南的工农群众与苗族都一样需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如果提出民族独立，客观上必然分离云南工农与少数民族的联合战线，结果必为法帝国主义利用去。现在现实的口号是民族自决而不是民族独立。

其二，关于少数民族上层问题。出于反对阶级压迫的主张，我们党曾笼统地反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号召推翻他们的统治。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好多少数民族的上层其实是该民族的代表，和群众有相当深的联系，反了对上层则根本无法接近、团结那个民族。所以，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工作原则的指示就纠正了笼统反对民族上层的说法，认为，瑶民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其落后，内部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显著开展，土司管事等在瑶民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威信，依然是瑶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一切对外关系都为他们所垄断，因此苏维埃红军也不得不开始同这些代表发生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瑶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对他们的统治方式、思维习惯与宗教信仰表示尊重；并且不求过早地发动内部的阶级斗争。长征过后，1936年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中又讲到，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但应该团结蒙古广大的平民群众，并且应该把王公、喇嘛、军队等都团结起来。

其三，关于实行联邦制还是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二大”的纲领中，提出在自由联邦的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后来的苏维埃宪法也一直提建立联邦。但以后根据中国国情适时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政策？前面已具体涉及了。毛泽东

早在 1938 年的《论新阶段》中说到为团结各民族共同对付日寇，必须注意几点：第一是允许蒙、回、藏、苗、瑶、彝、舍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第三是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是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毛泽东所论述的这些其中就已经包含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

访问人：在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政策确定之后，特别是建国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黄铸：第一，帮助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干部，先后创办的 10 所民族学院已培养出 100 多万人的少数民族干部，这是破天荒的；第二，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根据各民族的不同情况，我们党先后帮助各民族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让各民族从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其中不少民族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而同汉族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第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几十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铁路、公路、航空、邮政等基础建设及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是有目共睹的。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的巨额财政补贴和智力投资，也对那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逐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在民族压迫消除之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1953 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实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对这个任务作了表述：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括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规定经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我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愧是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繁荣这一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而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以此为已任，努力不懈，以求各民族共同繁荣。

1992 年 8 月 10 日于北京府右街

访陈雪薇——

知识分子的毛泽东 与中国的知识分子

陈雪薇

陈雪薇，1935年生，广东中山人。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二室主任、教授。
主要著述有：《历史的启示十年（1957—1966）建设史研究》、《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经济》等。

陈雪薇是我们这次采访中遇到的第3位女教授。她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必要的一日三餐，就是和丈夫各坐一桌，研究与写作，还有体育运动：打得一手不错的羽毛球。

访问人：毛泽东与中国知识分子是个热点话题。对这个问题，党史界有褒有贬，陈老师，您怎么看？

陈雪薇：我认为，毛泽东是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不愧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奠定人。尽管他的晚年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犯有“左”的失误，但从整个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上看，我们仍然应当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他在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上的贡献，而不应该忽视他在这方面所产生的深刻的积极的影响。

访问人：看起来，您是在一个基本肯定的前提下作具体的分析。说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您能不能详细地谈一谈？

陈雪薇：好的。大家知道，作为知识分子，自然离不开读书。毛泽东对读书的嗜好也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位孜孜求知，独立思考的大学问家。从幼年起，他就勤奋好学，手不释卷。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以后，在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涯中，他还是不忘读书，总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各类书籍，爱不释手，仔细地读，认真地思考。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便提出配置各类书籍。经多年努力，逐步建成一个门类齐全又适合需要的藏书室。有同志估算过毛泽东一生读书有2万多册。他读的书范围很广，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论著，从古代到近代，从中国到外国，囊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宗教、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诸多方面。1954年，毛泽东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可见，毛泽东学习的毅力。毛泽东的一生，是同孜孜以求的读书生活相伴随的。但爱读书并不是毛泽东所唯一具有的。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最重要的是，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访问人：学以致用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人世之道。

陈雪薇：但不同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他去实践这种结合，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思想基础。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视救亡革新、改造社会、富国强民为“己任”。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经历了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选择与摒弃。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表明，毛泽东开始确立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认定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个信仰一经确定，他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青年毛泽东抱定的救国救民宗旨，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更升华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信念。抱定这样的信仰与信念，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特殊而复杂的问题；他敢于同本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抗争；他勇于在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高举革命大旗，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在艰苦的实践中，闯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出色地把中国革命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独创性的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意识、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掌握了人类文化知识的优秀成果，并使它同工人运动牢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立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都是沿着这一轨道，为无产阶级找到了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中国伟大领袖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他作为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

访问人：对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科学的分析。那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应如何评价，这是不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及毛泽东做出回答的？

陈雪薇：是的，这无疑是一个必须正确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基石。从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1939年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10多年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能够科学地阐明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毛泽东认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广大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了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基于这些认识，1939年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我党关于知识分子工作指导性的文献。

访问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陈雪薇：一是它充分而明确地提出了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重要观点。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这就把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具体地表述出来了。同时，把知识分子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把对知

识分子工作的好坏，同中国革命的成败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观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新论点。

二是及时而正确地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工作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及其产生的原因。当时在许多军队的干部中，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对这种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毛泽东给予深刻的分析：第一，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第二，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第三，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第四，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第五，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毛泽东这些分析，既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科学运用；又是对我国知识分子特点的我党知识分子工作现状实事求是的分析。对纠正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是制定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第一，对于那些愿意抗日而忠实、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在战争中在工作中磨炼，使他们为军队、政府和群众服务，并按照其具体情况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意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前进。第二，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下，毫无疑问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第三，对于一切比较有用的和忠实知识分子，应当分配适当的工作，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逐渐克服其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第四，对一切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最后，毛泽东特别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能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访问人：这是建国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最集中的论述。那么，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否有所补充和发展？

陈雪薇：有的。在八大预备会上，他提出，我们要造就大批知识分子，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会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57年，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又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为此，毛泽东提出过从两个方面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设想。一是各级领导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计划。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90年，10年树人。10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25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10年树人倒是可以的。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起来。二是无论搞工业、农业，还是搞商业、文教的同志，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

他说：“我看也要搞个10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这些论述，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提出来的新论断，这在今天，还是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

访问人：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了错误。对于这种改变，您怎么看？

陈雪薇：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与失误，都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实施毛泽东在1939年《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提出的战略决策，对抗战、解放战争一直到建国后我们事业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党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是正确的，也是相当谨慎的。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解决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适时地提出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重要建议。这次会议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然后赶上世界水平。”

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逐渐离开了正确的方向，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出现了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最突出的表现是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并不要读很多书”，“书读得越多越蠢”，“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等等。这些错误观念长期纠缠着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1958年以后，在全国明显地取消了干部队伍和工农群众的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建国初期像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的速成工农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农预科等各类干部文化学校也逐渐销声匿迹了。

第二，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由“工人阶级一部分”倒退作为“两个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戴上所谓“臭老九”的帽子，遭到排斥打击。

第三，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逐步升级。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知识界表现特别突出，被划定55万多名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占总数的57%左右。到1963年以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支配下，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左”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它又提供了哪些深刻的历史教训？

陈雪薇：胡乔木曾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从这个重要教训出发，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

首先，要经常地系统地了解我国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科学论断，切忌一知半解，一叶障目，切实地做到对知识分子的充

分的理解。对我国知识分子的调查研究是长期的，决不能做三、两次，就一劳永逸。调查研究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静态和动态的情况；包括知识分子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知识分子在我国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地位及其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全党的典范。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如他自己曾说过的：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因此，对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变化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因而，轻率地放弃了八大前党中央对知识分子作出的正确估计，而提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论断。以至使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向“左”的偏差越滑越远。我认为，党经常地系统地了解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并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基础。

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我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正确判断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制定和实行相应的政策，这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出发点。1956年1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作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估计，并强调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却没有以此为据，制定相应的知识分子政策，而继续沿用建国初期行之有效但至此已经不适用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缺陷。这样的政策没有能把我国知识分子真正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点体现出来；没有切实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依靠力量之一，这对五十年代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不断发展，埋下了隐患。

第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纠正党内对知识分子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保证党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切实执行。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工作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以“左”的指导思想错误地反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决策，人为地制造的反倾向斗争，越斗越乱，越斗越“左”，甚至提出只准反右，不准反“左”。这种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导致1957—1978年这20年间，知识分子工作出现重大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些消极影响留下的烙印也不是一时就能消除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邓小平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毛泽东为我党奠定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使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失误得到了纠正，这是值得令人高兴的。

1992年5月2日于中央党校

访王兴国——

杨昌济的得意学生

王兴国

王兴国，1937年生，湖南株洲人。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著有《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合著）、《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等。目前正撰写《青年毛泽东（1910—1927年）的思想轨迹》。

几年前，就和王兴国一起在《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共过事，再加上京、湘两地在毛泽东研究方面颇多联系，找他谈谈也就不是什么难事。况且王兴国快人快语，挺爽直。访问人：您在国内从事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是比较早的，同时也最早系统地研究过杨昌济。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早年拜在他的门下，是杨昌济的得意学生，后来毛又成为杨的女婿。您能具体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王兴国：我们对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开始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试图证明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也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从不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我接触了许多具体材料，感到杨昌济与青年毛泽东关系十分密切，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十分深刻。于是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便立即转入杨昌济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觉得杨昌济与毛泽东之间，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或翁婿关系，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杨昌济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导师。在《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一书的“引言”中，我曾通过对杨氏生平经历及其在湖南思想界地位的分析，指出他“在旧文化与新文化、中学与西学之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确是起了某种桥梁作用的。”也就是说，他是引导青年毛泽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领路人。

杨昌济生于1871年，1920年去世。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人，所以人称“板仓先生”。他出身于一个农村的读书人家，从小饱读儒家经典并精研宋明理学，服膺程朱。19岁考取秀才后，几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上举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他开始鄙弃科举仕途，关心经世致用之学，并在戊戌变法时期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在湖南进行的变法活动，撰文发表自己的政见。戊戌变法的实践，使他大开眼界，“以为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1903年至1908年留学日本，先后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主攻教育学。1909年考入英国扼北淀大学，主攻哲学和伦理学。1912年夏毕业于扼北淀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此后在德国进行短期考察，于1913年春返国。1913年至1918年，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1918年夏，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伦理学教授，直到逝世。主要著作有《达化斋日记》、《教育学讲义》、《论语类钞》及收入其他论文的《杨昌济文集》，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我下面引用的杨昌济的一些话，基本都出自这些著作。

毛泽东与杨昌济的来往始于1913年秋。其时，杨昌济刚从国外留学归

来。任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而毛泽东也在这一年春考入该校预科。现存的毛泽东的笔记《讲堂录》中修身课部分的内容，就是1913年10月至12月听杨昌济讲课的记录。1914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杨昌济与毛泽东均转入一师。由于杨昌济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加之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所以毛泽东对他十分尊敬，课余经常与好友一道去杨家请教、谈心。《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就曾记有毛泽东与杨昌济的谈话情况，内容除毛泽东自述的家世、个人简历之外，还有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认为毛虽农家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918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创立新民学会时，其21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外，均系杨昌济的学生。所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谈及学会缘起时，着重指出，除时代的影响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仍十分关心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等人的前途，他不仅大力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而且介绍第一次赴北京的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对毛泽东等1919年底组织的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也积极支持。逝世以前，他还致函章士钊，拜托他以后多关怀和提携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杨怀中别帐》）杨昌济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痛，曾与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发布启事，高度评价了杨一生的教育事业，并发起捐集赙资，抚恤杨的遗孤。同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结婚。

访问人：杨昌济与毛泽东友谊如此深厚，那么他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一定也是很深的了？

王兴国：是的。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方面来说，首先表现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杨昌济生活的时代，恰处国际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为了瓜分市场，攫取中国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地处中国近邻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得特别贪婪。其突出表现就是1894年对中国属地朝鲜的侵略和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的勾结。对此，杨昌济始终抱有警惕。他曾回忆，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到讲西洋历史的日本老师说，中国人与罗马人同，惟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当时他心里就感到，日本人不怀好意，颇有入主中国的思想，值得国人注意。所以杨昌济在讲课时经常联系现实，以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教育其学生。杨昌济的这些教诲，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立即激起了毛泽东等人的愤慨。他在悼念亡友的挽诗和挽联中曾痛切地写下了“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等语句。他还在一师师生编印的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豪言壮语：“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百折不回。

其次，杨昌济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曾说：“从政治上求变，变之自上者也；从教育上求变，变之自下者也。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高以下为基，吾宁自教育始矣。”所以他说：“欲救国家之

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这种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所以当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被读书从事教育事业与从事现实政治斗争的矛盾所困扰。同时，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中所以称道克鲁泡特金一派的“温和”方法意思“更广，更深远”，显然也是受了杨昌济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文化观方面，杨昌济主张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基于这种认识，杨昌济既反对“留学迷”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闭关自守的“国粹主义”。

访问人：有的人认为杨昌济的这一观点是“折衷主义”。

王兴国：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不管怎么评说，我们都不能忽视它们对青年毛泽东五四时期文化观的重大影响。首先，它使毛泽东能避免五四时期许多人在文化问题上的绝对化的形式主义方法，正确区分中西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例如，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就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其次，它引导了青年毛泽东注重对国情的研究。所以，当新民学会中很多成员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却决定暂时留在国内进行研究，并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现在有的论者曾为毛泽东当年没有出洋留学而惋惜，觉得这影响了他的文化观并导致了他思想上的某种局限性。这一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重视国情研究，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促使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且成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

访问人：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要比“西学”浓厚得多。留在国内的这种选择，您刚才说到，毛泽东有许多理由，但这几种理由的出发点，还是对“中国文明”的充分重视。其实，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认识与追求，也体现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这里也有杨昌济的影响吗？

王兴国：杨昌济一生十分重视哲学思想的研究，认为“人不闻道，是谓虚生”，又说：“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这深刻地影响到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记录的杨昌济介绍的某些哲学观点。1914年冬，以杨昌济为首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毛泽东、黎锦熙、蔡和森等人。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西洋哲学、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毛泽东将杨昌济

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译稿借来，整整抄了七个笔记本，认真地进行研究。杨昌济不仅向青年毛泽东传授了丰富的中西方哲学史知识；而且其“贯通大原”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激励着他热烈地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当时，毛泽东宣称：“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另外，《讲堂录》及杨昌济的其他有关著作表明，他经常教导毛泽东等学生“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杨昌济这种注重学以致用、知行统一的思想，也曾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响。

杨昌济道德高尚，对伦理学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他不仅在人品和人格上给毛泽东等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在伦理学理论上给毛泽东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封建道德的批判。由于杨昌济对宋明理学有深刻理解，对中国传统礼教知之甚深，又长期在国外留学，对西方伦理史，特别是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很有研究，所以他在批判封建道德时，往往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他说过：“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君子之为教也，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固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进德修业相尚。过度之压制，固非训育之所宜也。”正是从重人格独立和进德修业的立场出发，杨昌济曾尖锐地抨击封建的家族主义及社会上的种种陈规陋习，诸如欺诈虚伪、好逸恶劳、铺张浪费、无谓的应酬、打牌赌博、不讲卫生等等。这些均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 批注》中对“三纲”的批判，以及他和战友们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提出的“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就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影响的痕迹。其次，杨昌济宣传和介绍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 批注》之中。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的弊端，杨昌济极力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为了避免极端利己主义的弊病，他提出了一个“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为青年毛泽东所继承，即《（伦理学原理 批注）》中的所谓“精神之个人主义”。

访问人：毛泽东是读师范的，师范培养的是职业教师。杨昌济在师范任教，他的教育思想对毛泽东又有什么影响呢？

王兴国：在教育思想方面，除前面说到的教育救国论之外，杨昌济其他一些教育思想也曾影响于毛泽东。其一，是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按杨昌济的说法，人格主义者“谓教育宜发达个人之人格，同时宜使个人得能与社会调和之性质。”这一思想与杨昌济在伦理学上主张培养“有公共心的个人主义的人”是一致的，与青年毛泽东“精神之个人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认为，学校之设就是要使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其二，从人格主义出发，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均批判资产阶级学校的“坏处”。杨昌济说：“现在学校钟点，总不免太多，学生负担过重，大有害于身体。女学尤甚。收事关于国民之体力甚大。”毛泽东则更尖锐地指出，旧学校“用

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蔑视学生的人格”；“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其三，他们认为要使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得以贯彻，就必须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杨昌济说：“自来论教育者，往往分为智育、德育、体育之三部。”毛泽东则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之研究》）只有三育并重，才能达到“身心并完”，这正是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所提倡的“自我实现论”在教育上的反映。

在治学态度和修养方法上，杨昌济的“以久制胜”被其学生奉为“达化斋的法门”。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早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毛泽东就记下了这一“法门”：“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1920年萧子升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也提到“以久制胜”，并特别注明“这是达化斋的法门”（《新民学会资料》第143页）。

访问人：如您所说，从政治、文化、哲学、伦理学、教育、治学态度和修养等等方面能看出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有些影响还相当深刻。说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学生，真可谓名副其实。

王兴国：的确如此。1936年他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一师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对恩师兼岳父的杨昌济始终抱有无限崇敬的心情。

1992年6月2日于长沙

访萧超然——

毛泽东和北京大学

萧超然

萧超然，1929年生，湖南临澧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蔡元培研究会总干事、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政党与政治、北京大学校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合著有《国民革命的兴起》、《北京大学校史》。主编了《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等。

萧教授的家在北京大学，到处堆满了书，显得有些拥挤。他笑笑说，这大概是北大的特色。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有关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谈话。

访问人：北京大学是我国历史最久的一所名牌大学，荟萃着不少风云人物，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栋梁之材。1919年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它发生了密切关系。我们想，北京大学一定对毛泽东也发生了一些影响。

萧超然：如果谈到影响，这是一个还有点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充其量只是一个图书馆助理员，地位很低下，谈不上什么。我想，地位低，那倒也是。假如毛泽东后来没有成为伟人，我们也就不会知道他的名字。问题是毛泽东成了伟人，他又刚好是五四时期在北大工作过一段时间，北大呢，又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处在新旧转折的阶段，那里又出现了一批群星，这与毛泽东在北大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现象就值得研究了，虽然时间很短。

访问人：影响是一定有的，那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萧超然：影响有大有小，这个影响有多大，大家看法也不相同。我认为，毛泽东从韶山到长沙应该说迈出了一小步，然后从长沙到北京是比较大的一步。如果没有两次北京、上海之行，他可能不会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全世界，换句话说，就不会有后来的伟人毛泽东。

访问人：请您具体谈谈。

萧超然：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他早期思想的转变，表现在他人生道路的选择方向，具体说来，就是对他选择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北京大学的文化现象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毛泽东在来北京之前，从没有出过湖南省界。但他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在湖南求学的几年中，他读书，看报，脑子不停地思考，一门心思地要探讨救国拯民的“大本大源”。1918年的北京大学，由于蔡元培校长采取广揽人才的政策，正处在人才荟萃，思想上、学术上异常活跃的时期，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争奇斗艳。像毛泽东这样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年轻人，一来到这种地方。受到这种文化现象的感染，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兴奋与刺激，并且眼界大开。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极强参与意识的人，所以一到北大，他就参加了北大的新闻学会和哲学会。此后还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不是北大的，但初期会员多数是北大的）。这些学会在当时都是针砭时弊，研讨救国救民道路的学术团体。无疑对毛泽东一定会发生不小的影响。

访问人：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之前与之后，思想有很大不同。这之前，他强调立志，强调探求“大本大源”。这之后就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强调民主和科学，反对儒家的独霸思想等等。

萧超然：下面我谈的第二个影响，也就是对他选择信仰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接触工人啦、社会啦，都有关系。我主要谈谈他从北大读过的书所受的影响。因为毛泽东信仰的确定，是从各种主义、学说比较中逐渐形成的。要比较各种主义、学说，首先要了解这些学说，不了解这些学说就谈不上选择。毛泽东自己说过：他在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东西。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全国大学图书馆中最大的藏书量，毛泽东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在这样的地方，他一定读了不少过去从未读过的书。具体读了哪些书，现在还找不到直接的材料，起码《每周评论》、《新青年》他读了。像《国民杂志》、《新潮》等北大的一些刊物也会读的。李大钊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也正是毛泽东在北大时发表的。这些都会对毛泽东产生相当的影响。拿《共产党宣言》来讲，毛自己说1920年夏就读了，有些学者提出《宣言》还没有出版。我觉得毛自己说的话，不要轻易否定。他没有读到陈望道译的《宣言》，但他可以读到其他人翻译的《宣言》。1919年4月，《每周评论》就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其中的一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翻译者是成舍我，他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后来是世界日报的总编辑，很有名的报人。还有1919年11月出版的《国民杂志》也刊登了《宣言》的一章，是北大经济系学生李泽彰翻译的，是《宣言》的纲领。像这些材料，毛泽东是不是可能看到，我想完全可能。另外罗章龙的回忆，也有一定的可靠性，因为他是德文班的学生。北大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早的文献，关于德文版的有8本。罗章龙说曾和他的同学翻译过《宣言》，或打印或油印，是比较可信的。还有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看到毛泽东的桌上摆着《共产党宣言》，如果和罗章龙的打印本或油印本联系起来就不奇怪了。总之，当时的北大介绍各种主义、学说，介绍俄国革命的书刊很多，这在毛泽东确定信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他选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向是很关键的。

访问人：北京大学的各种人物也一定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萧超然：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各种人物对毛泽东的综合影响。

访问人：早年的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友不博，则见不广”只要“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凭着毛泽东这样一种访贤问道的精神，在北大一定拜访了不少名人。

萧超然：大体说来有三种：第一种，是大的名流学者。如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邵飘萍、周作人，还有新闻学系的教授徐宝璜等，这些人对毛泽东说来，可谓神交已久。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也好，还是自己登门上访，或去听课也好，毛泽东两次在北京期间，都或多或少的和他们有些接触。虽然没有过多过深的交往，但给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就一再提及这些人，并引以为自豪。从受的直接影响的来看，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在他选择主义的过程中都逐渐被否掉了。邵飘萍自由主义的倾向，也使他非常佩服。可见那些名流学者们新颖的思想，深逢的学问和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曾使青年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吸引力和精神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日后的修养和领袖品格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种是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论影响恐怕他们两人最大，主要反映在毛泽东世界观的形成上。毛泽东在没有见到李、陈以前，还谈不上对主义的选择，第一次在北京期间见了，当然也还不存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陈独秀本人也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抱有好感，这就为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当毛泽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对各种主义的分析、比较中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第二次见了陈独秀，很快就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一方面，毛泽东自己也有回忆，他说：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两人在毛泽东选定人生目标与信仰中起了导向作用。

第三种是在北大的湘籍教授和一些学生。湘籍教授主要是杨昌济和黎锦熙。毛泽东在湖南求学的时候，他们就是毛的老师，而且师生关系很好，到了北京毛泽东和他们更是来往密切，有问题、有困难总是找他们解决。黎锦熙国学根底雄厚，在治学、研究方面对毛的影响大一些。杨昌济在修身立世方面对毛的影响大一些。1920年杨昌济逝世以前，还向上海的章士钊写信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可见杨对毛是十分看重的。在北大大学生中毛泽东和朱谦之一起讨论过无政府主义，和康白情一起议论新诗，还接触了傅斯年、罗家伦等等，当然一段时间之后，毛就对他们表示失望。影响最大的还是湖南籍学生邓中夏，他们后来来往密切，通过邓中夏，毛泽东认识了许多别的朋友，还参加了邓中夏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五四运动中，邓中夏曾专程到湖南向毛泽东介绍北京的情况。邓中夏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将毛泽东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公布于众，使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在当时的北大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访问人：一个人的成长，要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从毛泽东来看，他和北京大学的这段因缘，是他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所在。那么请您谈谈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有搞不清的问题吗？

萧超然：大的问题基本上都可搞清楚了。比如他在北大做什么，有些什么活动，结交了哪些人，思想受了哪些影响等等。具体问题有的也说不太清楚。比如，他来北京前，从他的通信来看，杨昌济希望他进北大读书，但为什么没有进，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没有看到材料。

访问人：当时的北大要考试，是否他外语或者是数学不行？

萧超然：这是一种可能。文史专业一定要考数学。吴晗当年考北大，中文、历史都是100分，数学零分，结果北大没有录取，清华录取了。

访问人：现在人们比较强调他的经济困难，是否也有关系？

萧超然：也有可能。他自己讲，开销很紧张。不过毛泽东不太喜欢学校，喜欢自由研究。北大的环境他肯定欣赏，但让他进正规的班听课，他不一定欣赏，他一直讨厌正规的教育，喜欢不受拘束。

访问人：其实门捷列夫在普鲁士留学时和他有相似情况，那里的教授请他读博士学位，他不肯。毛泽东也很有主见，求真理不一定非进学校才行。

访问人：如果强调他的经济困难，我也不太赞成。以毛泽东当时的家境，说服父亲不一定不准他进大学读书。还有毛泽东没有出国，也有人把它归结

为家庭经济困难，我认为也不一定正确。当时经济困难的罗学瓚，就是毛泽东等为他借钱出国的，还有陈绍周也是这样。以毛泽东当时在学生中的地位，以及向章士钊借款三万元的情况，他出国是无问题的。关键还是想立足国内，这也符合他本人的性格。萧超然：显然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进北大读书，各种因素都有可能。还可以探讨。

访问人：最后请教一个问题，建国后毛泽东与北大有哪些来往？

萧超然：总的说，毛泽东对北大是比较关注的。《毛泽东书信选》还收了他给北大的一封信。那是 1949 年北大纪念五四运动 30 周年，请他参加，毛泽东回信表示，感谢邀请。他说：“因为工作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第二年，五四运动 31 周年时，他又给北大写了信，并应全体师生的请求，给新制的校徽题写了“北京大学”四个字。

访问人：“文革”期间毛泽东和北大也有不少联系。

萧超然：那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要说清楚，还需要再找时间，详细研究。

1992 年 5 月 17 日于北京大学

访黎永泰——

青年毛泽东与中西文化

黎永泰

黎永泰，1944年生，四川忠县人。现为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哲学学会副秘书长。自1983年以来，出版个人专著有：《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毛泽东与大革命》、《毛泽东与美国》。主编或合作出版的有：《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等。

黎永泰副教授不光是闭门著述和教书，而且注意和外界的交往。关于青年毛泽东和中西文化这个问题，在这篇访谈录成稿之前，他还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John Flouel 博士有过交流。

访问人：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极大兴趣，据此，有人说青年毛泽东就是一个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黎永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既要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去考察，又要从毛泽东个人方面去探讨。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非常之大，用那时的人的话来说，是“亘古未有之奇变”。这个大变动，给中国社会中的先进人们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压力。但这种大变动，不是社会形态自身按常轨发生的变动，而是在西方国家的外力打击和压力下，向一种更为复杂和畸形的社会形态的转变。它使中国丧失了独立，同时丧失了文明进步发展的希望，国家和人民都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出路问题，便成为时代的根本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国家的独立解放和富强现代化。

中国社会这种巨大变动，不仅使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也使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严重挑战。由中国文化传统所提供的为人们一贯尊崇的精神范型、思维范型、社会关系范型、技术范型和行为范型等等，已经很难帮助人们应付新的局面、新的情况。这种传统范型，在社会变动面前显得如此无能，不能给人们带来安全、保证、有效，不能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不能应付不可预测的事件、具有威胁的事件，以及实际发生的灾难，中国文化传统受到西方文化沉重打击。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人维护仁义道德的原则，西方人却以发财的原则相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暴露了它的严重缺陷，迫使先进人们对它的信仰发生了严重动摇。

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为了争回独立，为了像西方一样先进富强，中国人民大众用革命、用反抗来对付西方的侵略和中国腐败无能的统治者。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中国近代社会处在“革命的震荡”时期。与此同时，中

国先进人们在社会出路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步正视现实，转换思维模式，以开放的姿态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他们努力做着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传统，引进西方文化的工作，以期创造和获得新的文化范型、思维范型、社会关系范型、技术范型和行为范型等，以适应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的斗争的需要。因此，与近代人民革命相适应，中国又处在文化转型的时期。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传统，引进西方文化，这些方面的工作，都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进行着。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先进青年，会对西方文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的客观背景。

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传统，引进西方文化这些方面的工作，如果不和中国社会的“革命震荡”这个主旋律结合起来，即文化转型不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往往便会导致文化上的反传统立场，即全盘西化的立场；或者导致保守文化传统的立场，即复古主义的立场。我们看到，许多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人，由于没有把文化转型的工作和社会革命的要求结合起来，便向这两极分化过去了。而把文化转型和社会革命的要求结合起来，便会在反抗西方侵略中，既承认中国文化的缺陷，又认识西方文化中存在的弊病，这就会在文化上导致一种辩证的立场。

青年毛泽东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兴趣，这和他顽强寻求中国社会出路，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追求是分不开的。他的突出特征是把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和自觉坚持文化转型的立场结合起来。这使他学习西方文化而又不盲从西方文化；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而又不盲目反传统。毛泽东具有独立思考、不苟同于时俗的性格特点，这使他能冷静地对待中西文化。他在青年时期对中国文化就有深厚的功底，这使他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有一个比较。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个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这种观点，使他看到西方不是一切皆好。例如，他看到西方有民主，也有专制；有先进的物质生产，也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因此，凡是西方敌视人的东西，中国人决不能接受。所以他宣布：“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当然，他从促使文化转型的立场出发，也非常激烈地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他主张对中西文化同时实行改造。他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斯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值得指出的是，青年毛泽东还得到了一位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具有深刻了解，并对中西文化持客观立场的大学者杨昌济先生长期的直接指导。杨昌济主张把握中西文化的特点，吸取西方文化有益的东西，来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化。他认为，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结果，不是一种文化压倒或同化另一种文化，而是文化间的互相吸收和交融，由此而“融铸”出新的民族文化。杨昌济在中西文化上的观点，对毛泽东发生了深刻影响。以上便是我认为青年毛泽东既热心于学习西方文化，但没有采取反传统立场的原因。

访问人：您提出把文化转型和革命要求相结合，便能导致对文化的辩证立场的观点是有启发性的。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青年毛泽东接受过哪些西方文化的影响？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黎永泰：从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和后来的多次回忆中，可以知道，他

学习过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多种知识，接受过西方近代的唯心论、二元论、机械论、进化论、辩证法等各派的哲学观点，受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深刻影响。因而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多方面的。我认为西方文化对他影响最深，甚至影响到他一生的思想特征的，可以举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受到西方文化中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并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结合起来。1944年7月18日，他对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说：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我们曾接受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处处体现着他对民主的渴望、追求和歌颂。他肯定，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专制是黑暗之母、倒退之母、分裂之母、落后愚昧之母。西方进入民主时代很久，中国仍然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不独立的原因，任人宰割的原因。因此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这成为他一生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后来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种，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他肯定，中国人民理解并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的实验，或者“监护”。当然，他后来讲的民主，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他的民主思想起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予以改造。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民主思想，成为毛泽东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

第二，他受到西方文化中强调主体能动性作用的文化特征深刻影响。和那个时代的先进人们一样，毛泽东在对中西关系和文化进行对比时，他认定，中国之弱，不仅在国力之弱，犹在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之弱。他说：“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于全国人民的思想空虚腐败到了十二分。”为救其弊，必须振奋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志，改造民族文化。他认为，有了宏大的民族精神，强毅的民族意志、抗争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即使处于逆境也可以振兴，处于衰亡也可以再造。他早年接受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的唯心主义观点，夸大主体的能动作用，其目的就在于此。杨昌济提出哲学是最高精神，蔡元培提出世界观教育，他认为对于增强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切中要害，以致于后来他一生都提倡学习哲学和改造世界观。当然，他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后来也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

最后，他受到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解放的文化特征的深刻影响。他认为西方的个性解放值得提倡。他把个性的不独立、不自由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他指责专制主义的最大罪恶就是压抑和摧残个性。中国社会的落后腐败，中国人的愚昧和创造性的萎缩，就在于中国统治者不允许中国人有个性发展，个性自由。他年轻时许多文章阐述的就是这个主题。他把西方的个人主义改造为精神个人主义，突出强调个性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他把个性的解放和民主制度的造成，以及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看作三位一体的东西。他一生都强调要实现个性解放。1944年，他说：“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

主义。”他在阅读《聊斋志异》的《小谢》篇时，高度肯定个性解放的意义。他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我认为，在西方文化思潮中，这三个方面对毛泽东影响很深，这三方面也和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

访问人：根据您的看法，毛泽东年轻时接受了西方文化很深的影响，又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很深的影响，那么，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呢？

黎永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方文化，并不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障碍，相反，正是它们构成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首先，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高级的文化形态，它是对人类文化科学总结的宝贵成果。如果对中西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即对人类文化缺乏丰富的知识，要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首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对中西文化有深刻的了解的知识分子，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其次，对中西文化的丰富知识，为毛泽东比较中西文化提供了根据。他在比较中西文化中，发现了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缺陷，这就促使他去探求比民主主义更为优越的马克思主义。最后，中西文化提供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毛泽东从中国文化传统中继承了求实的精神和经世致用的精神，这就促使他以顽强的毅力去追寻使中国人获得独立解放、富强和现代化的理论，这是他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方面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他在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时，接受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中包含的怀疑的方法。这使他对包括西方各派思想的各种学说不采取盲从的态度，而是采取比较、分析，甚至怀疑的态度。这样，他便能够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中发现其缺陷和问题，这也促使他进一步去探索马克思主义。所以我说中西文化的深厚功底，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当然，并不是对中西方文化有深厚功底的人，就一定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胡适便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中西文化的探索还要和社会革命的主旋律结合起来，才能导致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

访问人：我们还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您在《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一书中，提到中国南方文化对毛泽东也有很深的影响。我想请您谈谈中国南方文化对毛泽东有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对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无作用？黎永泰：毛泽东受到中国南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想谈三点：

其一，是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影响。湖南有深远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在漫长的历史上产生了诸如屈原、王夫之、魏源、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禹之谟、刘道一等一大批爱国和革命的志士。毛泽东对湖南历史上的先进人物十分熟悉和景仰，熟读和研究过他们的著作，并引以为骄傲。他访问过玉笥山屈原的故居，深为屈原宁折不弯、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高尚品德和爱国主义的气节所感动。他经常到船山学社听刘良老讲船山学说和事迹，对于杨昌济指出的“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此是船山之大气节。应当推而广之以反对今天外来压迫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的论点，深以为然。他和蔡和森等常在岳麓山上禹之谟墓前徘徊逗留。他对禹之谟大义凛然的气节深为感动，“心潮起伏，赞叹不已。”他对近代史上湖南人民在爱国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惜牺牲的美德高度肯定，指出：“我觉得湖南人确有几种可爱的特性；坚苦、奋发、勇敢、团结、同心都是。”爱国主义、民族气节、舍身忘我这些优秀传统对毛泽东影响极深，是促使他走向马克思

主义的因素之一。

其二，是关心大事的优良传统的影响。中国南方文化重宇宙的穷极，富于形而上的特色、富于大的特色，这种特色对毛泽东影响极深。老子言道，称之为“大道”，浩浩荡荡、无始无终，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大道记兮，其可左右。”正因为道为大，老子便喜欢大政策，“执大象，天下往。”庄子极颂其大。毛泽东最喜欢的庄子的《逍遥游》开篇便极言其大：“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毛泽东极其欣赏庄子的宏大气魄和人生态度。在关心大事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毛泽东和“大”结下不解之缘。他喜欢江河湖海、五岳大山；喜欢谈宇宙、世界、人生；喜欢立大志、办大事；喜欢人生、社会“奇伟之大变”，如此等等。这种南方文化培养了毛泽东高远的志向、伟大的追求，他把自己的胸怀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融为一体，所以他始终关心国事大事，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其三，是对规律执著追求的传统的影响。中国南方文化从对“大”的追求的传统中衍生出对规律执着追求的传统。老子是一个对于宇宙沉湎于玄想的思想家。他把道理解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支配和主宰万物生化的规律。他的全部学说是道这个根本规律的探求和阐释。南方另一位玄想大家庄子不承认什么自然规律，他把老子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来一个翻转，将其统摄于人的主观境界而化除。从主观世界讲，逍遥乘化、自由自在就是道。庄子似乎否定规律，其实他也在阐释规律，只不过他的出发点是人的个性自由而已。其后，屈原在《天问》中对宇宙中的许多现象提出了深刻的质问，他急切地对宇宙探寻个究竟。毛泽东很欣赏屈原在《天问》中表现出的执著追求的态度。南方文化这种对规律执著追求的传统，深刻影响了毛泽东。他把规律尊之为宇宙真理，把追求宇宙真理立为终生宏大志向。真正的立志，就是以全副功夫把握宇宙真理。所以他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掌握了规律才能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依自己的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这种对规律执著追求的态度，不断引导他走向真理。

必须指出，我们谈到中西文化及中国南方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但它们并不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原因，决不能忽视毛泽东革命实践的这一方面。关于这一方面我就不多说了。

1992年8月1日于四川大学

访盖军——

毛泽东上山前后

盖军

盖军，1930年生，吉林扶余县人。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专题讲义》（合作），发表论文十余篇。主编有《中国工人运动史教材简编》、《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七十年》等。

我们访谈的对象很少有女性，她是本书仅有的三位女性之一。这些年盖教授潜心向学，常抛出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她熟悉的领域，谈起这一段的毛泽东，如数家珍。

上山前

访问人：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向共产党发起进攻，昨天的同盟者，今天成了敌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鲁迅先生对此有个描述，他说：“在‘清光’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在此情况下，人们忧虑、彷徨，更有甚者脱党、投敌。毛泽东作出了上山的选择。请您谈谈毛泽东是怎么想到上山的？

盖军：可以说是“逼上梁山”。谁逼的？就是不知感人民之恩的蒋介石。1945年8月毛泽东在谈到这段情况时说过：“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是蒋介石把我们逼到农村去的。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次讲演中说：“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里插，就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

访问人：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客观事实，但不是所有人一下子就认准了上山这条路的。

盖军：毛泽东的话是笼而统之讲的，具体每个人在思考今后的革命之路怎么走，答案确实有所不同。这从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看得很清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最先提出上山的主张。陈独秀说：“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最好”的办法是到国民党部队中“当兵”，以待时机。张国焘提出脱离共产党，可以上山“抢富济贫”。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则主张进攻城市。毛泽东与众不同，坚决地主张在党领导下的武装上山，这样“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如果我们党手里“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可见，这时毛泽东已注意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教训，已敏锐地看出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会搞阴谋“事变”，要我们党做准备。毛泽东提出的上山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形势的最高认识和科学预见。

访问人：上山思想在马列文本上是找不到的，这显然是一个突破。他能够比较超众地提出这个思想，得益于什么呢？

盖军：我想他之所以有这样高的认识，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来自他对

当时国情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来自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来自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从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两篇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上山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当把毛泽东提出上山思想同他的两篇著作联系起来研究，就会理解的更深些。当然，我不是说这时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已经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思想体系，那是以后的事。由提出上山思想到工农武装割据再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理论，在他领导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起来的。

具体地说，我认为毛泽东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他能够正确地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主要表现在党的八七会议的发言中，他在会上的发言虽然不长，但却抓住了要害。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主要有三点：（1）是我们同国民党合作问题上没有去争领导权，他说，国民党本来是个空架子，我们和国民党合作时，孙中山认为如果国民党不增加新的血液就没救了，所以才要同共产党合作，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合作后，我们本来应该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但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思想准备，不敢大胆地做改造国民党的工作，处处迁就国民党右派，一再妥协让步。为什么这样呢？毛泽东分析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终究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个分析既通俗又深刻。（2）是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组织也要革命，但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就不同了，不仅听不进要革命的意见，反而“跟着许克祥走了”，限制农民运动。他说，我们要真正搞国民革命就必须领导农民坚决搞土地革命。因为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如果不把农民发动起来，国民革命不可能胜利。后来毛泽东成为中国党的领导人始终特别注意这一点。前年我们曾接待过台湾的访问大陆的人，在谈到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时，他们也提到台湾有些人特别佩服毛泽东能把中国众多农民发动起来，解决了土地问题，就把蒋介石打败了。他们的立场同我们不同，但他们在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认为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发动了农民。发动农民的要害就是实实在在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条，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着重地提出来了，而且要明确规定对农村各阶级、阶层的政策，而其他人的发言中就讲得不够。（3）是武装斗争问题，我们党是幼年党还不懂得自己直接掌握武装的重要，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中国的条件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党还有些合法斗争的条件，中国就没有。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一句名言，即“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在会上讲，我们过去还批评孙中山专搞军事运动，其实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孙中山和唐生智，他们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有一个理论，认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资产阶级来领导，我们只有等待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是拿欧洲的模式来套。毛泽东坚决搞武装的主张对八七会议决定建立工农革命军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毛泽东坚定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斗争。大革命失败了，全国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这是考验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关键时候。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我们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经不起考验，有的消极悲观，有的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出卖党，出卖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但是，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夏明翰在临刑前写下的诗中豪迈地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确实是这样。不少人在这样时刻，勇敢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很出色，他毫不畏惧，坚决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忘我奋斗。这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他十分赞成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即认为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所说的矛盾，一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没有解决。还有反帝的任务；一是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没有解决，这是反封建的任务。有两大矛盾存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一定会兴起。因此，中央提出要继续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当时中央开会分工，曾提出让毛泽东留在上面，毛泽东说，我要去做“土匪”工作，拿起武器，组织工农革命军，上山搞工农武装割据。

访问人：当时的中央曾实行紧急疏散，派毛泽东到四川去，毛泽东没有同意。他坚决要求到湖南去搞武装起义。到了湖南，他本来应当留在省里，可又跑到下面去，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

盖军：当时，中央还向他征求过意见，要他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他表示不去。总之，他坚决要去组织工农，用他自己打比喻的话说，去做“土匪”工作，这个“土匪”是打引号的。实际是到农村搞工农武装割据之意。

访问人：当时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举行武装起义，是没有不同认识的。但用什么办法，具体怎么干，我觉得还是有分歧的。

盖军：是的。要建立自己的武装，举行武装起义，搞土地革命，八七会议是明确的。一句话，要不要掌握枪杆子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认识上可以说是一致的。

但是，用什么方式实行武装反抗、走什么样道路，在认识上是不同的或者是不明确的。毛泽东在8月9日会议的发言中提到他起草的《湘南暴动大纲》，我认为这是一份需要很好研究的历史文献。在“大纲”中，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指唐生智掌握的省政权——引者注）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所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1）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2）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3）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8月9日发言还进一步指出，万一失败，就“应上山”。这是毛泽东在7月4日首次提出上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这个“大纲”是经中央批准的，但当时中央的计划与此不同。第一，中央原来指示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是全省的，把全省划为三大区同时举行：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湘中暴动，以衡阳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以常德为中心发动湘西暴动，然后夺取全省政权。中央的这个计划反映了“城市中心”的思想。而毛泽东是以靠近山区的汝城县为中心，进而占领几个县，实行土地革命，造成中心区域，逐步实现夺取全省政权，并准备上山。第二，当时中央的思想是把全省起义作为帮助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强调的是湖南的秋收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这样看来，毛泽东的认识比其他人的认识要高一些。当然，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上井冈山的思想，但他有了以汝城为中心，万一失败就上山的思想，这同他领导秋收起义失利后很快率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不无关系。我觉得过去对

这一点注意不够。

访问人：从中央的分工来看，我感觉当时中央工作的侧重点，或者说倾斜度，还是倾向于城市暴动，偏向于争取正规军起义。

盖军：是有这个问题，当时的中央就是这样认识的。南昌起义时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还是说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就不一样了，他率先提出放弃国民党的旗帜，举起自己的红旗，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中央一直到9月19日才决定放弃的。

尽管毛泽东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一样，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是一心为公的。当时，瞿秋白在党内一次会上说：我们党内唯一有创见的是毛泽东。我想，这句评语，也是很有见地的。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那样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勇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是不怕一切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什么都说不上。最近，我在讲课中就强调了这个问题。当革命处于低潮时，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者，为人民的利益而忘我战斗，是多么高尚而可贵的品格。正像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多么形象地描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情景呀！这是第二点。

第三，毛泽东注意社会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因此，他看问题、提问题比较务实。八七会议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时，毛泽东提出的意见说，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一定要把大、中、小地主的标准明确起来。为什么毛泽东能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到湖南农村考察时，已经注意到要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就需要定出政策标准。对大地主的土地坚决没收，没收中等地主的土地也没有问题，对小地主怎么办？实际上他认为中国的南方同北方的情况不同，在南方，“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还有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他提出现在农民要向富农进攻，那么我们应怎么对待富农，政策怎么订。

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后，瞿秋白说：土地问题党无一致的意见，“五大”讨论了，决定“耕者有其田”，这五个大字“什么问题都可包括了。”这说明瞿秋白没有下去过，不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接着说，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这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不同意，他说现在是我们要到农村中去，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回答和规定。由于国际代表说了，会议就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访问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能不能提出问题，提什么样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人了解实际多少，接触实际深浅，有多大的水平。

盖军：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八七会议上决定要搞秋收暴动，但怎么搞只有大的设想，并没有具体规定。要搞暴动，非要军事不可，没有正规武装配合是很难成功的。所以，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不仅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和安源工人纠察队，还组织了卢德铭警卫团。他主张我们应有一部分从国民革命军过来的正规武装参加。没有这些，光是农民拿的梭标，能行吗？

访问人：毛泽东当时反复强调要有兵力的护卫。

盖军：他是很清醒、很实际的，搞起义没有一定的武装不行；就是起义

成功了，没有兵力，也无法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

访问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走在他人的前面，我想与其经历不无关系。

盖军：这和他的经历有关系。他做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马日事变后又在湖南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做了一些斗争，这么丰富的经历在党内是不多的。在八七会议上他就讲，对于农民问题，未下去之前，对中央不妥的决议，无由反对。可是到了湖南呆了三十多天，考察了农民运动以后，我就有实际根据提出意见，向中央写报告。他说“我的意见是农民指挥我成立的”。

访问人：几年前，我们曾访问易礼容。他说，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毛泽东对他说，我要下乡和工农滚在一起，组织工农革命军，搞武装斗争。易礼容要求和他一起去，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好，还是留在上面，我身体好。我们决不会让革命这样容易的失败，一定要奋斗到底。

访问人：秋收暴动原计划是打长沙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盖军：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同新任命的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前面我已说过，原来中央计划是全省开花。毛泽东到湖南后，他强调了两点：一是主张“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这样组织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才有保障。二是认为全省开花不行，坚决主张缩小发动暴动的范围，提出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湘东几县的秋收起义。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决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实践证明，不要说打下长沙，就连浏阳、醴陵这样的县城也拿不下来，起义军三路先后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放弃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计划。虽有不同意见，会议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会后，毛泽东率领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从而将他提出的上山思想付诸实践。因为他感到一时难以攻打中心城市，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是统治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在进军途中进一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那里原来就有党和群众基础。王佐、袁文才的土著军队既然可以在山上搞割据，我们也可以搞割据。这说明毛泽东善于从实际出发，及时总结经验，审时度势，比较灵活，有可能就去争一下，宁肯冒点险也去争一下，不行就回来，决不去硬攻硬拼。正像邓小平同志最近讲的，要敢于冒一点险，不行再收，有条件就干，没有一股闯劲不行。我想当年的毛泽东对于打长沙也是如此。

访问人：这样看来，革命战略家的作风都是一样的！（同笑！）

上山后

访问人：上面您讲了毛泽东上山前的一段，上山后毛泽东是如何开创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上了山就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吗？

盖军：上了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转折起点，有重要意义。但上山后，能不能站住脚是首要问题。工农革命军上了山，但群众并不知道你是什么队伍，还要看你的行动。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因此毛泽东就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对于红军能不能受到群众的拥护，能不能站住脚是很重要的。它是区别人民军队和任何剥削阶级军队的本质所在。我在讲课说到这一段时就强调这一条，因为它直到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应同现在的党风问题联系看，学习历史经验就应对指导现实有作用，不然，不如不学。三大纪律中有一条最早的规定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来改为“不拿工人

农民一点东西”，现在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最早规定是不拿群众的一个红薯，这就很实际，也是老百姓最易懂。当时井冈山上的老百姓都吃红薯，群众看你连一个红薯都不拿，第一个印象是“秋毫不犯。”三大纪律下面还有“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六项注意。这些规定一贯彻，群众心里就很清楚了，毛泽东带领的军队是爱护人民利益的子弟兵，与已经看见过的军队不同，很自然地会受到群众的喜欢和拥护。他们会像看见一件新鲜事一样，奔走相告。所以，这是上山后能否站住脚的首要问题。

第二是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这和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不一样，和苏联红军也不一样。当时我们没有经济来源，当了兵不仅要打仗，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到古田会议明确规定为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红军如果离开了群众，像鱼离开水一样，就不能生存。那时的环境是多么艰苦，斗争多么残酷啊！可是群众不仅不疏远你，躲着你，而且把你当成亲人，掩护你，保护你，送茶送饭送水，这就赢得了群众，赢得了民心。因为群众亲身感受到你是为他们谋利益，而不是谋私利的。这是我们党的本质，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应当永远发扬。

第三是党的建设。对于党的建设这个问题，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共产国际是很担心的，总认为以城市为中心，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才是无产阶级的，才是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工农红军到了农村，农民成份的党员多了，就会变成一农民党”。这是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当时的党中央及共产国际对此有些担心，不无一定道理，但是他们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固守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模式，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泽东考虑的是从中国条件出发，如何在大多数是农民出身的党员的情况下，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首先，他在组织上提出“支部建在连上”：把工农革命军建成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从三湾改编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点。“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提出从思想上建党，就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用马列主义教育广大党员，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并在艰苦奋斗的环境中来考验。有了这条，才能开阔视野，懂得为整个革命事业，而不是为一己私利，不是只为农民的眼前利益奋斗。毛泽东在1928年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有过生动形象地描述。他说在农村的条件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对他们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那么怎么办呢？毛泽东指出办法是三条，一条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因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同时也注意吸收工人成分。另一条是在实际斗争中改造思想，例如打破反革命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第三条是红军的物质生活是那样菲薄，战斗又是那样频繁，为什么仍能维持不散呢？原因是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现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概括说来在那样既艰苦又战斗频繁在农村条件如何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主要是三条，首要一条是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一条是长期实际斗争的考验和改造，一条

是民主主义制度的实行。

我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建党的一条极端主要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条好的传统。今天条件变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条仍有其现实意义。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就不行，越是改革开放，越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第四是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的建设有两个内容，一是政权，一是地方武装的建设。毛泽东主张，除了搞好正规军以外，还要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红四军的领导人在看法上不甚一致。我们看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后向中央的汇报，其中特别讲到这点。毛泽东主张军队的党要帮助地方党，军队的武装要帮助地方的武装，还讲到要给地方拨枪。因为正规军的任务是流动作战，一旦部队有任务开走了，这里的地方武装没有发展起来，根据地就有失掉的危险。当时红四军的领导层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是有分歧的。

访问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有人民战争的思想了。

盖军：是的，这时已有了人民战争的思想。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党史上是有过争论而经过革命战争实验的检验，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指南。

访问人：您对红四军领导层的分歧怎么看？

盖军：我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除了上面我们谈到的在根据地建设上有分歧外，还有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问题。为什么会有八月失败？实际上是符合了二十九团的家乡观念，因为二十九团主要是湘南的农民，当时他们中有一种回乡情绪，想回湘南去，对此有不同意见，毛泽东是不主张他们回湘南的，作了一些工作，没有作通，这和其他领导人的态度有关。

访问人：有的材料说，当时朱老总也不同意，但当二十九团走了，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去了。

盖军：实际情况是，当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到井冈山传达省委的命令，要去打湘南。朱老总认为现在虽不马上去湘南，但去湘南是对的，实际上主张去湘南。这一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建井冈山巩固的根据地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应先把井冈山这块根据地巩固下来，先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然后再波浪式的向前发展，最后形成对中心城市包围的局面。这个战略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是明确的。但那时红四军的其他领导人（也包括朱老总），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战略思想，仍受朱毛会师前的习惯做法的影响，主张打游击。这就像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批评的，这里流动游击一下，那里流动游击一下，这里群众发动一下，那里又发动一下，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认为这样不行，在中国搞武装斗争，必须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然后不断地向外发展。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强调朱毛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是认识问题。两位革命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对一些问题在认识上发生分歧是自然的，亲兄弟还会有不同意见，何况是领导一支当时最大的工农红军的两位最高领导者，而且还有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导思想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后，陈毅同志在揭发批判林彪时曾提到过这段历史，他说，毛主席在井冈山以及在赣南闽西时就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一般的原理，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些决定，具体怎么搞，还得我们在实践中去探索。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所主张和坚持的，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马列的书本里只规定了一些基本东西，如武装斗争、武装起义等，但在中国具体怎么搞，是不是就只能搞城市起义，实践证明不行，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农村根据地里，从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一套东西。当然，上井冈山之后，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红军能不能发展起来，根据地能不能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即“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毛泽东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正确的答案，才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逐步发展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总结革命斗争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个唯一正确的理论。这一点，历史已作了结论，用不着再去细说了。

1992年4月5日于中央党校

访于光远——

与毛泽东同在一张餐桌

于光远

于光远，1915年生，上海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9年到延安，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社科院副院长等职。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有大量论文及专著。近年来主要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等书。

出于我们的意料，今天这位经济学家没有涉及什么理论问题，而是轻松地叙述了他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些回忆。

访问人：去延安的时候，您还是个青年吧？对毛泽东，有深刻的印象吗？

于光远：我于1939年7月下旬到延安。印象深的是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1939年12月9日那一天，举行了“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纪念会，时间是在晚上，会场设在中央大礼堂，也就是后来毛泽东作整风报告的那个礼堂。在我参加到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中来的时候，划时代的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了，虽然党的那一段历史我们并不知晓，但是都知道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威望在我这样的青年党员的心目中是绝对高的。还是在抗战前的北平，只要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解放》周刊上的文章，没有一篇我不仔细阅读。后来我又在武汉《新华日报》上读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些著作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机智的语言更加强了毛泽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那天我听说他会出席这个青年的集会，将要发表演讲，我就想象他演讲时除了会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会有怎样的表情、风格和技巧，有心注意研究这一次他演讲的特点。

那一天不是他一个人讲话。除了“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李昌作了如何继承“一二·九”精神、积极参加抗战的报告外，还有王明和别的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毛泽东是第一个讲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讲话很口语化，语言很朴素，不加什么修饰，仿佛是在跟一个人谈话，那么自然、那么亲切，不用什么雄辩术，而是靠对事物透彻深刻的理解，就把听众说服了。他讲的道理似乎也很简单，但是越回味越觉得他的确讲出了很重要的思想。而且他讲话很风趣，有幽默感，听的时候一点不吃力。他的确是在作演讲，而不是在宣读什么文稿。如果是文稿，人们就会想，何必去听，不如去看稿子。而听他的演讲就不会产生这种想法。那次演讲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论点是，他把“一二·九”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比较，说它们都是为一次伟大革命作了准备：“五·四”为1925年的大革命，“一二·九”为抗日战争。又说“五·四”和“一二·九”都从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民运动。毛泽东在这个演讲中把“一二·九”运动和红军北上并提，指出了两者的结合促进了全民抗战。我虽然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但我并没有理解到它有这么大的意义。听后豁然开朗。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后来刘少奇也著文强调过。

访问人：您刚才说到，到会讲话的还有党的其他领导人。他们的演讲风格怎样呢？

于光远：在那个会上王明也讲了话，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在会上，当王明讲话时，我对他和毛泽东两个人的演讲作了一番比较。论文章，我是先读过毛泽东的，后来才读到王明的，而且一比就感到两个人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论见面，我在长沙局青委工作时就在王明的领导之下。抗战前在北平，抗战后在武汉，都有人对我宣传说王明的口才如何好，演讲如何精彩。可是有一次在武昌昙花林听王明演讲回来，我和蒋南翔走在一起，我俩议论到，王明演讲很讲求词藻，注意演讲技巧，但是很浅，讲给中学生听听还可以，像我们这样的干部听了觉得没有东西。这次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又把他同王明的演讲作了比较，更觉得自己过去对王明的演讲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在听这次演讲前不久我开始记日记，我把这种比较详细地记在了日记中。

在我这次对毛泽东和王明的演讲作比较时，我对王明曾犯过“左”倾错误还毫无所知。我那么分析完全是凭自己的感觉。因为在日记本上我发表了许多这类对党的领导人的议论，所以在整风开始时，我为了对党表示忠诚，把它交给了组织。因此现在也就无法引证日记原文了。

访问人：您跟毛泽东有过直接的接触吗？

于光远：刚到延安的人都有一个心愿——见到毛泽东。我去延安时，毛泽东才44岁。那时的毛泽东经常出席延安的各种集会。有一回我翻了翻延安《新中华报》，发现每个月他都要出来作几次演讲。那时群众要见到他并不难。我到延安不几天，在延安东门外的飞机场上就召开了一次人数很多的“追悼平江惨案被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后来收入毛选的《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会太大了，我站在远处没有看清楚他。这是1939年8月1日的事。在这个大会前十来天女大开学和在这个大会后十来天边区学联开代表大会，他都出席并讲了话。当时他和群众的联系非常密切。那时晚饭后大家都喜欢到延河边结伴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谈话，或者一边散步一边唱歌。毛泽东也常去散步，我就在河边遇到过他好几次。他散步通常只有一个警卫员陪着。有时我看到他和别人打招呼。有两回我都想走近他，跟他握握手。我相信，当时如果我那么做，警卫员不会阻拦，毛泽东也不会拒绝和我握手。不过我还是没有那么冒昧从事。我已经见到了他，听过了他的演讲，我并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也没有什么问题要他解决，因此我没有利用那样的机会去接近他。

我真没有想到，到延安只有半年，我就有机会坐在杨家岭他的窑洞里，离他很近，可以仔细地端详他的容貌和表情，听他讲话，握到他那肥大的手。

我去杨家岭，为的是同屈伯川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筹备情况，请他出席二月初召开的成立大会。我们按时到了那里。那面窑洞很平常，窑洞里的家具也很简单，一张书桌，桌旁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另外两把椅子和一张茶几靠窑壁。书桌上放着文具、纸张和文件。我们进去时，毛泽东正伏在桌子上写字。我们一进去，他就停下了。屈伯川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他答应到时候去，我们很高兴地得到了他的许诺。原先我们想他很忙，谈完了正事就走，没有想到他很从容，听完了汇报，又向屈问起王人美在大后方的情况。他关心王人美能不能来延安。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王人美的父亲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之类的事。屈也真能够讲出一些这位电影女主角的情况。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只简单地补充了屈的汇报。我估计那次我没有给毛泽东留下什么印象。不过我倒是观察了他近一个小时。

访问人：很多人都曾讲到，在延安，毛泽东与人交往十分随和，有时甚

至不拘小节，您觉得呢？

于光远：有一次，我见到毛泽东大笑，笑得很开心。时间是 1940 年 6 月 21 日，地点是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内的文化俱乐部的一面特大的窑洞里，场合是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的第一次会议，带有开幕式的性质。延安新哲学会是 1938 年下半年成立的。这个会成立时我还没有去延安，因此不了解这个会发起、筹备和成立后工作的情况。到 1940 年 6 月开这个年会时，中间已过了一年多。开这个年会时，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洛甫、朱德都参加了。到会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有何思敬、艾思奇、郭化若、和培元、周扬、陈伯达、杨松、张仲实等不少人。在我的印象中有三、四十人，后来听说到会的有五十余人。是何思敬介绍我参加这个新哲学会的。这是我参加延安新哲学会的第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许以后这个会就没有活动过）。

引毛泽东大笑的原因是，延安新哲学会的重要负责人（我不知道他的职务名称）何思敬致年会开幕词时，一开头便讲：在这个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研究会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这成绩首先表现在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写了《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那样的著作。

他一讲，大家就笑开了，他越是一本正经，大家也就越觉得可笑。毛泽东也笑得直不起腰来。当时我脑子里闪了一下，领袖也可以这么笑吗？再一转念，领袖也是人，为什么不能同常人一样自由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呢？

大家都笑，只有两个人不笑。

一个是何思敬。大家那么笑，他有点发呆，似乎他还没有明白为什么大家笑，为什么毛泽东也笑。他还是照着他准备的稿子讲下去。

还有一个是艾思奇。他预定在何思敬致开幕词之后作会务报告。也许在他的“会务报告”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何的开幕词讲稿大概他也看过，他也笑不出来。后来我慢慢地熟悉了艾思奇的性格，他平常也偏于严肃不常笑。

当时，我也是跟着大家笑得很厉害的人中的一个。建国后，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常常遇到要我写理论工作总结这样的事情，也就常常遇到应不应该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同志在理论上的贡献写到总结里去的问题。我常常为这个问题左右为难。在我有了这样的工作经历之后，当时我也许就笑不出来了。

延安的纬度虽然比北京低两度，夏至的白昼还是很长的。这次新哲学会下午 2 点多钟开始，散会时已经 7 点左右了，天还没有黑。会后聚餐，聚餐的地点就是文化沟口才开张的“胜利食堂”。50 余人如果都去，就得五圆桌，胜利食堂似乎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吃饭的人只有两、三桌。毛泽东也去了。一就座，我发现我同毛泽东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而且我紧靠着他，在他的左首。那次入座完全是随意的。没有人做什么安排。

在延安吃饭，一般干部都是自备两个大碗：一碗盛米饭，一碗盛菜，并且在胸前左侧平常插自来水笔的地方，插一支勺，那时，即便有很少数人吃小灶饭，也只是比一般干部好一些，两菜一汤而已。因此到馆子吃饭，自然是最高档次了。不过“胜利食堂”的烹饪水平只相当于今天北京街头的小饭馆的水平，有一点特色的是，在那里有一道甜食，那是用鸡蛋、面粉、白糖和食油制作出来的，吃起来一不粘碗、二不粘筷。三不粘嘴，延安人叫它“三不粘”。我看那天毛泽东的胃口也很不错。

坐得那么近，说话就很方便。他详细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学历、专业，是否党员，在延安哪个单位工作等等，并且跟我讨论哲学问题。

访问人：在这次“会面”中，你们谈了些什么？

于光远：在那天的会议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认为当时的抗战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进入了相持阶段，而只能说是进入了走向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我在发言中讲了事物发展有可能有过渡的形态、过渡的时期的一般哲学上的道理。我的这篇话引起与会同志的注意。因为1939年冬天，党中央已经说进入了相持阶段，毛泽东也以《相持阶段中的形势和任务》这样的题目在1940年2月发表过文章。因为是学术讨论，我还是讲了自己的看法。我讲了量变引起质变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复杂情况，我讲了过渡的问题，也举了一些自然界的例子。我讲这样的话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与会的人除何思敬外，别的人大概都不认识我。在我发言时，毛泽东也很注意我。在餐桌上毛泽东就同我继续讨论关于“过渡”的哲学问题。我讲了一些哲学家既要学社会科学，也要学自然科学的道理。这次餐桌上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向他交了一份党员登记表，也可以说是接受了他一次哲学口试。对如何看这个相持阶段问题，毛泽东没有表示他对我的看法的意见，我自己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之后，也没有再思考过这个问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需要作更加认真的考虑，看来毛泽东对一个只有25岁的青年也就不那么严格要求了。

到过延安的青年成千上万，能够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谈话的人不会多。我得到这样的机遇，真是“三生有幸。”

1992年7月23日于北京

访杨奎松——

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杨奎松

杨奎松，祖籍四川重庆，1953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著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等，还有《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等几部资料集，发表论文数十篇。

他是我们访谈的年轻学者之一，不苟言笑，思想比较活跃，看了下面的谈话，就可以一窥他在研究上的风格。

访问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个命题的提出，对于中国革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最先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大体上经历了哪些阶段，有哪些困难和曲折？

杨奎松：中国化的基本定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严格他说，这种结合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的，从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到中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人们最初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罢了，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都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任何从事中国革命的人，在实际工作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的。这里的关键主要是能不能自觉的去认识它和解决它。从苏联来讲，他认为他是各国革命的中心，只有他才能对革命做出说明、进行决策和指导。从最初的中共来讲，也认为自己必须向苏联学习，才能得到理论上的提高，才能在经验上和政治上得到指导，同时中国革命也需要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从世界革命的高度来考察和解决问题。但是在具体革命过程中，来自苏联的理论、经验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确实还总在出问题，因此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党自己，事实上都不能不注意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访问人：尽管大家感到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是，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杨奎松：首先要解决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即能不能和敢不敢独立自主地认识问题，否则就无法面对这种特殊性，就难以提出适合于这种特殊性的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这也是由当时的客观历史情况决定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是上下级关系，中共作为下级支部，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不管你对共产国际有怎样的看法，有什么意见，都必须执行。这样就制约了或者说限制了中共独立思考的条件。

访问人：解决了独立自主问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中国化了呢？

杨奎松：不是的。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即是否真正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敢不敢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你纵然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如果你不能立足中国革命实际，特别是不能从实际出发来提出不同于前人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即使没有苏联人指手划脚，结果你还是摆脱不了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这个问题也必须解决才行。

访问人：这么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独立自主的

思想路线，一是怎么立足于中国实际的问题。相对来讲，哪一个问题解决起来更容易些呢？

杨奎松：应该说前一个问题容易些。1942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取得了独立自主，可以说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尽管解决了，实际上只是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目的。因为中国革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是说确立了这条思想路线，就一定不存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了。理论联系实际，其实有很复杂的内容，不是说你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实际当中来了，你就理论联系实际了。重要的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理论能够适合于中国的民族特点、社会特点，能够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需要，即使之中国化，据此制定出适合于中国特点的方针和步骤，规定出适合于中国实际需要的革命目标和策略。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问题。什么时候结合好了，中国化了，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反之，就受挫折。40年代以后，之所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仍在作怪，就说明了这一点。不是打倒了一个王明，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个问题就完全地永远地解决了。实际解决这个问题还很难。

毛泽东还不很自信

访问人：你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很赞成。那么，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杨奎松：我想，大体可分两个阶段。1940年以前基本属于探索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确立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是很困难的，说起来也比较复杂。一般的说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就一直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了。但实际上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彻底摆脱国际的束缚，共产国际始终在政治路线上，包括在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对中共起指导作用，像统战策略的规定，具体的阶级政策变化，甚至像取消苏维埃、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都是在国际的指导下解决的。跟过去几乎没什么两样。不同的只是有一段失去了联系，后来电讯联系建立起来了，或人派来了，但没有国际代表驻在中共中央，联络、指导不那么灵便了。

访问人：1940年以前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意识应该说已经有了。

杨奎松：是有了，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并不等于就完全解决了独立自主的问题。比如，按照一般的说法，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已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日战争的策略方针，包括统一战线中的“防人之心”等等。但由于王明的到来，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这些问题一下子推翻了。会上毛泽东和王明发生了冲突，不同意国际的方针，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会议没有作出决议。这是现在一般的表述。

我认为，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从会议本身看，所以没有作决议，不是因为毛泽东抵制了会议，而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的会议记录写得很清楚，“决议”由“王明起草”，但是会后王明走了，“决议”也就未写。所以1938年3月会议时，王明说，很遗憾，当时没有起草那个“决议”，要是搞个“决议”就好了。这说明“决议”不是因为受到抵制没有起草，而是王明本人没有写。

访问人：那么您是否认为，12月会议上毛泽东和王明的意见就是一致的呢？

杨奎松：我不这样认为。王明贯彻的国际指示和洛川会议的精神不一样，

所以会议上不免产生分歧，但因为他打的旗号是国际和斯大林的，是主张全力以赴去抗日的，所以许多与会者一时不能分清对错。比如洛甫，洛川会议的方针是他和毛泽东等确立的。但他在发言时，开始还肯定洛川会议的方针，王明传达了国际的意见之后，他立即就表示赞同了。就毛泽东说来，在谁吸引谁的问题，军事指挥的策略问题上，他有些不同看法。但是从发言看，毛泽东对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是同意的。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这个口号，毛泽东也是赞成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真的能够争取到共同领导，有什么不好？要知道，国共在此之前的合作谈判中，共产党一直是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或指导的。真能争取到共同领导，自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因此在以后的实践中，毛泽东基本上是按照 12 月会议的方针做的。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注意，就是不能把毛泽东神化。因为抗日战争是个新问题，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是个新问题，中共第一次同时面临两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是蒋介石。显然，和国民党联合，并不是因为双方不再是敌人了，而是因为同时跟两个敌人作战是做不到的。因此，你既然跟你过去的敌人联合，甚至不能不承认国民党的“实力领导地位”，在具体实行时，就不能不考虑到一切可能性，不能不为自己着想。为此就要提出新的策略。而这个新的策略既要考虑到如何确保自身的利益，并且力争发展壮大，又要考虑到如何适应抗日的需要，如何不因自身发展而破裂统一战线，这是极其复杂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搞“左”了，统一战线要破裂，共产党难以生存，搞右了，自身利益也难免要受损失，并失去可能发展机会。所以说，这对所有人都是十分重大的新问题。当时的毛泽东就认为只有我的东西最成熟，你们的东西和共产国际的都不成熟？我觉得，这种看法起码从一般逻辑来讲不合情理。毛泽东当时在党内还没有后来那种一言九鼎的地位，集体领导还是主要的，毛泽东就完全不相信多数同志的看法？应当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个探索过程。共产国际毕竟比他高一头，斯大林那个时候在毛泽东心目中恐怕也还是有很高的地位，况且后者又是站在世界革命，站在整个国际大气候、大政治环境下来考虑问题的。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长期生活在战争环境和乡村中，对外部世界还不是十分了解，说毛泽东当时就断定自己的办法最适合于新的形势，恐怕说不过去。毛泽东当时即使有看法，多半也只能是将信将疑。从客观事实来看，毛泽东在国际提出意见后，也是一直试图按国际的方针去做的，只要看一看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为努力和国民党搞好关系所提出的各种组织合作的办法，和他这时对国民党的高度评价，就可以知道毛泽东在执行国际的指示方面究竟是不是认真的。这时季米特洛夫之所以支持毛泽东当中共领袖，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注意到这一段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按着共产国际的方针去做的，基本上是正确的，相信毛泽东是维护国际路线的。当然这里也包括其他几个因素，比如：国际对当时事实上担任总书记工作的洛甫不太信任，而毛泽东在国际的威信很高。另外王明回来后，制造了一些麻烦，弄的中央书记处无法工作，而王明在国际的后台米夫又在苏联的肃反中成了阶下囚，致使王明在国际的地位一落千丈，等等。

访问人：您的意思是说，毛泽东之所以不能摆脱国际的制约，一是我们党内许多人还迷信国际，二是毛泽东本人也不十分自信。我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虽然努力贯彻国际精神，但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

杨奎松：这就是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不同点，也是他的高明之处。但这种不同和独到主要表现在哪儿呢？它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共产党的利益看得非常重，他始终是站在中国革命利益一边考虑问题。怎样才能确保革命利益不受损失并得到发展，是他考虑问题的基点。毛泽东在和国民党合作时，一再强调“防人之心不可无”，为的就是要千方百计保住共产党当时那点儿实力，以作为将来发展的基础。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一直非常强烈。

访问人：当时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的确非常复杂，能否把握好不容易。

杨奎松：是的。毛泽东什么时候感觉到他过去的看法是对的呢？应该说是在1939年以后。因为那以后国民党开始搞限共反共，千方百计想把共产党挤出华北，两党间的军事政治磨擦日益加剧，无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他这时还是坚持不破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第一，亲爱第一，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只是在抗日的前提下，你不能侵犯我，你若是打我，我就打你。然而只要“礼尚往来”，两方的争执就不可能消除、或平息下来，只会不断地激化。这个变化也涉及到当时国际的意见。1939年5月以后，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说中国有出现东方慕尼黑的可能性，中共要提高警惕。甚至说，国民党的投降就是反共，反共就是投降。我们想，这个指示是会激励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斗争态度呢？还是会削弱毛泽东的斗争态度呢？当然只能是激励。正是从这以后，毛泽东很鲜明地主张要和国民党斗争。1939年8月以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苏联和德国签订了苏德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德暂时曾站在了一起，也说明国际整个大的统一战线的格局变了，不再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了，国际转而又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这在毛泽东看来，自然更清楚地表明了同国民党斗争是合理的。所以，1940年，毛泽东开始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过去毛泽东还是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现在不一样了，是无产阶级准备代替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发展前途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过去说的三民主义共和国是资产阶级领导，共产党参加，如今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内容完全不同了。这样一来，中共对国民党的认识也就相对地发生了变化，开始否定蒋介石了，过去把蒋介石算做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把蒋介石算做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大资产阶级是要被打倒的。结果路线、方针、策略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人更难以向国民党妥协了。可是，想不到国共之间的磨擦只能是加强，而不是削弱。这样的态度和国际的方针又不同了，国际希望你无论怎样，不要损害苏联在东方的利益，千万不要把蒋介石逼到日本那边去，这是最主要的。所以1940年8月，苏联对德，对英美的态度再度发生变化以后，它就很难接受中共与蒋介石对抗这个事实了。但这个时候中共却没有变，不仅没有变，而且因为蒋介石出现反共高潮，毛泽东高度紧张，不断地怀疑蒋介石的反共有投降的背景、国际的背景。今天觉得蒋介石要投降德日，明天觉得要倒向英美，来来回回的就是定不下来，搞不准蒋究竟要往哪边倒。但不管蒋介石往哪边倒，毛泽东有一个态度，蒋介石肯定要打共产党，反共就是投降嘛！所以他一直想对策，是进攻，还是防守。到了11月，毛泽东没办法了，估计蒋肯定倒向德日，他给季米特洛夫打电报，要求苏联支持，同意中共派大兵过长江，打到四川，打到蒋介石的背后去，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方针。季米特洛夫几次

回电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没有根据，也太冒险，政治上大不利。国际和中共的认识就此发生了冲突。

访问人：对整个国际形势，对统一战线的估计，特别是对蒋介石集团的估计，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敏感地认识到，国际是不同意他的。

杨奎松：问题在于结果，是你对了还是你错了，皖南事变的发生，毛泽东认为他对了。这是最主要的。毛泽东认为我当时估计到了，结果你不同意，结果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这件事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

访问人：毛泽东认为他对了，国际错了，这样的电报有吗？

杨奎松：没有这样的电报，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后来的讲话和电报里都有过这样的意思。他在一份电报中说，我们几个月来和远方几经反复，始终意见分歧。毛泽东给叶剑英的电报还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攻，应该对国民党进行坚决反击，要求国际对蒋再也不要给予援助，但进攻的最大障碍就是苏联不支持。所以毛泽东认为国际当初的估计不正确。当然后来毛泽东承认自己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也有不成熟的地方，以后要加强研究。

毛泽东成熟了

访问人：这件事的发生，预示着什么呢？

杨奎松：它导致了两大问题。一个是中共对国际的看法产生了变化，毛泽东开始感到自己成熟了，可以独立自主了，特别是意识到国际正在成为自己独立自主的障碍与威胁。另一个问题，从 1937 年以来，中国党一直想和国民党搞好关系，结果终于证明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说，证明国际的方针是不成功的，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时的观点是有预见性的，对的。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自己的尖锐对抗的态度是对的。尽管国际不同意军事上这样做，但是毛泽东还是坚持在政治上这样做了。做的结果，对了。国民党的气焰确实被压下去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下决心在全党整风，一是搞臭党内的教条主义，一是解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认为时机成熟了。1937 年的时候，我相信毛泽东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是不是成熟了，他的策略是不是完全正确，没有检验，没有任何实际的东西来证明。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觉得自己的策略是正确的。

因此我认为，只是到 1941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才真正开始自觉地去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时候提毛泽东思想，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在理论上，文字表述上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首先解决的其实主要是一个民族化、中国化的形式问题，因为当时要真正做到独立自主，理论的形式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整风的直接目的和结果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七大”把它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具体到理论怎么结合实际则是很复杂的问题。如理论怎样完善，怎么去进一步充实，如何适合于中国实际，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化的理论形式树立起来了，独立自主的问题自然就容易了，不至于什么都完全按着苏联的方式去做了。从实践来讲，自 1941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是完完全全按着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制定的方针去做的，不管国际同意不同意，它都这么做了。做了以后，一般地来看是成功的，1949 年的胜利最能说明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

毛泽东的特色

访问人：通过您对这段党史的研究，您认为毛泽东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杨奎松：我认为毛泽东的最大特色，就是务实与浪漫相结合。毛泽东通常非常务实，特别是在自己力量处于劣势时，他考虑问题首先是如何保存自己。比如，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的“打不赢就走”，长征后期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抗战初期提出“山地游击战”方针，等等，都表现出毛在关键时刻很务实。上井冈山就是个好例子，当时的暴动政策要求的是进攻，反对退却。要按进攻路线，你就要打下去，不管失败还是怎样。可毛泽东务实，一看不行，拉起队伍就走，赶快上山，先保存实力再说，而当时的大多数暴动者，却照中央和国际代表的进攻路线硬干，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确实和别人有不同的地方。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往往很富于幻想，很有冒险精神。对毛泽东来说，别的领导人不敢做、不敢想的东西，他往往很浪漫，很大胆，不怕打破坛坛罐罐，常常出奇制胜。在指挥解放战争时，这样的例子很多，像开始时主张夺长春、守四平、指挥刘邓、粟裕等在关内大打，后来的辽沈、淮海几大战役，战役设想都极带冒险性，往往是一般军事指挥员所不敢想的，影响到以后，解放后的合作化运动、大跃进主张等等，也都有这种情况。当然，冒险是冒险，可在涉及具体问题时，一出现危险或眼看着要损害自己利益时，他往往又很谨慎，细致，策略的东西非常实际，经常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或反复征询意见。总之，一面是很浪漫，很豪放，很洒脱的诗人气质；一面是很谨慎、很实际，强调务实。

我觉得，我们今天来总结毛泽东和研究毛泽东，最应当注意到的和最应当学习的，就是他的独立思考和标新立异的精神。他这个人头脑里框框总是比别人少，很少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能为人先，能创造，没有这点精神，中国革命胜利不了。因此，我觉得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没有谁敢跟共产国际斗，洛甫也好，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好，谁也不敢。当时人们眼睛里，共产国际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又代表着马列主义，谁敢呀！有这个魄力的就是毛泽东，敢于丢开国际自己干，敢于在老祖宗面前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当然毛泽东并不是真的都丢开了，有事还得请示，但在思想深处是这样想的。共产党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到后来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已经成熟到可以摆脱斯大林这样的伟人。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但毛泽东有。有没有是不一样的。至于具体怎样结合；就很复杂了。也并不是所有的办法都是他的，其他人也有许多办法是成功的。可是他敢想敢做，给中共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想路线，大家按着他的思想来做，最后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如果中国变成东欧那样，任何东西都得控制在别人手里，自己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的方法，理论思想永远是人云亦云，就只好办了。所以毛泽东这一点不仅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对中华民族贡献都很大。

1992年3月15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访温济泽——

听毛主席的整风报告

温济泽

温济泽，1914年生于江苏淮阴。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解放日报》副刊主编、新华社口头广播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副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现仍担任《霍秋白文集》编辑组组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坐在对面的这位老人和蔼亲切，虽然年逾古稀，但他每天的工作、写作日程还是排得挺满。说起那些死难的先烈，他的声音有些哽咽。那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的一种激情。

要认清“左”倾路线的危害不容易

访问人：40年代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被称作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运动之后，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人们都知道的。您当时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对这段历史，今天回想起来，是不是还有很深的感受呢？

温济泽：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讲得比较全面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比较简明的是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两本书我看后比较满意，运动的经过的确就是那样的。今天，我不去介绍它的全过程了，只就从1942年2月开始的全党整风的第二阶段谈一谈。这个阶段是对全党影响最大的。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题目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隔了一个星期，8日，毛主席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篇报告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整风的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里把整顿学风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学风问题是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思想方法问题，是全党工作的态度和思想方法问题。我那时是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重点研究哲学。整风开始时，我还在做研究工作，但不久就被临时调到院党委去做宣教工作了。我对于延安的整风运动的确是感受很深的。

说到整风运动，根本的任务就是为了肃清王明“左”倾错误的残余影响。遵义会议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已经得到了纠正。瓦窑堡会议以后，他的“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也已得到了纠正。但是思想路线还没有彻底清算，它的影响还存在，还不可低估。整风就是为了对这种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有四年之久，影响不小，在这之前，还有个立三“左”倾错误。对这些错误的认识，需要时间，需要经过实际斗争的教育才能纠正，就我自己来说，对这一点也是深有体会的。

访问人：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吧？

温济泽：我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当时我在江苏淮阴中学读书。参加革命不久，就遭过一次被捕。经过这次被捕，我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出狱之后，就在1930年4月，参加了共青团。那一年我16岁。立三路

线时期，我在南京做地下工作，立三路线失败以后，结果来了个更“左”的王明路线。那时，我已在上海。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是怎么回事，错在哪里？这是我到延安整风时才慢慢懂得的。在当时，只是服从组织，盲目蛮干。那时我们怀着一股极高的热情，抱着要革命就不怕死的精神，向往着靠这样的献身精神来赢得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且以为不要很久革命就会成功的。当时我们那种幼稚的想法，那种不怕死的精神，那种准备悲壮牺牲的心情，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访问人：是很难想象。我们看到的都是书本、电影、电视里描绘的，已经人们加工了的。

温济泽：那时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什么路线错误，什么路线不对头。不但没有认识到，而且觉得干革命就应当是这样干的，胜利很快就会到来。1932年我接连被捕过两次，7月10日一次，7月17日又一次，都是星期天，中间只隔了一个星期，真是不要命地去干。

访问人：是在什么活动中被捕的？

温济泽：7月10日那一次，是在援助牛兰示威中被捕的。牛兰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被捕后，听说要解到上海就医，我们举行了要求释放牛兰的示威。7月17日那一次，是这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后，5月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为了反对这个协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群众团体，叫上海市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民联”）。我被推举为“民联”青年部部长。接着组成江苏省和全国“民联”筹备处，我又担任筹备处的青年部部长。当时我是复旦大学的团支部书记，我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活动。7月17日这一天，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开会。大会开始以前，特务包探已经布满会场周围。我是主席团成员，我向大会主席建议，把大会推迟，另外找地方改期再开。这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来了，改期也的确有困难。大会主席就决定，派三个代表到警察局去要求保护开会。结果，三个人去了就没回来，来的是大批警察和三辆大卡车，我们一起被捕的有88人。有13个人被判死刑，牺牲在雨花台。有70个人被判了徒刑。我看到自己非常要好的难友走向刑场，看到这么多人坐牢，心中很难过。但当时并不觉得“左”倾错误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对王明“左”倾错误危害的认识，就我来说，是到延安以后才懂得了一些。要说完全弄清楚，还是在整风运动中。

王明路线统治党中央4年之久，的确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给这条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划上了句号。到延安后，毛主席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理论著作，目的就在于继续清算王明路线在思想路线上的坏影响。1941年5月19日，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主观主义，提出要在全党树立理论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这个报告之后，马列学院改成中央研究院。我也从中央宣传部调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中央研究院开学的时候，毛主席做了一个报告，内容还是讲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毛主席讲了不少遍。但是，要真正理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个长的过程，需要从点点滴滴的实践中去认识。口头上会说了，也并不意味着思想上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我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才在认识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毛主席说出一句令人吃惊的话

访问人：1942年2月，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您去现场听了么？

温济泽：我去听了。当时我在中央研究院做哲学思想研究工作，对毛主席两个报告中提出的思想方法问题很注意，印象很深，感受很深。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听毛主席讲《整顿学风党风文风》，那时的中央党校礼堂没有座位，大家都是站着听的。我站在前面的一、二排，离主席很近，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心里非常高兴。那时人们对毛主席不能说有什么个人崇拜，但是爱戴毛主席的感情的确是根深厚的，毛主席开始讲为什么要整风，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但在讲到反对主观主义时，有一句话使我为之一惊。他说，你们当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过工作的吧？我一听，感到很亲切。谁知主席接着说，有些人比猪还笨。我一听，很惊讶。怎么回事？我们许多同志不要命地在斗争，怎么说比猪还笨？当时心里挺不舒服的。接着听主席继续说下去，他说，你们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明敌人已经有准备了，要逮捕人，你们还是不顾一切。主席又说，你们看，猪在猪圈里，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可你们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听主席这么一说，我觉得是有道理。回想那时，的确是这种情景，上级一个决定来了，我们就坚决执行，有人稍有犹豫，就会给扣上“动摇”之类的帽子，处分，甚至停止同他的联系。我们对这样“左”的领导并不满意，但又往往认为革命就应该这样嘛！听了毛主席这一番话，感触很深，使我信服。整风中，我才对王明“左”倾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

访问人：您当时是否知道这就是针对王明的？

温济泽：我认为主席讲这些，是在指出以王明为代表的整个“左”倾错误领导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我15岁参加革命，整风那年28岁，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我是都经历过的。对“左”倾的一些做法，在实践中，并非能够诚心诚意地接受，并非一点意见都没有，有时也感到行不通，但不懂得他们不对在哪里，也不知道正确的又应该怎么做，思想上是幼稚的。到延安后，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从根本上认识“左”倾路线危害，还是在整风运动中。认识真理，往往需要一个长过程，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访问人：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们过去没听说过，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没有，可能在修改的过程中删去了。

温济泽：在解放区出版的老本子上有过。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是亲耳听到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有份量，给我的感受也很深。接着，毛主席又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讲到理论与理论家，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很注意地在听的。

我想，我初到延安时，23岁，在陕北公学教了两三年书，又到中央研究院，讲的是哲学、社会科学概论，研究的也是哲学。这总算是做了理论工作吧？但接着听下去，毛主席说，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的实际问题。能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听了毛主席

的这番话，我心悦诚服了。我懂得了怎样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在整风运动中的一大收获。

访问人：是否可以说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

温济泽：确实是一个飞跃。整顿三风，除反对主观主义外，另外还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不清除这些，只反对主观主义，还是不彻底。

对于反对宗派主义，毛主席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中，指出了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他首先批评闹独立性。有些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接下来他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团结，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团结。再后面，毛主席又讲到要消灭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残余，说有些人自己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就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不尊重人家。他说假定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有四百五十万党员，也只占百分之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非党人员合作呢？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没有排斥他们的权利。这一点，我也很有感触。王明视中间派为最危险的。敌人，认为他们很反动，这真是莫名其妙。“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成立上海市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这个团体，按理说应该联合所有赞同抗日和愿意援助东北义勇军的人们，就连蔡廷锴这样坚决抗日的将领也应当成为联合对象，但当时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左”倾错误领导甚至对抗日的十九路军竟提出过要兵不要官的口号。我非常信服毛主席关于团结党外人士的这段讲话，因为没有千千万万的群众一起来斗争，光靠清一色的党、团员，革命能胜利吗？不团结包括国民党蒋介石在内的各个阶层，能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打败日本侵略者吗？听毛主席的讲话，的确有拨开迷雾见太阳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访问人：毛泽东在2月8日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其中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您当时对此有何感受？

温济泽：毛主席讲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二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三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党八股对党的工作的影响的确存在。写个报告，往往都是长篇大论，第一讲国际形势，第二讲国内形势，最后才讲到我们要做的事。王明作报告，几乎每次都把马列著作一大摞放在桌上，一边讲，一会儿翻这条，一会儿翻那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就是有的同志写文章，也老是引经据典，似乎拉得越长越有气派。毛主席批评了这种不好的文风。毛主席讲话时，当场还发了一个小册子，名叫《宣传指南》，里边有四篇文章，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摘下来的，讲列宁怎样做宣传；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第三篇是《鲁迅全集》中的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其中说到要“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等等；第四篇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对这个小册子中的这四篇文章，毛主席一一作了说明，要我们学习。这在今天的《毛泽东选集》里都能够看到，就不细说了。

“左”和右都不是实事求是

访问人：您对整风运动的成就怎样估价呢？

温济泽：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这是我有切身体会的。我在中央研究院参加整风。当时领导我们整风的是李维汉同志。他是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教育两个研究室主任，又是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纪念中央研究院建院四十周年的时候，李维汉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其中这样讲过：“延安整风是教育了两代人：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年一代（老干部）。那时延安除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五老外，一般老干部还是中年人。”“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他自己还说：“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估价。我的世界观也是在整风学习中得到根本性转变的。整风运动中我听了毛主席的这两个报告，还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认为，这些报告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是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整风运动使我们从理论上、思想上明确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清了三风不正的残余，使中国革命和党的工作真正地完全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但是全面地考察整风运动，也不能说它没有缺点。比如运动中写思想自传，有些单位比较好，大家写得比较全面，正面和反面，成绩和缺点，都写。还总结出发扬成绩和克服缺点的办法，使大家充满信心，努力前进。但有的单位就一味要求写缺点，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使他们感到自己毛病太多，感到压抑，感到丧气。另外，运动中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有时候有些事却仍违背这个精神。拿中央研究院讲，它是整风的试点单位，整风时是拿批判王实味开的头，最后把他错打成托派分子和国民党特务。王实味问题已经在1991年初完全正式平反了。我有一篇文章《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登在《炎黄春秋》1992年第1期上，这就是一个事例。

访问人：这篇文章我们都看到了，反响很大，很多报刊都转载了，海内外舆论界也很重视。

温济泽：“实事求是”很重要。王实味问题是一个错案，虽然主要的责任的确是康生，但从王实味被冤这件事本身也可以看出，整风运动中确实仍存在一些不实事求是的地方。王实味问题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得到澄清，本着的也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整风运动在1943年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审查干部是必要的，但在审干工作中，出现了严重偏差，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搞逼供信，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冤枉了很多的好同志。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在康生。后来周恩来同志提出意见，毛主席也发现了问题，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毛主席还主动承担了责任，亲自到一些单位，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整风运动在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结束。整风运动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无疑成绩是巨大的。

访问人：从整风运动开始至今天有50年了，整风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带来的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中国推向了历史性的大转折，走上改革之路。今天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又被人称之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50年前，50年后，在这个历史的纵向上一以贯之的是不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

温济泽：50年前的整风运动，对于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的确是整风运动中在全党树立起来的优良的思想作风。但要做到这四个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毛主席在晚年犯了错误，也是他老人家自己违背了这四个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致力于要恢复和发扬这种优良的思想作风。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想，也就是要我们真正学会“实事求是”。小平同志又指出，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和“左”，都不是实事求是。对于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他历次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坚决地贯彻。

1992年5月30日于北京木樨地

访张居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远至国外

张居华

张居华，1937年生，湖北襄阳人。196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副教授。任湖北省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主要从事马列文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美学的研究。有《思考与寻根——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新探》等著作。

这个题目，是受张老师参加1991年底中央文献研究室举办的毛泽东研究述评讨论会的论文的启发。这次系笔答。访问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中心问题，这对边区的文艺事业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些，那么，它对边区以外的文艺乃至中国现代文艺运动的发展走向有哪些影响？

张居华：这个问题很大、只能简要地谈谈看法。毛泽东在《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分析中国新文艺运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五四”运动至1942年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科学总结，第一次明确解决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的中心问题。从此，中国革命文艺从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讲话》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讲话》着重论述的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这一中心思想，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事业，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它把边区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史无前例的光辉的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边区的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纷纷走与人民大众、首先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并注意从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一批新的文艺作品先后问世。这批作品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题材新，主题新，人物新；二是形式新，风格新，因而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比如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荷花淀》、《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戏剧《白毛女》、《刘胡兰》以及许多报告文学、散文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艺术品等，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和严峻生活，有力促进了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现在看来，虽说它们当中有的作品显得艺术上不那么成熟，不那么精致，也不那么理想，但不可低估它们对当时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影响，对主要满足当时边区人民群众艺术需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且，这些作品以中国文艺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出现，为建国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奠定了良好基础。

正如你们所说的，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些，那么，就可以看出，《讲话》着重论述的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的中心思想，不仅对边区的文艺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对边区以外的国统区进步文艺运动，也产生过相当大的积极影响。

1943年10月19日《讲话》在延安正式全文发表之后，紧接着，同年1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着重论述了

《讲话》的中心思想。1945年《新华日报》又公开出版了《讲话》全文。随后，我们党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组织进步文艺工作者学习《讲话》，使其文艺思想逐渐在一些进步作家、理论家中得到赞同和遵循。从当时革命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在基本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因为从国统区的文艺运动的主流来看，从《讲话》到新中国成立的八年中，基本上是遵循着《讲话》提出的文艺方向前进的，大批作家向人民靠近，投身于民主斗争的行列，写出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文艺作品，对革命斗争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比如，讽刺喜剧《升官图》，讽刺诗集《马凡陀的山歌》，讽刺小说《围城》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家，不仅受到《讲话》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受到来自边区反映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作品的启示和影响。

至于问起《讲话》对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走向的影响，我看应该作肯定性的回答。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一开始就遇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革命先驱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对此进行了长期探索。这使从“五四”运动到1942年的中国现代文艺运动，有力配合了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它的最主要的贡献。《讲话》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它承前启后，既是对“五四”运动至1942年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使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总的来看，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发展走向，特别是1942年以后，与《讲话》的宗旨是一致的。建国以后，来自边区的一批极有生气的作家和原国统区的大批作家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共同遵循《讲话》提出的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的中心思想，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因而结出丰硕的成果，为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辉煌成绩。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举不胜举。由此可见，《讲话》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发展走向，影响之大，是举世罕见的。

访问人：《讲话》的影响远至国外吗？

张居华：是的。《讲话》早已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在世界六大洲广为传播，其影响早已远至国外。德国戏剧家沃尔夫教授说过，《讲话》是一本极好的书，在德国作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1949年主编的《人民与艺术》月刊，在封面上引录《讲话》的名言，作为创办这一杂志的宗旨。这段名言是：“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访问人：那么国外现在对《讲话》研究的侧重点或特点是什么？您对此怎样评价？

张居华：国外对《讲话》研究主要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其研究的侧重点或特点，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首先，他们从革命文艺或进步文艺的发展方向、道路、路线和方针、政策方面对《讲话》进行肯定性研究和评价。1946年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曾连续组织召开《讲话》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它“解决了人民文艺建设的基本方向问题”。1972年5月，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纪念文章说，《讲话》“指明了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罗马尼亚作协负责人说，《讲话》指出的“文艺道路是光辉的”。古巴著名作家在《波希米亚》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从而找到了这条指导路线”。日本一位文艺理论家说，《讲话》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柏林《世界论坛》认为：“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分析目前德国形势并从而找出有关文艺政策

方面的特点，有着极大的帮助。”这可以说是国外研究《讲话》的一个侧重点，或者说是其内容的突出特点。

其次，国外从《讲话》的逻辑体系和它论述的美学原理，其中包括文艺的审美特性以及作家艺术家创作体验等，进行了肯定性研究并作出高层次理论概括。比如一位日本学者，在其日译本的后记中说，《讲话》“好像不成体系，……但实际上这篇论文的结构是非常严整的，既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他还说，《讲话》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苏联编写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一书也认为，《讲话》“对美学的一般哲学基础和社会主义艺术的建设问题作了巨大的贡献”。古巴《今日报》发表评论《讲话》的文章认为，“毛泽东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讲话，实际上是科学唯物主义美学观点的极其光辉的概括”，因此“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相信它的“这些观点是持久不变的”。斯里兰卡《爱国者》周刊发表文章认为，《讲话》是文学艺术的“不朽的宝库”。这些可以说是国外研究《讲话》的另一个侧重点，或者说是其内容的突出特点。

以上国外对《讲话》研究的两个侧重点或特点，不是互相孤立的，而常常是不同程度的结合。就是说，虽然在不同的研究文章中各有其侧重点，但总的来看，许多文章兼顾了这两个方面，使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道路、方针、政策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作家艺术家对创作对象的审美体验、创造结合起来。从这样的理论高度对《讲话》进行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极其可贵的。

访问人：《讲话》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那么，怎样理解这个体系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和探讨，它对文艺审美本性是不是作了必要的论述呢？

张居华：《讲话》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它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特色，因此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个科学体系，主要是由文艺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理论框架建构的。这里所说的“一般”与“特殊”是相对而言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分离的。简单他讲，揭示文艺与其他各种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共性的规律，就是文艺的一般规律；而揭示文艺不同于其他各种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个性的规律，便是文艺的特殊规律。《讲话》不仅对文艺的社会本质、社会作用和政治方向等一般规律，作了充分的论述，而且对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反映和创造，对文艺的欣赏和批评，对文艺遗产的“推陈出新”等特殊规律，也作了精辟的阐述。《讲话》的内容，涉及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文艺理论问题，其中包括文艺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比较严密的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忽视或否认《讲话》论述了文艺的特殊规律，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至于说《讲话》对文艺审美本性是否作了必要的论述，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如前所说，《讲话》的“中心”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问题，然而其中文艺审美反映和创造的理论“核心”，则是文艺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人民大众首先与工农兵生活的关系。这在《讲话》中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极为重视作家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了解、熟悉、感受和体验，强调生活美向艺术美的转化和质变，而且也很重视一般艺术美向艺术审美反映的理想境界——典型美升华，强调艺术典型美更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因此，我认为在《讲话》里，对生活美、

艺术美、典型美的精辟论述中，以及对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尽可能完美统一的批评原则的辩证论述中，都极为重视文艺的审美本性，而且十分强调由生活美转化、升华为艺术美、典型美过程中，审美主体在客体对象基础上的艺术审美创造性，也就是强调发挥作家艺术家“头脑”的审美反映和创造性。诚然，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人物，不可能像文艺专门家那样对文艺的审美本性作细致、深层的论证，但同时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著名的诗人，对生活美、艺术美、典型美以及文艺批评的宏观审视和精辟的理论概括，有时却是文艺专门家们所难干企及的。

访李君如——

毛泽东强调人的改造

李君如

李君如，1947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并任科研处处长、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和哲学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主任等职。主要研究毛泽东思想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课题。有《观念更新论》、《毛泽东的哲学透视》（合作）等著作与译著。

看他的著作《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在前。后来在1991年底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毛泽东研究述评讨论会的休息室里，第一次见他“侃大山”。由于京沪之间相隔数千里，这次只能以笔一问一答了。

访问人：您在《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一书中认为，毛泽东的建国思想集中体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为什么这样说？照你看来，毛泽东建国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精华何在？李君如：建国的关键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解决一个“国体”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段在国家中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论人民民主专政》从理论上集中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国体问题，因而说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建国思想。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论人民民主专政》不是即兴之作，而是凝结了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到《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关于建国问题的精彩思想，吸取了各个革命发展阶段中从工农民主政权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实践中的丰富经验，所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句十分精辟而又深刻的话：“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里说的“主要纲领”，就是毛泽东的建国总纲或建国纲领。

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精华就体现在“结合”上。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这种新型的国家，一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二是以工农联盟为其政治基础的；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毛泽东坚持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同时强调了两点：其一，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里，人民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新政权的政治基础不仅包括工农联盟，而且包括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其二，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里，专政的对象不是整个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专政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是极少数反动派。所以，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与其相比，“专政面”大为缩小，“民主面”大为扩展。由此可见，这是毛泽东在运用“结合”论时获得的非常精彩的理论成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精华，就在这里。

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结构方面与功能方面两大类。在毛泽东建国思想中，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结构包括：（1）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地位；（2）工农联盟；（3）人民民主统一战线；（4）对反动派的专政机构。其功能主要是：（1）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的需要；（2）对人民实行民主；（3）对反对派实行专政，并努力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4）维护国家的独立与统一；（5）保卫国家的安全并维护世界和平。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建国思想要注意其丰富内容，有人认为毛泽东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经济建设，只能说明他们对毛泽东建国思想理解很肤浅，不懂得这个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国思想。

访问人：从毛泽东建国思想中体现出了哪些“中国特色”呢？

李君如：我想，先从方法论讲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得益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在接受与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难题，即由于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阶级对立不像资本主义那样“简单化”，而且众多的阶级的外部差异不很显著，其政治组合也极其复杂。因此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敌我分析。阶级分析主要是从经济出发，通过对各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的分析，来区分其阶级属性和阶级地位；敌我分析方法则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再从政治出发，区分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角色。同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前者是“人民”，后者是“敌人”，即在于应用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方法论上的特点，在科学研究中，必定会给理论研究的成果打上“特色”的印记。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毛泽东建国思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国思想，其“特色”主要体现在：

第一，强调“人民”。我在《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一书中分析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时，引了一位英国学者的话，他说“毛超出列宁关于专政只是一个革命阶级的专政的论断，他想强调的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性质。”我是同意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的。毛泽东比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人民”这一范畴。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各个阶级的集合，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具体他讲，他认为建国时的中国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但不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而是人民的政权。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也列于这一政权的主体之列。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科学论断，因而具有“中国特色”这一“特色”表现在制度上，就是新中国的政体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党制度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与合作制度，并相应地设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政治组织。因此我常讲，这一套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第二，强调“民族”。毛泽东区分敌我所用的政治标准，是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标准。什么是“人民”这一阶级的集合所共同依赖的政治利益呢？主要是两条：一是拥护或参加革命，二是爱国。而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两条是相通的，而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近代中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其中，封建主义已经与帝国主义紧密勾结，与此相联系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兼有反动与卖

国的双重特征。所以中国革命虽然称为“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它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汇的革命。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把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作为一个基本的内容，是其重要特点。我在《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一书中引用了毛泽东所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指出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三年解放战争和三十年人民革命的成果，而且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历次斗争”的硕果。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应该是人民享有国家主权、各民族团结与平等的统一的新中国。这就是说，中华民族是统一的整体，并在国际上独立的；同时，中华民族内部的各个民族之间是平等的、团结的。与此相应，新中国建立前后提出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以及后来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等等，都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三，强调人的改造与发展。毛泽东的建国思想，不是一种静态的建国纲领，而是一种动态的建国构想。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的改造与发展。毛泽东是在阶级分析与敌我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思想的，但他并不认为敌人就是绝对的敌人，他们也是可以改造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两处提到“施仁政”，一处说对人民要施仁政，另一处说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在对敌人进行专政的时候，强调消灭其阶级，改造其成为新人，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人民”也要通过“自我教育”来改造自己。当然，这同时“敌人”的改造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造。但由于中国的“人民”中包括了大量的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对小生产者的“教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工人阶级在中国也因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也要自觉地克服小生产思想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即建国思想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这两个要求外，其深层包括更为深刻的基本要求：人的改造与发展。这一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是毛泽东建国思想的一大特色。

访问人：毛泽东建国思想是否付诸实施了？您怎样看毛泽东建国思想与后来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所走的弯路这之间的距离？

李君如：很难用“付诸实施”或“没付诸实施”来回答。我想，只能说这个建国思想在毛泽东那里没有贯彻始终。从1949年到1956年，就总体而言，毛泽东的建国思想贯彻得较好。尤其是从1949年开国到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短短的五年时间，中共中央在毛泽东领导下做了十件大事，来实施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国思想。这十件大事包括：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建立地方民主制度；建立基层国营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工会建设；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废除束缚个性解放的封建婚姻制度；试行劳动保险制度；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举行普选和召开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及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一些缺点，主要是工作中的问题。但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我们在贯彻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时常常出现严重的失误，包括：混淆敌我界限，忽视对小生产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离开物质利益原则片面地强调人的精神的作用。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偏离了人民民主专

政国家的首要任务或中心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的思想。当然，1957年以后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毛泽东建国思想没有贯彻好。比如在坚持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方面，毛泽东与党中央在任何时候没有动摇过，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也有一些正确的做法。所以，我们只能讲毛泽东建国思想没有贯彻始终，因而在思想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距离。

访问人：毛泽东的建国思想存在缺陷吗？

李君如：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把上面的问题深化了，上面我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毛泽东的建国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贯彻始终。如果再深入地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建国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能贯彻始终呢？

除了工作指导上的问题外，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本身有没有不足呢？这个问题我在写《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时，曾经困扰着我。

我研究的结论是：毛泽东的建国思想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制度化、法律化的东西，即：法治精神稀薄。如前所述“人民”与“敌人”是在阶级分析与敌我分析的基础之上区分出来的。敌我分析不仅要看各个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且要看其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而政治是个极富变动性的东西，所以毛泽东常讲“人民”与“敌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阶级组合。这样，就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的最基本的范畴——“人民”与“敌人”，是一对又确定又不确定的范畴。它在民主革命时期，相对他讲，因两军对阵而比较好确定；在社会主义时期则不易确定。我们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主要表现为把人民内部矛盾混淆为敌我矛盾，即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这同“人民”与“敌人”在社会主义时期难以把握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法制来解决问题，即不是凭任何个人的判断，而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来对此做出权威的判断。可是，我们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不仅法制不健全，而且有法不依，甚至听凭领导者凌驾于党的集体之上而不能约束他，破坏了人民民主专政。又比如，对民主的理解，我们往往把它等同于群众运动。这在民主革命时期，比较适合于同国民党的专制主义作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群众运动的负面影响就暴露出来了。一个小生产者人口众多的国家，小生产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会在群众运动中冲击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的秩序与纪律。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应看到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现在的任务应该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用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确定起来，依据制度与法律来“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可惜的是，在毛泽东的建国思想中，对此缺乏充分的认识，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几次发扬民主都出现挫折，不是领导判断错误，就是群众运动的自发倾向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

我感到，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问题，真正切中了时弊与毛泽东建国思想中的不足之处。所以，我们在谈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不应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应该看到这套制度本身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应该看到我们过去的不足在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缺乏制度化与法律化。加强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应在法制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应该用法治精神来完善毛泽东的建国思想。

访赵勇田—— 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

赵勇田

赵勇田，1925年6月生于河北安平。1938年投身革命，1939年1月参加八路军，曾先后担任排长、指导员、文化科长、解放军总参谋部文化部副部长。主要著述有：《抗美援朝战争纪实》、《板门店谈判》、《独脚虎将》、《小八路日记》等。

作为原总参文化部的副部长，他离休后一刻也没闲着。这几年又潜心抗美援朝史的研究，相继推出《抗美援朝战争纪实》、《板门店谈判》等著作。忙归忙，他对生活也很投入。

毛泽东难下决心

访问人：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40年了，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如何做出抗美援朝决策的？

赵勇田：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面临着难以下决心的选择。我们党领导28年的斗争，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刚刚取得政权，就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如果从1949年10月算起，到1950年6月，才有9个月的时间，如果算到1950年10月19日出兵，也才有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当时我们的新中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经过几十年的战乱，我们需要治理的是一个疮痍满目、百业凋零的国家，当时的状况，从几个方面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毛泽东难以下决心，难以选择。第一点，就是解放战争还处于尾声。到1950年春，大陆上的蒋介石国民党军虽然消灭了，但西藏和台湾还没有解放，同时还有大量的国民党的散兵和土匪，大约有40万，也有的说是50万，国内还有军事行动，总之战争还处于尾声。第二点，是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区土改要涉及三亿一千万人，这是一件大事。不仅是消灭封建势力，而且是解放生产力，在当时我们工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村生产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解放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就要实行土地改革。第三点，是抓紧恢复国民经济。革命胜利后在社会经济领域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广大农民要生产，工商业要发展，社会秩序要稳定，这一切都需要政治指导的正确，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是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的，但不少人是在观望，看看你们共产党能不能搞建设，能不能站住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于1950年6月6日到9日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接着又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为贯彻这些精神，接着又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步骤和方法，都是为了治理战争创伤，改变和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所以，当时全党的心思都是在国内，搞好我们的建设。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是连着召开的。当时有的代表就在北京，还没有回去，6月25日就发生了朝鲜战争。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是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处理朝鲜战事的，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明下决心的难度。

访问人：对朝鲜爆发战争，毛泽东有没有预料？当时中下层干部有无反映？

赵勇田：据我接触的材料，可以说有预料又没有预料，所谓有预料，是

说早在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斯大林曾向毛泽东透露，金日成想用军事手段解决南方的问题。但哪一天，用什么形式解决，是毛泽东和中央所不知道的，这就是没有预料。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是很突然的，包括柴成文同志，据他回忆，他看到朝鲜战争《号外》，是他从西南军区调往北京路上在郑州车站看到的。中央军委调柴成文本是去东德工作，而他赴京后却改为出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说明，上面可能有些准备，中下层没有准备，甚至满脑子想的还是搞和平建设，想自己以后的发展。

慎重考虑后的抉择

访问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作了哪些部署？

赵勇田 6月25日朝鲜爆发战争后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并命令他的海空军给予李承晚以支持，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占领台湾，接着又操纵联合国，组织所谓联合国军，直接介入朝鲜内部事务。这些变化，就引起了我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1950年7月7日和7月10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国防会议，决定组建战略预备兵团——东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是以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为主组建的，还任命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因此第十三兵团就急促地从驻地河南向东北调动。组建这个兵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解放战争向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转变。8月以前，我们的准备基本上是面上的准备，但到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这就直接威胁着我们东北的安全，也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了。

到底怎么办？毛泽东有两种选择：一是守土护疆，就是在鸭绿江边上守着，守卫国土；一是直接出兵援助朝鲜人民。美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后，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越过了三八线。局势更加严峻。所以客观上事物的发展把新中国的领导入推上了处理国际战争的舞台。这个舞台不好上呀，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地理情况、人事情况都熟悉，而此时我们面对的是国际战争，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强国，当时敢跟美军抗衡的只有苏联和我们。所以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办？发展的结果又如何？毛泽东和党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现在我们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至少在10月2日就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这有电报为证，就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10月8日，正式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访问人：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是不是和朝鲜劳动党的请求有关系？

赵勇田，有关系，现在已经查到了金日成首相请求中国出兵的信件。过去史学界讲到此事时，只是笼统地写10月上旬，现在收藏在档案中金日成的信件，落款是10月1日，有中文，也有朝鲜文。现在我们为什么重视“请求”二字呢？因为不请求就出兵，这涉及两国主权问题，有了这个请求就比较好办了。所以在我和柴成文同志合写的《板门店谈判》一书里，有意识地出现两到三次“经两党商定”周恩来干什么，“经两国政府商定”彭德怀如何如何。这不仅为了师出有名，也是为了反映历史的真实。实际情况就是那样。

但是我认为，我们党和政府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定，是根据对国际形

势的判断，对战争的预测独立自主作出的，绝不是简单地由于一个“请求”就出了兵。

访问人：在出兵问题上，当时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你能不能说说这方面的问题？

赵勇田：这个问题我知道的不多，但从事后接触和了解到的情况，有几个方面可以说一说。一个是军队内，打了几十年仗，革命成功了，好不容易刚获得了和平，又要打仗，这个弯子不好转。这就如同搞体育运动会一样，运动会期间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可精神了，但比赛结束，一松懈下来，一点劲也没有。我们的解放战争刚刚打完，又要动员参战，的确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当时我就认识第五十军的副军长，五十军是起义部队，那时他就和我说，刚刚解放，他们部队里起义兵和俘虏兵占有相当一个比例，他流露出宁愿指挥这样的部队去打仗的情绪。他们不是怕打仗，当兵的嘛就是打仗的，常言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但他带这样的部队有顾虑，这是当时的实际反映。当然，我们的主力部队，工农成分多，政治素质好一些，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再一个是在政界，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影响经济建设，怕打败仗，打不赢怎么办？又怕打到北京来，怕北京刚解放又失掉，这样的担心是有的。从战场上下来的人都有体会，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我们部队从太行山上下来，到河北邯郸，就感到这个地方好，可不能丢掉，以后从晋冀鲁豫平原到了石家庄，觉得这里更好，是大城市啊，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又这么干净，可不能丢掉啊。所以那时为什么毛主席一再讲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就是针对人们这些思想来的。再一个是群众性的，我们的基本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跟共产党走、听党的话的，但群众中也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主要是恐美、羨美，恐美主要是在知识界和民主人士中。认为美国科技先进。恐美的面要宽一些，不少人觉得美国兵厉害，他们刚刚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担心志愿军打不赢。不然为什么花那么本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抗美援朝的教育运动，如果简单的话就用不着搞这么大的声势了。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这些问题集中在党内，尤其集中在中央决策层，也就出现了主张出兵和不主张出兵两种意见，我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属于决策过程中的争论和思考，这和作出决定之后再反对不是一回事。

林彪不愿带兵吗？

访问人：有些文章和一些回忆录讲，林彪是不赞成出兵的，毛主席点他的将，他不干，究竟怎么回事？

赵勇田：现在的说法不甚一致，究竟他到底怎么不干法，具体如何，毛主席什么时候征求他的意见，等等，都不太清楚，至少史料中记载的不清楚。但他不愿带兵是真的，他的行动也证明他不愿带兵，因为他去苏联了。

这里有个情况说一下，就是当时我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从朝鲜回来，写了一个《汇报提纲》给周总理，周总理让柴成文去向林彪汇报。这时是1950年9月初。为什么向林彪汇报，我猜测可能那时是让他带兵的。在柴向林汇报中，好像林已看过“提纲”了，就问了许多问题，如朝鲜的道路怎么样，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果打败了怎么着，打胜了怎么着等等。柴成文后来回忆，他当时觉得林彪在态度上有些不坚决，还产生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些变化的感觉，但他当时还没有产生愿不愿意带兵的感觉。这仅仅是一个侧面。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也说不好。但不管党内有什么意见，

毛主席一拍板，出兵的事情就定了，10月2日通知斯大林，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时调正在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回京，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以后就是10月25日赴朝作战部队打响第一次战役了。访问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这个重大举措，反映出毛泽东的伟大和魄力，其意义是什么？

赵勇田：我们翻开时间表可以看得很清楚，1950年10月24日，西南军区第十八军结束了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战役，就是昌都战役，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上就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中间没有间隔，历史的衔接就是这样紧。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种巧合，但对中国最高决策者来说，是他导演“戏”中的一步。

抗美援朝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局部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都有百万，除了原子弹之外，所有的现代化武器都使用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伟大和魄力，我觉得有三点：一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处理民族危亡的问题上高瞻远瞩。从调动第十三兵团到东北边防军的建立，以及出兵整个过程，应该说都是按照战略部署进行的，未雨绸缪，运筹帷幄。我记得那时，从9月初开始就动员机关干部炒小麦、炒玉米，当然是讲为了支援朝鲜，并没有讲是给志愿军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为战略家高瞻远瞩是非常重要的。二是战略家的胆量，在当时亚洲格局和世界格局的情况下，世界上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挑头，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敢于主动挑起这样重大的国际义务，这在一般情况下真是难于下决心的。三是全局在胸，这么大的一次战事，如果没有战略家的眼光是不可想象的，打赢这一仗就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威望，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不打这一仗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现在是看得很清楚了，若当时不出兵，美国人就在鸭绿江边，你怎么搞建设，小丰满水电站也搞不了，沈阳、大连等和内地的大工业也搞不了，上海、东南沿海也要受牵制。所以这一仗应该打，而且值得打。所以我感到毛主席在难以下决心，难以选择的情况下毅然决然选择出兵，是非常英明的，这也正是他才华横溢的写照。

出兵有百利

访问人：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40年了，它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什么，我们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

赵勇田：我和柴成文同志在写作《板门店谈判》一书过程中，采访和接触了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在国内统帅部工作的老师和将军们，如徐向前、聂荣臻、杨得志、洪学智、王平、李志民、李达、伍修权、杨成武、肖克、吕正操、社平、丁国钰、迟浩田、徐信、魏传统、华楠、刘志坚、史进前、李真、王政柱、彭清云、黄文明、高存信等，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精神，那就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和锻炼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自力更生，自强不息，通过参预国际战争。增强了巩固国防意识与应付未来战争的现代意识。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探讨了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意义，概括起来有四点：

一、认为毛泽东作出的抗美援朝决策是正确的。这些老将军们个人的经历不同，但对毛主席作出的抗美援朝决策，一致认为是应当的，正确的。就是出兵有百利，不出兵有百害。出兵虽有不可避免的伤亡，也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一些物质上的损失和负担，但用牺牲换来了祖国的安宁，这是非常值

得的。老将军们有的受了伤，身体上不仅带着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的弹片和伤痕，还带着抗美援朝的弹片，如彭清云老将军，抗日战争时失去了右臂，在志愿军任师政委，奋战在前线，身体力行，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前几年，社会上有人说什么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要了英雄主义，冒了一次大险；也有人在某些著作里专门寻找毛泽东与彭德怀往来电报中意见不一致的东西，按作者意愿扩大某一方面，以此说明毛泽东战略指挥上的失误。其实这些人幼稚得很，他根本不懂统帅与前线指挥官之间战略运筹的过程和关系。老将军们对这些议论也是嗤之以鼻的。

二、通过这场战争对全民族进行了一次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这场战争不仅挽救了一个民族的危亡，保卫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几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所一直奋斗的。当美军越过三八线直向鸭绿江边突击时，形势已经很危急了，有的说美军距江边有40公里，有的说有20公里，柴成文同志是驻朝大使馆政务参赞，他说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到了北部边城江界和满浦。如果朝鲜灭亡了，再恢复那是很困难的。我军一出兵，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第二次战役之后，美军就退回三八线以南。那时全国人民都很振奋。所以，抗美援朝对我们民族来讲，提高了全民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的精神。经历过抗美援朝的人，现在年纪小的也到了60岁左右，对这些人的成长和革命意志的保持以及作为社会中坚都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从40岁、50岁、直至60岁，对其支持着的社会基本意识，就是那时树立的。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如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张积慧等的事迹一直被人们传诵。

三、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一个和平环境。朝鲜战争中双方各调动百万大军，经过三年多的交战，最后终于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这个结局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当年参加过这场“马拉松”式谈判的柴成文同志有个说法，他认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和美国人基本上打了一个平手。美国没有达到他们占领全朝鲜的目的，我们也没有彻底把美国侵略军赶出朝鲜半岛，基本上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双方都有胜利，也都有失败。你强调你的胜利，我强调我的胜利。但对我们来说，这个结局是最好的，不要忘记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的大国，超过那个限度我看是不可能的。签字已经近40年了，有人讲，像板门店签字有效期为40年是不容易的，因为这40年给了我们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使我们有可能搞自己的事情。当然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那是另一个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有一个好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对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朝鲜战争停战签字以后，亚洲及至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世界两极发生了变化，冷战已经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更应该为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这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忘记昨天的战争，不要忘记为了祖国的安宁流血牺牲的先驱，要记住自己的责任。我曾遇到过在第五次战役中没有打好的那个师长的后代。他是怎么看他的长辈的呢？他认为他父亲仗没有打好受到处分没什么说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人民是通情达理，很有政治头脑的。很使我感动。我接触到的老将军们都认为要把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作风一代代传下去，把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传下去，发扬光大，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起来。特别是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十年规划，小平同志又

为我们规划了今后发展的蓝图，相信我们能把改革开放搞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那些在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人们的血不能白流。

访问人：现在板门店还有我们志愿军的代表吗？

赵勇田：有，现在板门店还有我们志愿军的代表处，全称叫“朝鲜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处”。1992年春天，杨尚昆主席去朝鲜访问，在陪同人员中就有一位田同志，他就是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委员。几十年来，它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的常设办事机构，与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机构共同“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与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访问人：朝鲜战争已经过去40多年了，后人探讨这场战争的题目很多，我们今天着重回顾涉及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决策的一些重要情况，这对我们研究、剖析这场令人难忘的战争是有益处的。

赵勇田：我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仅仅是起步，以上议论，只是个人的理解，以此抛砖引玉，获得教益。

1992年4月26日于北京花园路

访汪澍白——

建国后毛泽东的 文化观发生了变化

汪澍白

汪澍白，1923年生，湖南人。现为厦门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早期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可称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其它的著作还有《艰难的转型》等。

我们是在北京一次会议上巧遇汪教授的。采访过后，便熟悉起来。那时，他正在写他的新著《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微》。他从厦门来信说，天热，只得在靠海边的林荫下工作。

访问人：近几年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成为一个热门课题。但是，很多人对它并不甚清楚，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请谈谈您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究竟想告诉人们些什么？这对研究毛泽东有何意义？

汪澍白：文化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总和。毛泽东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文化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和文化性格，首先就因为毛泽东是中国文化的产物，离开了中国文化，就没有办法了解毛泽东；更谈不上研究毛泽东。另一方面，毛泽东是一代巨人，他的文化观及其演变对中国文化的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是推动；有时是阻滞）。尽管毛泽东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巨大的身影仍然覆盖在中国的大地上。他的思想、性格还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的现实生活。要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我们就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和超越毛泽东。否则，有可能让“死的拉住活的”，迈不开现代化的步伐。

访问人：毛泽东早期的文化观是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来融合中西文化，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色，从而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建国以后，您认为他的文化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说，恰恰是一种逆向选择。那么毛泽东的文化观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他的变化说明了什么？此外，文化观的变化和他以后的曲折演变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关系？

汪澍白：1949年革命胜利了。从1946年算起，用了3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非常之快，以至他对主观能动性估计得过高。原先根据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情，准备在胜利以后搞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到条件成熟时再转向社会主义。现在看到苏联把东欧一片解放了，东欧国家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希望走在前面，改变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伐。由于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而又缺乏自己的一套经验。所以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口号和照搬苏联模式的作法。幸好当时党的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党同群众的联系也是密切的。所以在50年代初期还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胜利。缺点在于急于求成，重破轻立，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过分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念念不忘批判资产阶级，像对《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胡风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把批判资产阶级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却放松了对传

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警惕，特别是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方面对反对个人崇拜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看出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弱点，他确实想另辟蹊径，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讲话，还提出双百方针，显示出一种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的势头。然而，当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响应号召认真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他又将“双百”的口号一变而为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方针。“雹碎春红，霜凋夏绿”，1957年的百花园里顿呈一派萧条肃杀景象。

1958年毛泽东进而在全国城乡经济领域发动了一场基本上摒弃欧美模式与苏联模式，以“土法上马”为特色的“大跃进”运动。同时，在生产关系方面，又强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试行向共产主义实现“穷过渡”。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重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并写了一段著名的批语。他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相比照。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小农经济土壤中萌发出来的平均主义思想，正是他热衷于穷过渡的深刻原因。这种“左”倾狂热虽然在1959年遭到了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而把这些批评和抵制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反“左”的努力，反而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更系统地提出以“四个存在”“一条纲”（阶级斗争为纲）为核心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发动了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从此关起门来批资批修，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独自摸索“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终至演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经一度集中主要精力攻读马列原著以及苏联30年代的一批哲学著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进入古都北京以后，毛泽东似乎更喜欢读中国古籍。《四库备要》、《二十四史》以及诸子散文，诗骚歌赋、词曲戏文、演义小说等等，他对这些东西兴趣浓厚。可惜他沉浸于古典文化和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候。这样中国和西方的距离就越拉越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文化观变化，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和世界的历史潮流是逆向的。

访问人：毛泽东急于把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按理他更应该向西方学习，从他的文化观来讲，他是讲求对中西文化采取批判与融合的，至少也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

汪澍白：他是主张过学习苏联。民主革命时期，他坚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抵制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自己拿不出一个模式来，结果也搬了一段苏联模式。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

访问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拿不出自己的模式来，就只能接受苏联的模式。从主观上说来，他一直是想批判与融合中西文化，但没有融合好。

汪澍白：是存在这个问题。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产生与实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它是 30—40 年代苏联所处的国内外各种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且，它也曾较好地适应了苏联社会主义初期尽快发展社会主义重工业和国际工业体系的客观需要。但是，斯大林时期的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少弊病。特别是当它被神圣化、公式化、凝固化之后，这些弊病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化。建国初期，还看不到这些矛盾和弊病。那时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形成一个阵营，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看不到阴暗面。待到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有所省察，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说：“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落后的东西”。虽然在总体上没有否定斯大林模式，但提出了在经济上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政治上强调要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基本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 1957 年反右以后，他滋长了骄傲情绪与个人专断的作风，1958 年的“大跃进”是“土法上马”。本来就割断了与欧美的联系，现在又摒弃了苏联的经验，随心所欲地办事，自然会乱套的。

访问人：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有利，对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有局限性。

汪澍白：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融合和发挥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比如在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口诀当然主要是从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但也的确融汇了历代兵家韬略与农民战争中的丰富经验。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描述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又谈到他与捻军作战的遭遇：“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所谓“贼中相传秘诀”云云，实即太平军与捻军总结出来的经验。毛泽东早年就阅读过曾氏《家书》，十分留意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待到他亲自领兵进行反“围剿”战争时，太平军与湘军双方的经验自然都成为他作战艺术的参照系了。这些东西对他战胜蒋介石是很有用的。

1949 年革命战争胜利结束以后，主要的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仍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与经济，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熟悉的東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又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这些话说得非常好，可惜他事实上并没有照着做。1957 年反右，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把不少内行人打成“右派”。红专辩论，又把许多老老实实学经济工作的人插上了“白旗”。“大跃进”时，他用搞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建设，结果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访问人：我总是想毛泽东为什么不那么喜欢读西方的书，这也许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

汪澍白：毛泽东年轻时，对现代科学就不那么感兴趣。他所喜欢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意志非常坚强，笃信“心力”的作用。1917年7月，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者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这些话，把他的个性表现得很充分。

建党以后，当着几次错误路线统治党中央的时候，他的个性受到压抑，但他往往能以异乎寻常的韧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充分圆满地克服了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把党从极端危险的局面下挽救过来。遵义会议过后，特别是延安时期，逐步地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他那时在组织上能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坚持集体领导和维护党的团结。在理论上，能虚心学习，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和苏联哲学著作。当年写的许多论著，内容都很深刻，至今读来，仍然感到很能启发人。

建国以后，他一方面号召向苏联“一边倒”，一边又感到斯大林模式对自己是一种束缚。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解除了苏联模式的束缚。1958年成都会议的讲话，势如破竹，痛快淋漓。痛快是痛快，但脑子有点发热，脱离客观规律，结果带来三年困难。刘少奇“大跃进”时也很热衷，到经济困难时，有所反省和改正，毛泽东就感到不合拍，担心要出中国的赫鲁晓夫，终于导致后来的十年内乱。

此外，毛泽东土生土长，没有出洋留学过，这自然影响他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但反过来问，为什么他组织那么多人赴法勤工俭学，他自己却没有出去，这又与他的个性有关，与他的文化性格有关。我们不能夸大个人文化性格的作用，但也不能小看它。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来开辟道路的。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文化性格之所以值得研究，其原因正在于此。

1992年4月18日于军事科学院

访李希凡——

毛泽东与《红楼梦》

李希凡

李希凡，1927年生，祖籍浙江绍兴，久居北京通县。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当研究生。1955年初调《人民日报》文艺部，后任该报文艺评论组组长、文艺部副主任。1986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至今。从事文艺评论和研究工作多年，有《红楼梦评论集》（与蓝翎合著）、《说情——红楼艺术探微》、《李希凡文学评论（当代）选》等十六种著作。

中国艺术研究院设在原清恭王府内。这天，风很大。雅致的客厅里，那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当事人之一李希凡，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和蓝翎写这篇文章的经过

访问人：1954年，您和蓝翎两人写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被称为“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俞平伯、对胡适主观唯心主义乃至后来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作为当事人，请您谈一谈这件事的前后经过。

李希凡：1954年这场批判运动涉及到我和蓝翎，涉及到我们当时写的两篇文章。时事变迁，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今天来回顾历史，我只能谈谈自己的记忆和想法。这是我要首先说明的。其实当时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共青团员，政治上很幼稚，对党内的情况也不了解。至于说到对俞平伯先生以至胡适的红学观点和古典文学见解有不同的看法，对我来说，是从上大学时就开始了。1952年教学改革时，我就写过一张小字报，提出意见，认为我们的文学史讲学中，不少是胡适观点：应当说，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而我自己又早在1947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我的姐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曾在他家寄居两年，一面帮助他写作，一面在山东大学旁听。青岛解放后，军管会文教部的王哲同志知道我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就主动写信介绍我到华东大学（革命干部学校）去学习，在那里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教育。1951年华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合并，我又回青岛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和蓝翎同学。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党的威信很高，很多老师在政治上虽然倾向进步，拥护共产党，但学术思想上，恐怕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较多，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中，胡适的影响还不小。课程内容，总是讲考证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作品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较少。可以说，真正能说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的，几乎没有。这使我们很不满意，1953年，我们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作研究生，继续学习；蓝翎也分配到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教书。记得是1954年春假中的一天，我和蓝翎在中山公园的报栏里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登的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文章，联想起前些时看到的俞先生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文章《红楼梦简论》，我们就商量要对他的那些观点写一篇文章进行商榷和批驳，这样，我们就利用春假的时间写出了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对俞先生《红楼梦》研究主要观点的不同意见，也比较扼要地阐述了我们

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评价，由于当时我是《文艺报》的通讯员，就先写了一封信询问一下，大意是说我们写了这篇文章，长了点，有9000多字，不知能不能用。但等了一段时间，《文艺报》没有回音。我就把文章寄给了我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执行编辑葛懋春同志，他是一名历史学家。这样，文章就在《文史哲》的1954年第9期上发表了。《文史哲》是建国初期较早创办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倡导和创办这个刊物的，是当时我们的老校长、中国著名的现代史学和鲁迅研究专家华岗同志。他主持下的山东大学学术思想很活跃，《文史哲》的办刊宗旨，也是不拘一格，不大讲论资排辈，而且主张不同学术观点可以进行讨论，很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就曾有过一篇读书报告被刊用过。写完《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以后，我们觉得话还没有说完，就在1954年的暑假，又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研究》是俞先生解放后出版的一本著作。文章写出后，寄给了《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

我所知道的批判运动的风波

访问人：后来的事情现在也了解一些了。你们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毛泽东看了，表示赞赏。虽然《文艺报》后来在第18期上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毛泽东在1954年10月16日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还是表达了他不满的心情，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看不起青年作者的态度问题，而是甘心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作资产阶级俘虏的问题，他表示通过对俞平伯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错误思想的批判，“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态度一明朗，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就被要求做检讨，《文艺报》的编辑机构也被改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也很快展开。这些情况，您和蓝翎当时了解吗？

李希凡：我们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不太满意，不同意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评价中的许多看法，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古典文学作品，发表一下不同的意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前几年所谓反毛非毛一股思潮起来的时候，红学界对这场批判运动说什么的都有，包括对我个人，也有各种说法。在港台，海外奇谈就更多了。发表我们文章的当年《文史哲》编辑葛懋春同志80年代初去美国探亲，从美国图书馆收存的台湾出版物中抄录了有关我的小传寄给我，有的写得没边了，说我是江西红小鬼出身，给康生当过通讯员，是康生布置了这项任务给我们。这真荒唐可笑，也大拔高我了。红军时期我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而且是生活在开始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郊区。其实，就是我们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也不可能是我们能预料得到的。我记得当时《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发表后，大概是在国庆节前后吧，《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找到蓝翎和我。了解我们写作的经过，要我们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准备在报上转载。但文章改出来拿去排印，却没有见报，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曲折，我们当时不了解。隔了些日子，又说要由《文艺报》转载，请冯雪峰同志找我们谈话。我对雪峰同志是很尊敬的，因为我读过他很多论鲁迅的著作，认为写得很深刻。后来批评《文艺报》，冯雪峰同志出来作检讨，我也懵了。我记得他接待我们时非常平易近人，他只说了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

这样一些话。我们的文章确实比较粗糙，我自己也没感到这话有什么问题。

《文艺报》要登，我们当时很高兴。领我们去见冯雪峰同志的是“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同志，是文学界的前辈。他也很和蔼，说《文艺报》是老大哥，等《文艺报》转载了你们的文章以后，我们就登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至于当时中央或高层领导的意见，只是邓拓同志向我们透露了一点，说是你们的文章毛主席看了，肯定你们的观点，至于有什么具体批示。他也没给我们说。我们知道毛主席读了我们的文章，就已经兴奋得不得了啦！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我在“文革”前没看到过。“文革”中，戚本禹的一篇文章公布有这封信，那时我已被造反派打入牛棚，进行劳动改造。是因为这封信，我才被放出牛棚。毛主席对我们的文章作的批注我也是在“文革”中从中宣部的一位同志那里看到的。当时我们的两篇文章发表后不久，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称“这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在此前后，邓拓同志又曾把我们找去，说你们还可以再写些文章，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不是讲到了胡适的观点吗？这篇文章可从批判胡适的角度写。这样，我们就写了那篇《走什么样的路》，发表在1954年10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按照邓拓同志意见着重提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论，不过其中联系到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却不知是谁加上的，那时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的认识”。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文章的同一天，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在东总布胡同的作协所在地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参加的人有研究古典文学的，也有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报刊编辑。我们参加了，俞平伯先生也参加了。就是在这次会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俞平伯先生，还是周扬同志引见的。其后，很快又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楼上召开了文艺界更大规模的会议，名义大概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开始进入批判胡适思想的阶段。但可以说，我们的认识当时还没有到自觉的程度，没有感觉到《文艺报》压制我们，至于什么阶级、路线斗争问题，更不是我们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在《走什么样的路》发表以后，袁水拍同志发表了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学校上课，是听了广播才知道的。

访问人：是在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一篇吧？题目叫《质问文艺报编者》。毛泽东当时还审阅、修改了，其中毛泽东加了这么一段文字：“《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的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李希凡：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很多意见，听说周扬同志就曾打电话问邓拓同志：怎么回事？矛头又指向谁了？《文艺报》是文联和作协的机关刊物，周扬同志是文艺界的党的领导的代表，有此一问，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文艺报》的主编是冯雪峰同志，他就在会上做了检讨，检讨也没通过。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记得一位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曾问我对冯雪峰同志的谈话有什么感想，我说：印象很好。他有点像鲁迅，很关心青年人的成长。这位领导同志立刻批评我说，你真糊涂，这是假象，他一贯会这样做。譬如他说党给鲁迅以力量，实际上是标榜他自己给鲁迅以力量。《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同志也做检讨，他检讨中有那么一句话，说：《文艺报》是老大哥，

我们跟着老大哥走。说得下面哄堂大笑。看得出会上的人不满意他们的检讨。

访问人：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在1954年11月4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看后也不满意，认为是“陷入资产阶级泥潭里”、“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应该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11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黎之的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看了，也不很满意，认为把问题说轻了，说编辑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到12月上旬。《文艺报》就改组了领导班子。

李希凡：毛主席的这些批示。在当时没听说过。但后来的批判运动的形势大大紧张起来，我们也想象得出，党对文艺界工作不满意。到12月8日，三位文学界泰斗出来讲话，讲话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是郭老的《三点建议》。一个是茅盾同志的《良好的开端》，一个是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很快转向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批判开始还都是批判他们的学术思想，后来对胡风的批判越来越激烈了，在我听来，胡风先生和陆翎先生的发言是针对周扬同志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以后的事，这里不提了。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后，我们已经插不上话了，我们还是继续写关于《红楼梦》问题的文章。

访问人：这个时候您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吗？

李希凡：我是1955年初到《人民日报》社的。1954年10月蓝翎已经调到那里去了。调我的时候有些周折。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吴玉章同志，还有聂真副校长，都找我谈了话，希望我留校继续学习。老校长还说，本来学校已准备让我去上俄文专修班，然后到苏联留学。我很感谢老校长和聂真同志对于我的培养和期望，但我实在太爱我的文学专业，不愿转向其他专业了，何况那时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经济上也比较困难。我给周扬同志写了信，表示自己想上文学研究所工作，周扬同志回了信，大意说，已决定你调《人民日报》社文艺组工作，“你们走了很好的第一步，望继续努力，不要有一丝骄傲情绪，因为学问和斗争都是无止境的。”后来听报社同志讲，邓拓同志也向毛主席反映了我对工作调动的想法，毛主席只说了一句：“那不是战斗岗位”。就这样我调到了《人民日报》社。但为了不辜负老校长对我的期望，我向吴老保证。一定继续在夜校把我该读的课程读完。一进《人民日报》大门32年没挪窝儿，直到1986年才离开那里来中国艺术研究院。

访问人：您见过毛泽东吗？

李希凡：见过三、四次。1954年12月我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在怀仁堂大厅里第一次同毛主席握手，开幕晚间宴会时曾向毛主席敬酒；当年春节在中南海团拜时，又见过一次。1956年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也见过一次。每次毛主席都讲过一些不同的话。我写过一篇回忆录，题名《在毛主席身边》，记录了这几次见面。

我对这场批判运动的看法

访问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到今天，已经过去38年了，您现在对那场运动怎么看？

李希凡：对这场运动作历史的结论，是党中央有关部门的事。林则徐有一句诗，叫做“青史终能定是非”，我相信这是真理。“文革”后的一段时间，以及1988年兴起的一股思潮，对这场批判全盘否定，并把它同毛主席的晚年错误扯在一起，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最近，我看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这场批判运动作了这样的评断：“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党发动这两次批判（另一次指批判《武训传》——引者注），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我以为，这样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这场批判运动，才是有说服力的。自然，也要承认这场运动对俞平伯先生有伤害，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很大。后亲运动升级，批判也升温了，有些文章也就不实事求是了，包括我们后来的一些文章，也有对俞先生不尊重的称谓和说法。

访问人：对红学研究的影响呢？

李希凡：从红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从1954年有了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的开端。前几年不是发生过一场“红学三十年”的论争么？事实证明，这三十多年间，“红学”确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不仅《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就是那些过去所谓新旧红学的老课题，如作者家世、版本考证等，也有了新发现，新结论。特别是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和1980年中国红学会成立以来，有关《红楼梦》的学术活动，广及国内外，多次掀起所谓“红学热”，使《红楼梦》出版的印数始终居于四部古典小说之首，而且三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和六部八集电影系列片《红楼梦》的问世，在亿万观众中普及了《红楼梦》，使这部杰作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影响，1954年提出的主要观点基本上已被大家接受了，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

访问人：有不同意见是免不了的，也是正常的。

李希凡：有不同意见后来也都展开了公开的争论。总之，通过这件事，在那么大的范围，有那么多的人说《红楼梦》、译《红楼梦》，的确拓宽了《红楼梦》研究的视野，推动了红学在新的历史阶段下的发展。

毛泽东读《红楼梦》的独特历史视角

访问人：您能不能就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谈一谈您的看法？

李希凡：好的。毛主席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评价很高，从他多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喜爱这部作品的。他说他读过很多遍，他认为这部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就说过：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真的只有一部《红楼梦》，而是以《红楼梦》为中国优秀文化艺术的代表。在我国四部古典小说中，《红楼梦》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它是篇幅浩

瀚，头绪纷繁描写现实生活的长篇巨制。它不以情节取胜，而以多采多姿的世俗人情的深刻描写见长。它主要写的是一个贵族之家——荣宁二府，或者扩大一点说，是牵连到四个贵族之家的兴衰破败。但它所显示的艺术视野却十分广阔，封建末世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从王公贵族到市井小民，以及乡野情趣，反映在它的艺术世界里，就像实际生活存在一样，虽然千头万绪，参差交织，却相互联系，浑然天成，不可分割。其中大事件中穿插小故事，小故事中又潜伏着大变故。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作者的构思既周密又巧妙，首尾相应，筋脉连贯，丰富多彩地展现在层层涟漪的艺术画面里了。至于所写的人物，就有四百多个，上至妃子、王爷、公侯、官吏、夫人、少爷、小姐，下至管家、奴婢、小厮、丫鬟、庄头、村姬、村女，以至和尚、道士、尼姑、娼妓、无赖，三教九流，一个个生气勃勃，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当年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里写过这样一句话：“《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毛主席看到后，加了密密的圈点。我想毛主席说他读《红楼梦》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意思就是通过它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状况。1987年第2期《红楼梦学刊》发表过龚育之、宋贵仑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红学”一家言》，其中说到毛主席“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

当然，一部反映时代的伟大作品，它也必然具有这样的认识价值。龚育之、宋贵仑同志还列举恩格斯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称赞《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列宁则把托尔斯泰的作品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来作说明。这还不都是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当作历史读么？只不过毛主席读《红楼梦》公开说明了他自己的这个视角，难道这就损害了《红楼梦》？相反，只把它说成是一本“爱情小说”，倒没有贬低它的价值？我以为，正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的认识评价是如此之高——可以当作历史读，他才那样不能容忍“新红学派”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的“自传”，或是什么《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是“色空”等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呓语。主凤姐跟爱情有什么关系？但作者写她的笔墨一点也不少于宝黛爱情。那么作者是什么意图呢？读过《红楼梦》，又有一点生活经验的人，一定会感受到写这么一个大家族，如果它的神经中枢没有王凤姐这样一个人物，那层层阶的贵族家庭的生活“体制”，会无法转动。凤姐是这个封建大家庭中各种关系的一个集中点，从她身上集中反映了各种矛盾。毛主席在谈《红楼梦》时经常谈到她，引用她的话，称赞作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创造。有人抓住毛主席说的“《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这句话大做文章，其实这也不过是个比喻，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是同一语义。恩格斯不是还说过，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难道能因为他们是从这方面的“视角”来看待文学作品的，就断定他们忽略审美，不懂艺术？毛主席不但是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诗人。不仅他的古体诗词写得那么气魄恢宏，独具一格，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每一篇文章，也何尝不是说理透彻，文字优美，显示了他广博精深的文学造诣。谁会相信，他能幼稚到连文艺与历史的区别都分不清呢？

访问人：好像记得胡适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共里边要数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最好。

李希凡：胡适的这个评价，还是公正的。据说主席很喜爱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当然，三李的诗的思想艺术成就，并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他们都工于诗艺，各有独特的风格。好像毛主席不太喜欢杜甫的诗，虽然他也评论过杜甫诗“是政治诗”，作了肯定。还有，对于新诗，主席开过玩笑，说，要让我看新诗，除非给我二百块现大洋。他虽不喜欢新诗，但在给臧克家同志的信中，还是提倡和鼓励青年人写新诗。可以说，毛主席的艺术修养、艺术情趣都是很高的，但他同时又不以他个人的爱好简单地去看待文艺问题。

访问人：这一点我同意，毛泽东处在政治领袖、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有时他评价一样东西，哪怕是文艺作品，也自然有他特殊的角度，和一般人不一样。

李希凡：当然不一样，高屋建瓴，视野开阔。仅就《红楼梦》来说，茅盾同志40年代的回忆录中就称赞，毛主席在和他谈话中“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延安文艺回忆录》第6页）。可见他对《红楼梦》是早已熟读了的。他曾把《红楼梦》与《金瓶梅》作比较，认为《金瓶梅》只反映黑暗，不尊重妇女，而《红楼梦》写得有点希望，是尊重妇女的。话很简单，却抓住了要害。我曾写过两篇文章，涉及到《金瓶梅》：一篇是1957年写的，题目是《（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中的地位》，是从《水浒》与《金瓶梅》的比较而言的；另一篇是80年代写的，题目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是从《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而言的。《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虽有一定的地位，但决不能像目前有些学者那样一味瞎吹。我还是同意清人诸联的这样一段评语：“书（指《红楼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褻嫖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红楼评梦》）再比如，毛主席认为《红楼梦》的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四大家族的“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过去没有人这样讲过，这也是毛主席的高明视角的一个方面。毛主席晚年的确犯了错误，而且很严重，也包括文艺上，“文革”前的两个批示，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伤害了文艺界。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过去我们把他当成神，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今天，我们也不要神的标准来要求毛主席。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毛主席的错误，也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纠正。我们应该像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那样，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因为毛主席“文革”中的错误掀起全盘否定的所谓反毛非毛的浪潮，这是我绝对不能苟同的。没有毛泽东思想，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新生么？同样，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理论基础。只不过，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可以不涉及了，今天的主题本来就是谈《红楼梦》研究批判问题的。

访问人：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1992年4月22日于北京前海西街

访卢文——

毛泽东、邓子恢关于 合作化问题上的三次论争

卢文

卢文，1922年生，广西合浦县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七支队政委、中共钦县县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党校党委副书记、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联络室主任。现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等。

对卢文的这次采访可以说是高效率。电话一联系，他就爽快地定了时间。骑了几分钟的单车，谈了不到一小时，我们出来一看表，哟，还早呢！

访问人：50年代，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同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发生过一些争论，请您谈谈这件事的大致经过。

卢文：那时我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没有直接的经历。近十多年来由于从事农村问题和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研究，看了不少材料。可以根据所知的情况谈谈。

邓子恢到农村部工作是1953年。他和毛泽东之间关于合作化问题的争论实际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5年春天在浙江收缩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3月下旬，邓子恢和当时的浙江省委负责人开会讨论，写成了《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发往浙江省。这个电报稿据说是经毛泽东审阅过的。发到浙江后，浙江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部署，一个月后浙江的农业合作社就由55000个压缩到40000个（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说浙江砍了20万个合作社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了解到浙江的这个情况后很有意见，批评邓子恢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55年6月下旬以后，中央农村工作都提出了一个计划，准备在全国65万个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万个。中央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毛泽东巡视长江以南回来后，提出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这样就发生了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与小发展之争。邓子恢坚持原来的计划。他提出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整个合作化运动应该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不能过快；二是现有的合作社存在问题多，要打好基础，巩固的任务很重；三是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有待逐步提高。这样一来就和毛泽东的意见不合。这一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批评邓子恢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到了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对邓子恢点名严厉批评，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小脚女人”的批判随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而进一步深入、扩及全国。这是第二次争论。

第三次争论是在1962年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上。这时，全国还处

在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时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制度经过调整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邓子恢主张贯彻稳定小队所有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保留自留地、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方针。形式是责任组向生产队包工，零碎活包到个人，对田间管理和集体不便进行的技术活可以包到户，联系产量，超产奖励。这与今天我们说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还是不同的，它仍是建立在坚持集体统一领导、统一分配、统一核算的前提下的。但邓子恢的这个主张又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是“刮单干风”，说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办一件好事”，宣布撤销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也离开了那里。这是第三次。

访问人：在农业合作化进度问题上，其实邓子恢是按照中央决议精神贯彻执行执行的。

卢文：这在中央批复的1980年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就说到了，对邓子恢的工作也作了客观评价。认为压缩浙江的一部分合作社“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一度紧张的中贫农关系得到了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部政策水平提高了。实践证明，这个处理是符合群众要求的。有的地方由于酝酿不够，行动过猛和工作粗糙，对不该收缩的也收缩了一些，这是在具体执行中的缺点错误。”“把浙江省坚决收缩说成是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1955年大发展问题的争论，“实际上，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实际上邓子恢同志并不是提倡包产到户和鼓吹单干，而是想找到一种将集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形式。其实，回顾当时实际情况，在一些经济极端困难的地区，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是必要的，也不算什么错误。”

访问人：在争论以前，农业合作化是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的。毛泽东自己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对合作化的进度和完成时间也有估计，认为需要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到后来有突然的改变？我们注意到了195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巡视江南的事。这次巡视是不是毛泽东改变决策的转折点？

卢文：毛泽东巡视江南的确影响了他对中国农村形势的估计，对推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有一定作用。但我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为什么前后有如此的变化，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还在于他思想深处的东西。他有很多好的思想，比如说主张土改后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要调动农民的两个积极性；要坚持自愿人社原则；通过示范、帮助、教育的办法使农民逐步地从互助组进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用15年或更长的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以生产作为检查合作化的标准等等，都是正确的。但他自己又违背了这些。当邓子恢按照这个原则按部就班地安排工作时，他提出了批评。为什么呢？里边是有深层原因的。

我认为，第一，他对中国农民当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估计过高，对改造小农及小农经济的艰巨性估计不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估计？与他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战争的经验有关。他把这两件事情跟改造小农及小农经济同样看待。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战争和进行土地改革。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土地改革后

农民大批参军，争取解放，三大战役一下子就扭转了局势，党在人民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威信。这使他感觉建国后农民也会很快地跟着党的号召走社会主义的路。他有句话，叫做中国的农民要比西方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还高。没有估计到改造小农和土改与革命战争的根本不同；也没有估计到改变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状态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建设与多方面的工作。在夸大农民这一面的同时，他又夸大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富农、富裕中农的发展会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很担心，害怕商品经济，害怕出现贫富差距。急于要用合作化的办法来防止这些东西。

第二，他对工农矛盾的认识。他看到了国家工业化和分散的小农经济不能相容这一点。工业化离不开农村提供的食物、原料和资金，但小农经济不能保证有效地提供这些东西。毛泽东想通过实现农业合作化，加上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来实现农村食物、原料市场的计划性，使农业的发展服从工业化的需要。毛泽东看到这个矛盾，重视这个矛盾，想要解决这个矛盾，但他简单化了，想用尽快合作化的办法全部解决矛盾。历史证明是急躁了。

第三，与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关。改变农村的小农经济，就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农的联系，孤立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没有了农村提供的食物、原料和农村市场，就无法生存。事实的发展也是这样。合作化一搞起来，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快也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但毛泽东这个步骤迈得过急了。现在看来，有些个体的东西、私有的东西对于调动一些人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特别在农村经济很落后的情况下，应允许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存在，以便适应各方面的情况，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可惜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一点，急于建立一个全盘于干净净的社会主义。

访问人：急于把私有制一下子扭过来，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卢文：毛泽东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来的。马、恩总结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情况，创立了社会主义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是对的。而我国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农村情况，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想到了另一面。这表现在他说：我国是一穷二白。穷就要革命；白就是一张白纸好写文章。他想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纯粹的公有制，要走一条笔直的道路，一步就迈入社会主义，办法就是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来个大跃进，一下就进入纯粹的社会主义，就像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一样，一下子解决问题。因而在农村中就以大批判开路，掀起合作化高潮，不断实行变革，搞各种运动，想迅速把小农经济变成纯粹公有的发达的农村。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小农经济落后的现实状况和改变这种状况的艰苦长期的过程，也忽略了列宁讲述的需要经过很多过渡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话。

访问人：结果搞快了，搞急了。毛泽东的思路有时是跳跃性的。他自己定了的，往往又会改变，使别人难以跟上。

卢文：是的。邓子恢搞农村工作，接触实际，接触农民，比较了解农村情况。当他按照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作出的决定按部就班地往前走的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又已经走到了他的前头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争论也是这样。新民主主义要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多长时间？刘少奇也是按照毛泽东以前的《论联合政府》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表述的思想提出的，结果这时毛泽东已经走到前面了，提出了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刘少奇就急于跟着赶上去，但在很多地方还跟不上。到了 60 年代，“文革”开始，刘少奇就被划入了“右”的、“修正主义”的一边。在和邓子恢的争论中，同样也表现出了毛泽东思维的这种跳跃特性。

访问人：假如在浙江收缩农业合作社，和毛泽东发生分歧的不是邓子恢，换一个人，争论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卢文：换一个人也会发生这种争论。上面也讲了，事情发生的原因更多还是因为毛泽东头脑中对中国社会形势和社会主义的认识。

访问人：这次争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赢了。那么作为决策人，作为处在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他的观点看法肯定要影响到中国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影响是什么？争论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今天回头再看，您怎么评价？

卢文：毛泽东赢了这场争论，当时的历史好像也是按照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了。他说农民有很高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农民确是敲锣打鼓入社的；他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那就真的到来了。几个月的功夫，合作化就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比预计的提前了 11 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随着也席卷全国。但是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1978 年以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说明了什么？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你人为地硬拉它前进，走笔直的道路，往往最后就要走曲折的道路。

访问人：历史的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卢文：农业合作化的急速完成无疑对以后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很快建立产生了影响。但问题是一步步地暴露出来的。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干部不多，又缺乏管理集体经济的能力和经验。而我们却通过运动一下建立起大规模的、纯粹公有的、高度集中的、靠行政命令行事的、清一色的、“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集体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很好结合，不利于调动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僵化的体制，并没有显出预想中的优越性。加之那时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就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邓子恢原想在那种基本体制下找出一种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办法，却又受到了批判。这个问题直到 1978 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才真正开始得到解决，其中走了 20 多年曲折反复的道路。

这场争论带来的另一个直接的影响，是把邓子恢批为“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争论的问题也只是工作上的意见不同。毛泽东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等帽子，这种做法滥用了领袖的威望，损害了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当时的批判还株连冤枉了一批同志；也给当时的合作化运动施加了人为的压力。

访问人：由争论上升到批判邓子恢为右倾机会主义，它所产生的政治压力是不是当时农业合作化所以能像预想的那样飞速发展的一个推动力？

卢文：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有一部分是与农民的思想情绪分不开的。新中国建立不久，群众是十分信赖我们党的。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看到共产党所提的东西都是正确的，都是能办到的：共产党说，要打败日本鬼子，就真的打败了日本鬼子；共产党说，打倒蒋介石，就真的打倒了蒋介石；共产党说，要分田给农民，就真的分田给农民了。共产党真是说到做到。这次共产党说合作化好，那加入合作社准没错。这种想法在农民中还是普遍的。但

是另一方面，压力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对干部来说，这是一种政治压力；对农民群众来说也是一种强制。干部党员带头敲锣打鼓入社，很多人就只好跟上，即使心中有打算，嘴上也不敢说出来。等到热潮过后，逐渐感觉到合作社不像所说的那样好，如农户的许多东西归到社里，说是折价，其实后来没有完全兑现，在社里，生产没有自主权，生活也不自由，生产和分配也不理想。特别是在困难时期搞得很多人没有饭吃。农民的思想就逐渐发生变化。后来有不少农民要求牵牛退社或搞包产到户，但都被批判压制了下去。

今天回头来看，就这场争论来说，是毛泽东错了，他只考虑到了集体的优越性，忽略了个体的积极性，脱离了农村的实际。其实个体积极性也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个体，集体是空的，人的积极性不调动起来，集体的优越性怎么显示出来？邓子恢看到了农村的实际情况，要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他当时探索的方向和路子是对的。这已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的实践所证明。

访问人：邓子恢和毛泽东的争论是围绕着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展开的，是快或慢的争论。其实，实现合作化是他们一致的方向，这在今天还应该肯定。几十年来，生产力还是有所发展的。

卢文：是这样。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是不能否定的。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尽管出现许多失误，但我想起起码有这样几个成绩是应该肯定的：第一，现在农村中的乡村合作组织的基础是那时打下的。有些搞得好的单位如北京的窦店、江苏的华西、河南七里营的刘庄等，它们仍坚持统一经营为主。目前全国还有七千个这种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单位。第二，实现了土地公有，消灭了两极分化和剥削的基础。第三，促进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第四，发展了一批乡镇企业，发展了集体的公共财产。第五，保证了几十年城市人民低水平的供给，也保证了国家工业化的需要。第六，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第七，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干部。总的说那段农业和农村生产还是发展的。所有这些成就不能一概抹杀，要一分为二。我们今天的改革就是继承那一段的积极成果，扬弃不合理的东西，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访问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农村今天的这种好局面，正是昨天中国历史的继续。如果我们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路走下去，中国八亿农民的明天会更好。谢谢您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些好意见。

1992年4月18日于北京西四

访李越然——

毛泽东说，涉及主权的问题不能谈

李越然

李越然，1927年生，黑龙江人。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1948年在中苏友协工作，不久转至东北铁道部部长室任翻译。建国后到北京，至1965年，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外事活动及各种重要会谈、国际会议做译员，并长期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献的中、俄文翻译、审订工作。发表过若干译学论文及文学翻译作品。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兼中国译协副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顾问等职。

眼下，他似乎更忙了。忙里偷闲，约上一次访谈，也是匆匆来去。就连我们的这篇文字整理稿，他也是通过电话定稿的。

访问人：您在毛泽东身边做翻译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越然：从1949年8月，当时我22岁。那一次，毛泽东接见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苏联职工和家属。记得是一天的下午，我们一行来到中南海，等待着毛主席的接见。大概是下午三点钟，毛主席从勤政殿北面的旁门进来。他步伐稳健，满头黑发，目光炯炯有神，神采奕奕，同我握手时问道：“你这个小鬼是于什么工作的呀？”当时我又激动又紧张，竟然说不出话来了。站在一旁的沈阳铁路局副局长王学文同志忙替我回答：“他是翻译，同时在我们铁路局做秘书。”主席微笑着：“噢！翻译，那好啊，请你告诉苏联同志，我们很感谢，他们一路上辛苦了”。这是一句普通的寒暄语，可对我来说却是一次考试。“辛苦了”，如果翻译不好，在俄文上会被理解为“你们累了”，这样就不确切了。当时我译成“谢谢你们的服务和劳动”后，苏联朋友很高兴，忙说：“感谢毛主席接见我们，我们在火车上做了点工作是应该的”。然后毛主席和苏联朋友作了亲切的交谈。这次工作以后，我就从沈阳铁路局调到北京，被派在苏联顾问团工作。

访问人 您给毛主席作了多年的翻译工作，他留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李越然：从1949年8月第一次在毛主席身边做翻译起，一直到60年代初，十几年时间，我对毛主席的了解只是一个历史画卷的局部，但既然为他老人家做翻译，就必然会多方面地去熟悉他，注意他的思想，他的作风，他的言行表现的特色，甚至他使用语言的特点。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毛泽东既伟大又平凡，他的伟大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的平凡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因此我叫做：伟人身上的平凡，平凡中的伟大。我举个例子：1957年，毛泽东准备去苏联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组织上确定我跟随毛主席访苏，担任翻译。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为了让我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冲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安排我在中南海直接接触毛主席，熟悉他老人家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记得有一天，毛主席带着思考问题的神色漫步走了一会儿，侧脸望我一眼，问：“李银桥呢”，“我在这儿”，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跑上来，主席站住脚，指着我和李银桥说：“你们这二季，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俩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我和李银桥都笑了。主席又对我说：“今年五月伏老（指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我赶紧说：

“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水平还不够”他说：“你看，我说的许多事，如果你翻译不过去，那伏老也不能理解，而伏老究竟什么心情，你不翻给我，我也不知道，可不是你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听了非常感动。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仅心里装着世界大事，还装着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的工作。

毛泽东的伟大是连外国人甚至我们的敌人也承认的，更难得的是这样一个伟人又非常平凡。我们一般人具有的喜怒哀乐他都有。他平时一般是不发脾气的，偶尔发脾气都是遇到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生活而言，他发了脾气都是为睡觉惊醒了他，他的卫士偶尔因为不小心他也发过火，但过后又做工作，说：“你们别生气，我能睡下去很不容易，刚睡着了，又把我搞醒，实在烦心。”但有特别重要的事叫醒他，他是绝对不发火的。在生活上，他的简朴是出乎人们的想象的。比如，1949年8月我第一次见到他，看他穿的皮鞋，是那时北京刚兴的那种橡胶底的皮鞋，一直到1957年去莫斯科开全世界共产党大会，还穿那双皮鞋。那时出国也讲置装，大家忙活要给他做衣服，他高低不同意，费了好大劲才做了一套衣服。吃饭也非常简单，在莫斯科时，克里姆林宫里什么最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主席，但他吃得不多，主要还是按自己的习惯吃辣子火腿、鱼、米饭、小米粥。实际上那些好吃的大部分让我们工作人员分享了。

访问人：您能不能举几样？

李越然：多了，各式各样的点心、烤乳猪、烤牛排、烤猪排等等，都是高级的，他不大习惯还是喝他的小米粥，吃米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小豆，他吃饭嚼得很细，但很快，尤其是会吃鱼，也爱吃鱼，吃完的鱼刺一个个规规矩矩地放那儿。吃饭时他喜欢把周围的工作人员找到一起交谈，但你得作好准备，他随时随地都可能出个题目给你，让你回答问题。毛主席认为，人要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你是重复别人的观点，他会认为你没有头脑。即使你的观点是错的，他也会认真听，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

访问人：问过您什么问题吗？

李越然：有一次，他和郭沫若在一起纵谈三国，我在旁边。郭老是大历史学家了，因此他们说得非常热烈。谈着谈着，毛主席突然问我，李越然同志，给你提个问题，你说诸葛亮和曹操这两人，谁厉害？当时我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说，主席，我对三国只有一些非常浅薄的知识性的了解。毛主席说：那不行，对三国，要多看，起码看三遍。又说，水浒也要起码看三遍。三国里有许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水浒里有许多辩证法，祝家庄怎么打进去的，主观主义就不行。

访问人：在这些平凡小事中，毛主席是很平易近人的。

李越然：所以说伟人身上可以看出许多平凡的东西，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在这些平凡中又表现了他的伟大。

访问人：在平凡而伟大的毛泽东身上，您认为最突出的是什么？

李越然：第一条，他随时想着人民，随时想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探讨每一个问题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三年困难时期，他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并坚持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样，吃粮不超过定量。他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想过没有，在这么困难时期，全国老百姓吃什么，照理说我们要吃一点也没什么困难，但这样行吗？全国人民这么困难，我们吃着舒服吗？人民的困难怎么解决，我们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当然天灾是一条，那么我们

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不足啊？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曾7个月没吃过一口他喜欢吃的红烧肉。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是做翻译工作的，但做翻译不能光懂语言，还要学政治，学经济，要懂得人，要了解人的心理状态，否则翻译工作也做不好。

第二是中华民族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首先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不是照搬苏联现成的经验，而敢于向苏联、斯大林提出自己的意见，斯大林也钦佩毛泽东这一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屈服于外部的压力，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我党同其他党相比最突出的一条。到1957年莫斯科全世界共产党大会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可以说给予了适度的支持，使会议开得很成功，但也有过相应的批评。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搞共同舰队和长波无线电台，这似乎看来是一件具体事，但毛泽东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了他革命家的远见和维护中华民族主权的大无畏精神。

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两国关系发展得不错，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都在发展，军事合作也谈过，也准备搞些合作。大概赫鲁晓夫觉得两国关系发展很好，就提出了搞一个长波无线电台，并联合成立一个共同舰队。提出这两个问题，是先由当时驻中国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的，说是为了防御美国的第七舰队，希望同中国方面搞这两个项目。毛主席听尤金讲完后，问这是什么意思，尤金也说不清楚，答应说回去向赫鲁晓夫汇报，于是赫在1958年7月31日秘密来中国。

赫要来，阎明复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毛主席有外事活动，一般由我和阎明复担任翻译），说主任让你赶紧过来，主任就是杨尚昆同志。我过去后，杨主任对我说，明天赫鲁晓夫就要来，你们准备一下，并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赫鲁晓夫的专机降落在南苑机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都去接了，但能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赫下飞机后就在飞机场休息一下。还有一段插曲，刘少奇和赫鲁晓夫谈话说：我们现在大跃进（正是浮夸风的时候），粮食产量特别多，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赫很轻松的一笑，“那不要紧，你粮食多了给我们”。

访问人：毛主席同赫鲁晓夫的会谈是在什么地方？

李越然：在颐年堂，当时参加会谈的还有邓小平，苏方还有费德林。首先毛主席表示欢迎，然后说，尤金大使向我讲了你们的想法，这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显得很轻松的样子大谈起来，说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我们提议搞一个共同舰队，另外我们潜艇为了联络，需要借中国的力量，搞一个长波电台，也可以共同使用。赫说得很起劲，这时毛主席憋不住，火了，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说：“你讲了大半天，我也听了大半天，说了许多话你还没有进入正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气氛一下子很紧张，赫说：“共同舰队就是跟你们一块共同商量商量。”主席说：“还是不切题，什么叫共同，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沿海都拿过去，那好，统统拿去好了。”赫说，我们商量商量嘛，毛主席很干脆他说，涉及主权的问题根本不能谈，共同舰队怎么指挥？

访问人：当时情况，赫鲁晓夫很尴尬吧？

李越然：相当尴尬。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1957年他支持了赫鲁晓夫是出于全局的考虑，一旦涉及中华民族的主权，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

丝毫不让的。我们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奴役了几百年，我们知道被别人支配、受人欺负的滋味。所以说毛泽东的伟大是其他人难比的。

访问人：第二天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游泳池继续谈，又发生什么事情没有？

李越然：事倒没有发生什么，就是有点争吵，主要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讲，原来你们是支持我们的，现在好像不大支持了，好像是向我们的后院抛石头。主席说，不对，实际是抛了一把金子。赫说，别人的金子我不要。毛主席说，你要不要是一回事，我要助你一臂之力，因为毕竟在我们共产党国家里你们是头一家。

访问人：有种看法，毛泽东在游泳池接见国家元首，是否不太礼貌。

李越然：我不这么看。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并不一定是有意的，他不大管外交礼节，很随便。说到游泳就更有意思了，赫鲁晓夫是没法和毛泽东比的，毛主席一下水，真是如鱼得水，而赫鲁晓夫只是带着救生圈扑腾两下。

访问人：还有人议论，说毛泽东建国后只读古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越然：这种议论我也听到过，无非是说毛泽东对西方世界不熟悉。这是不对的。我亲身感受到，他对世界各地的情况是相当关心的，而且就他的愿望，非常想自己出去看看。他多次给我们讲：我很想出去看看，但是我毛泽东今天处在这么个状况，是无法实行的。因此我非常主张少奇、恩来、小平同志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多了解外界的情况，不要光呆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像美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有谁能够邀请毛泽东？这是个很客观很现实的事情。所以对那种说毛泽东不了解外国情况的说法，我是不赞同的。我就多次亲耳听到毛泽东讲这个问题，而且显得很迫切。

不仅如此，他为了能直接阅读西方的原文报刊，特意请了英文教员，其中就有林克同志，我亲眼见到他抓紧时间学英文的情形。那么他学习英文是为了什么呢？我看他不是为了讲外语，他学习外文就是为了直接阅读西方的书报。老人家经过努力，到晚年基本达到能阅读英文报刊的能力。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了解西方的情况。举个例子，还是 1957 年在莫斯科时一次一块吃饭，他问浦寿昌博士（他曾在美国学经济学，后来担任副外长）：你是学经济的，你能不能把美国的经济情况给我谈一谈，它过去怎样，现在怎样，你是怎么分析的。浦寿昌同志给他讲了美国经济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表示很满意。他是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

毛泽东有个特点，非常爱跟别人交谈，特别是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常常给你出些题目，请你回答。他不喜欢八股调，常说，说错了不怕，但你讲话要有自己的观点，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想，究竟你怎么想的，把你的观点你的看法讲出来，哪怕还很不成熟，甚至不对也没关系，总是你的看法。他很愿意和这样的人谈话。如说了一通，什么意思也没有，净是顺着他说些应付性的话，他就很反感。1957 年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来机场接他，毛泽东、赫鲁晓夫，还有我和李银桥坐一辆宽大的“吉斯”车，我当翻译。他问赫，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了没有，赫说到了。毛主席特别问了一下“铁托到了没有”，赫鲁晓夫说，“还没到，我们给他发了请帖，希望他能到，他不来就是他失礼，他要来我们正好批评他一下”。毛主席听后不同意，说：“铁托不来，一定有他不来的理由，你要知道斯大林整人整得够苦的，把人家开除出情报局，人家能没气吗，他来了更好，不来要理解人家”。然后又问如

铁托不来谁来呢？赫说，卡德尔来，他是南斯拉夫的笔杆子，南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大都出自此人之手。毛主席说，我一定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光从外界评论南斯拉夫不行，情况究竟怎样，我很希望他和我讲一讲，他们搞的那个自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都说明毛主席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去了解外界的情况，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只读中国的古书。古书当然也是读的，我们中国的当代人有谁读古书能达到他那个水平。他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很少看到他不看书，他读书非常仔细，手里拿支铅笔连圈带画，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但他不仅读古书，也读西方书、现代书。

1992年6月14日于北京水碓西里

访林蕴晖——

探索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成与失

林蕴晖

林蕴晖，1932年生，江苏丹阳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军事学院政治系毕业。现任国防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参加编写有：《中国共产党六十年》、《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含著《凯歌行进的时期》、主编《四十年战略演变》等。

探讨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今的一个热点话题，林教授自己也说，他早就想找个机会，凑几个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切磋切磋了。因此，我们用了一个晚上，完成了下面一篇谈话。

访问人：我们想请您谈谈 1956 年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林蕴晖：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问题。从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存在的弊端的认识来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人当中，毛泽东是比较早的一个。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提出了很多重要原则、方针、政策。无论在当时或今天来看，都是很深刻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1957年6月在评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指出：“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在消极地贬斥过去。”如果从1956年前后，由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在不少重要领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访问人：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提出了那么深刻的见解，可后来并没有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反而走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相反的路上去了呢？

林蕴晖：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重要原因之一，是对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从总体上还缺乏认识。

访问人：那就请您谈谈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

林蕴晖：我认为，1956年前后，毛泽东并不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有什么问题，只是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具体方针、政策上有缺点错误。如：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权力过分集中等等。因此，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基本上还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中起步的，没有跳出或突破这个框架。后来我们同赫鲁晓夫发生争论，在批评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我们正确地维护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但同时也维护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果说这时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模式有弊端的话，那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还不干净，他实行的“高薪制度”，还可以滋生出“新的资产阶级”。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建设一个“纯洁”“完美”的社会主义的由来。

访问人：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究竟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毛泽东在这

些基本理论问题上是怎么看的，他对斯大林模式本身触及到的深度如何？

林蕴晖：我的看法是，从斯大林所论述的社会主义来讲，主要有四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是斯大林的一个基本理论。二是统一的中央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商品生产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四是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这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斯大林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在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已开始觉察到建立完全的单一公有制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因此，他在八大前后曾经提出可以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可以允许地下工厂合法化等等。甚至说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样使人震聋发聩、耳目一新的话。应该说，当时把这个问题说得这么透彻，这么深刻，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终究是即席讲话，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既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那么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又要允许私有经济以至于资本主义存在，并要它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呢？理论如果不加以说明，实践必然要发生动摇。

访问人：这就是他的正确思想未能贯彻到底的原因。

林蕴晖：是这样的。事实上从整个观念来讲，毛泽东还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二者是不相容的，没有摆脱这个框框，当时也不可能摆脱。

访问人，需要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补充这一思想是八大时陈云提出的，当时毛泽东同意这个看法，后来的具体情况怎样？

林蕴晖：毛泽东当时尽管同意了，但党内的看法并不统一，也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解决问题。早在1956年底，党内就有人惊呼“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开展的两条道路大辩论，到1958年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终于又决定农村由小社并大社，缩减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城市则强调继续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正是理论上没有突破社会主义是单一公有制这个总体观念的反映。

60年代初的调整，人民公社比较突出的就是把基本核算单位退到以生产队为基础，重新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明确我国的手工业应该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商品流通有三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但在理论观念上，同样没有改变。如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仍肯定1958年人民公社决议中由队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再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正确的。（只不过规定的时间短了一点）。于是，后来又强调由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不割断“资本主义尾巴”。总之，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认识上是基本一致的。

访问人：在计划经济问题上，毛泽东是怎么看的？

林蕴晖：在经济的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很好很重要的思想。《论十大关系》提出两个积极性还是一个积极性的问题，也明确提出要给企业和生产单位以自主权，并强调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这

些都涉及到管理体制问题，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当时提出处理好这些关系，是针对苏联完全由中央集权这个弊端提出来的，很中肯，也很深刻。但仅从行政权力的区分上提出统和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总是在统和分的框框里打转。即：统死了就分，分了又乱，乱了又统，统了又死。可见，仅从权力分配上提出和解决问题是达不到目的的。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困难时期，毛泽东虽然主张人民公社退到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但他绝不允许搞包产到户，认为这是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这说明当时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管理体制看成是一回事，只有统一经营才姓“社”，个体经营就姓“资”。

访问人：在所有制问题和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上，看来毛泽东还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框框，那么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毛泽东曾提出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不要剥夺农民等等，是不是比斯大林前进了呢？

林蕴晖：毛泽东鉴于大跃进中共共产风的教训，重新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并说“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说，毛泽东除了赞同斯大林不能把商品生产简单地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思想外，还明确提出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由此断言：从对商品生产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来看，毛泽东比斯大林“前进了一大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作全面分析。毛泽东使用过“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对商品生产历史作用的认识比斯大林前进了，还要看他商品生产历史作用的具体阐述。从现在能见到的材料看，毛泽东在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发展而不是废除商品生产时，指出最根本的理由，是还存在着集体和全民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对农民不能剥夺。这说明就对历史作用的认识而言，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斯大林的水平。而且他在一次引用斯大林强调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话以后，接着又说：“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他，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这明显地反映出毛泽东仍然是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资本主义的鬼哪里来的？还是商品生产中出来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把资产阶级法权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也就可以理解了。另外，毛泽东在谈到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说，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试问，如果商品生产不讲成本、价格和利润，还谈什么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还不及斯大林，斯大林还比较强调经济核算。

从以上几个侧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尽管很敏锐地察觉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弊端，并据此提出了很多好的见解。但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认识到斯大林社会主义总体模式的缺陷。说来也不奇怪，因为这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吻合的。如果动了这些基本的东西，似乎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访问人：看来，这种理论和认识的局限，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

林蕴晖：是的。所以到60年代同赫鲁晓夫争论时，我们就把苏联包括东欧对斯大林体制进行的一些改革，当作是“修正主义”加以反对。

访问人：这个问题可能还要早一点，在5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问题上就开始了。

林蕴晖：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纠正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错误时，我们曾同意了。但到60年代同赫鲁晓夫发生争论时，把南斯拉夫的问题又提

了出来。1963年9月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可以说是用斯大林模式作为裁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范例。可见，我们是走了一条由吸取斯大林错误的教训，转向维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路，不仅没有从这个模式中突破出来，而且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

现在看来，这种把社会主义看成只有一种固定模式的理论观念，是建国以后党内斗争越斗越“左”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三自一包”到后来提出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一不是把与这种传统模式不一致的党内意见，看成是不搞社会主义，而在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而是搞修正主义。当把党内在搞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不同主张，看成是姓“社”、姓“资”，姓“马”、姓“修”的问题时，斗争就必然成为不可调和，于是要把姓“资”、姓“修”的扫“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就势在必行，理所当然了。

最近小平同志讲，“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这一点确实高明。三中全会以后，如果搞姓“社”姓“资”的争论，第一耽误时间，第二必然把问题引导到政治争论上去。这是历史的教训啊！本来从毛的思想作风来讲，他是注意吸取斯大林搞个人专断的教训的，但后来也走了这条路，其原因，就是把不同意见提到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高度，这样，其他一切制度规定，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等等，都成了次要问题了，政治方向才是第一位的。

访问人：不搞争论是非常现实的，但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没有区分的必要呢？

林蕴晖：问题的实质在于标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条是实事求是。我们今天坚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作为尺度，也不能把苏联模式作为尺度，更不能把我们60年代“反修”斗争中的观点作为尺度。因此，如果不更新观念，我们走了多少年的路还要走回去。所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澄清思想上长期影响着我们的糊涂观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仅仅把毛泽东当年说过的话，简单地指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还不足以使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思想的整体，还是一些平面的直线的东西，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对到什么程度，错到什么程度，要放在一起看，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同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20年探索过程中正确的和错误的思想都有联系，是对毛泽东正确和错误思想进行扬弃的结果。有的同志偏重强调继承毛泽东的正确方面。实际上，不是直接的继承。离开了对错误的否定，正确的东西也没法继承下来。我这里谈的，不是说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毛泽东没有提出什么新思想，而只是说明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毛泽东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框架。

访问人：在您看来毛泽东虽然经过艰辛的探索，但最终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的模式，您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没有能摆脱这种模式？

林蕴晖：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工人阶级却是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了胜利。这就涉及落后国家怎样超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到这个

问题曾经设想，如果前资本主义国家，在获得了一定的历史条件，比如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已经作出了榜样，同时能给落后国家以物质支援，在有了这些条件时，处在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民可以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并没有争取到这个条件，因此列宁去世后发生了一场在一国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斯大林坚持可以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他在实践中首先消灭了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和阶级，虽然还不是像马克思所设想的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完全由国家组织生产、组织分配，但是建立了由中央计划统一管理经济的体制。从基本内容来讲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实践中，以较短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法西斯德国，也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从学习《共产党宣言》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对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后来就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看成是全世界“一个完全的典型”。这不仅仅是毛泽东，整个一代人都是如此。应该承认是有客观原因的。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这种实践，在矛盾还未充分暴露以前，人们的认识要从原来的框框里突破出来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

访问人：我想毛泽东个人的经历、经验，对他的社会主义探索也是有影响的。

林蕴晖：逢先知写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有一段分析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好。他说，毛泽东不是不主张发展生产力，但更多的是考虑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如果这两方面发生矛盾，他更多的是倾向于后者。这个情况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有关。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农民占绝大多数，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对革命队伍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组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夺取政权是起了巨大作用的。几十年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作风，不能不对毛泽东包括他们那一代人发生影响。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在毛泽东身上确实是印象深刻的。回过头来，我们研究一下建国初期贯彻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过程中，为什么出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我认为，无论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还是他对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议的批评，都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也符合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但毛反过来认为刘少奇是思想右倾，给予了严厉批评。说明他们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毛泽东之所以发生这个变化，主要是着眼于防止在农村土改后出现两极分化。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是为了追求很快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以致于消灭差别。结果是事与愿违。根据某些历史事实，有的学者讲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农业社会主义，国外有人说是乌托邦，是民粹主义，这显然是一种轻率的武断。应该承认，毛泽东的思想，总体上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样也应该承认，由于在实践中，他离开发展生产力去片面地追求社会公正，这样，他的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空想。

1992年3月27日于解放军原政治学院

访廖盖隆——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

廖盖隆

廖盖隆，1918年生，广东信宜人。1938年8月到延安。1944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国内评论部副主任，新华社国民党区新闻部主任。建国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朱德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多部著作；主编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中国编年史》、《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七十年》等书。

这位党史界、理论界的老前辈，近半个世纪以来（文革的10年除外），文章屡见报端，大部头的著作接连问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仍笔耕不辍、勤奋治学。当我们约他一谈时，他把时间定在后天晚上，“可后天是五一节呀”我们说。

“没关系，我刚好有空，只是耽误你们过节了”。仅此小事，便使我们肃然起敬。

访问人：在研究毛泽东以及他的生平、思想问题上，时常碰到一个如何看待他的伟大功绩和他晚年错误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廖盖隆：关于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的晚年错误，还是邓小平给我们指出了把握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化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前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邓小平又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访问人：那么，如何把握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

误的关系呢？

廖盖隆：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明确，毛泽东一生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其次是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是性质根本不同而且相反的两样东西。因为我们要坚持并作为行动指南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考验证明其正确性的、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正如我们所要坚持并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列主义，是指由它们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而不包括它们的这样那样的个别错误论断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涵义，和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言论的涵义是不同的，后者是包括他的某些错误观点、错误论断在内的。而毛泽东晚年错误，则不仅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且正好相反，归根到底，这些错误是由于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就是由于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背离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或三项基本原则而造成的，并且它们是由长期的历史考验证明其为错误的。

拿发动“大跃进”运动来看，正如邓小平所说，这种做法“完全违背客观规律，想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这就是说，“大跃进”任务的提出，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也不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的；这些任务是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是一种盲目的冒进；这些任务是由上面、凭主观愿望提出，并用强迫命令的组织手段推行的；推行以后，又没有及时地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这些任务是否行得通，是否正确，从而经过再认识，进行自我批评，及时地改正错误。

发动“大跃进”运动是这样，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包括把富队穷队强行合并在一起、实行剥夺农民的“共产”，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在内），提出以超高速增长为核心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三者合在一起，当时被叫做“三面红旗”），也完全是同样的情况。

访问人：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犯了错误，同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有所不同，因为他初步察觉到了，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看法，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廖盖隆：我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只是初步的，不能说是彻底的。而中央的其他同志，比如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比毛泽东深刻。如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

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他又说：“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

访问人：但是，错误仍然没有避免，“左”的思想继续积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什么？

廖盖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更严重、时间更长的全局性“左”倾错误，同样是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即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背离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党的三大作风或毛泽东思想的三项根本原则的。

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所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决议又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据的上述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完全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也完全不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的，而是一种主观的臆造。而这种主观臆造，正如1959年8月发动“反右倾”一样，是拒绝承认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要求超高速度的总路线的错误，拒绝作深刻的自我批评的表现。不错，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195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的估计，是作了一般的、笼统的自我批评的。他说，他的错误也“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所说的错误，是指所谓在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他仍然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和不能动摇的。这就是说是下面的干部群众执行正确的路线发生的错误，而不是他提出的路线、提出的超出实际可能的任务的

错误。所以，我认为他的自我批评是不深刻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对教训毕竟总结得不够”、“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的。他对上述刘少奇对最近几年来的错误的深刻批评，特别是对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所明确表示的保留态度，是很不满意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毛泽东为了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尽管他是说得很隐晦的。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按：在这里强调的是高度的集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同上文不连贯的——引用者）。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提出这些警告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后来在1967年2月（这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出来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他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专政的国家。

这就像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情形一样，当彭德怀尖锐地指出，“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以后，毛泽东就反过来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且随即把彭德怀打倒了。1962年1月，当刘少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对“三面红旗”表示了明确的保留态度以后，毛泽东就反过来指责说，有人要搞修正主义，要求大家警惕和好好想一想。那时以后，过了七八个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思想就进一步急剧升级，并指责当时出现了“黑暗风”（指刘少奇等把经济困难形势说得很严重，是非常时期）、单干风（指邓子恢提出，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同意的要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翻案风（指所谓小说《刘志丹》要为高岗翻案，也指邓小平等主张用一风吹的办法来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对许多干部的错误处理）、投降风（指王稼祥提出的对外关系上的“三和一少”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所谓投降主义错误）。这样他就明白无误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一线的大多数领导人了。而且这是在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的“左”倾错误、拒绝自我批评和改正错误的情况下，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无根据的臆测和怀疑。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怀疑、臆测和严厉的指责，都是完全错误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说得对：“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访问人：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了很好的总结，同时决议又指出毛泽东在犯错误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这一点也要充分注意到，那么怎么才佬实事求是评

价毛泽东呢？

廖盖隆：如上所述的那些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确实是明白无误、完全错了的，应当彻底加以否定。至于毛泽东晚年在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有长远战略性指导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正确决策，例如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败，防止干部蜕化变质、和平演变、出修正主义，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等等，这些同上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是两回事，这些是当时中央领导层一致认同的，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坚持。同时，这些正确思想、正确决策是同毛泽东晚年占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的思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又必须仔细地、谨慎地加以辨别。

访问人：为什么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呢？

廖盖隆：因为如果对这两者不加以严格区别，我们就会或者是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错误，或者犯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加以坚持的类似1977年到1978年那种“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这两种错误都是对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非常有害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说：“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及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历史决议所讲的这两种错误态度，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存在的。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的右的态度，就是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少数人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反对和批驳这种错误思想，指出这种主张的错误和危害性，消除这种主张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两三年来，还有些人借口1989年中国发生的一场政治风波、东欧的剧变和1991年8月以后苏联的解体，而要求重新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甚至提出所谓“毛泽东晚年思想”这样的概念。有人说，必须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提出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要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为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翻案，就是要推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就是要求回到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老路上去。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集中起来说，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还说中国现在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胜利，甚至公然说“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党内走资派、反对党内资产阶级也是正确的。有人把目前形势估计为现代修正主义要翻天、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要翻天，说最近几年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滥。这样说来，我们正处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前夜，处在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这也是拿大帽子来吓

唬人的。

对苏联、东欧的剧变我们要加以分析。正如邓小平所讲，是共产党自己没有搞好，所以出了事。据我看，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领导体制上的高度集权，实行对人民的专制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个词是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见1956年11月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9页），这是旧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致命伤。另一条是在那种体制下经济建设没有搞好，生产力没有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结果，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抛弃了共产党。说这些国家是现代修正主义上了台，也没有说对。修正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是那些上台的人既没有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没有搞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同他们是不相干的。

所谓最近几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空前泛滥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时，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也是极少数。当时，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是真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真诚拥护改革的。但是，他们采取了类似“文革”中“四大”的做法，结果与广大学生和群众的主观愿望相反，酿成了一场动乱。

最近两三年真正存在的，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那些“左”的东西。他们说，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说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他们竟然批判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正确提法。他们说“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又说乡镇企业正在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农业生产承包制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正如邓小平所说，说这种话的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他们只知道拿大帽子吓唬人。据我看，他们讲过来讲过去，就是斯大林晚期和毛泽东晚期的那些教条，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要拨乱反正的东西。他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攻击是毫无道理的。

其实，足以亡党亡国的，正是使我们放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而且回到过去“左”倾路线的老路上去的那种主张，这是最危险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吓唬人的大帽子下面解放出来，从那种“左”的教条主义，从老的和新的教条主义下面解放出来。邓小平说：“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访问人：您开头谈了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我们觉得，如果从总结经验的角度，不应光是知道他犯了哪些错误，还要总结他犯错误的原因，找到犯错误的根源，这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会更有好处。

廖盖隆：我觉得主要是个认识问题，毛泽东长期生活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中间，后来情况变了，他不能适应，还是拿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他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犯了错不但不承认，而且听不得人家的批评意见，这也是认识上的错误。应该说，他的整个错误，都是在探索中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间发生的，是一个伟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访问人：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缺乏经验，或研究不够呢？

廖盖隆：他在思想指导上犯的错误的三个：一个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再一个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性的错误。这三个是他在指导思想上的主要错误。前面说过，这些主要是认识上的错误。不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不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认识方法，不坚持自我批评，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这三条是他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至于没有经验，当然也是一个原因。历史决议还讲，他对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思想准备。另外，毛泽东对现代经济、现代化的工业管理这方面的东西不熟悉，他对农村的情况了解一些，但也不是全部，他自己就说过，我只知道农业，也是知道一部分。我举个例子，60年代斯诺来访，他对毛泽东说，美国只用百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毛泽东听后不相信，认为这不可能。他不能想象怎么能用百分之三的劳力来搞农业。因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既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又没有调查，他实际上脱离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这些基本的东西。丢掉了这些，犯错误就是必然的了。

不过我们还要全面地看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很多思想是很好的，这包括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有内在的联系。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恢复新民主主义的说法，我们是讲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存在，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企业存在。这些经验也是毛泽东创立的，不过在今天这些经验大大发展了，例如对外开放、发展“三资”企业，就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了不起的创造。我们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大发展。我们今后的任务仍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1992年5月1日于北京万寿路

访金春明——

“文革”起因十说

金春明

金春明，1932年生于吉林延吉，祖籍山东昌邑。现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文化大革命”论析》、《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国后三十三年》，合著有：《不平凡的七十年》、《“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新中国编年史》、《中共党史纲要》等。

金教授的家整齐明亮，大屋小屋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书橱；写字台很大，上面报纸杂志样样齐全；柜子上还有一张全家福。在我们的想象中，教授家就应该这样。

访问人：发生“文化大革命”是我党最沉痛的一段历史。痛定思痛，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为了防止今后再犯这类错误，我们又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都很复杂，请您说说您的看法。

金春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既算清楚，又算没有清楚，还在探索当中。所谓清楚，是因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经过党内集体讨论，大家得出的共同认识。所谓不清楚，是因为海内外学者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观点各异，相差甚远，各执己见，众说纷坛，我们还不能完全说服他们。美国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就曾撰文说：“极少历史事件像毛泽东的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那样令后人众说纷坛。”我认为这个说法有相当道理。众说纷坛到底有多少种？我把它概括为十种。

访问人：金老师，在谈起因之前，是否请您先谈一谈什么叫“文革”，就是说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个问题弄清了，再谈“文革”的起因，大概人们的认识就容易一致了。

金春明：这是一个必须统一认识的问题。到底什么叫“文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文革”的结果来说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作为学术问题，还是可以探讨的。因为“内乱”这个词是中性词，革命可以造成内乱，反革命也可以造成内乱，内乱本身还表示不出“文革”的特点。我个人认为，“文革”可以这样定义：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种特殊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特殊性主要表现有七点：（1）它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2）它有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3）它用一种特殊的神圣使命为号召，如“反帝反修”；（4）它有特殊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5）它有特殊的内容——夺党政财文大权；（6）它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规模。这样七点，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场内乱。很多人赞成我的观点。当然如何更科

《大变动的局限性：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位》。伦敦《中国季刊》1986年12月。

学更准确还可以研究。

访问人：我们探讨了“文革”的性质，下面请您谈谈人们是如何评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文革”起因十说，这些观点都是些什么？他们分析的对还是不对？

金春明：“文革”起因十说，是我对各种意见的概括，不是我对文革的十种看法。情况如下：第一种，阶级斗争必然说。这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期的传统的说法，是上了“九大”“十大”“十一大”文件的。“九大”报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必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激化，激化必然要引起“文革”，“文革”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引申。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文革”曾作出的权威解释，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个观点在国外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个观点已被我们否定了，但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前一段就有人讲走资派还是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对的，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种理论虽然从整体上已经被否定，但它的影响还继续存在，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种，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种观点在港台，在西方相当流行。他们用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观点来反对我们的阶级观。认为“文革”的发生不是政治路线分歧，也没有原则问题，只是一种权力斗争。这种观点很多学者都有，但说法不同。他们对中共党内的派系分析也不一样。有毛派、周派、刘派、军派、地方实力派、务实派、激进派，各种说法都有。同样主张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个人讲这种几派，那个人是讲另外几派。

访问人：权力斗争说根据是什么？

金春明：比较流行的是，他们抓住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大权旁落了，所以他要夺回失去的权力。实际上毛泽东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掌握着全党的最高权力。如果毛泽东失去了最高权力，他不可能违反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的意志去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封建复辟说。这种说法在理论上论述最多的是苏绍智。一个时期内相当流行。之所以流行，也有它的道理。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人们长期受其影响。封建残余及其影响不可能很快消失。而我们党对这一点又恰恰估计不足，认为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因而反封建是最彻底的，甚至哪一个国家也比不上我们。其实经济上反封建和意识形态上反封建有联系但又不能等同。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性。本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影响并不大，但毛泽东极力强调反资本主义。应当承认，“文革”期间确实有封建的东西泛滥，很多东西都是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如“株连”，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按规定丈夫犯罪是丈夫的，不株连妻子、孩子。我们的株连可厉害呀！不要说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就连老同志、上下级都要株连，这当然是封建的。“早请示、晚汇报”也是封建的。“文革”中确实有许多东西是封建的。也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残余是不可轻视的。但就“文革”中出现这种现象来说，我认为是属于沉渣泛起。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平静的池塘，表面上看好像水很干净，但用大杆子一搅，底下的各种东西就会翻上来。翻上来快，沉下去也快。但显示了它们的存在。“文革”中不是讲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跳上舞台表现自己吗？我在讲“文革”特殊意义

时，就强调这一条：“文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国情，使我们懂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残余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它的不妥当也是明显的，就是把封建残余的影响估计过分了，尤其强调是封建复辟则是错误的。“文革”不是封建复辟，红旗下长大的红卫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搞封建复辟。你们是不是红卫兵？

访问人：那时我们还小，小学五、六年级，是红小兵。

金春明：当时那些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十几岁的中学生，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动机很纯洁，就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毛主席。他们抱着这种神圣目的，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但他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受到各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本身不可能是一张白纸。加上天真幼稚，辨别力很差，有时会把封建的东西当成是革命的。例如他们并不清楚血统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两回事，有些人认为自己是高干子弟，就是天然的革命派，这是一种思想错位，是意识形态的错位。因此，这个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

第四种，毛泽东帝王思想说。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当皇帝。这种观点在国内私下议论的不少，但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最典型的是香港的一个刊物上的文章，题目就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帝王思想的产物》。从他发表的文章内容看，这个人可能在大陆受过一点教育，接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他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是地道的创业帝王，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历史就是创业帝王的历史。这个观点是非常反动的。

访问人：他说毛泽东想当皇帝，根据是什么呢？

金春明：根据不多。主要是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他认为1935年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相当显赫，但他只是毛委员，不是主席。帝王思想还没有表现的机会，遵义会议后取得了军权，他感到已上升到帝王的位置了，于是帝王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几年之后，就有“雪”一词的诞生。这首词不仅表明毛泽东要成为创业帝王，而且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查了一些材料，想看看这种说法是不是这位作家的创造。结果是这样：1945年秋毛泽东的这首词在重庆发表时，当时的重庆曾掀起一股《沁园春》热，有很多人唱和。蒋介石知道后很恼火，下令批驳。《扫荡报》就发表文章，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扫荡报》大家知道的，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机关报。原来发明权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该氏只不过是40年之后拾了军统特务的牙慧。

第五种：乌托邦碰壁说。这是苏晓康等在电视《河殇》解说词和专著《乌托邦祭》前言中所宣扬的。他们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规律，是乌托邦的空想。其实乌托邦说也不是苏晓康创造的，而是来自外国学者的看法。早在1981年，美国的施拉姆教授就提出过这种看法。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到乌托邦去和返回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当时廖盖隆同志就写文章作了否定的回答。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也有这样的提法。乌托邦这种观点从国外传来，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到底是不是乌托邦需要作出回答。最近《教学与研究》邀我写东西，我和我的学生写了一篇《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研究》。我们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科学社会主义观，其中由于历史的局限，确实加杂着某些空想成分，但总体上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他不但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探索有发展，

这个问题应该肯定。不然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竟是搞了个乌托邦，是不能服人的。

第六种：群众反官僚主义说。这种观点港台有，国内私下议论的有，但在国内报刊上长篇大论不多。他们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群众有气，是干部脱离群众。毛泽东不是也说过吗，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摆架子。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确有纯洁党的组织，反对官僚主义的含义。但主线不是这个，主线还是反“走资派”，“反修防修”。开始挨整的那些人都是在第一线辛辛苦苦干事的人，刘少奇、邓小平是官僚主义吗？不是。这一点在地方上更明显，常常是那些长期休养不干事的干部最早被结合到领导班子里来。这样的例子很多。另外，“文革”前后的所有中央文件，也没有明确把反官僚主义作为“文革”的主要任务。

访问人：从当时提的口号看，这个问题也不突出。

金春明：所以要把问题区分开。从群众来讲，确实有不少人是出于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对某些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有气，才积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这并不能决定运动的性质。说到底，“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群众运动。

第七种：东西文化冲突说。这是一位青年学者的观点。他提出“文革”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与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尖锐对抗的一种集中表现。认为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对抗和较量从近代开端就没有停止过，“文革”是其中一次全面的冲突和对抗。“文革”发生完全不是什么党内路线斗争，而是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忠君意识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同现代化的发展和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学、思想自由、人权平等、法律至上的文化价值体系尖锐冲突的结果。“文革”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复苏。这种观点在一些知识青年中有相当影响。但认真研究一下，不过是抽象的议论。他错误的地方是，首先，不符合历史事实。科学、民主的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在中国传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关键。矛盾冲突一百年，怎么到了一百几十年后的六十年代冲突出一个“文革”，这没办法用历史来解释。其次，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归之于封建专制君主思想，把西方文化归之于民主文化、人权文化，这个立论本身就是片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民主性的精华，不都是君主专制。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和中国实际（包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得到了创造性地发展。“文革”之中有文化冲突，但说“文革”的原因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而且把西方文化讲得绝对好，东方文化说得绝对坏，则是错误的。

第八种：人性兽化说。这种观点主要产生在文艺界。他们在议论中或作品中描绘，为什么出现“文革”，就是因为那一天人突然都变成了兽，一种是“牛鬼蛇神”，被专政，一种是豺狼虎豹似的“造反派”。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老作家巴金，他说：他经常思考、探索，人怎样会变成兽？他对于自己怎样变成牛马有了些体会，至于造反派如何化为虎狼，却怎么也想不通，柏杨教授讲“文革”是兽性横行，还有人写文章，叫《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说“文革”是道德的大滑坡，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忏悔。这样就把“文革”这场大灾难，归咎于人性，归咎于道德。“文革”有没有野蛮的东西，当然有，但从人性上解释是说不清的。

访问人：这只是一种表现，不是起因。

金春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十几岁的孩子很纯洁，他们穿着军装，

拿着皮带，是很凶的。一经宣布某人反毛主席，是坏蛋，那他就义愤填膺，死劲整，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把原因归结到这儿也不行，一个历史现象，不是光用人性、兽性就能说清的。

第九种：奸臣祸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颇多，但很少系统论述，而是散见在传记和回忆录及各种文章中。“文革”中有些事情本来是毛泽东决定的，把一切坏事都说成是林彪、“四人帮”搞的，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林彪、江青、康生坏透了，怎么说都可以，但有些是他们的，有些不是，要作分析。不能再回到中国传统的思路上去，无非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有了错误皇帝没事，都是下面人使坏，而且坏人中最坏的还是女人。江青的确干了很多坏事，国人皆曰可杀。但认真想一下为什么她过去做不了坏事，如果毛泽东不给她支持，她有那么大能量吗？

访问人：还是应看作是制度上的问题。

金春明：有制度上的，有习惯上的，也有毛泽东个人的错误，这都是不能回避的。研究历史还是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史实。毛主席伟大，但不是他的每件事都伟大，都正确。中国有个传统习惯，从孔夫子那里讲，有三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不希望人们怨恨老人家，都希望他好。但确是老人家犯了错误，你给他遮盖，能遮盖得了吗？林彪、康生、陈伯达原来在党内还有些地位，“四人帮”中谁在党内有地位？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所以把“文革”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党内出了几个坏蛋，是不行的。

访问人：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能正确总结“文革”的教训了。

金春明：这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讲的，如果把路易·波拿巴政变仅仅理解为出了几个坏人，那就太可怜，太幼稚了。

第十种：即“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这也是我持的观点。我们是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对历史作了充分的研究分析得出来的，也是现在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具体他说，可以把它概括成“三个恶性循环”。第一是“左”的理论与“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这是从政治上思想上讲的。1957年反右以后，先是毛泽东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认为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误断是毛泽东提出来经八届三中全会同意的。根据这个精神后来搞了一系列运动。毛泽东曾说，北京是加工厂，材料是从下面来的，的确如此。毛泽东本来就“左”了，下面又有人投其所好，当然也有人认识问题，有人是调查研究中的片面性，但汇总到毛泽东那里，他就会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再概括提高，贯彻下去，结果越搞越“左”。比如，认为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最早并不是毛泽东说的，是下面报告来的；工厂大多数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也是下面报告来的，还有官僚主义问题，夺权问题等等，都是从下面来的。毛泽东有个突出的思想特点，就是思考问题透彻，看问题深刻，善于抓本质、要害。如果他进行了正确的概括、总结会比别人深刻，反过来，他进行了错误概括也会比别人错误得厉害。就这样，“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着左倾实践，而左倾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实践（包括人为地创造“阶级斗争”又仿佛为“左”的理论找到了实践依据，强化了左倾理论。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个恶性循环是个人崇拜与集权体制的恶性循环，这是从组织上讲的。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理论”，有意鼓励了个人崇拜。

比如 1958 年毛泽东讲有两种个人崇拜，就为个人崇拜开了绿灯。1959 年庐山会议批了彭德怀，林彪上来后，第一篇文章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阔步前进》。林彪是有意识的极力推崇个人崇拜的，在他的笔记中就写着“得一人者得天下”。由于毛泽东本人的默认和提倡，再加上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推波助澜，个人崇拜就盛行起来了。本来中央的集权体制就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反过来个人崇拜又加强了集权体制。领袖被神化了，权力完全集中于一人之身，这样就出现了毛泽东个人可以否定政治局决议，凌驾于政治局集体之上的极不正常的局面。

访问人：看来林彪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

金春明：也可以说研究透了。相反，我认为毛泽东没有看透林彪。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在“山洞”里给江青的信，有人说那时毛泽东就把林彪看透了。我不这样认为。这封信的基本点是：我的朋友要借助我的名义去打鬼，我就自愿当了钟馗。你们看，他是在朋友和敌人之间进行选择的，很明白，“朋友”是林彪，帮我打鬼的，“鬼”是刘少奇。他对林彪的基本估计是朋友，而且是帮助他打鬼的朋友。这对林彪是肯定的。此外，毛泽东 7 尺写信，“8 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把林彪提名为全党第二号人物，如果说毛泽东把林彪看透了，这个问题就难于解释。

访问人：记得好像有谁说过，1949 年我们进城时，人们就想到将来接班的很可能是林彪。

金春明：这个说法我没有听说过。但毛主席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欣赏林彪，而林彪也是被提拔最快的。1928 年上井冈山时是连长，到 1930 年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

访问人：好像长征那一段他们之间有点别扭，林彪曾建议请彭德怀出来代替毛泽东指挥。

金春明：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受了彭德怀的指使，被人当傀儡。

访问人：毛说林彪只是个娃娃。

金春明：总的讲毛泽东对林彪一直很重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资格比林彪老的多得很，但林彪是第一把手。这些都值得研究。

访问人：我们扯得远了，是不是请您谈谈第三个恶性循环。

金春明：第三是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所谓“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现在大家都在重新反思。而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观点确实认为大多数党都不信马列了，变成了修正主义。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封锁，就更认为有必要在国内搞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公开大论战影响巨大。国际论战也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认识。这两种矛盾交互作用，互为因果。

访问人：现在人们对修正主义的看法，似乎还是不很一致。

金春明：是这样的。叫不叫修正主义值得研究。如西方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和我们就不一样。有的评价很高，有的很低。如：说他是伟大的改革者，失败的改革者，蹩脚的改革者，鲁莽的改革者等等，反正都承认他是改革者。我们还讲不讲他是修正主义，值得研究。我主张，不要笼统叫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已经被叫烂了，有些是弄错了，为什么还要捡回来用呢？

这三种恶性循环作为理论分析是分开说的，其实作为现实生活是搅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很难单独分开。恶性循环的结果，最后导致毛泽东对国际

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内情况的错误判断：如果不来一场大革命，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这样他下了错误的决心、发动群众搞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果出现了一场巨大的全党和全民族的历史悲剧。

访问人：刚才您讲了“文革”的性质，“文革”的起因，再请您谈谈对“文革”的评价。

金春明：对“文革”的评价，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该不该彻底否定，能不能彻底否定，过去彻底否定对不对。说到底就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彻底否定的观点。这个问题我讲得最多，以至有人说“彻底否定”是我提出来的。我说不是，发明权不是我，是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这有文件作根据。其精神是源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清楚，“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社会进步，它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纲领，只能造成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坚持彻底否定观点，就是贯彻《决议》。龚育之同志曾说：《决议》既是政治权威，也是理论权威。这个话我赞成。所谓政治权威，因为它是中央全会的决议，作为党员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就是要和党中央的正式决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某个领导人的某次讲话保持一致。所谓理论权威，因为它是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是拨乱反正的集中表现。《决议》代表了我们对党的历史分析的最高水平，而且经过十年的检验证明是站得住的，所以今天必须坚持。

访问人：现在对“文革”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金春明：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彻底否定了“文革”，就是违背了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我觉得不能这样看。我们说的否定不是一般哲学上说的肯定、否定，也不是从扬弃意义上说的否定之否定，而是从政治上讲的。为什么要加“彻底”二字，就是表示“坚决性”。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干净、彻底、全部”，必须百分之百的否定。不是说它史无前例吗？已经空前了，那就让它绝后，决不能再搞了。搞一次“文革”已经伤筋动骨落后了许多年，再折腾受得了吗？再折腾，中华民族就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

我们说彻底否定，还因为《决议》是在坚持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一分为二不是折衷主义，也不是说任何事物都只能有好有坏，都要好坏兼半。有的事就是坏事，比如黄色的东西就是坏的，这还能讲一分为二？什么事都机械地一分为二，这也是走极端，把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混淆了。

还有人认为，“文革”十年还是有成绩的，比如粮食产量增加了，南京长江大桥修起来了，卫星上天了等等。这样认识也是混淆了概念。我们说彻底否定“文革”，是否定“文革”的本身，不是“文革”十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怎么能否定了呢？十年历史和“文革”本身是两回事，“文革”是在特殊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我们否定的是这个运动，而不是历史。如果没有“文革”，那些生产会搞得更好，成绩更大。如卫星上天，如果你们看了聂帅的回忆录就会知道，卫星早就做好了，并准备发射。给中央打报告时，让晚点发，等开“九大”时再发，好证明是“文革”的胜利成果，所以推迟了。哪里是“文革”的成果嘛！南京长江大桥也是在“文革”前修的，本来早就该通车，因为“文革”起来后建桥工人打派仗，所以推迟了通车。你说这是“文革”成果，还是“文革”错误？如果没有“文革”，大桥早就通车了。所以要否定的是“文革”本身，不是十年历史，十年中党和人

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坚持生产和工作，坚持科研，都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否定。

还有人认为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了毛泽东。这个也要弄清楚。否定“文革”，不是否定毛泽东，也不是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决议》已明确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即使晚年犯了“左”倾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他还是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当然哪些是对的，可以具体研究，有人估计高些，讲了九条或几条，有人估计没那么多，都可以讨论。

而且我特别感到，“文革”的后遗症至今仍然存在，随处可见。如姓“资”姓“社”的问题，就包含着“文革”思维定式后遗症的体现。因为“文革”中特别流行着两种观点：一个是只有两边，你站在哪一边？红卫兵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方面就是革命派，站在反对方面就是反革命派。还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变成两极化了。世界的事情本来是很复杂的，并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拥护就是反对。毛泽东的话，本来是在抗战时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讲的，有根强的针对性。把他的话离开具体的时间、条件，统统拿来套，就会出问题的。有一个当时流行的观点是：事事连着纲和线。无论什么事都上纲上线。比如，在于校劳动时，不小心碰坏了一把锹，说你不是劳动人民的感情，是资产阶级的感情。上纲上线，批评个没完。实际上并不是事事都能上纲上线，有些事是要上纲上线的，但大多数不是。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大多数事情都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还要上纲上线，就完全错误了。事物本身有大有小，不能随便都提到纲上去。联想到历史，王明路线错误时间只有四年，我们用了十年中间还经过了延安整风才得以彻底清算。“文革”十年，加上前后有二十多年，“左”倾思想方式可说是家喻户晓，要彻底清除其影响，决非易事。

访问人：我觉得，这主要靠实践。

金春明：实践是需要的。但实践也还需要总结，需要等待，不能立即见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加上一项宣传的任务，就是宣传《决议》的精神，贯彻《决议》的精神。这项任务要靠我们历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去完成。

1992年5月24日于中共中央党校

访于南——

从毛泽东处理 “九一三”事件说开去

于南

于南，1928年生，吉林集安人。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简编》、《中共党史大辞典》等。

骑行一小时零十分，找到在中央党校的于南教授家。心直口快，坦坦荡荡，是他给我们的初次印象。那天天气很好，暖风拂面，正是北京不冷不热的季节，所以说得也顺当。告辞出来，见到教授家后院菜畦中的花椰菜长得正盛。

林彪的出逃是被迫的吗？

访问人：1971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在我国当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是什么，成为近几年一些人们议论的话题，您是搞“文革”史的，请谈谈您的看法。

于南：“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以及定性，随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以及近几年一些史料的披露，除某些细节外，基本是清楚的。我认为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是冷静的，措施也是得当的。现在有人认为林彪出逃是被迫的，也就是说被叶群、林立果等劫持走或被骗上飞机的。这不符合事实。

访问人：这种说法国外早就有流传。

于南：国外主要就是1983年出版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这本书。我已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写了篇短文，作了批驳。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究竟是否被劫持问题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关键的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李跟随林彪14年，最后和林同车去山海关机场。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因为林彪原来对李说是去大连，现在听说去伊尔库茨克，是到苏联，李怕当叛徒，想到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愿跟他们一道走，就突然喊停车。司机当时是听他的口令的，车一停，李便跳下车，车里人向他开枪，击伤左臂，李用右手掏枪还击。李文普在“九一三”后，一直这么讲的，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从未改口。此外，林彪在北戴河96号楼上车时，很多人看到并没有人强拉他上车。因此劫持的说法不能成立。

叶群也可能作了准备：万一林彪不走，到时就强迫他走。也不排除叶群说些瞎话欺骗林彪，或说些威胁、恫吓林彪的话。林彪在决定是否逃跑时，有激烈的思想斗争，说过不想走的话，这也不难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最后下令让李文普调车去机场的是林彪。林彪愿听他老婆、儿子的摆布，却不信任中央和警卫部队，只能由他自己负责。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掌握军队实权，身经百战的元帅，在周围有大批警卫部队的安全环境中，竟会被一个50岁左右女人，20多岁的毛孩子绑架、劫持走，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管林彪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必须对出逃一事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这是谁也开脱不了的铁的事实。

访问人：还有一种说法，林彪的出逃是被毛主席逼走的。于南：这种说法也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国外有的出版物也这样说过。我认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尽管林彪一伙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毛泽东还是有意保护林彪。他在南巡讲话中说：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谈什么？无非还是想挽救他。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替毛泽东想想，他本人愿意出后来那种事吗？他根本没料到林彪会暗害他。林彪是他选定的接班人，并写进党章。他是不愿看到他的接班人出那么大大问题的。就是对林彪不满意，也不会采用逼走和整死的办法。

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对林彪不信任了

访问人：林彪摔死后，毛主席衰老了许多。

于南：是的，他大病一场，受的刺激太大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对林彪是不满意的，特别对他们一伙搞阴谋诡计很反感。他采取了几项削弱林彪一伙权势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访问人：从总体上讲，毛泽东对林彪还是比较信任的。

于南：我的看法，过去，毛泽东对林彪是信任的，但对林的弱点或错误毛泽东也是知道的。在“文革”前毛泽东就考虑过接班人的问题。周总理曾对王稼祥说过：将来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到底是谁？没有定。但“文革”一开始，邓小平受到批判，当时发动“文革”需要军队支持，只有选择林。

毛泽东如果根本不信任林彪，就不会叫他当接班人。但这种信任是有限度的。林作为二把手从来没有享受到像刘少奇当二把手那么大的权力，是林不想要吗？不是，是毛泽东不给他。

访问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于南：毛泽东可能是鉴于过去的教训，给的权力太多，怕再出现大权旁落。为什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林彪一伙抢班夺权？就同这种情况有关系。林彪集团同江青集团的矛盾，以及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种种表演，我在1992年《党的文献》第3期上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已经作了些评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面对林彪、江青两派的争夺，可以有几种选择：对双方都支持，这不可能；都反对，也不行，两派都是靠他崛起的，这样做等于否定了他自己。还有两种选择：或支林压江，或支江压林。毛泽东都没有这样做，他批评了林，但也没有明确支持江青的言论。当时这是最好的最没有副作用的处理方法。毛泽东还十分讲究策略，在会上就抓陈伯达、吴法宪，就点名批他俩。后来随着批陈整风的进展，毛泽东才知道林彪等在背后搞了一些阴谋活动，非常恼火，才出去南巡。当林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十分紧张，于是在叶群、林立果筹划下，经林彪同意，便阴谋暗害毛泽东，事情败露，只好出逃。

所以，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犯了全面性的错误，但不是所有事都错了。哪怕毛泽东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一旦发现他进行篡党夺权，要搞武装政变，也毫不留情地在周恩来协助下，领导全党，指挥军队，及时平息。当时的处理方法也都是稳妥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护和起用了一批老干部。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说明了什么？

访问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于“文革”起了什么作用？

于南：“九一三”事件发生于“文革”中期，它在“文革”中起了分水

岭的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把“失败”说成“破产”。这本书说：林彪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接着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十二个问号。问得好，不愧为大手笔！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真实想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打破，至少认为毛泽东不是神，看人也有看错的时候，林彪这个接班人就选错了。这是无法遮掩的事实。人们对“文革”怀疑和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林彪这样的反革命集团，除林彪一伙的个人野心外，应该说同我们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某些弊端有关系。就是邓小平 1980 年说的：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同残存在党内的家长制作作风分不开，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还说：要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如何解决？就是要从改革制度着手，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搞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损害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文革”中的“公安六条”，实际上是保护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压制人民对他们的抵制和斗争。这些教训是很深刻的。

中国以后还会出现“文革”吗？

——也可能发生……但绝不能发生了

访问人：您认为，类似“文革”这种事情，今后还会重演吗？

于南：我大胆地冒叫一句：如果不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些许动摇，大家不警惕“左”的苗头，不注意防止“左”的东西，让林彪、江青之类人物出来捣乱，那类似“文革”的悲剧，不管人们怎样深恶痛绝，它就有可能在中华大地或局部地区重演。早在 1979 年 7 月，邓小平就在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我原以为经过拨乱反正，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整党，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看来我是像小平所说的：想得太天真了。

访问人：您能举出一些事实吗？

于南：可以。比如前两年有人鼓吹：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是和历史决议、党章总纲“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唱反调吗？这个缺口一打开，必然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再发展下去，离“文化大革命”就近在咫尺了。去年又有人说：1957 年毛泽东提出的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要长期进行下去。这合适吗？首先，我怀疑这位同志是否了解究竟什么叫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1957 年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9 年庐山会议打退彭德怀的进攻，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91 年还要肯定这个命题，不能不使人担心是否又要开展反右派或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其次，1957 年就说过：现在找到了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肯定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

命，必然要肯定它的形式，这不是在呼唤“四大”吗？接着，我们会听到“文革”这个魔怪的脚步声了。最后，1981年的历史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否定了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正是这一理论要点之一。肯定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肯定“继续革命论”；肯定指导“文革”这个理论，下一步的实践必然是“文化大革命”了。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你们看可怕不可怕？还有人说某某就是“走资派”，连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的话，也有人要重新肯定。虽然这只是些苗头，却令人十分担心。如果邓小平这次不出面说主要防止“左”，任那些“左”的东西发展，那还得了吗？

当然，作为历史、作为学术问题，究竟“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命题是否正确？它的内涵又是什么？不是不可以探讨，但不能把对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异议的同志，都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拨乱反正以来，我没有看到任何党史教材、党史工作者再去肯定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从它的提出及其以后的实践，认为它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理论的一个起点，这已成为党史界、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我不明白到1991年再肯定它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

访问人：这个命题的重新提出，是不是和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大背景有关系？

于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恢复过去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左”的错误的东西。这几年，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队伍中已经出现苗头，有些人试图把毛泽东晚年（主要是“文革”前的）的“左”的东西隐隐约约重新加以肯定，这恐怕不对头。那些东西已经试过了，实践证明不行，干吗还要再拿出来？现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应该好好区别一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错误的坚决不能再，正确的就要继承和发扬。邓小平说得好，什么叫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许多事情已经拨乱反正，为什么还要回到以前错误做法上去呢？

访问人：继承和发展有个前提，就是拨乱反正，没有拨乱反正，就谈不上继承，也更谈不上发展。

于南：作为学术问题，过去否定过的东西，如果否定过头了，可以再探讨，说了过头的、不大妥当的话，也可以再纠正过来。但是重大是非，党中央已经作了明确决议的，有了基本结论的，就应该坚持。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内部探讨。不能在报刊上公开反对。我不理解：党章明确讲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怎么能公开发表文章唱对台戏呢？又如，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央明确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政治上一视同仁（有时叫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新政策。可是去年就有人提出应恢复“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这行吗？我当时真想喊：需要起来保卫三中全会路线了。

访问人：如果真的改变了这一方针，接下来就会伤害一大批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受到影响。

于南：那当然！知识分子说不定又会成了“臭老九”。政策要有稳定性，不能随意变。为什么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我国

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决定的。在这点上，邓小平抓住了要害。主要矛盾一变，基本路线也非变不可，我认为最近几年，有些“左”的东西是在反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也是反倾向斗争的一个规律。反“左”容易出现右，反右容易出现“左”，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反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左”的东西就冒出来了。邓小平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根深蒂固。这就抓住了要害，“左”的东西有些是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习惯，说“根深蒂固”是非常恰当的。

当然，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和“四人帮”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思想体系确有某些相通之处。

访问人：为什么反右容易反“左”难呢？

于南：首先，看看历史。建国以后，我们多次反右，却很少反“左”。并不是实际工作中没有“左”，而是把“左”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保护和肯定。同时又把一些正确或并非右的倾向当作右来批判。有些人是以“左”来反右，使“左”的东西，借反右之机得以发展，“左”便成为一种很大的习惯势力。其次，从认识论上说，长期流传一个说法：“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邓小平南巡谈话说：“‘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怎么会比右好呢？把社会主义给葬送了，还不是立场问题吗？“左”带有革命色彩，教条式地搬几条语录，容易迷惑人。第三，就是过去对犯“左”的错误和对犯右的错误的处理不一样，反右是噱哩咔嚓，反“左”则是羞羞嗒嗒；反“左”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右则把人整得死去活来，没完没了。彭德怀是明显的例子，他是右吗？不过是抵制了“左”的东西，就把他说成右，以至整死。而犯“左”的错误的，有几个受过处分？顶多检讨几句，这里不能呆了，换个地方就是了。长此以往，一些人心理就是宁可“左”一点，总比右保险些。

还有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淆。不能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流派，随意上升为政治问题，乱扣帽子。邓小平这次说：拿大帽子吓唬人，这就是“左”。有人似乎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一切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一律斥之为“自由化”，这行吗？学术问题能几个人垄断吗？怎么能把一切不同意见统统说成是自由化，任意扩大“自由化”的范畴，势必掩盖真正搞自由化的人。

访问人：您能举些具体例子吗？

于南：去年有一个杂志，发表一篇读者来信，硬说某著名作家一篇寓言式小说，是影射攻击一位老前辈的革命家。证据是配合了境外某些攻击舆论。我特地找来看看，没看出有影射的地方。却使我感到这家杂志的做法和“文革”中批“三家村”的手法有些相似。为什么要拿海外舆论作依据呢？他挑拨离问你也信吗？有人就是摆脱不了“文革”及其以前“左”的思维定势：国外有什么风，国内就有什么浪，国内出点事，要到国外找依据，什么配合国际反华大合唱呀，是国外敌人的应声虫、代理人等等。我们为此造成的冤案难道还少吗？怎么就不接受教训？

我不理解的是：有人过去执行了“左”的一套，整过人。但在“文革”中别人比他还“左”，又整了他，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按说应该觉悟了吧，挨整的滋味不好受，挨过整的干部都会有这个体会的。可是有人一有机会还想整人，这是很可悲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很佩服两位老同志，他们过去执行“左”的东西，整了好多人。“文革”中他们被整得死去活来，

拨乱反正，平反以后觉悟了。见到被他们整过的人一再表示道歉，对“左”的东西，警惕性也很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有这种精神，应该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

1992年5月30日于中央党校

访王年一——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侧面

王年一

王年一，1932年生，江苏扬州人。解放军国防大学正师职教员，多年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工作。著有《大动乱的年代》、《执政党建设研究》（合作）、《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是《中国改革大辞典》主编之一，并参加编写《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发表过几十篇中共党史论文、文章。

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王年一为“党史专家”。约晚上十点半，我们拨通他的电话。好久，听筒那边才有声音，原来教授已经休息，他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我们连忙道歉，他连连说，不知者不为怪嘛！

访问人：多年来您一直研究“文化大革命”，并写出了专著。能不能请您谈谈晚年毛泽东？

王年一：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建立过丰功伟绩。邓小平说过：“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我谈晚年毛泽东，力所不逮。只能就毛泽东晚年工作作风的一个特点——专断，谈谈自己的看法。国内外都有人把它仅仅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或者若干人，或者予以不正确的解释，甚至因此给予毛泽东以恶溢，是我所不同意的。我力图对此作出比较科学的说明。

访问人：我们同意您的观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说明。《决议》说：“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决议》还说：“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那么请问：毛泽东晚年的专断，您能举例吗？

王年一：事例很多，不妨举几个：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他对此从不讳言。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包括九大政治报告）里多次以歌颂性的语气述及这一事实。“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也是如此。从未有过“文化大革命”是党或者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的说法。陈云从组织原则角度说过：“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陈云文选 1956—1985年》第246页）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毛泽东又走上第一线。此后，种种事实说明，他对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不尊重。

访问人：请再具体些。

王年一：支持红卫兵，发动红卫兵运动，是他个人决定的。

未经中央讨论，他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批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矛头指向中央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殃及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人，用以扶持造反派，压制所谓“保守派”。周恩来、陶铸、

王任重都不同意这个提法，周当面向毛提出不同意见，都被否定。

支持上海夺权，是毛个人决定的。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唐平铸、胡痴以重要工作人员的身分参加），谈支持上海夺权问题。请注意，与会者中没有林彪或者常常代表林出席会议的叶群，没有周恩来、康生，没有中央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王力在一个材料中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总理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叶群也没有通知。”会上，毛口授《人民日报》转载《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语，当场审定，第二天见报。这个编者按语，不仅高度评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而且指出：“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年1月15日，陈伯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几万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刮起的“接管风”。周恩来接着讲话，说：“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要像上海同志向我们警告的形成‘接管风’。”毛泽东迅速得知，当天召开小会批评周、陈，讲了一番话。王力据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此文经毛审定，发表于1月16日《人民日报》和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这是号召全国全面夺权的第一篇文章。著名的“二月抗争”说明，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不赞成如此这般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正确意见被毛泽东个人否定。此后，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而代之。

访问人：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斯诺说过：“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是一个喜欢自由行动不受约束的人物。反映在政治上，他是不是愿意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比较欣赏个人专断呢？

王年一，不是，绝对不是。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是载入党章的，就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左”倾的党章也是载入的。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个报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审阅过）中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张闻天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时，作风很民主，毛泽东称他为“开明君主”、“明君”。这虽是戏称，但说明了毛泽东对民主作风的肯定。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如果不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一人称霸”，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指离开北京十个月——引者注），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这几句话讲在1975年，特别耐人寻味，可以理解为是对“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否定。

事实上，毛泽东在1957年以前的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但不专断（1957年以后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专断，也远非事事专断），而且是坚持民主集中制

斯诺说毛泽东讲的是“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译本第176页。龚育之在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的《再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中指出，这给弄错了，毛泽东讲的是：“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模范。参加编写《毛泽东年谱》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的作风非常民主。凡大事都与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而不一人做主。十分注意倾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建议，用以完善、修正自己的意见，甚至在与中央同志讨论后据以改变中央的决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确实是林彪先提出的，毛泽东、中央同意这个方针，把它作为中央的方针。粟裕建议中央改变派一部过江作战的决定而发起淮海战役，毛泽东、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批准了这个建议。许多好的意见、好的主张，是从下面上来的，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回过头来说，毛泽东并不认为专断很好。不要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是普通人，也不会认为个人专断很好。

访问人：个人专断在理论上自然都是站不住的，但毛泽东晚年还是犯了一些个人专断的错误。现在在学术界、在民间都有人认为这是受了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原故。您是怎样看的呢？

王年一：我不敢苟同，因为此说距离事实太远。

毛泽东早年是卓越的民主斗士。大量事实说明，他在各方面（包括生活上）反封建主义是很坚定、很彻底的。用受封建主义影响很深来解释，与毛泽东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并不专断这个事实相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后来却受了很深的影响，这是说不通的。

访问人：那末，毛泽东在晚年为什么专断了呢？

王年一：毛泽东晚年的专断，无非为了维护他的意见、主张。情形常常是这样的：毛的意见、主张不为中央集体所接受，或者势必不为中央集体所接受，而他认为自己的意见不仅很正确，而且很重要，他就专断了。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任何人都不会为专断而专断。1956年经济工作中冒进，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冒进，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同意制止冒进。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批准解决冒进的问题。这与毛泽东的“反右倾”的主张不合，毛是主张建设速度快些、建设成就大些的（谁也不反对速度快些、成就大些，但要做得好。）毛泽东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8年1月南宁会议（九省二市委书记会议）、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一次比一次讲得尖锐、严厉，否定了中央集体的意见。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发动批判彭德怀。讲话是个人讲话，发动批彭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决定。何以不付诸讨论？因为估计中央集体不会同意。事实上，批彭不过是抓个典型，它是针对党内（首先是党内上层）的所谓“右倾”的。1962年8、9月间中央先在北戴河后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前发了通知，规定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毛泽东8月6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突出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改变了中央集体规定的会议的主题，并且为9月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定了基调。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问题是个基本问题，必须提出。

这几个例子，都说明毛泽东的专断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见。他并不是不承认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放弃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他长期代表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使他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指导党，他

又有可能机械搬用了他在历史上独排众议而获得伟大成功的经验，因而专断，与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去甚远。

访问人：毛泽东晚年的专断一定是有特点的？

王年一：是的。毛晚年专断的特点就是需要组织承认。毛泽东尽可能地掩盖它。个人专断在毛泽东说来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十分需要中央集体同意他的意见，或者事后批准他的意见。他以个人的崇高威望先在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一些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会上自然都无异议，中央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就批判了反冒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造成批判彭德怀的事实，使中央难于拒绝他的意见。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毛泽东也需要中共九大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很特别，他需要组织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如对毛泽东的信赖，在毛泽东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不得不顾全大局，对某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而提不出意见，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领导制度不完善、不健全），中央集体常常违心地或者不违心地接受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使他的独断成为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不仅使持不同意见者更难于抵制，而且使毛泽东更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意见。

访问人：邓小平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王年一：这种由集体决定掩盖个人专断的奇特现象，是由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毛泽东以前长期代表正确因而具有无人可以匹敌的极高威望是一个重要条件，领导制度不完善、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等更是没有反对过。既然如此，就不能仅仅归咎于一人或者若干人。

毛泽东需要组织承认，这也说明了他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很好，也说明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

访问人：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什么要说“我是和尚打伞”呢？

王年一：上面说的是1957年至1965年的一般情形。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重大举措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那更有特别的原因。

事情很复杂，我在这里只说个大概：

自1960年起，我们进行了“国际反修”。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那么对60年代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应当怎么看？从原则上来讲，不能认为全部是错的，也不能认为全部是正确的”。叶剑英1979年9月29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说：我们“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当时我们认为全部是正确的。苏联变修了，东欧许多国家变修了，这是当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全党的共识。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在中苏论战中，国际共运大分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分裂，产生了新的共产党——同意中共立场、观点的党，与原有的、同意苏共立场、观点的党相对立。中共成为“坚持马列主义”一派的核心，毛泽东成为这一派的领袖。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自封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国际共运向何处去的问题。

指导国际共运，说一千道一万，首先要把中国搞好，要使中国成为高举马列主义大旗的样板。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发生了重大变化，“复辟”了“资

本主义”，中共中央不能不接受教训，毛泽东不能不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们以自己的观点进行国际反修，它没有影响苏联分毫，却真真实实地极大地影响了自己——正确的方面、不正确的方面都影响了自己。1960年以后，毛泽东在若干重大问题上违反了他本人在此以前的正确思想，似乎难以理解，其实症结就在于国际反修。他对问题重新作了考虑。针对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为全会所同意。本来我们在1957年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就有重大失误，这一次是错误的大升级。苏联的重大变化肇因子苏共领导集团的重大变化，苏共领导集团可以发生重大变化，中共领导集团就不能发生重大变化吗？处于最高领袖地位的毛泽东考虑了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种情况”，就是国际反修。

“党内同志间”，主要指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之间。“党内关系”，主要指毛泽东和中央第一线的关系，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处在第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比较务实，有许多正确的主张，毛泽东视为右倾乃至修正主义，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愈来愈不信任中央第一线。

访问人：这是毛泽东专断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只是我们感觉，问题不仅这些，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王年一：是的。国际反修的深化，强化了中国是“世界的革命中心”这种认识。这种认识的强化，又深化了两个想法：一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鲜艳红色的样板；二是认为中国的现实太不纯洁，太不完美，存在许多“黑暗面”。要把中国建设成样板的心情愈急切，就愈是认为中国的现实有太多的“黑暗面”。毛泽东在1960年以后有许多批示、言论，极少讲到我们的事业的成就方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以前他总是讲成绩是主要的，而在1960年以后，亦即国际反修深入以后，他却对中国的现实频频不满，多所指责。他对文艺界不满，对教育界不满，对新闻界不满，对出版界不满，对卫生界不满，对学术界不满，对党政机关不满，对于部队不满，对农村不满，对工厂不满。上面说过，对中央第一线也不满。极而言之，他没有什么满意的。许多方面的缺点、错误确实存在，但是毛泽东极度夸大了。

毛泽东决心“大破大立”，发动了确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他诉诸群众，要以空前规模的群众行动的急风暴雨来“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要用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是一大教训。

访问人：“大立”是什么呢？

毛泽东审阅过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明确指出：“世界的革命中心已逐步转到了中国”。该文载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1967年第16期。

王年一：是创造一个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轮廓，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作了勾勒。创造这样一个社会的底蕴，他在1974年12月26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里作了揭示。这个社会的构想萌发于1958年，《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所载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记录了这个思想。在实践中碰了壁，后来部分地否定了，是毛泽东本人否定的。正是在国际反修的巨大影响下，在国内问题上陷入“反修防修”的迷误的情况下，毛泽东不仅肯定而且发展了1958年的构想。既然把经济改革的要求视为修正主义，把改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视为资本主义，那就没有别的出路。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是社会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胡绳对这样的社会构想曾加以评论：“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香港大律师胡鸿烈讲到“无法无天的十年内乱”时说得好：“当时，既然叫一场‘革命’（我说的是加引号的），那就无法可言，什么法也不管用的，再健全也不行。不要说中国，哪国革命一来，都不会顾及法律的，否则就不叫‘革命’了。”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他是直率的，符合实际情况。

访问人：“和尚打伞”，这里总是有个结，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王年一：“和尚打伞”是现象，本质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失误（这是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有正确的方面。）

访问人：就“文化大革命”而言，根本教训是什么？

王年一：邓小平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这句话非常深刻。

1992年5月27日于解放军原政治学院

访陈明——

毛泽东对丁玲说： 几十年看一个人

陈明

陈明，1917年生。江西波阳人，1937年到延安，先后担任过陕甘宁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长，延安文化俱乐部副主任等职。1937年与丁玲相识，1942年结婚。建国后曾任中央电影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有民间叙事诗《平妖记》，电影《六号门》等作品。现为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常务副会长。

陈明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家门。人很诚恳、健谈。当他拿出珍藏多年从未发表的丁玲给他的信，一字一句读来时，我们被打动了。临结束访谈，还一再告诉我们，要在有生之年把丁玲所有的文字整理出来交给读者。

去延安——毛泽东对她说，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

访问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他与文艺界许多人士有交往，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他就数次与有关人士交谈，了解情况。这样的事情很多。作为决策人，毛泽东通过这种交往了解文艺界的动态；同时在这些交往中，毛泽东也展示了他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个性魅力。毛泽东和丁玲的关系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过去一些报刊也有所记载。您和丁玲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陈明：从哪里说起呢？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感慨。我从丁玲到延安的时候说起吧！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1936年8、9月间，她终于跟地下党取得联系，决定脱身到陕北去。经过是这样：当时冯雪峰带着任务从陕北回到上海时，丁玲并不知道，但她相信，鲁迅的身边一定有共产党员，鲁迅一定和党有联系，她就通过曹靖华向鲁迅透露了自己一直想脱离南京，回到革命队伍的心愿。冯雪峰在和鲁迅、史沫特莱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丁玲的心愿。于是冯雪峰派张天翼到南京帮助丁玲从国民党的软禁中逃了出来。丁玲提出要去陕北，冯雪峰就用电台和陕北联系，征得了中央的同意。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是毛泽东，我想，决定丁玲去陕北一定也经过了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第一次和丁玲有联系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吧。

丁玲从南京逃出后往上海见冯雪峰。这次见面冯雪峰主要与她谈起了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对鲁迅，丁玲比较了解，毛泽东的名字，20年代在湖南她早听说过，但从未见过。冯雪峰对她谈起这两个伟人，特别是毛泽东，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丁玲从西安往保安的途中曾住在七贤庄一个外国牙科医生那里，他也是共产党员。七贤庄后来是八路军办事处驻地。1936年斯诺从陕北回西安，史沫特莱从西安到陕北，在那里停留时，丁玲见到了这两位美国记者，三人用不同的语言唱国际歌。斯诺是由刘向山护送去的，这位同志是一个地下党员，公开的身分是东北军里的参谋。刘向山接受的任务是送斯诺回西安，接丁玲到保安。去保安的路上，接待过丁玲的还有吕清同志，他建国后曾任农垦部副部长。1983年我们偶然遇到，他向我提起此事，说当年在保安叶帅这样交代他，过几天有个大作家要来，你买点肉准

备招待她。后来见到那位大作家，原来是丁玲。这件事一直印象很深。我说这些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丁玲没有到达保安前，就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有关部门沿途安排得很周到。丁玲当时对此并不太清楚，许多情况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丁玲一到保安，宣传部就专门开会欢迎她，她在会上谈到她自己在南京被囚禁的生活。从那个没有人身自由的环境里来到边区，丁玲的确很激动，何况，这里又是胡也频向往已久的地方呢。所以，丁玲一到保安，就全身心地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毛泽东曾问她，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她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丁玲就跟着杨尚昆到了定边前线。

访问人：在保安由中央宣传部开的欢迎会上，毛泽东参加了，这是不是丁玲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呢？

陈明：是第一次见面。那天，毛泽东披着一件棉大衣，很精神。大家和毛泽东开玩笑，说他漂亮多了，当时人们的关系包括上下级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这是丁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和毛泽东谈话。

访问人：毛泽东 1936 年写有《临江仙》一首词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描写的是不是这次欢迎会？是不是丁玲到前线的事？

陈明：毛泽东写这首词时，丁玲已经在定边前线了。这首词是用电报发去的，由聂荣臻转交给丁玲。为这事我托人询问过聂帅，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事？聂帅说不记得了。丁玲记得是聂帅转交她的。

访问人：不过的确有毛泽东这首词的手迹。

陈明：那是 1937 年 1 月间，中央机关从保安搬到延安，丁玲陪史沫特莱一起从定边前线回来后，毛泽东写给她的。原件我还保存着，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一次问丁玲，想做些什么工作？丁玲说还是当红军，毛泽东便亲自安排她去中央警卫团当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一个主要负责部队文化生活、后勤给养，包括战士家属家眷安排事宜的工作，这对一个一下子从大城市到农村、部队的作家来说，它也许不是最合适的。丁玲一时很难习惯，也感觉力不从心。一方面，那些长年随部队征战南北农民出身的战士，比如部队的管理员、事务长，和知识分子是有些隔膜存在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想接近他们，却也不知如何做起，显得格格不入。这种隔阂与彼此间的不理解后来有了大的改观，但初时确实存在这些现象。丁玲做这项自己不熟悉的工作，抱了极大的热忱。这时期她有些作品，并不一定深入，但却可以看出她内心的这种真诚。只是她的特长是写作，她不会处理当时那个环境下的各种人际关系。所以，当后来丁玲要去“西北战地服务团”之前，毛泽东曾这样对她说：你以后到一个单位，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这句话是从侧面对丁玲的批评，对丁玲的影响很深。当时她没有掂出这句话的份量，但越往后，甚至几十年，这一辈子下来，她就越感到它的重要和深刻。这番话，是刻在她心里的。对丁玲，毛泽东那时还说过这样的话；我看你还是习惯同知识分子在一起，你看抗大的学生一群一群地去找你。这也是毛泽东对丁玲婉转的批评。丁玲不是抗大的学生，也没在抗大讲过课，毛泽东去抗大讲辩证法，每次都有警卫员跑去告诉丁玲，丁玲每次都去听毛泽东讲大课。1937 年抗战开始后，“西北战地服务团”搞起来，丁玲就去了那里，和我在一起。“西战团”的人员

是以军委的名义调动的，但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宣传部。

访问人：丁玲在延安和毛泽东有很多接触吗？

陈明：是的。丁玲经常到毛泽东窑洞里谈闲天。去毛泽东那里的人，包括一同长征走过来的战友，和毛泽东谈的多是工作问题，或请示，或汇报，能和他谈闲天的人不多。丁玲是一个。丁玲很敬重毛泽东，头脑中也没有上下级关系的概念，又是搞文化工作的，所以谈起来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毛泽东每到这个时候也很松弛，两人还时不时开些玩笑。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好么，那你得给我封官啦。丁玲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两个人都说得热闹开心。谈闲天，开玩笑，他们的关系的确很和谐，也很融洽。毛泽东一直很关心丁玲，“西战团”成立，还没出发，毛泽东就打了两次电报给山西（那时是阎锡山的统治区），告诉那边丁玲带团大概什么时候过黄河、什么时候到，要他们沿途负责接待。

访问人：毛泽东发出的那两封电报是给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的，第一封电报中说到丁玲带领的“西战团”要由延安过河经吉县到太原，第二封电报说由延安动身，在平渡关过河经吉县、平阳到太原，要求彭雪枫派人迎接。

陈明：“西战团”在山西活动一段时间后，1938年春天，奉命到西安，宣传八路军抗日的胜利消息，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那时。国民党在西安封闭了十几个进步群众团体，搞摩擦。“西战团”它不敢封，但另外耍花样，要求我们即刻到战区去，不准留在大后方，如果过时不走，就逮捕负责人。为此，我们商量过对付的办法，丁玲为此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主席指示我们说，要针锋相对。磨而不裂。丁玲回西安后，我们就是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做的，影响比较好。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主席对丁玲的信任，对丁玲工作的关心和帮助。

1938年8月间，丁玲从“西战团”回延安，此后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1939年丁玲已经到马列学院学习，康生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他在一次党校学生会议上说，丁玲要是想到党校来，党校不会要她，因为她在南京自首过。曾经在“西战团”工作过的一个同事把这话讲给丁玲听，丁玲很生气，康生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说我自首过？她去找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也去找毛泽东。主席对她说，你不要生气，我相信你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要作结论，是组织问题，你得找陈云同志。主席还说，你也可以找找康生嘛！丁玲找了陈云，但没去找康生，她这么想，我和康生毫不相干，干嘛要找他？

访问人：丁玲和康生过去不熟悉？

陈明：他们之间基本没什么接触。丁玲和陈云倒很熟，对丁玲在南京一段历史的审查工作是后来陈云同志委托任弼时同志做的，任弼时同志为此事专门到丁玲住的窑洞里去找她，那时，丁玲已经到边区文协了。她和我谈起此事时，说弼时同志与我谈话时态度非常好，给人的感觉是你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为人很亲切，随和。

访问人：那么是什么时候做出书面结论的？

陈明：是1940年10月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作出的，有陈云、李富春的签名。通过对丁玲1933年5月被捕至1936年离开南京这一段历史的审查，

中组部结论认为，丁玲曾经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不能凭信。因此应该认为丁玲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把这个书面结论交给丁玲本人时，陈云还告诉她，最后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加的。我记得，这个材料是用复写纸抄的。丁玲最后还是一次没找康生，倒不是她记仇，而是她这人就是这样，你和她平等相待，她也会很随便。康生和她并没有来往，找他干什么？

访问人：这期间丁玲发表过哪些作品？

陈明：发表过一些。比如《在医院中》，发表在1941年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还有一篇是《三八节有感》，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这些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一些批评，有不同的意见。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问题就严重了。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并不存在什么反党的问题，只是批评我们内部存在的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東西。

访问人：王实味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有一个关于他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给予平反。

陈明：但当时主持《解放日报》副刊的丁玲很紧张，思想负担很重。其实她写的那些东西是有感而发。《在医院中》写的就是她生病住院期间的亲身感受。那个主人公即护士陆平是有原型的，那人我也见过，为人很单纯，也非常热情，但有点神经质。她给别人打针可以，别人给她打针，针头还没挨着皮肤她就会大叫起来。1981年我们在庐山遇到当年那个医院的院长，和他谈起《在医院中》这篇作品，他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但在1958年对丁玲的不公正的批判中，把她的这些作品，还有一篇叫《我在霞村的时候》统统又翻了出来，说她是“反党集团”的人。

访问人：我们看到过1979年中国作协对丁玲右派问题进行复查后作出的撤销1958年划定的“右派分子”的结论。1984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又有为了玲恢复名誉的通知，对“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错误结论作出改正，恢复丁玲的党籍和政治名誉，推倒一切不实之词。

陈明：是啊！1979年作协对丁玲的结论是很不够的，所以才又有了1984年中央组织部的这个“通知”，对丁玲的不公正终于有了结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1984年接到那个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已是80岁的老人了。她说，“现在我可以死了。”

访问人：在延安，丁玲因写《三八节有感》受到一些批评的时候，她跟您谈起些什么吗？

陈明：《三八节有感》受批评的时候，她跟我讲起过她的这么一个猜测，就是可能因为她得罪了江青。

访问人：是怎么一回事？

陈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了。记得是在一个周末，派人送来一封信给丁玲，说请她去吃饭。同时请的还有也在马列学院学习的徐海东、谭余宝两人。信上没写结婚这件事，丁玲看后以为只是吃顿饭罢了，正巧礼拜六她跟学院总务处借来头牲口，要到六十里外的安塞去看在幼儿园的女儿。借头牲口用在那时是不容易的，所以她就先办自己的事了。她想吃饭哪天不能吃？对江青，丁玲尽管有自己的看法，但她对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从没表示过反对。丁玲跟我说她怀疑是不是在这件事上得罪了江青。后来我也想过，恐怕这个怀疑是不能成立的。

访问人：我想丁玲《三八节有感》受批评的原因，大概是在应该如何反

映延安生活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角度。

陈明：其实那个时候的批评也只是提出意见而已，并不像后来 58 年的批判运动那样来势汹汹。那时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在一次高干会上，这个情况丁玲自己写过。这次高干会是毛泽东主持的。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批评丁玲的是曹轶欧。丁玲开会回来跟我说起时还感到奇怪，曹轶欧又不领导文艺工作，怎么第一个起来批评我？曹轶欧发言后，又接二连三有七、八个人发言。只有徐特立徐老发言没有批评。贺龙批评说，我们将士在前方打仗流血，你们在后方骂我们。贺老总的性子是很直的，话说得也直。会上总司令朱德老是抬着眼镜望丁玲；博古是解放日报的社长本来坐得比较远，后来也挪到丁玲近处来，事后问丁玲一句，感觉怎么样？丁玲笑嘻嘻的似乎并没觉得有什么难堪。贺老总那么批评她，她并不往心里去，只是想贺老总误会到哪里去了。她和贺老总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第二天，她去看贺龙。说：不打不相识：你误会我批评我，我就来看看你。贺老总第二天也到文协来看丁玲，丁玲留他吃中饭，那次我也在，就在窑洞里开了一个客饭，加了个菜“土豆炒肉丝”。贺老总一边吃一边问：“你们作家就吃这样的饭啊？不怎么样嘛！”他还跟我们说起他到南泥湾部队去检查部队生活，不进办公室也不去连队宿舍，而去看厕所。他说，你看那里的粪便一阵风刮跑了，就说明战士们吃得不好，营养差，生活就有问题。贺老总的话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谈得也很融洽。所以尽管高干会上那么批评，彼此间还是诚恳相待的。

访问人：善意的批评，善意的帮助。

陈明：那时他们高级领导人之间彼此也是相处得很好。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散了会照样在一起甩扑克，无私无间。

访问人：丁玲受到些批评，毛泽东关注过这件事吗？

陈明：丁玲跟我讲起，毛泽东还是保护了她的。那次高干会开到最后，毛泽东出来讲话说，丁玲和王实味不一样，王是托派（尽管后来证朗这样划是错的），丁玲还是我们自己人，她的文章中还有积极的建议，她最后不是有几条建议吗？女同志要自强、自尊、自爱，还是积极的。不过，虽然毛泽东讲了这番话，王实味问题提出来后，丁玲的思想负担还是挺重。特别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散发了她的文章，更是她意想不到的。但在她心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觉得毛泽东是了解她的，她十分敬重毛泽东的感情丝毫没有变。

访问人：在整风运动之后，丁玲写过一篇文章叫《田保霖》，发表在 1944 年 6 月 30 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是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模范人物的，它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都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陈明：毛泽东 1944 年 7 月 1 日写信给了玲和欧阳山，信中说他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了他们的文章，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他还约他们两人来叙谈叙谈。这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后对丁玲的鼓励。毛泽东在别的会上也替丁玲说过话，说丁玲还是个不错的同志，为了写文章，深入生活到农村去，和老村长的那个生了大骨节病的婆姨住在一个炕上也不嫌弃。这是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告诉我们的。所以整风时期对丁玲的批评和帮助还是诚恳的。毛泽东也对丁玲很关怀。1944 年我由中央党校三部调到文协同丁玲在一起工作，是乔木找我谈话，并经手办的。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我猜想我的工作调动说不定也是毛泽东的意思，那时我和丁玲已经结婚。毛泽东总希望丁玲能在基层的实际工作中多一些锻炼。

访问人：这个时候丁玲又有所创作吧？

陈明：丁玲是非常热情，非常努力创作的人。自从毛泽东跟她讲生活中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她就想自己也要把在生活中认识的人一个一个地写出来。写战士，写带兵的营长，写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员，写边区的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她计划，用不同的笔法，写出十个不同的人物，作为自己今后写人物，写长篇的练习。结果完成了三个，一个民间艺人李卜，一个红军营长袁广发，还有一个就是田保霖。因为形势的变化，另几篇都来不及写了。1945年七大召开以后，总政治部约了几个作家准备写我们军队的几个将军，分配给了玲写的是陈毅，陈毅为这事还专门到我们家里来过。

访问人：这事没听说过。动笔了吗？

陈明：没动笔，刚开始接头。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延安南门外的边区文协，陈毅爬很高的山来与丁玲见面。但正准备访谈的时候，日本投降了，形势转变，将军们都得赶紧去前方，我们也要离开延安，为将军立传的计划就搁下了。丁玲写十个边区人的计划也只完成了三个。

访问人：丁玲采访陈毅有文字记录吗？

陈明：没有，刚开始接上头嘛！

在西柏坡——毛泽东说，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

访问人：从延安出来你们去了哪里？

陈明：我们拿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各大区中央局的介绍信和盖着朱德总司令沿路驻军的关防，在1945年10月动身离开延安；年底到了张家口，都是步行。本来我们是去东北的，但没多久全面内战开始，交通断了，就留在华北。等到1946年中央的《五四指示》一下来，丁玲说我们搞土改去吧，这个斗争很重要。现在和国民党打仗，靠谁？还是得靠农民。怎么发动农民？就是要搞土改，土改把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土改解放生产力。从这里可以想象到丁玲的热情和抱负，不在城市呆，而是到下面农村去。就这样我们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的上改工作队。一开始我们在边区农会主席郭强同志负责的工作队里，后来又转到由边区青委许世平负责的队里，具体工作主要由许同志和我做，对丁玲，则要她多留心观察生活便于创作。搞了一两个星期后，我和丁玲又到了第三个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在涿鹿县，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描写的地方。工作队除我、丁玲外，还有一个剧社的同志，一个当地的区工会主任者董，共四个人，负责三个村子的土改。在这里，丁玲广泛接触当地农民，她并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但在工作过程中，为她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收集了丰富的素材。丁玲土改时候用的是化名，叫蒋英。土改结束后，我们到了阜平红上山，以后又到正定县，写这部长篇，在小说快脱稿时，她又到石家庄近郊的新解放区一个村子继续搞土改去了，这回是她自己当组长，组员是华北联大的几个学员。这时她已积累了不少土改经验、生活素材和人物形象了。分地主的地，分房子分浮财，怎么分得合理，她心里都有数，了解情况比当地的村干部还仔细、准确。有些农村妇女分浮财时，拿了这个又想拿那个，工作组的人嫌这些人落后，不屑于去做这些人的工作，丁玲就去做。所以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很熟悉她。

访问人：村子叫什么？

陈明：叫宋村，在石家庄郊区，是个大村子。1986年我还去过那里，那儿的许多老人还记得丁玲，说很想念她。我把丁玲当年开列的贫农团的名单带去了，可惜有些人已经不在，包括丁玲当年最信任最喜欢的一个青年干部。当年我在石家庄工作，丁玲有一封信给我，里面就谈到这个人，说，这

两天她感冒了，今天又哭了，因为这个青年干部土改后报名当兵，他家人反对，他就在民兵宿舍里又叫又唱，心绪不宁，搞得她心里也很难受。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后，把它给乔木、萧三、艾思奇看了，请他们提意见。

访问人：萧三的夫人甘露 1986 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一篇文章，里边讲到他们三人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 1948 年 5 月在平山县西柏坡。他们三人陪毛泽东外出散步时，在一边讨论丁玲的小说，毛泽东问起，乔木说：“小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毛泽东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后来甘露把毛泽东的这个话讲给丁玲听，丁玲很高兴。

陈明：丁玲把初稿先给周扬看过。丁玲写完这部小说后，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参加妇女代表团出国出席世界妇女大会。她就经华北局驻地城南庄往西柏坡。在城南庄把稿子从周扬手里拿了回来，周扬什么意见也没说。不过，当时却有了一些关于丁玲这部小说的传说，虽然没有指名，但意见是说她写地主家如何干净漂亮，写贫下中农家就都是苍蝇屎，以此证明作家中也有人地富思想。我们也猜到这个传说的来源，丁玲心里是很生气的。到西柏坡，听甘露告诉她毛泽东怎么怎么说，她当然很高兴。乔木组织萧三、艾思奇等人重新看稿子，还告诉丁玲，你是个作家，出国访问，应该有一本书的，我打电报给大连，叫大连帮你出这本书。你先走，有一些文字上需要修改的这边给改。后来毛泽东也答应看一看这部作品。

访问人：丁玲在西柏坡时，和毛泽东有过接触，甘露回忆说丁玲去看望过主席，还一起散过步，谈得很多。

陈明：是的。1948 年 6 月间，丁玲在西柏坡有一封长信给我。那时我在正定。这封信从没发表过。因为你们今天要来，要谈毛泽东和丁玲的交往，昨天我特意找了出来。我来读给你们听：

“伯夏：

我昨晚到了这里（6 月 15 日）。我现住妇委，住在杨之华大姐房内，但是我们还未谈话呢。我要先告诉你我昨晚干了些什么。车子刚从×××出发，到×××时。对面来了汽车。我下车来走，看见两个穿黄衣的走来，是谁呢？我认出来了，是主席！他也看见我了，对我在笑，我赶忙跑过去。主席说，哦，好得很啦，看见你，几年没见面了。江青也走过来。主席很胖。身体很好的样子，江青也还同以前一样，或者稍微老一些。主席即要我和他坐汽车，一道散步去。汽车上同去的有十几个小娃娃。他们的女儿和别人的儿女们。半路上又上来了傅钟夫妇和他们的儿女，挤满一汽车。主席告诉我收到了前年我给他的信，他说我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母亲’，‘写母亲’，我了解土地。他问我的作品，并答应我读我的原稿。

访问人：这是不是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稿？陈明：是的。信中的“车子”，是丁玲他们坐的胶轮大车；信里的地点因为当时考虑保密，隐去了。（接着读）“后来我们在野外坐下来又谈开了。主席两次重复着对我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滞、是倒退，是好、是坏。（陈明插话：这话丁玲后来给我讲过多少次）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多么地在鼓励着我。他还怕我不明白，第三次在他院子里坐时，又重复了这句话，并且拿鲁迅作例子。他并且说我是同人民有结合的，我是以作家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是代表，代表中国人民。……”

他又问我搞土改的情形，还问了你，并且说我已经农村十二年，可以够了，以后要转向城市，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建设。我们天快黑时又坐汽车到他的家，在他们家里吃晚饭，他又同我说我的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我说我没有成绩。……吃过饭，江青就陪我去找小超。你看我多幸福呀！我第一次就作了他的客人，就听了她给我这样多的鼓励。我想着柯仲平为着见不到他而喝酒，喝醉了酒骂人，我是多么地有运气呀！我并且同他约好，以后我要找他时，就在他散步时来，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下面写的是别的事就不念了。

访问人：这封信真是太珍贵了！似乎感觉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在眼前。

陈明：我很珍惜这封信，为了保存，我把原稿裱了起来。

访问人：毛泽东对丁玲的评价很高。

陈明：丁玲不会想到以后它会发表。她给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把她感受到的幸福同我分享。的确。毛泽东一直是很关心很相信丁玲的，丁玲对他的感情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所以1979年给她摘去“反党”、“右派”帽子后，她回到北京，在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前言里就说，“过去毛主席在的时候，我不愿意多说这些。倒是现在毛不在了，我应该说了，我当时是带着一种什么心情写这本书的，我就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喊着毛主席冲锋。”

艰难岁月——最后一次看见毛泽东

访问人：这段文字给人的印象很深。

陈明：有外国记者也问过她，说共产党那么整你，毛泽东对你那么不好，你为什么还对共产党、对毛泽东那么有感情？丁玲回答，毛主席晚年确实犯了错误，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无论是长征，还是抗战，还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他的历史功绩是在那里摆着的，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丁玲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始终如一的。所以，1955年丁玲开始受批判，1958年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我与她两人心里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也许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正确的，但在把丁玲打倒这个问题上，他是百分之百错了。我们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做？丁玲就想过，难道毛主席不了解我吗？中央那么多领导同志不了解我吗？后来想来想去，觉得是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偏听偏信之后他一说什么别人就不能再说别的了。这是过去我们党内民主生活的缺陷。我想，民主生活的缺陷。从被领导者角度来看，就是主动接触领导少了，向领导反映群众不同意见的机会少了，这就可能影响领导者在重大决策时由于狭仄而造成失误。1944年在延安时，曾有人劝说丁玲，应该接触中央领导，如实、全面地反映群众意见，否则，领导只能听到一种意见，难免偏听偏信，走着独木桥，那会是危险的。

访问人：独木桥？

陈明：丁玲有一种脾气，遇事不愿出头露面，就是我搞我的写作，没留什么心眼去走上层路线，搞人际关系，组织上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就去做。在延安时期，有一位朋友劝过丁玲，要她经常跑一跑，向上级反映意见。丁玲并不理会。1955年批判丁玲时，中国作协党组背着丁玲本人，给中央一个报告，里面列了丁玲的四大罪状，据说中央批准了。我去听这个报告的传达，我认为没有一条是真的，全是站不住脚的牵强捏造。我开完三天会晚上回来，丁玲还在埋头写她的小说，见到我就说：“我把我写的念给你听听。”我不

忍心直接告诉她，就婉转地说：“你是不是把这小说暂时停一下。我最近听说中央有个文件是关于你的，你应该向组织要求给你看一看。”她这才向组织提出看文件。接下来她就开始写辩正材料。文件里关于丁玲的问题，没有哪一条是能站得住脚的，有的事甚至颠倒黑白。向中央报告前既不作调查，也不跟本人见面，光凭一面倒的会上某些人的说法就定了罪。比如说丁玲要在文学讲习所挂自己的照片，实际情况是，文学讲习所为了接待东德来的作家，准备学苏联的做法，在会客室挂些名作家的相片。讲习所秘书长田间就打电话请示丁玲，丁玲说，挂鲁迅的，郭沫若、茅盾的都可以，就是不要挂我的。第二天，她专门派秘书到所里去看，说如果有我的，一定要他们拿下来，而且还批评了田间同志。事实就那么回事。结果说成丁玲要挂自己的照片。丁玲被批判后，并不想到要去找中央领导解决问题——这不牵涉到对中央的信任问题。我们只想赶紧承认错误算了，承认了就能赶快下去离开北京，到群众里面去，专心创作。当时我们考虑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荒林区，一个是贵州林区。

访问人：结果去了哪里？

陈明：去了东北，去了北大荒。那时我被株连，划为右派，到北大荒监督劳动。我只得跟丁玲商量我先走，看情况，创造条件，她也去。以后我们在北大荒呆了12年，在秦城监狱呆了5年，又到山西农村3年多。

访问人：整整20年的时间。

陈明：在这期间，我们都盼着能尽快解决我们的问题。1961年我的“帽子”摘了，丁玲的不摘。“文革”刚开始时，我们心里想，说不定有希望了，结果却证明我们想得太简单了。老干部、老同志接二连三都被打倒了，形势很乱，本来已摘了“帽子”的我又被重新戴上了“帽子”。那时丁玲在一个队劳动，我在另一个队里，我很怕她听到这个消息受不了，就写条子给她，捎红旗杂志，棉褥子给她，暗示我平安无事。

访问人：这期间丁玲有没有想到写信给毛泽东，把自己的情况说一说？

陈明：没想过。

访问人：1958年1月，《文艺报》刊登了一个批判丁玲、陈企霞等人的专辑，编者按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有许多段落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不知道丁玲本人知不知道这件事？

陈明：当然知道。

访问人：是别人告诉她的吗？

陈明：不是。毛泽东的笔法看得出来，除了他，没有谁的文字写得那么有魄力，一看就知道，不用别人讲。

访问人：丁玲是不是很伤心？

陈明：当然伤心。当时报刊上登载这些东西太多了。为了减轻她的精神压力，减少对她的刺激，这一类的文字，我尽可能瞒着她，我把材料收起来，只就一些重大的告诉她有这么一件事。跟她说，别看了，还不就那些个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我们就不要再说什么了，换个地方重新从零干起吧！我们有一些党内斗争的经验，所以心存希望，希望迟早能给我们平反，如果闹得党籍都没有，就更不好办了，结果，偏偏就把我们的党籍开除了。当时，我哭了，丁玲也哭了。

访问人：你们从北大荒出来，什么时候被关到秦城去的？

陈明：1970年。那时已经是“文革”末期了。当时我想，为什么这个时

候把我们送到北京去？是不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没想到我们是带着手铐进去的。1971年在狱中我看到报上的“七一”社论，其中讲“文革”以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想糟了，这有问题，中央内部有分歧了。果然不久邱会作、李作鹏在报上消失了，再下来很快折戟沉沙，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和丁玲是被隔开关押的，我不知道丁玲怎么想，我心里有数，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们的问题不会很快解决了，再等待吧！这一等一直等到1975年5月。

访问人：这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出来主持工作了。

陈明：关进去时我想，他们关我们可以打着所谓的什么罪名，可将来，到时候看他们怎么放我们，总得交待一下归了什么案呀。结果真没想到，放我们的时候，他们说不提问题，也不定问题，就这么稀里糊涂把我们放了，而且还故意让丁玲早我一天走。对丁玲也说没发现什么新问题，年纪大了，一个月给80块钱弄到山西长治养起来，对我则恢复“文革”时已经被降了5级的工资，具体工作到长治再安排。就这样又到山西呆了3年多时间。直到1979年。

访问人：“文革”的发动，最大的伤害是对人的伤害。

陈明：也是对我们党的伤害。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人，晚年犯错误，令人很可惜。他的晚年生活是寂寞的，这是我看到近期出版的像《红墙内外》这样一些书后感受到的。晚年毛泽东没有真正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主要靠周围人们的汇报作出判断，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访问人：建国后丁玲和毛泽东有过交往吗？

陈明：比较少了。

访问人：我们知道这么一件事：1951年夏天毛泽东曾顺路去颐和园看望过你们。

陈明：哦，是这么一回事。那会儿丁玲正在颐和园的云松巢写一篇文章。因为丁玲和我从外地回来后，看到《文艺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定中的文章，批评肖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丁玲就把肖也牧的这篇小说拿羽看了，觉得李定中的批评文章言词激烈，有点过分了，她就想也写篇文章，谈些自己的看法。她还专门把她这篇文章给肖的朋友康濯看过，请他们到家里来，我们四个人边吃边谈，气氛很友好。文章写完了，丁玲和我，还有丁玲的母亲就准备回城了。那天收拾东西，正等车，忽然跑上来个警卫员，说你们等一等，中央有首长要来看丁玲。那天萧三的夫人甘露也在，大家都奇怪谁会来。一会儿毛泽东上来了，因为出汗，穿着的黄绸子衬衫湿了半截，我赶紧上前扶他，又连忙叫勤务员去买西瓜。陪毛泽东来的人不少，其中有罗瑞卿。

访问人：谈了些什么？

陈明：当时我们无心，没有记录下来，毛泽东一行也没有带记者。具体怎么讲的不清楚了。只记得丁玲与毛泽东说到自己正在写的这篇文章，并告诉他肖也牧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那是在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然后他就从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谈开去，谈了对知识分子以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

访问人：这是丁玲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吗？

陈明：不是。丁玲1958年出事后，她的作协副主席职务就被撤了。听说由于周总理说了话，作协理事一职才保留下来。1960年作协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拍了个电报通知丁玲，大意说作协开会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们

商量了一下，还是去。丁玲就去参加会了。还作了书面发言。会后去看周扬，交谈中丁玲曾说我这人很不习惯斗争，周说，你还不习惯斗争？57、58年你那个斗争厉害得很啦。丁玲回来后把这些讲给我听。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丁玲见到了毛泽东。

访问人：说话了吗？

陈明：没有。是大家照相的时候，丁玲看见了毛泽东。她没敢过去，站得远远的。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那个时候，她那个身分，怎么敢走近去同毛泽东说话呢？照像时，丁玲老天真。拍了前面一个熟人的肩膀一下，那人回头一看是她，赶紧跑到另一边去了。

访问人：您和毛泽东接触多吗？

陈明：除了和丁玲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同毛泽东接触不算多。大概1939年我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担任大队长时，在延安蓝家坪洛甫的窑洞里同毛泽东一起开过一次会。另外，同一年的11月底，我们因为排演了一个歌舞话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很受毛泽东赞赏，他就请我这个大队长和大队戏剧教员、导演侣朋到他那儿吃饭、谈话，鼓励一下。毛泽东很随便，我们也不拘束，什么都谈。毛泽东还递给我一支烟，我说我不会抽，实际上我会。临走毛泽东开了一张200元的支票奖给大队。后来侣朋说陈明你真滑头，毛主席给你烟抽你为什么抽。我说不是我不抽，是这烟来得不容易，太宝贵，留给主席抽也算我的一番心意。主席奖给我们的钱解决了二百多号人过冬的棉鞋呢！几十年过去啦。毛泽东不在了，丁玲也不在了，我岁数也大了，今天我与你们谈的都已经是旧事了。

访问人：听来真是感触颇多。您看，今天晚上不知不觉已经谈了快三个小时了。

陈明：时间过得真快。我现在想的就是要尽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有关丁玲的事办好，包括帮她出版一套全部的《丁玲文集》，把丁玲的所有文字都交给读者，让他们去认识丁玲这个人。

访问人：我们搞这样的访谈录也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毛泽东。我们祝愿您早日完成这项工作。

1992年6月15日于北京木樨地

访金冲及——

毛泽东和周恩来

金冲及

金冲及 1930 年生，上海人。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周恩来传（1898—1949）》（主编）、《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合著）、《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合著）、《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等。

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个题目，我们好早就约了金冲及，但又觉得他太忙，不忍催得太紧。前几天和他说起，他说：“哎，反正我每天总这样，找个时间就谈吧。”于是就有了这篇谈话。

毛泽东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

访问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更突出的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有人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谋事是毛、成事是周”。对这种毛周之间密切配合所产生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您怎么看？

金冲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泽东起着主导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而对毛泽东，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访问人：那么，具体而论，又怎么估价他们两人各自对中国革命、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呢？

金冲及：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来讲，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泽东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恩来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是负责执行和落实。

但这只是相对说的，不能把话说死。毛泽东是不是光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就不过问？不是的。毛泽东对他认为在全局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些具体环节通常也抓得非常紧、非常细。他不是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吗？在他的前期尤其是如此。反过来，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也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有着重大决策能力的人。比如，周恩来 1924 年在法国时谈到“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说过：“不走到第一步，

何能走到第二步？”说明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道理。1930年4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写道：“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些都是很早的事情。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作用，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后，在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于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一直作出过很多贡献。我举个例子。

在《周恩来传》起草过程中，有位中央领导同志着了后觉得对周恩来在军事上特别是解放战争包括三大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因为周恩来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应当反映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后来我跟邓大姐讲到这一点时，邓大姐说，是这样。他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由他再来贯彻。”这确是事实。我们为难的是：写传的主要根据是目前留下的档案，其中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性决策问题的文件大都确是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起草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具体贯彻执行的或配合性的文件。但这是不是就说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作决策？也不能那样说。档案能说明问题，但档案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在当时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讲到过：当时一般来说，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了以后，考虑好自己的意见，通常在地图上也标明了，然后去找毛泽东，两人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商量。做出决定之后，重要的文电由毛泽东亲自动手起草，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由周恩来处理。当时党的领导集体是五大书记，在军事方面很多重大决策的作出，毛泽东当然起着主要作用，接下来就是周恩来的参与了。周恩来曾说过：转战陕北时，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最小的司令部实际上就是两三个人。另外，在外交等方面，周恩来也发挥不少重大的决策作用。这不用多说了。所以，说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一般说可以，但不能说死，只是相对而言的。

访问人：“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是一般概括性的比较形象的说法。

金冲及：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曾跟我谈起过一件事：建国初，有一次他曾问周总理：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总理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可见，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确实钦佩毛泽东，相信毛泽东考虑这些更大的问题要比自己高明。也是尼克松讲过这么一句话：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个人。

访问人：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溟的话，虽是一家之辞，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缺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同时也说明，毛、周二人之间有着高度的默契。金冲及：是这样。毛泽东的思想博大精深，有时候不能止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周恩来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同时，对周恩来办事的细致周密，毛泽东也很放心。

周恩来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晚年的毛泽东，一方面越来越少参与党和国家的日常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他同实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胡乔木同志讲到过，有一次他劝主席多到工厂农村去看看。主席说，我怎么去啊？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在毛泽东晚年这种同实际越来越隔膜的状况下，周恩来在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毛泽东所起的补充作用似乎比以往更多一些。

说到他们的一致和不一致

访问人：毛泽东、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一致和不一致呢？金冲及：照我看，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

先讲民主革命时期。国外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不是这样。

访问人：对于苏区时期，人们议论较多的有三件事。一件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问题，一件是打赣州，一件是宁都会议。国外有人讲毛泽东、周恩来的矛盾是权力之争，说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就夺了毛泽东的权。

金冲及：这话不能成立。因为成立苏区中央局是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后几天政治局决定的。书记一开始就是周恩来。它不是只负责中央苏区，而是负责指导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因为那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离不开周恩来，所以，书记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来因为“AB团”问题，说项英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周恩来到了苏区，书记一职自然由他担任。这怎么能说夺权呢？比如，这个位子本来是你的，你没到的时候请别人先代坐着。你来了他自然让给你。这哪有什么夺位子的问题？

访问人：那么，宁都会议是否存在周恩来夺了毛泽东军权的问题呢？

金冲及：这里讲的军权主要是指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问题。本来，中央军委成立后一方面军就不存在了，朱德任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是作为中央政府主席随中央军委活动的。后来一方面军恢复了，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朱、王联名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毛泽东是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总政委职务的。宁都会议上多数人要毛泽东召回后方。周恩来坚持将毛留在前方，可以在两种方案中选择，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毛泽东个性很强，他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周恩来还是先代理总政委，以后才兼了这个职务。这不存在周恩来夺毛泽东权的问题。

宁都会议前关于军事问题的那一场争论，前方的周毛朱王四个人意见是一致的，都是和后方中央局的争论。后方说你们不进攻，是消极等待主义。前方认为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急于求战，主张先在那里发动群众，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等待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前后方之间来来回回的电报多啦，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访问人：宁都会议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有会议记录吗？

金冲及：现在就苦在没有会议记录，具体讲些什么，无从查找。不过看

一看后方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知道他们对周并不满意，说他是调和，说他批评项英甚至超过了批评毛泽东。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你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的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这一点也可能是周恩来不如毛泽东的地方。

访问人：在打赣州问题上，毛和周的不一致您是怎么看的？

金冲及：打赣州，毛泽东不赞成打是对的，周恩来赞成是错的。但这不能说是路线斗争。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也向临时中央表示过：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打。当时许多人认为打赣州有很多有利的地方，那时以为城内守军只有一个旅（后来发现情报搞错了）。如果以三军团为主，再加上一军团、五军团，赣州能拿下来。打下赣州就和湘赣根据地连成一片，很有利呀！部队里很多人也表示有把握。周恩来那时刚刚到中央苏区，也支持了这种意见。结果，赣州的实际守军比情报中所说的要多一倍，打了一个月打不下来，国民党增援部队又来了，只好撤围。这一仗没有打好。但如果认为只要主张打赣州就涉及到打不打中心城市的路线之争，那么这以前的打吉安呢？吉安也不小啊！还有接下来的打漳州，漳州也不比赣州小。这里，主要不是打不打中心城市的问题，而是对敌情的判断错误。其实，红四军第三次入闽前，毛泽东也打过一次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为此他曾总结出七条经验教训，教训之一就是敌情的判断错误。毛泽东的高明，常常在于他有了一次教训后，下次就记住了，不再干了。别人不一定那样。党的历史上发生过的争论很多，争论中当然有是非之分，但不见得要把什么争论都夸大成路线之争。像打赣州的问题，我觉得谈不上两人之间存在路线之争。当然从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毛泽东对了，周恩来错了。

第五次反围剿的打法，也并不是周恩来的主张。事实上，到后来周恩来也被架空了。

访问人：中央苏区这一段，周恩来、毛泽东的关系稍微曲折一些。从1927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来看。周恩来对毛泽东似乎还不太理解，曾提出要撤毛泽东。1929年到红四军“七大”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之后，周恩来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我们的感觉是，要说他们有路线之争，恐怕不大好说，只是在个别的具体问题上，有时你这么看，有时我那么看。经过实践检验之后，错的，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对的继续坚持。要知道，当时革命没有经验，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呀！

金冲及：从总的看，毛泽东在政治上当然比周恩来要高，周恩来后来对毛泽东那样心悦诚服并不是偶然的。我的印象，周恩来大体上还是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之下，也就是在这个大框架下，对事情考虑得很周密，有条有理地去做。他那精力充沛、机智果断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别人很少能做到的。而毛泽东比周恩来又要高出一大头：只要时局有个变动，毛泽东一下子就能提纲挈领地对形势作出全盘分析，提出一整套适应新形势的理论、方针、政策，造成一个新的格局。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敢想别人不敢想的问题，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是周难以达到的。后来周对毛的心悦诚服是真诚的。至于对中央苏区时期，说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矛盾，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的说法。

访问人：中央苏区以后，特别是抗战初期以后，他们之间就很少分歧，配合得很默契，创造出一个个个人间奇迹。但建国后，遇到一些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毛周之间又产生了一些分歧。

金冲及：大一点的问题可能是两次，一次是1956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在反冒进问题上，详细的就不多说了，比如周为什么提出反冒进等等。我这里只讲一点，南宁会议批周批得很凶啊！毛主席讲，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总理检讨了一次又一次。

访问人：总理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

金冲及：我认为，他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违心的。他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据说他找主席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主席提出要追加20个亿预算，周坚持不同意。据当时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

访问人：他可能是在试图想通，或者努力去想通。

金冲及：问题恐怕就在这里。在周看来，主席高瞻远瞩啊！他可能会想，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证明，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么这一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的检讨也不完全是违心的。

访问人：到1956年，可以说毛泽东还没有怎么失误过。

金冲及：批“反冒进”，引出了一个大跃进。对大跃进，有些外国人以为毛泽东是在发神经病，好像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脑子，跟着在那里胡来。不是那样的事情。大跃进当然错了，应该批评，但作为人种历史现象的出现，我们总要先把当时的周围环境、社会心态、领导人为什么会作出这种决策弄清楚，才能作出中肯的批评，引出有益的教训。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怕别人批评我，就怕别人误解我。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看来说得很痛快，其实却毫无意义。只有在正确理解事实的基础上来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问题的症结，这种批评才是有益的。公正他说，大跃进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多数党员、群众都是拥护的，而且是兴奋的。这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整个民族的心态。中国过去是一个文明古国，近百年来却一直受外强欺辱，被人家看不起，中国人的心里憋足着气。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谁都希望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当时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主张“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是很容易得人心的。这反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愿望、普遍的精神状态。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情。

第二，是当时历史的特殊环境和气氛。那段时期是我们接连地发展得最顺当的时候。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三年胜利了，谁想得到。胜利后，经济上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三年就恢复了，又怎么能想得到。抗美援朝和美国人作战，这可使不少人提心吊胆，三年也解决了，最后美国人只得在板门店坐下来签了字。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提出来，三年后又进入社会主义了。现在感觉是快了点、粗了点，但当时人们的心里是高兴的。1958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出现“大跃进”的。这以前，每次许多人都觉得不可能那么快，结果都实现了。整个社会十多年来一直处在那样剧烈的、而且迅速见效的巨大变动中。这种惯性很容易引出一种思维方式：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

观努力的作用，认为只要下决心去作，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很快创造出来。离开了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氛围，许多事就无法理解了。

第三个原因是缺乏经验。我现在读建国后毛泽东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真有一种感慨，觉得是个悲剧，他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满腔热情的，也是深信自己这一套想法是对的。但是，他依据的仍然是他自己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靠政治挂帅，靠群众运动。他认为过去我们不是遇到过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吗？只要政治挂帅，只要发动了群众，结果就解决了，他都是那么讲的。不知道经济工作有它的特殊规律。还有一条，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不想照搬苏联经验的，他想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可是，他不熟悉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吃了大亏。毛泽东以前讲过，春夏之交，秋冬之交，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要注意这个“之交”。如果不变换衣服，会闹出些毛病来。但他自己真碰到这个大的“之交”，也不清楚，还是用原有的习惯了的办法去对付新问题，就出毛病了。我们那时也是根本不懂啊！如果懂了还那么做，才是发神经病。我们也不是没有脑子的，不是什么问题都看不见的，但当时有个想法，觉得付出一些代价，打开一个新的局面，闯出一条新路来，是值得的。现在当然知道了；即使是好心，还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违背了就会受到惩罚。至于周恩来反对冒进，毛泽东对他提出了那么多尖锐的批评。周恩来就想了，也许我错了，但未必彻底想通。就像你们刚才所说的，他可能是努力去想通，认为大概是我错了，讲的也不是假话。

访问人：关于“文化大革命”，人们对周恩来议论较多，有的说他是忍辱负重，有的说他是不倒翁，是愚忠，更有甚者，个别人说他是软骨头。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金冲及：子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些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没有告诉他，这也是事实，当时他正在忙着华北抗旱。《海瑞罢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他对“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拥护的，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他不会反对。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生怕在这上面出事。其实，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我想这也包括周总理在内。

访问人：现在在人们心里有个结，毛泽东很信任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和毛泽东说上话。可周明明知道毛有很多作法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不向毛提意见呢？

金冲及：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倒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毛主席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这里了，他单独见毛泽东的次数很多，这在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周恩来通常

也不会把他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王力讲给我听的，他说，周总理给毛主席讲过，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通，路线错误只有“左”或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为什么讲出来呢？因为周总理找王力了解《红旗》杂志和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可见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这是偶尔露出的一点点。其他的事，照我看，他如果给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了多少不同意见。反过来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就没有向毛泽东提过不同意见。谁也没有根据，因为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历史上总有些后人再也无法弄清的事情。

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某个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就遇到过，是一个研究生递条子向我提问的。当时我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说，现在有些年轻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个对国家、民族负有那么大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时，是怎样权衡利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当时的环境多么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制约因素，对负有这样大责任的周恩来说来，并不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赞成这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上所做的，要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得违心他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决裂和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在那样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只是到处鼓动冲杀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要用煤，哪里交通断了要疏通，全得要他在那里硬撑着。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几乎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如果他下来，国家这些事怎么办？对“文革”中许多事（包括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过分的混乱状态等），当时也只有他说话多少还能起点作用。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着图得是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主席吧，这谁都承认。他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前面两种选择中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

包含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下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所以在这两个选择之外，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既要明确地表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又能维持团结，这说起来固然痛快，事实上却根本不可能。

访问人：其实还有另一面，林彪和江青一伙也是抓他的，在那么复杂的关系里，也就是周恩来能处理这些矛盾，维持这个大局面。

全冲及：我对那个递条子的研究生讲，陈老总是硬骨头吧，假如周恩来是软骨头，那么陈毅为什么还对周恩来那么尊重。就是因为陈毅能理解他，清楚地知道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一个伟大的肩负着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他在那里所考虑的问题，是不能用那种小市民市侩心理去猜测他的。一看他没有倒，就想他是在保自己的什么，是在怕什么等等。所以就有“软骨头”之类的说法了。还是刚才引用过的那句话，一个人不怕别人批评他，就怕别人误解他。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当然可以说周恩来哪一点做对了，哪一点做错了。他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做得正确的。这些，后人自然都可以评论，但首先总得如实地理解他，决不能轻率地不符合实际地凭着自己的猜测去议论。

性格、出身的差异，……这不是主要的访问人：记得有一次听您说过，如果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出身、少年时的环境作些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毛泽东出身于一个上升的农民家庭，家庭内部的关系又比较紧张，在他身上反映出的“挑战”意识很强烈；而周恩来则出身于一个向下败落的家庭中，家庭内部的关系又比较融洽，这同他看重和谐、顾全大局的性情的养成很有关系。他们这些性格上的差异，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全冲及：这个话我说过。每个人所处环境的不同，包括童年的出身、经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影响的。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正统的东西多一点。而正统的传统文化里面不一定是糟粕。

访问人：不好说温良恭俭让就完全不对。

全冲及：都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毛泽东在农村中长大，周围经常看到农民那种痛苦的生活，他从小喜欢看《水浒传》、《封神榜》一类的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他更欣赏带有叛逆性格的那些人物和学说。他在家又是长子，父亲对他的影响不是温情脉脉，而是很严厉。反抗性格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得很突出。

周恩来出生在一个日益败落下去的家庭里，处处领会到生活的艰难，从小就有那么重的、几乎是他这个孩子力不胜任的生活担子要他担起来，养成他对集体一直有着一种特别强烈的责任感。他小时候过继给叔父，后来又由他伯父带出去，有时在一种“寄人篱下”的情况下生活。当然“寄人篱下”这个词并不确切，因为他伯伯待他很好，但总和在家里生活不同。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写的作文中说到：有一年除夕夜，别的同学都回家了，他回不去，不仅家在千里之外，而且那么穷困，想到这些他很伤心，流的眼泪把枕头都湿了。所以，他很重感情，也很能忍。周恩来整风时在重庆一次党的会议上还讲到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有影响，在他身上还有刚毅果断、总能以理智支配自己感情的一面。如皖南事变这样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就不说了。我举个小例子，1958年他的家乡搞农田基本建设，碰到他父母的坟墓，他就坚决要求把他父母的遗骨进行深埋。这在我们今天

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周恩来身上并不是这样。他的留日日记上记有这么一件事：当他听说母亲坟上的砖头露了出来，心里十分不安，一夜都没睡觉，恨不得能立刻飞回家乡去料理。可见他对母亲的感情多么深。但在1958年那个状况下，他毫不犹豫地要求把坟墓平掉，把父母的遗骨埋下去，其实也包括把他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埋了下去。

访问人：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看来在周恩来这样的伟人身上，他的性格也有两个方面。那么，一个人少年时代的性格在这个人身上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金冲及：一个人大概到二十来岁，性格就逐渐形成了。这种性格是不是后来都消失无影呢？不见得。拿我自己的体会来讲，到现在已经做了四十多年的共产党员，但青年时代的朋友见面时，觉得你还是和做学生时差不多，性格好像没有怎么变。其实，变还是有变化的，变了什么呢？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当然和那时不一样了，有了自己的坚定信念，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学到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就是性格在有些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一个人早年的性格对他的影响要作一个适当的估计，不能大多地去强调。对一个人起决定作用的更多地还是他长期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实践，不完全取决于童年养成的性格。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周恩来也是这样，可以把童年对他们的影响作为一个角度去分析，但不要过分去强调。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过分夸大了，甚至把局部说成全体，也会变成谬误。

毛、周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就是对人类美好理想的追求、把中华民族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极大责任感，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宽阔的胸襟，顽强的意志，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包括对克服困难、挫折表现出来的韧性等等，这些恐怕是主要的。

访问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进入青年时代后的经历也不完全相同，这些经历是不是对他们的以后有影响呢？

金冲及：我看这个问题比童年性格的影响更重要，更要注意到。从毛泽东来说，他基本上是在国内活动，只是在解放后去过两次苏联。但在国内，他还是到过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这些大城市，如果没有这一段，只是在韶山，他也不会成为后来的毛泽东。毛泽东坚持不出国，说他的任务首先是要研究中国。这一条，毛泽东是很高明的。对旧中国国情的了解，在我们党内谁也没有毛泽东了解得那么深刻、那么准确。不要说从苏联回来的那些留学生，甚至其他人也没有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熟悉。所以，在怎样推翻旧中国这个大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能和毛泽东相比。但反过来讲，他对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对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发生着的深刻变动，毕竟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当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新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怎样再前进，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他的经验和知识渐渐不够用了。当然，毛还是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但这种经验和知识上的局限对他也不能没有影响。

有一次，我到乔木同志那里去谈到：把《论十大关系》重读了一遍，跟周恩来在这前后的一些讲话相比较，觉得两人在思路上有点差别。《论十大关系》中没有着重谈知识分子问题，没有谈科学技术问题，他侧重于怎么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多种关系，热气腾腾地把国家建设搞上去。周恩来在总的方面自然是按毛泽东的主张去发挥的，但他比较注意到我们正面

对着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巨大挑战，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科学技术是关键。他还讲到过搞建设不能光靠人多，也不能过分追求超越实际可能的高速度。他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还特别强调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从两人的思路上细看，是有差别，或者说是同中有异的。

访问人：问题在哪里呢？

金冲及：我想，这跟他们的各自经历也有关。周恩来、邓小平，包括陈老总、聂老总他们在年轻时都曾长期在欧洲留过学，即使是陈云，也是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成长起来的，十二三岁就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他们对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亲身感受比较多，这对他们理解问题和考虑问题都是有影响的。当然，并不是说毛泽东和他们在路线问题上有根本的分歧。总的说来，他们都是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实际国情，在想问题，在摸索经验的。在探索过程中，细看起来，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思路有差别，但并没有形成鲜明的两种不同主张，最后还是统到毛泽东那里，由他作决定，别人还是按照他的主张去做。

访问人：能不能这么说呢，毛泽东在国内的知识和经历，在民主革命时期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别人在国外留过学的经验和知识则暂时没有多少用。建国后，毛泽东的经验和知识渐渐不够了，而他们的知识则可以用上了。所以就产生了思路上的差异。

金冲及：有这个问题，但起决定作用的，仍不是青年时代的经验，而是现实的社会实践。周恩来为什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那些话，这跟他当时的实际工作有关：他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一订计划，一算帐，就发现我们的专家大少了，我们要达到什么指标，建设多少工厂，就需要多少技术人才，缺工程师啊。还有一个情况，这段时间周恩来到国外去了多次，1954年去日内瓦、去欧洲，1955年到万隆，他看到了国际上科技发展的势头，引起了思考，因此，他在讲话中谈到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些亲身的感受、感触，决定了他对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

所以，这些后来的社会实践比他们的家庭出身等造成的早期性格关系还要大。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历史，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中国正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社会大变动时期，那个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就是群众运动、一直到武装斗争，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巨大飞跃的阶段，事情变化得那么快，这是长期历史积累下来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显身手，总结出一套中国革命的经验，演出了一场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按照量变和质变的规律，在一个飞跃实现后，又需要积累，经历一个渐变和部分质变的过程，不能凭主观而不断地采取大飞跃的方法。硬要那样做，即便是好心，也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摔跤子，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我们今后的发展也是一样，要几年上一个台阶，波浪式推进，不能再用类似“大跃进”的方法。如果达成这个共识，既发愤努力，大胆地开拓前进，又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1992年12月19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访陈绍畴——

毛泽东和刘少奇

陈绍畴

陈绍畴，广东东莞人，1934年6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少奇研究组副组长。主要著作有：《刘少奇在白区》、《白区斗争纪实》（合著）；发表的论文有：《刘少奇与白区工作的转变》、《刘少奇与华北上层统一战线》、《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等。

由陈绍畴谈这个题目，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研究刘少奇，已花了十年功夫。所谓“十年磨一剑”，恐怕指的不光是功夫，还有“潜心”“专门”的意味蕴涵在里面。看了下面这篇谈话，读者能感受到吗？

从相识到相知

访问人：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巨人，他们的交往、友谊曾对中国现代史留下了影响。请就您的研究对这两位伟人之间的交往谈谈看法。

陈绍畴：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一代主要领导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他们之间最早的交往应从1920年说起。那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少奇这时从北京回到长沙，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的交往从这时就开始了。

但他们直接的交往还是在安源罢工时。安源罢工前，毛泽东曾去安源考察，了解工人运动情况，觉得罢工条件已经成熟，考虑派一名“得力的人去安源”，协助李立三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他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派少奇同志去“最合适”。那时少奇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刘少奇肩负重托，于1922年9月11日抵达安源。他去安源的前夜，毛泽东约他在清水塘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从安源工人痛苦生活，谈到安源工人渴望解放的要求，从对工人进行启蒙思想教育，谈到组织工人革命团体、领导罢工的具体策略。毛泽东希望刘少奇依靠安源的党组织和工人群众开展工作，他在领导罢工中，基本上是按毛泽东定下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做的，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结果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在刘少奇和李立三的带领下取得罢工的重大胜利。安源罢工后及大革命时期，刘少奇主要在城市搞职工运动，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先后在河北、上海、东北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毛泽东主要领导农村武装斗争。秋收起义后，他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们分别战斗在两条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领导中国人民继续革命斗争。

访问人：两条战线，一个是苏区斗争，一个白区斗争？

陈绍畴：是的。当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合法存在，一部分继续留在城市，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一部分转入农村，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样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便出现了两个政权相互对立的局面，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苏维埃区域），一个是国民党的白色政权（白色区域）。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区域同时存在，也就决

定了中国革命要采取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一种是农村的武装斗争，这是主要的，另一种是城市的和平斗争，包括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从而我们党的工作也就分为苏区斗争和白区斗争这两条战线。刘少奇主要是领导白区斗争，这是配合农村武装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方面所建树的历史功绩，不仅为全党所熟悉，而且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访问人：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是怎样评价的呢？

陈绍畴：1943年春，薄一波同志回到延安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在谈到白区工作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我体会，这两个方面军，或者说这两条战线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正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色。刘少奇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对白区工作的贡献，是他最富有特色的贡献之一。因为他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在思想理论上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策略原则，成为毛泽东策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刘少奇这方面的贡献，党中央也有很高的评价。1941年9月1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王稼祥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党过去的思想方法论，存在着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同唯物辩证法的对立。在苏区“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善于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访问人：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曾写有几篇笔记，谈到这段历史，其中对刘少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陈绍畴：对，毛泽东的笔记，是专门批驳王明“左”倾路线的，一针见血，非常深刻，从中可以看得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思想路线上，在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 and 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上相通。

“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刘少奇，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形势的估计，二是所谓领导权问题，三是关于革命不平衡问题。毛泽东在笔记中就这三个问题，批驳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理论上的谬误，同时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作用，以及他提出的主张给予充分肯定。“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全国一切地方的领导（包括白区的、苏区的、红军的）都是“机会主义的动摇”，甚至连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和中央宣传部的某些人也都是“机会主义”。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们指责白区工作同志对形势估计不懂辩证法，“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指责刘少奇对工人运动作了“悲观失望的估计”。对此，毛泽东写道：什么叫作辩证法？老爷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他说的是：凡不听老爷命令的叫做不懂辩证法；凡听老爷命令的，叫做懂辩证法。世上有这样一种辩证法吗？辩证法难道是这样讲吗？辩证法是讲对立统一法则的。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到，是有不少的地方党部提出了和临时中央的盲动主义相对立的正确主张，可见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少奇同志那样的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临时中央斥之为‘机会主义者’”。

关于领导权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引证了刘少奇1931年给临时中央两封信中的几段话，攻击刘少奇“深深的陷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间”，而标榜自己是什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指出，这里明显的摆着两种马列主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马列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这一切都

不成问题。他们的特点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便是了，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毛泽东又说：真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刘少奇同志以及还有许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关于革命不平衡问题，“左”倾领导曾对刘少奇也是横加指责，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肯定了刘少奇的主张。他说：少奇同志是承认工农之间、工人内部之间的发展都有不平衡状态存在的，但他既没有怀疑领导权，也没有投降反革命，他是讲究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毛泽东还讲了一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关系的话，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苏区、刘少奇在白区同“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他们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这正是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支持刘少奇

访问人：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纠正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但对过去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批评和总结。所以党内有很多干部，对于过去的错误性质还缺乏正确认识。在转变白区工作路线方面，刘少奇冲锋在前，毛泽东全力支持了他，是吗？

陈绍畴：是的。应该说白区工作的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不是犯了“左”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1937年5月中央召开的自区工作会议上。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长，为什么长？就是因为思想不统一。5月17日开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自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他认为，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基本上是错误的。至27日为一阶段，思想分歧非常大，从会议记录看有点开不下去了，据说刘少奇还急得生病了。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白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也参加了。从这个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中央领导层也有不同意见，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过去白区工作到底怎么估计，有人认为工作上虽然有错误，但路线是正确的，有人认为“左”的错误是主要的；二是对白区工作转变的两重性质如何认识，是由于形势变了而提出策略要发生变化，还是因为党内存在“左”的历史传统，需要纠正“左”的思想；三是如何正确认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策略方针的运用问题。

6月4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回答了上面提到的三个基本问题，支持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并且对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在他具体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也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我觉得这两段话相当精彩，对刘少奇的评价相当高。

访问人：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指什么呢？

陈绍畴：我的体会是指刘少奇在领导白区工人运动方面的功绩，同时也点出了刘少奇的思想特点。他向来以观点的鲜明性和尖锐性著称。1988年刘少奇90周年诞辰时，有一位老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曾提到这一点。刘少奇在讨论问题时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而且力求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也素以论证充分、逻辑性强见长，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人心悦诚服，即使你不完全同意，也难以辩驳。刘少奇在思想理论上看问题一捅就破，他有一种捅破窗户纸的本事。当然有时捅得狠了，批评人很尖锐，有些人就受不了。刘少奇在北方局以及后来在华中，都是独挡一面，主持一个大战略区工作，成绩卓著，所以1942年底调回延安，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一员，参与党中央的全面领导工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

访问人：在思想方法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陈绍畴：一下子很难概括出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是我们党的理论大师，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们坚持唯物辩证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们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制订党的政策和策略，去指导革命斗争，再从革命实践中去检验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样才使得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起来。他们有坚持真理的革命胆略。刘少奇曾讲过，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他特别讲到，“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曾出现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他们敢于顶住错误路线，是很不简单的。他们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维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他们有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这一点他们也是很突出的。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没有创新谈何发展马列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两人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分别在苏区和白区两个战线上，勇于实践，勇于探索，这才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对于毛泽东思想，刘少奇有一份功劳

访问人：对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刘少奇做了不少工作。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陈绍畴：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说过，毛泽东思想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我们党能够成功的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最后形成毛泽东思想，最大的功劳还是归功于毛泽东。他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理解，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以及他的理论概括能力，都是同时代人不可比拟的。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经验作了理论概括，逐步形成毛泽东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在40年代那个时候应该是呼之欲出的。明确使用这个概念有刘少奇的一份功劳，当然也还有其他同志的贡献。但我认为，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还是刘少奇，特别是他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至此，毛泽东思想才作为一个科学

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确定下来。

访问人：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方面，您认为刘少奇作了哪些贡献？

陈绍畴：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和其他党的领导人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刘少奇作为我们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某些见解方面，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为毛泽东汇总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准备，有的被毛泽东吸收或概括在他的著作之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策略思想，被毛泽东在《论政策》等文中加以吸收，概括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刘少奇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作出富有创见的理论概括，补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论著中的观点。有些毛泽东的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阐述的观点，刘少奇作了多方面的精辟的阐述，在某一点或某个方面使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更深化了，使它的含义向前推进了一步。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在党建方面，毛泽东曾提出要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怎样去建设呢？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著作，以细胞同人体的关系作比喻，说明党员修养的重要性，指出党员修养的途径，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又如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作过阐述。这方面，刘少奇又作了补充、发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著作中的许多观点。他最早提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是1944年5月20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他在“七大”的《论党》报告中，又讲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条件，提出四个“只有”，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以后他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和华北财经会议上，直到建国初期，他对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基本上形成一套想法。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他肯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存在，认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要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而必须经过一个不可逾越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并把这个发展阶段看作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以此作为一个中间环节或过渡的阶梯；第二，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在经济上就是有五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同时存在，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第三，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刘少奇在讲这个问题时，有时用词不太严密，把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这两个概念混用。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马上消灭资产阶级，不能过早消灭私有制，这一点则是对的。

访问人：他主张用什么方式解决呢？

陈绍畴：他主张让私人资本主义有一个和平发展，充分发挥它在发展经济中的进步作用，指出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无疑是破坏目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认为等到条件成熟时，再让资本家接受和平改造。他认为要消灭资本主义，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生产力要发展，一个是让资产阶级不反对社会主义，用赎买的政策。所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强调我党对资本家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重点是联合，而且指出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毛泽东后来提出批评，不是在这个问题上。

访问人：在什么问题上的？

陈绍畴：建国初期，毛泽东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我们未发现刘少奇有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说法，他是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是就社会制度而言的，他是把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强调首先要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他的第四个观点。他说，我们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解放生产力，第二件是发展经济事业，逐步实现工业化。指出实现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最基本的任务。他说，现在第一件事情已经基本上做好了，如果不接着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必需的经济基础，可以说，这是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访问人：刘少奇设想过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多长？

陈绍畴：这也是我想说的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第五个观点，他认为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建国前他就有这个思想，从七届二中全会到1951年他多次讲到。毛主席当时也赞成。

访问人：毛主席自己也说过，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大概要十年到十五年。

陈绍畴：刘少奇强调过渡时间的长短要看生产力发展状况而定。指出不要过早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那是一种冒险主义的倾向”。认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一个是农民问题。

访问人：在这两个问题上，两位领袖人物有了分歧。

陈绍畴：是的。刘少奇认为，今天是保留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主要是从战略意义上，更多地鼓励私人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长远方针来看待的。毛泽东则更多地是从策略上来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对农民问题，刘少奇设想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完成土改，把农民从封建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步是发展供销合作社，通过流通领域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让农民休养生息，也在发展进行中；第三步是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土改后，农村中出现了自发势力，党内有不同认识。刘少奇认为自发势力是经济发展的表现，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也是不可怕的。当然，也不是让其自流，而要加以领导。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有不同看法。他主张土改后趁热打铁，及时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在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上，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具体的思路也不一样。当然，刘少奇所阐述的某些观点，有些是不成熟的，也不完善，但对于我们党从理论上实践上认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访问人：整个说来，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配合得非常好，他们互相支持，很是默契。夺取政权后，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农村工作问题上渐渐产生分歧，这就是他们后来悲剧的原因吗？

陈绍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说清楚还须花相当的功夫。

1992年7月10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访刘学民——

毛泽东和朱德

刘学民

刘学民，1931年生于北京，祖籍山西浑源。1949年3月参加革命，1954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新华社、解放军报社记者、编辑20多年。后从事党史、军史与朱德研究。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著有：《朱德与范石生》、《智取宜章》、《论朱德、陈毅领导的“赣南三整”》、《论朱德和湘南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朱德》等。

谈到两位老人家的友谊，老刘同志是动情的，从朱毛会师一直说到“文革”，他又不失偏颇，客观地分析了鲜为人知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朱毛之间争论的一段史实。那段历史到底说明了什么？老刘同志说：这是正常的，没有争论、一团和气才是不可理解的。说得顺畅，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两个钟点。

访问人：毛泽东、朱德在党的领袖中，他们一起战斗的时间最长，从1927年到1976年，将近半个世纪。毛泽东、朱德的名字在我军历史上也威望最高、名声最大，一个是政委，一个是总司令，曾威震全国，名扬世界。这样的两位伟人，您能用简练的语言概述一下属于他们的共同建树吗？

刘学民：通过各种材料的综合分析，我认为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或者说红四军的历史，应该说是朱、毛共同创造的。当时就叫朱毛红军。当然还有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好多的高级将领（虽然有些很早就牺牲了），但贡献最大的还是朱德和毛泽东。他们不仅共同创造了红军，创造了根据地，也创造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此外还共同总结了一套战略战术原则等等。

朱毛会师

访问人：当人们说起毛泽东、朱德的时候，都要讲到井冈山会师。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朱毛会师预示了什么？

刘学民：这里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转战途中在江西信丰和地下党接头时，得到一个重要情况，说毛泽东带领一支部队上了井冈山。这是朱德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消息。时间大约是1927年10月底。

访问人：如果我们没有记错，到这时为止，毛泽东同朱德还从未见过面。

刘学民：是的。但朱德对毛泽东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湖南有个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专家，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就在这以后不久，11月上旬，一个偶然的时机，朱德从敌人的报纸上证实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消息。这时，朱德就急于想同毛泽东取得联系。几乎就在同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朱德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国民革命军第16军从粤北移防到湘南郴州、汝城一带。而这个军的军长范石生和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是同班同学，他们交往很深，曾结拜为兄弟，一块参加同盟会，一块参加昆明的“辛亥重九起义”，以后又一起在滇军共事。当时，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非常困难，从南昌一路下来，敌人追得很紧，伤病员很多，而且得

不到及时的治疗，时间又到了冬季，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弹药也用的差不多了，吃饭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部队急需休整。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和陈毅商量，决定和范石生联系，暂时取得帮助。这时，范石生也听说朱德带着部队在赣南地区，他也派人同朱德联系。后来，他们联系上了，达成协议，把朱德率领的部队以 16 军 140 团的番号在范石生的部队中隐蔽起来。朱德化名王楷，任 16 军军总参议兼 47 师副师长、140 团团团长。他们还协议朱部来去自由。这样，朱德带领的部队很快得到了补充。

待部队安定下来，朱德还是想着用什么办法去同毛泽东取得联系。陈毅说，有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朱德问是谁？陈毅说他叫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现在就在咱们部队里。朱德听了很高兴，立刻找来毛泽覃，让他装扮成 16 军的副官，通过敌人防区，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

朱德为什么总想和毛泽东取得联系呢？我认为他有个思想，就是要找个立足点、找个根据地。听说毛泽东当时在井冈山，就很感兴趣。朱认为毛泽东可以信赖，因为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专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创立了根据地。他认为毛泽东比叶挺、贺龙他们要高明，高明之处就在于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上，是搞农村根据地，不是去占大城市。这同朱要找落脚点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他提出了上井冈山向毛泽东靠拢。

访问人：这期间毛泽东也曾派人找朱德联系。

刘学民：是的。大约也是在 1927 年 10 月或 11 月的时间。毛泽东听到了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的情况，就派何长工下山和朱德联系。何长工下山先到长沙找到湖南省委，然后往湘南。当时的白色恐怖很厉害，根本过不去。何长工只好折回长沙去武汉，在汉口坐上美国轮船到了香港。然后经广州到韶关，已经是 12 月底了。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何长工去澡堂洗澡，听两个军官聊天，说这里驻扎的 140 团是参加南昌暴动的队伍，团长王楷就是朱德。何长工一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赶快收拾东西，化装成华侨商人，找到了朱德。朱德很详细地询问了井冈山的地形、群众基础、部队情况，还问能否屯兵，是否有利于防守等。何长工在韶关呆了两天，朱德给了路费派人送出广东，让他尽快赶回井冈山去。这样，朱德、毛泽东就取得了联系。

访问人：朱德、毛泽东在 12 月取得了联系，可他们的会师却是次年 4 月了。

刘学民：事情往往是复杂曲折的，革命斗争更是如此。本来朱德在范石生那里隐藏得很好，得到了暂时休整，开展了练兵活动，待机东山再起。大约是 12 月底，蒋介石得到情报，说朱德隐蔽在范的部队里。他立刻发来密电，要求范解决朱德。范还是很讲义气的，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德。朱德看形势不利，当机立断，很快就把部队拉走了。朱走后，在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先后占领了宜章、郴州等 7 个县。

就在湘南起义过程中，1928 年 3 月湘南特委下令要毛泽东带着井冈山的部队下山支持湘南暴动。但这时湘南暴动已处于困难时期，一方面宁汉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开始以主要精力对付湘南起义部队；另一方面湘南起义中地方党搞了不少“左”的东西，错误推行“烧杀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部队的处境很孤立。但湘南特委命令毛泽东下山，毛泽东也只好执行。不过心里很不痛快，到了酃县和敌人一接触就停下了。他让毛泽覃下山去找朱德，

找湘南起义的部队。而这时，朱德已决定向井冈山靠拢，见到毛泽覃后，坚定了去找毛泽东的信心。这样，他们就走到一起来了。

其实，这时中央也有两封给朱德的信，（一封是12月21日，另一封是12月27日），要他同毛泽东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只可惜，朱德在湘南起义后才看到这封信。这无疑更加坚定了朱德去找毛泽东的信心。

访问人：井冈山的会师，使朱毛两位巨人的手握在了二起，当时他们不曾想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师，将永远载入史册。中国共产党就将从这里兴旺，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从这里延伸……

刘学民：的确如此。从朱德毛泽东个人的关系来讲，也是重要的里程碑。由于朱毛会师，不仅创建了红军，成立了红四军，而且巩固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师后红四军接连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连续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的胜利和龙源口大捷，井冈山斗争出现了全盛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朱毛共同总结红军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通过这一段的合作，作为毛泽东来讲，他对朱德的指挥才有了具体的了解。过去也知道点朱德的情况，但到底能不能带兵打仗心里没底。现在他看出朱德确实是个帅才，和他共过事的不只是朱德，还有张子清、何挺颖等等，相比较而言，朱德还是更高一筹。此外，从用兵作战方面看，朱德的军事知识、实践经验是比毛泽东要丰富，因为他毕竟是讲武堂出身，而且在滇军当过旅长，在德国和苏联学过军事，还在南昌办过军官教育团。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把部队收拢来，保存了革命火种，然后转战湘赣边界，并领导了湘南起义等等。确实不简单，应该说是一个有胆有识、有才能的军事指挥员。所以，毛泽东对朱德的意见非常重视，对朱德本人也很尊重。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谈到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谈到对大政方针的把握与驾驭能力，谈到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毛泽东比朱德更高一筹。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对军事斗争的经验总结上，总是那样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道理讲得很精辟，分析非常深刻。他讲话写文章都是深入浅出，既有逻辑性，又有生动性，很是条理化、理论化。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很多具体经验，一经毛泽东总结概括，就上升为非常重要的军事原则。如“十大军事原则”，概括得中外瞩目。

这里我讲一个小插曲，1947年9月，朱总受中央委托到晋察冀解放区指导工作，他指挥了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战役中，朱德提出了“学习攻城”的号召，要求部队在战前上下级干部先开会，打时又开会，打不进时又开会，讨论仗如何打，坚如何攻，城如何破等具体战术问题，实行群策群力，结果打下了石家庄，取得了大胜利，积累了攻打敌人坚固设防大城市的宝贵经验。战役后，朱德把这一经验报告给中央军委。毛泽东看了非常重视，当即写了一段批语，将其概括为“军事民主”。当然过去也提到过军事民主，但强调的并不突出，这时，毛泽东对军事民主作了具体的规定：“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经他这样一概括，那些具体的作战经验，就成了带有普遍意义的军事理论。从解放战争的实践来看，这个“军事民主”的确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从分歧到友谊

访问人：朱德毛泽东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走到一起来了。当时的革命力量非常弱小，朱毛的两支部队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千人。这么小的力量在那贫困的山区如何站住脚跟，又如何打开局面，发展壮大，都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要完全靠他们自己去摸索、去寻找。这就决定了他们以后的路程必定是艰难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

刘学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国革命处于初创阶段，井冈山的革命势力向哪里发展，怎样发展，既要有超前的预测，又需要有实践的检验。因为大家的经历不同，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朱毛两人配合的时间也短，再加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级指挥上的问题。这个上级指中央和湖南省委，他们有时是正确的，有时又是错误的，各种因素都有，情况非常复杂，这样不免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发生些磕磕碰碰的事情。1928年7月，因为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红军向湘南发展，结果使井冈山的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就是我们常说的“八月失败”。以后在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又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党应该如何领导军队，前委之下还设不设军委，应该前委对外还是司令部对外，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要不要根据地等等。面对着这些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毛泽东和朱德以及其他同志之间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分歧的表面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在前委之下，红四军还设不设军委的问题，实质上是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以及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朱德是军事领导人，强调军事的重要多一些，毛泽东站得更高一些，他更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到1929年6月，对一些问题的争论更为表面化，到了急需统一认识的时候了。所以就决定召开党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本意是好的，想通过党的代表会议，共同研究讨论来取得一致意见。但七大没有开好，是个不成功的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分歧反而加剧了。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林彪和从国际回来的刘安恭起了很坏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会议时间短，敌人进攻迫在眉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草率地通过了决议。用陈毅的话说，是一个折衷的决议，对毛泽东、朱德各打五十大板。会议还对前委作了改选。选举结果毛泽东下来了，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访问人：前委书记是由中央任命的，按组织原则下级党组织是无权改选的。

刘学民：当时他们似有一种说法，认为改选后先工作，报中央批就是了。现在看来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应该说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因为前委组成的人选是中央定的。

访问人：这次会议的结果，使毛泽东和朱德都很痛苦，尤其毛泽东的处境更为困难，会后他只好离开部队，到闽西特委去指导工作。

刘学民：因为七大没有解决问题，9月，红四军又召开了八大。八大开得更不成功，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会上，曾有人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表示支持，由彭祐和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没答应。理由是没有分清是非，没有解决问题。这时，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比较全面地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各方面的情况，当然也包括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意见。在周恩来主持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讨论，最后委托陈毅为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回答了红军建军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出了红军“七大”的危害，肯定了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的路线是正确的，决定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陈毅回到红四军，向朱德如实汇报了向中央报告工作及中央九月来信的情况，又写信向毛泽东说明了九月来信的精

神。这样，毛泽东很快回到红四军，接着在当年 12 月召开了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军事第一、流寇思想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议，结束了红军高级领导层中的争论。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是正确的。这时，朱德认识也提高了，他衷心地拥护毛泽东。从此朱毛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互相配合得比较好。很快就使原来的一个军发展成一个军团，由一个军团又发展到一个方面军，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期间他们始终是一个司令，一个政委，很少分歧。关于这段情况，朱德自己曾回忆说：“直到 1929 年 12 月在毛泽东领导下召集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军的正确路线，纠正了部队的错误思想，这才挽救了部队的危机，使红军的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而我也就从错误方面转变到毛泽东的正确方面来了。”

访问人：当时的革命处在探索阶段，产生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学者把它概括为朱毛争论，您怎么看？

刘学民：可以理解。当然过去把这说成是路线斗争，是不对的，但对这场争论各打五十大板，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从个人性格上说，毛泽东脾气较大，性子较急，办起事来可能主观一些。当他的个人威信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使他周围的人难以适应。相比之下，朱德在带兵方面经验多，人又没有架子，很容易接近。所以，多数干部战士对他都有好感。当时在人缘上比毛泽东强些。

访问人：毛泽东在建军问题上，在探索革命道路问题上，应该说他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远。在许多情况下，朱德、陈毅有些地方还跟不上。再者毛泽东提出的那些办法，在马列的书本上，在六大决议里都是找不到的。因此，就觉得他不按党的路线方针办事。像刘安恭就是抓住这一点，攻击毛泽东，说他另搞一套。现在看来，毛泽东是善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刘学民：始终注意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确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所以才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王明一伙人，因为不懂得这一点，在中央苏区把毛泽东排斥在一边。按照洋顾问李德的办法瞎指挥，结果使毛泽东、朱德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中央根据地丧失了，红军被迫长征。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时，朱德在会上发言支持了毛泽东。他说，如果再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他还说，从无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领导也是高明的。这次遵义会议，因为会前毛泽东做了王稼祥、张闻天等大量的思想工作，会上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议否定了王明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表明，红军的高级将领包括朱德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

朱毛不可分

访问人：领袖有个成长的过程，领袖之间也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毛泽东、朱德是战火中结成的友谊，也是在战火中认识了对方。

刘学民：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朱德表现的更加坚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朱德坚持决不反对中央，更不反对毛泽东。1935 年 8 月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分两路北进，朱德、张国焘和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9 月 9 日，张国焘突然打电报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要他率右路

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等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率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他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为了对抗俄界会议，9月中旬在阿坝策划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攻击毛周张博北上抗日是机会主义是退却逃跑，会后就煽动一部分人围攻朱德、刘伯承。当时，朱、刘的处境非常困难，张国焘的警卫员把朱德的马偷偷杀掉，把卫兵撤掉，限制朱德不让他同其他人接触。尽管如此，在会上朱德还是表示坚决支持中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的大会小会开了很多次，有一个叫黄超的跳起来拍着桌子骂朱德，叫他表态呀！朱德说，北上中央决定的，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不能反对。还有一种说法：朱德强调中央的抗日方针是正确的，经过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我举手赞成的，我不能反对，只能有一个中央，就是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康克清回忆这段情况说，朱德是这样讲的：我赞成中央北上方针，手我只能举一次，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是一个整体，朱毛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反对毛是办不到的，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的联系，我是不能离开毛的。后来，有人问朱德，朱毛不可分割这个思想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朱德说，“朱毛不可分的思想我也不是一参加革命就有的。1927年南昌起义时，还没有这个思想，1928年上井冈上时我初步有了这个思想，但不够明确牢固，到了遵义会议时我才彻底树立了这种思想”。“我感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伟大思想。因此我下决心一心一意跟毛泽东干革命，拜毛泽东为老师，拥护他担任我们党的领袖。”

毛泽东对朱德也一直是十分信任的。1936年7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电报给共产国际说：朱德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独立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不会赞助国焘的。”朱德到陕北保安向毛泽东汇报同张国焘斗争的情况时，毛泽东对朱德作了很高的评价，说朱德“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访问人：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师。有同志对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表示异议，建议朱德任军委副主席。毛泽东认为朱德任总司令是当之无愧的，这样“对内对外均好，任副主席确不相称”。至于张国焘，那是为了团结四方面军，“暂时只好如此”。再次表明了毛泽东对朱德的敬重和信赖。朱德、毛泽东他们的友谊是否终其一生呢？

刘学民：是的。就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还是一直保护朱德的。那时“四人帮”操纵和唆使一些人在北京到处张贴朱德的大字报，污蔑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还在中南海煽动中办的一部分人起来造朱德的反。后来，林彪集团也参加了进去，说朱德秘密成立了什么党，并翻出1927年朱德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事，说朱德投降了国民党，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要打倒等等。毛泽东知道后，不止一次他讲过，朱老总是红司令。1973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开会，决定八大军区司令进行调动，就在这次会议上，增补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12月20日，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在座的还有朱德、邓小平、周恩来、江青。毛泽东一边坐的是邓小平，一边坐的是朱德。毛泽东讲，这是我们的好司令、红司令，不是黑司令。毛泽东还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是连在一起的。朱德听了深受感动。据康克清回忆，那天晚上朱德回到家里，讲起这件事时，非常动情，还落了泪。这些事实表明，毛泽东

在“文革”那样特定的环境中，只要有会还是出来替朱德说话的。总之，毛泽东和朱德在半个世纪中结下的友谊是很深很深的。

1992年9月8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访章学新—— 毛泽东和任弼时

章学新

章学新，1929年生。浙江绍兴人。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曾任文献室任弼时研究小组组长、《任弼时选集》副主编。著有《白求恩传略》、中国革命史小丛书《任弼时》，《伟人之初——任弼时》。目前正在从事《任弼时年谱》和《任弼时传》的编撰工作。

得知我们的采访意图后，章学新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在办公室和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直到夜里11时才结束。

访问人：毛泽东和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后深受全党爱戴的书记处领导成员，他们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是怎样相处的？

毛泽东闻道在先

章学新：这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命题，我想先从他们早期的革命生涯谈起。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时，正是任弼时政治上的启蒙时期。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曾经激励了15岁的乡村少年任弼时。当时，他们虽然同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但毛泽东是本科生，在校内是学生组织的骨干，在社会上是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分子；而任弼时是通过一师附小的老师萧子暉（萧三）和毛泽东结识的，1920年秋，他进入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就是新民学会介绍的。1921年后，任弼时奔赴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了4年，较为系统地读了马列著作，接受了严格的组织训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大势，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回国以后，他感到最困难的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这期间，毛泽东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考察工厂农村，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地方工作，已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毛长任11岁，“闻道”在先，是任当之无愧的师长。

访问人：他们早期的经历不同，在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认识上是否有差异？

章学新：在理论基础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认识是有差异的。不过，在大革命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无论在斗争对象和策略上，彼此认识是一致的。比如，五卅运动中，任弼时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发动团员、青年和帝国主义英勇斗争，在斗争中壮大团的组织，把原来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改造成为以工农青年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青年先锋队。这次运动，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等要求，毛泽东称赞为：“空前的反帝”，“民众因此认识到什么是不平等条约”。

“4·12”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后，国共第一次合作行将破裂，毛泽东率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任弼时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的会议期间，听了斯大林的著名讲演，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任弼时接受了这个论断，所以在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土地革命问题上，和毛泽东的主张是一致的。在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大革命转向土地革命的历史关头，他们的旗帜都非常鲜明。

访问人：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任弼时则坚持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工作，环境和斗争条件不同，彼此认识上有分歧没有？

章学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当时的中心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积聚力量，复兴革命。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毛泽东和任弼时都没有出席。这期间，毛在江西苏区，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任弼时则受中央委托留守在上海，指导国内的斗争。他代留守中央起草了《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城市农村工作指南》和关于红军建设的《军事工作大纲》等重要文件，对于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复兴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中写道：“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1928年5月至9月，正是任弼时等留守中央的期间。

如果说有差异，主要在于毛泽东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开始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斗道路，而任弼时，虽然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已经有所认识，提出了城乡斗争配合，公开和秘密斗争结合，发展下层统一战线等策略思想，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城市暴动的巢臼。

赣南会议，任弼时有没有排挤毛泽东？访问人：有人说，任弼时率领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排挤毛泽东，这是怎么回事呢？章学新：排挤之说不符合事实。任弼时是在党的四中全会后率中央代表团进入江西苏区的，从1931年4月开始，到同年11月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亦称赣南会议）和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止，是中央代表团在苏区工作的前期。四中全会前，中央已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代理周恩来为中央局书记。中央代表团到达后，对毛泽东是支持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4月中召开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充分肯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总前委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认为他们坚决为工农政权斗争，在解决土地问题上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正确的了解，建立红军的整个制度”，而且“并未因立三路线而动摇自己的正确路线”。在中央对毛泽东已有非议的情况下，这是很高的政治评价。

第二，在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上，支持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否定了“分兵退敌”的错误主张。

第三，恢复了毛泽东红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毛的总前书记是1月15日中央局成立时，项英宣布撤销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5月24日，中央局重新决定成立总前委，仍由毛泽东任书记。

第四，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议“以毛代项”为中央局代理书记。当时，任弼时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对项英则认为：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10月11日，中央局上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临时中央在复电中，一面责备说，中央局是“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的”，其成员变更应“由中央解决”，中央局“无任意变更之权”；一面不得不同意“中央局书记由泽东代理”，“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这样，11月1日开幕的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由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作政治报告，11月7日开幕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在中央电令下，推举毛泽

东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这一系列事实表明，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此期间是支持毛泽东的，没有理由得出排挤毛的结论。后来，毛泽东也曾说：如果没有代表团的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朱总司令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任弼时和毛泽东之间思想认识上没有任何分歧。

访问人：任弼时在赣南会议上批评毛泽东“狭隘经验论”是什么背景呢？

章学新：事情是这样的：1930年5月，李立三要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鲜明论断，锋芒针对抱着“本本”发号施令的教条主义者，提倡面向实际作社会调查。1931年4月，毛对这个论断有所补充和发展，在总政治部的一个通知中说“我们的口号是：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任弼时到苏区后，认为毛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强调社会调查是忽视理论教育。任弼时说，他进苏区之前，已听到王明等非议毛泽东右倾，指的是毛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损害了贫农利益，保护了富农利益。不久，共产国际指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临时中央便批评苏区中央局“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要任弼时按这个调子起草党代表大会的文件。但任弼时没有完全贯彻，相反。他向临时中央申述：“以人口标准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贫农利益”。但是，他在报告中讲到加强党内教育，注意思想斗争时，却提出要“打击狭隘经验论”，防止忽视政治理论教育和离开实际的“空谈主义”两种倾向。所谓“狭隘经验论”就是不指名的批评毛泽东。这说明任弼时没有领会毛文章的本意，更没有认识到披着国际路线外衣的教条主义。他适应了临时中央反右倾的某些要求。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使临时中央满意，所以半年以后，临时中央指责党代表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之一是“以反对所谓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是说任弼时不得要领，没有按中央的意图反对毛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对“狭隘经验论”的批评当然不会信服，所以10年之后，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重印《农村调查》一书，他在自序中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且措词严密地写道：“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如果说，毛对自己的论断，第一次补充发展，重点是完善调查研究工作，那么，第二次补充和发展，重点是阐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而这时的任弼时，对教条主义已有切肤之痛，所以，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1930年就提出的，那时（1931）的感觉，认为只凭调查的情况，而不是根据一定原则去解决问题，是会走人偏向，离开原则；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今天才能感到这句话是真理。就是说，只凭原则，不详究实际情形去决定问题，将不精确，将成为主观主义的东西，成为教条式的解决问题。自然，若调查情况不代表一般的，不是典型的，又不能用正确的观点、方法去找出问题，解决问题，那同样会走入偏向。这里的问题就是理论如何真能与实际相联系。与实际无联系的理论，将不成为理论而是空论。它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的。”两位革命家10年前认识上的差异、分歧和误解，在实践的道路中达到了和谐一致，这是非

常耐人寻味的！

宁都会议之争

访问人：那么宁都会议撤销毛的军事职务，对于任弼时来说有什么失误呢？

章学新：宁都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这是历史性的错误。任弼时后来说，他在政治上接受了临时中央在军事上的“进攻路线”，成为“对立以致反对”毛泽东的思想政策的“积极的协助者”。这种“对立以致反对”是怎样形成的呢？宁都会议上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因素的汇合。任弼时认为：“首先是对形势的估计和战略方针的争论”。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局对形势和战略方针之争，始于“9·18”事变以后，到1932年春天，分歧越来越明显。中央局内部也“充满了”争论，焦点是多数中央局委员接受临时中央的主张，夸大主观力量，要和反革命“决战”；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打赣州，打南昌，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毛泽东鉴于红军经过连续三次反“围剿”的苦战，亟需休息和补充，红军应扫清苏区以内为地主武装占据的许多“土围子”，打通赣南、闽西两大苏区，然后向苏区东北地域发展，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准备对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中央局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结果强攻赣州遇挫；而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却在福建漳州获胜。这个事实没有唤醒中央局多数成员，反而指责毛执行进攻路线不坚决，甚至认为三次战争以来中央局领导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周恩来刚进苏区不久，项英已经靠边站了，中央局自三次战争以来犯“严重，’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首先指的就是毛泽东。这是影响宁都会议的一个因素。

其次是前方来信。为了贯彻“进攻路线”，周亲自到前方，建立最高军事会议，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主持。7月，前方来信提出“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毛泽东任总政委，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以改变军事行动上“宝塔式的指挥权”。9月，又在信中反映：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独断专行，前方负责人太多，组织上又不“集中权力于个人负责制”，难免贻误战机。任弼时等是支持这些意见的。

三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湘鄂西、鄂豫皖两块根据地战斗相继失利，根据地垂危，纷纷来电要求策应。临时中央又电告苏区中央局，敌人将倾全力进攻中央苏区，望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伸出苏区，击破敌之一面。但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意临时中央“急于求战”的意见，主张先赤化南丰河两岸地区，为诱敌深入在苏区内击敌准备战场。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则认为，这样一来，击敌的时间将延迟一个月。彼此意见分歧，在电报中各陈理由，这时，前方发出训令，决定以十天为限，红军分散发动群众，教育训练，布置战场。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认为这样做“完全是离开了原则”。在这样的气氛下，前方提出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不料，到了会上，公开争论，中央局多数成员集中“火力”，指责毛泽东，主张召毛回后方。周恩来虽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他负主持战争全责，毛留前方助理；二是由毛负指挥战争全责，周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两个方案的共同点是留毛在前线。大多数同志同意前一个方案，集军事全权于周，保障“进攻路线”的执行。但毛因为“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提出暂时请假回后方治病。这是周恩来所始料不及的。任弼时后来说：“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后才发觉

的。”当他认识错误后，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在延安整风，在湘赣座谈会和七大的书面发言中，一再作了诚恳的检讨。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任弼时光明磊落的品格是令人景仰的。

借此机会，我想澄清一个事实：《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第251页中写道：周恩来“曾回忆说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掉的。”作者叶永烈非常明确地在脚注中说明，其根据是：“周恩来1972年5月21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记录稿。笔者摘自瑞金革命博物馆档案室。”为了核对事实，我查阅了上面说的那份讲话记录稿，并无这些内容；又写信请瑞金纪念馆帮助核查，回信说：“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去查找，终未查到出处。”如果作者另有所据，应重新加以说明，以免混淆视听。

从心悦诚服到鼎力相助

访问人，任弼时从政治上理论上全面信服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

章学新：任弼时坦率他说过：离开中央苏区时，他仍然认为毛泽东不重视理论，思想方法上“杀偏风”。抗战开始后，他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有关新民主主义战略的理论，他转变了认识，认为毛泽东的许多论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特别是1940年，回到延安，他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看到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的运用，整风运动中的思想领导和各种政策的掌握，他对毛泽东这“才爱戴佩服”，而且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所以，他在七大的开幕式上说：“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从此，他心悦诚服地协助毛泽东工作。成为毛的得力助手之一。

访问人：任弼时在哪些重大问题上支持了毛泽东？

章学新：除了上面说到的在中央苏区前期的情况外，最重要的支持：第一，是任弼时和贺龙一起，率领红二方面军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争，推动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当时，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损失惨重，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公开反对“毛周张博”。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妄图拉拢二方面军。任弼时和贺龙不为所动，不惧所压，坚持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一方面军会合。而毛泽东对任弼时及红二方面军政治上完全信任。1936年7月14日，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三军会师后，任弼时等立即向中央建议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军。试想，如果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得逞，中国革命将会走更曲折的道路。

第二，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是不甚理解、不甚放心的，所以派王明回国。王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回国伊始，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中央即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全面汇报工作，任弼时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又作了详细的说明和

补充，揭露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动摇态度，阐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策略，和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伟大作用等，改变了共产国际的片面看法。共产国际在决议中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和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说：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领袖。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国际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止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曾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如果没有国际指示，六中全会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任弼时在这个历史关头，对中国革命有巨大的功绩。有意思的是，在中央的会议上，提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的是王明，但任弼时在向国际的汇报中支持的却是毛泽东，这表明任弼时的政治原则性是很强的。

第三，协助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筹备召开党的七大。1940年春，任弼时回国后，积极协助毛建立中央机关的工作秩序，开展整风运动，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个基础上，筹备召开七大，并受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委托，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并参加书记处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七大的秘书长，积数年努力，胜利地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大，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下达到空前的团结。

毛泽东的诤友

访问人：作为毛泽东的助手之一，任弼时如何能动地在重大决策上发挥作用呢？

章学新：助手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央书记处内部实行集体领导，第一书记和书记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任弼时勤于调查，原则性强，不轻信，不盲从，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偏向，敢于坦诚直言。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1943年审干时，康生夸大国民党特务混入延安的数量，搞逼供信的所谓“抢救运动”。一度延安各机关、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干部中，被迫“坦白”成风，任弼时发现后，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以可靠的数据指出，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大多数是怀着抗战的热忱，在1937、1938年进来的，抢救运动中没有经过调查，被逼“坦白”的“特务”分子很多是弄错的。审查重大特务主要靠调查。他为此进行了细致的甄别。毛泽东说：“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此，以后不可再采用。为了承担领导责任，毛曾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向被伤害的同志行了“脱帽礼”。

另一个例子里，1947年在土改运动中，又是康生，在晋绥地区乱划阶级成分，在封建剥削条件之外，增加了政治历史、生活水平和政治态度等条件，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级阵线，兴县的蔡家崖村，被评定为地主、富农的，竟占农户的22.4%，超过一般情况近三倍，同时乱斗乱打乱杀，造成解放区内一度社会动荡不安。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在1947年12月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要立即纠正这种危险的“左”的错误偏向。毛泽东非常重视任弼时和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向全国广播任弼时关于《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经毛泽东多处修改、充实，阐明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巩固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法，工商业政策和对知识分子及开明绅士的政策，以及制止乱斗乱杀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毛本人为纠正“左”的

偏向，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 11 篇，及时地端正了土改运动的方向。本来，12 月会议后，毛泽东针对当时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的问题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草案），名曰《中央一月决定》，征求刘少奇等的意见。3 月 17 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说：“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这反映了毛的从善精神和领袖风度。

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毛泽东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确非人所能及；作为助手之一的任弼时，则严谨细致，敏思刚正。“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从一个领导班子来说，助手和“班长”是有互补作用的；从个人关系来说，任弼时不失为毛泽东的诤友。

1992 年 4 月 14 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访吴克斌—— 毛泽东和陈毅

吴克斌

吴克斌，1927 年生。四川合江县人。大学毕业。1949 年由新华社转业入伍，从事新闻、宣传工作。60 年代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和党史、军史的研究。参加过《星火燎原》丛书、《决战淮海》等书的编辑，并发表有文学作品及论著数十篇，协助十几位老革命家撰写回忆录达百万字。现正从事《陈毅军事文选》的选编工作。

对南京军区《陈毅传》编写组副组长吴克斌，原先只闻其名而不识其人。忽一日，他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办事，要找的人没找到，却走进了我们的办公室。于是有了这篇颇具深度的访谈录。对此，他自己也有四个字，曰：自投罗网。

陈毅一生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与毛泽东的相识

访问人：1992 年 5 月 30 日、6 月 6 日《光明日报》发表丹淮的文章《红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的友谊》，引起注意。《陈毅传》出版之后，也很受党史界及学术界的重视。毛泽东与陈毅的关系，从 1928 年朱毛井冈山会师到陈毅去逝，延续 44 年，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内容。您作为《陈毅传》编写组的副组长，一定了解很多情况，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看法？

吴克斌：丹淮是根据他自己对他父亲陈毅的了解，生动地写出了红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友谊的一面，是切题的。我还认为，这段时期陈毅与毛泽东的关系，既有基本的一致，也有分歧，有时甚至是原则上的分歧；他们的友谊是随着相互了解的增进而发展的。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性格不一样，哲学思想不一样，两人的立身之道，做人的规范信条也不完全一致。比如这样的差别：毛泽东一开始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表现了他很强的革命性、斗争性，对旧社会的破坏性极强，强调的是：“矫枉必须过正”。陈毅却认为“过犹不及”，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过”与“不及”同样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陈毅生性比较厚道，不肯做过头的事，也不愿强迫别人干什么。这也许与他自小生活在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有关，与他留学法国所受的熏陶有关。他待人处事比较宽容，能“反躬自省”、“推己及人”。而毛泽东个性倔强、严厉，提倡斗争，是积极、进攻型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之类的对敌斗争手段，最能反映他的个性特征。有共同信仰的这两个人存在如此的差别，决定了他们交往中能有机配合，相辅相成，但有时也有某些矛盾。

我认为陈毅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与毛泽东的相识。由于有了毛泽东，所以才有后来的陈毅。怎么解释？就是说，如果陈毅没有遇到毛泽东，那他在红军初创时期的多种选择中可能会有更多的徬徨和失误；如果没有毛泽东，他对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觉悟不会如此明确，因而也无法把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此充分，也就不能成就他后来的事业。同样，也正因为有了毛泽东，陈毅也只能是现在的陈毅。毛泽东影响了他，改变了他，可以对他人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决定作用、支配作用。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常讲‘组织决定’吗？你怎么把这些扯到个人头上去了呢”，这事看来有矛盾，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毛泽东有很高的才智，在党内有很高的权威，他的正确的政策常为组织所接受、采纳和实施。在组织上许多对陈毅的决定中，毛泽东往往起主导作用。毛泽东是能够做到这些的，而反过来，陈毅对于毛泽东却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不是他没有试过，红军时期他曾经有两次想支配毛泽东，一次是井冈山上，一次是红军党的“七大”，但结果却证明不行。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他的那一套思路是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道路相吻合，相适应的，而陈毅的认识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陈毅自己说过，井冈山会师后，以朱德为领袖还是以毛泽东为领袖都还没有确定，是经过七大、八大到九大，他才认识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1929年2月中央“二月来信”中提到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6月红四军“七大”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由陈毅继任，毛泽东一气之下到蛟洋养病。到“九月来信”以前，陈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这种想法：毛与朱两人最好都不走，如果中央一定要他们离开，或者走一个留一个，或者一前一后走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先走。为什么？这里陈毅可能有潜台词，就是认为军事作战没有朱德不行，毛泽东的政治职务却可以由别人代替。这个想法反映了此时陈毅对毛泽东认识的局限，没有把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同中国革命的全局和前途联系起来。但到他起草“九月来信”时，他的认识改变了，加深了，由渐变而到质变，对毛泽东的认识在思想上有了飞跃，有了后来的几次请毛泽东重新出山回红四军军部主持前委工作之举。

怎么看毛泽东的三个“相”字？

访问人：1928年5月6日，毛泽东给陈毅写过一封很热情的信，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对陈毅一见如故，早有定论？有了这三个“相”字，又怎么理解您刚才谈到的他们之间的矛盾？

吴克斌：我认为这三个“相”字，与其说是对他们两人关系作出的结论，不如说是毛泽东当时迫切需要获得、并且开始获得陈毅支持的一种感情化的表达。陈毅说过，在党的“五大”前后，毛泽东的划分敌我阶级界限的主张和以后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的主张，并未获得全党的公认，他在1927年末是“以孤独的情怀转入湘赣边界的农村”的。谁能给这种孤独的情怀以安慰呢？是井冈山会师。这一点，陈毅最有体会。远的不提，就说他们离开湘南上井冈山时，就受到坚决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湘南特委领导人的反对和嘲讽，说他们离开城市上山是“右倾逃跑”。因为当时中共中央的路线还没有从“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这三个“相”字对毛、陈双方都是切合的。

井冈山会师，朱德带来的是一支经过大革命洗礼的我党组建最早的一支部队，装备好，有战斗力，有现代正规作战经验，可以和国民党正规军的精

锐主力相对抗。而毛泽东秋收起义后带上山的部队主要是农民军，相对他说，装备差，军事技术、作战经验也不过硬，靠这样的部队加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要粉碎国民党频繁的“进剿”与“会剿”，真正长期在罗霄山坚持、发展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朱德率队上山，对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人们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井冈山会师后，朱德、陈毅率领二十八团打了几个大胜仗，便迅速恢复和发展了湘赣边区的武装割据。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由于两支部队的成分和作风不尽相同，在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也产生了矛盾。比如，南昌起义部队有优越感，不大瞧得起秋收起义部队；而秋收起义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旧军队习气重，纪律差。因而不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毛泽东感到棘手的一个问题。这时，陈毅及时向四军军委和毛泽东提出改编部队，两支部队干部相互交流的建议，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给在朱德部队做党代表的陈毅写这封信的。

毛、陈的相遇、相交殊为难得，但我以为，毛泽东之所以有三个“相”字赠与陈毅，他至少还考虑了这样两种因素：其一，他认为，只有朱毛两支部队一起，才能开创斗争新局面；其二，他认为，朱德部队作战主要靠指挥员威望维系的现状要改变，要削弱个人的威信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因此，毛泽东很迫切地要发现能拥护自己主张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陈毅就是其中最好的人选之一。这是不难理解的事。陈毅在“九一三”事件后曾经回忆道，井冈山时期，在一次讨论群众工作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到有一个人的发言很好，他就问陈毅，这人是谁？陈毅说，他叫林彪，是个连长。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好干部。毛泽东发现林彪是个人才后，就经常找他谈话。不能否认，林彪当时在基层干部中的确比较优秀，政治和军事都比较强，又年轻，能打仗，深受毛泽东欣赏。所以到红四军“七大”前后，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形：在秋收起义部队中有伍中豪这样与毛泽东意见不合的，而在朱德的队伍中也有林彪这样深受毛泽东器重赞赏而积极向毛泽东靠拢的。彼此交叉，互相做工作。这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对中国革命认识上存在差异的表现。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毛泽东给陈毅写那封很热情的信就很自然了。有了这封信，并不能说毛、陈两人之间就什么矛盾、差异都没有了。在有了这封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如前谈到的红四军“七大”风波，就说明毛、陈之间的友谊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井冈山会师，毛、朱、陈各有所长

访问人：井冈山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陈毅，还有朱德，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同为优秀人物，并不说明他们之间的结识就一定是一见倾心，一拍即合。其间会有互相的欣赏，会有此消彼长的互相借鉴，但往往有更多的互相比照竞争。毛泽东的优势是早有定义的，那么，在形成毛、朱、陈三人关系格局的过程中，朱、陈那时所具有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吴克斌：井冈山会师前，陈毅对毛泽东最早的了解是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听到蔡和森的介绍，而对毛的言论的直接接触，恐怕始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虽然没有见过面，毛的农民问题思想，毛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分，陈毅还是知道的。但此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有陈毅这个人。而朱德也是到井冈山会师时才初见毛泽东。相比之下，陈毅与朱德的相交从1926年8月在四川万县就开始了。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时，陈毅追赶上南昌起义军后，便随军南下，并参加了会昌攻击钱大钧部的战斗。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在崇义上犹地区整训时，地方党组织报告说附近来了一支工农革命军队伍。经联络，知道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中的第三营，负责人是张子清、伍中豪，他们在遂川小汾战斗中被敌人截断，毛泽东带着团部与一营回了井冈山，三营回不去就南下活动了。了解井冈山的情况以后，陈毅他们就派毛泽覃前去与毛泽东联系，12月，由毛泽东派出的何长工辗转到达韶关的犁市，和朱、陈见了面，相互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和打算。1928年初，湘南特委又派人到井冈山，强令毛泽东率部南下，策应朱、陈发动湘南起义，这些联系的延续，就有了1928年4月朱、毛两支部队在井冈山的会师。

会师井冈山，割据湘赣边，对朱、陈来说是有思想基础与条件的：

第一点，朱德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陈毅虽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赶上起义部队后随军南下，担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指导员。该部归朱德统一指挥，留守三河坝，当起义军主力于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他帮助朱德把溃散回来的人员收容起来，和二十五师一起，进行统一整编对部队的思想状况很了解；后来，广州起义即将举行时，广东省委通过北江特委指示朱、陈率队参加。部队已经到了韶关，准备好了车皮，得知起义已遭失败而中止，但又收容了一批参加广州起义归来的人员，因此，对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也有所了解。在辗转于赣粤湘边之时，朱、陈见到张子清和何长工，又了解了毛泽东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所以这三个起义所说明的孤立的城市起义不能成功，必须使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进行土地革命这一点，朱、陈已有所认识。

第二点，南昌起义南下的最后失败，使得起义军占领港口，取得外援，以广州为基地进行第二次北伐的计划落空，朱德率部退出广东后，就曾指出，中国革命靠北伐不行，靠攻占城市不行，将来的方向，主要应该是把革命战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中国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是农民游击战争。所以，1927年10月到12月朱、陈率部沿赣粤边西进时，就已经开始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从正规战转向游击战，还派干部、拨枪械，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其中如在广东仁化便建立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在1928年1月举行湘南起义。所以，对在农村进行游击战，朱、陈有些经验。

第三，1928年1月的湘南暴动是在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之后进行的。关于这个起义，过去宣传不够。我实地调查过，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而且基本成功，不仅建立了县、区、乡三级的苏维埃政府，还在1928年3月20日成立了地区一级的湘南苏维埃政府，比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还早两个月。因此，朱、陈搞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并不是来自井冈山，而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有自己的创造与实践。虽然湘南苏维埃政府存在的时间很短，前后不过二、三个月，但朱、陈从其中摸索的一些经验为以后他们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共同恢复和发展湘赣边界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从上面三点可以看出，毛泽东有建立湘赣红色政权的经验，朱、陈则有建立湘南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及袁文才、王佐部队，朱、陈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及数千湘南农军，可谓声势浩大。况且，革命目标一致，具体经验则不尽相同。因此，朱、毛井冈山会师，并不是朱、陈加入毛泽东的部队，而是几方面代表人物走到一起，几部分革命力量合成一股，是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人的井冈山武装力量的有机组合。在

这种背景之下，毛、朱、陈之间有争论就是极为自然的了。

井冈山会师是现代革命史上的重要一页，也给陈毅的一生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开始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把自己的思考和那一套经验与毛泽东相对照。这其中，有毛泽东的高明所在，也有陈毅的经验胜毛泽东一筹的地方（比如陈毅就有湘南根据地建设的某些成功的经验，如发行货币——劳动券，并一度为市场流通接受，这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没有过。据说还颁布了《土地法》等）。所以，要此时的陈毅像“九月来信”以后那样真正服毛泽东是不大可能的。

并进相长的最后结果：选择毛泽东井冈山会师以后，陈毅经历了湘南 8 月失败，和红四军“七大”的风波，职务也忽上忽下几经变动。但不管怎样，陈毅始终踏踏实实地做事。他不拒绝做领导工作，也甘愿当副手，做具体工作，特别是做群众工作。从自己的失败之中，陈毅也是善于总结教训的。比如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也是井冈山时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张要建立一支党的军队，党领导一切。陈毅通过湘南失败，也终于看到失败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制止不了流寇思想和家乡观念，致使官兵离队跑散。他提高了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认识，也就对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29 年底，他协助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也表明他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认识的飞跃。这个飞跃与陈毅注意对毛泽东本人及思想行为从实践到理论的比照研究分不开的。从井冈山会师到红四军“九大”之后，是毛、陈关系史上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正是人民军队的初创形成一定规模的时期。也是毛、朱、陈之间互相配合、支持、碰撞、了解，互相吸收对方优点，并进相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果，便形成了一个代表人物。这个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党的正确思想，代表党的正确方向。毛泽东的路线一经确定，毛、朱、陈的关系也就确定下来了。如果能把毛泽东比作“太阳”的话，那么，陈毅就是它的一颗“卫星”，有自己的轨道，但一定绕着太阳转。

访问人：陈毅曾经谈到：领袖不是天生的，是在群众运动中锻炼成长由群众认识的，我就是这样，开始我并不认为毛主席是领袖，经过湘南失败，经过红四军“七大”，最后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陈毅的这段话的确是他与毛泽东早期关系的真实表露。

吴克斌：他是通过斗争的实践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的。红四军“七大”前毛泽东辞职，“七大”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被改选掉，这些事不论组织程序上是否合法，它们的存在是事实，不必忌讳。革命领袖要为群众所认识、接受，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况且在旧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小块革命根据地犹如一个孤岛，旧意识的存在对形成真正的革命关系干扰很大，政治上出现些宗派小动作，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陈毅——朱、毛之间的一座桥梁

访问人：毛泽东与陈毅关系史上的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一段探索时期。那么，毛、陈关系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力呢？

吴克斌：毛、陈之间的关系是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急需寻找出路的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陈毅后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打的第一枪。但使这个起义终于获得结果，并成为人民革命胜利的最初出发点的是毛泽东领导工农武装向井冈山的进军。南昌起义后所

保存的一小部分军事力量，是在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武装及根据地汇合后，才得以发挥其在长期革命中的作用的。陈毅的这几句话说得很有分量。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陈毅与毛泽东关系的建立是很了不起的。老实说，当时朱德部队的官兵中多少还存在一点军事官僚的偏向，做艰苦的根据地的工作与群众工作，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的观点比较薄弱，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竭力倡导的。反过来，朱德也具有一些当时毛泽东还不具备的经验。毛泽东与朱德之间需要有个桥梁，这桥梁就是陈毅。他把军、政两方面的代表人物连在了一起。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政治见解上的不一致往往很快会被上升为敌我矛盾，而敌我矛盾是要用非正常手段解决的。这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在那时却屡见不鲜。因此，陈毅在毛、朱之间所做的沟通工作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1928年5月至7月上旬井冈山出现一个全盛时期，就与毛、朱、陈三人的紧密配合分不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对以毛、朱、陈为首的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政策和工作成绩作了肯定。在发挥桥梁作用的同时，陈毅自己也获得了思想上的进益。

毛泽东地位上升，定下毛、陈关系格局

访问人：如果说井冈山会师是把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的优秀人物推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接受历史的选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领先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以后出现了大的波折，但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终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于毛泽东与包括陈毅在内的他的战友们的关系来说，是否意味着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吴克斌：毛泽东地位的上升是与陈毅对毛泽东认识的逐渐深化基本一致的。与此伴随的，是陈毅从认识毛泽东到紧跟毛泽东，到把自己自觉降到从属地位的过程。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陈毅越感到毛泽东的伟大，就越看到自己和毛的差距。1944年他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与毛泽东有不少接触。1945年他去山东，见到舒同，舒同问他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的情况，陈毅说，毛主席进步得很快，自己远远赶不上，真是“望尘莫及”。1948年陈毅从西柏坡回来也跟大家讲过：“最近几年两次到延安、陕北，与毛主席相处，均有可望不可即之感，即距离太远，自己进步太慢，多年的知识分子的习气纠正是太不够了。”

访问人：您上面谈到了从井冈山到红四军“九大”，毛泽东、陈毅关系形成的过程以及这种关系的基本特征。那么，从这以后，他们的交往是否就走上了平坦的道路？

吴克斌：从那以后，可以说他们关系的格局基本上定下来了。这种关系影响了陈毅以后三、四十年的人生道路。成功也好，挫折也好，都受这种格局的制约。但是有一点须特别指出的是：在这几十年中，陈毅功勋卓著，却始终没有犯过路线性的重大错误。1930年7月以后，陈毅基本上做地方工作，比如搞扩红，筹粮草。而这阶段，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大发展，毛泽东正处在上升较快的时期，先后担任第一方面军政委、总前委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等等。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更使他威名赫赫。虽然其后毛泽东也遭受些挫折，但陈毅与毛泽东已不再是正副手这样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或上、下级关系了。陈毅和毛泽东的接触也相对稀少了。毛泽东曾经提名陈毅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但未见中央批准。陈毅受到挫折，一度被怀疑为“AB团头子”他的妻子肖菊英为此投井而死。那段时间，苏区打“AB团”打得很厉害，据宋时轮说毛泽东任命的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甚至还怀疑

到毛泽东头上。在很危险的情况下，陈毅写信给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回了封信，说，我是支持你的。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又把装有二十万元款子的几个洋铁箱和自己的文件托交陈毅保管，表示自己的信任。后来，对陈毅的“审查”不了了之。第四、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也被取消了指挥权。红军长征开始，陈毅受命留在苏区领导斗争，毛泽东的孩子小毛，岳父母，还有毛泽覃，贺怡的去向，都是通过陈毅他们帮助安排的，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托父托孤，这也说明了毛、陈相互信赖之深。

1934年苏区一别，直到1944年陈毅去延安才和毛泽东重逢。但10年的时间，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通过遵义会议的精神，能感觉到其中毛泽东的重大作用，这对陈毅来说，使他能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充满胜利的信心与希望。1937年抗战开始后，陈毅从一家香港刊物上看到有人引用毛泽东在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就知道毛泽东出来了，也理解了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因此他有主动下山与国民党赣南军政当局谈判的举动。这说明，陈毅与毛泽东的心是相连的，而这种沟通则是建立在红军时期对毛泽东的认识与理解基础之上的。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在新四军任职，坚定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方针，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理论著作推崇备至。在实践中，他身体力行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多所创造。对陈毅的工作，毛泽东是肯定的，对陈毅本人，毛泽东也是信赖的。毛泽东对1943年的“黄花塘事件”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从“黄花塘事件”的处理看毛、陈之间的关系

访问人：“黄花塘事件”？

吴克斌：这是在全党整风运动期间发生的。1942年3月刘少奇要回延安，16日下午，临行召集新四军军分会、华中局的负责人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等人开会，说：“华中局、新四军的工作，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中心，他领导工作有经验，军队工作搞得很久。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由饶代理，实际工作还是要依靠陈毅同志。”此后从5月到9月，陈毅在饶漱石离开军部去二师检查工作期间，代理饶代理的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这样，就有了对饶、陈这前后两位代理书记的议论。比如，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为什么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比如，称赞陈毅工作的人比较多。这些议论对饶漱石是个压力。加上1942年9月1日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更加使利欲薰心的饶漱石忐忑不安。1943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在黄花塘驻地，饶漱石策划了排挤陈毅的阴谋，他抓住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的历史关节，以及陈毅心直口快对这些往事的随便议论说，陈毅早就反对毛泽东，一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并排挤书记而代之。饶漱石还借口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有意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并据此在10月16日组织开展了对陈毅的斗争会。他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挑拨他们与陈毅之间的关系。这在《陈毅传》中已经讲到了。那么，制造黄花塘事件，把陈毅搞得灰溜溜的，除了过去的历史事件，到底饶漱石抓到了陈毅的什么“把柄”？陈毅的随便议论是些什么？

其实事情也挺简单：有一天，陈毅在军部处理公务，其他人都走了，就随便地和秘书聊天，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中央规定的整风必读文献，他就问，

你这些书都读了吗？接着他随口感慨说，这些书都是好书，可是不要看这些书讲得头头是道，执行起来就不一定真这样，我看得多了，在井冈山就看到了，有些事情就不是照样执行的。这些话，当时听来显然不太恭敬。秘书很单纯，吓坏了，回去也不敢和谁讲。过了些日子，上面再次强调整风要敞开思想，秘书就着急了，那天他看到饶漱石一个人在黄花塘边乘凉，就走上去谈了这件事，饶说，行了，知道了。表面平平淡淡，实际如获至宝，认为抓住了陈毅过去反毛，现在还反毛的“把柄”，可以在这上面大做文章。

陈毅有理说不清，无法解释，只好走。陈毅1943年11月25日动身，第二年3月7日方到达延安，行程数千里，到延安后，陈毅与毛泽东的交往，毛泽东给陈毅做思想工作的种种情形，《陈毅传》中写了许多。但陈毅初见毛泽东的情景宋时轮同志给我讲过：陈毅因为“黄花塘事件”，心中惴惴不安。虽然他一路上写了不少诗，其中也有像“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这样歌颂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诗句，但毛泽东和中央究竟会以什么态度待他，他心中无数。因此，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毕恭毕敬。公事公办样的谈话后，毛泽东忍不住发了脾气，他说，你这个陈毅，我们10年不见面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敢跟你说话吗？陈毅听了毛泽东这席话，很感动，放下了包袱，两人用在井冈山时期建立的那种感情交流谈话。陈毅原本是准备到延安“请罪”的，但毛泽东给他做思想工作，他感到越来越亲密，1944年12月1日，毛泽东就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为“七大”起草的《建军报告》，总结了1927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年军事斗争的历史和经验。这个文件虽然后来没用上，但他在其中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命题，并有较系统的研究。在“七大”上，陈毅作为新四军代表发言，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此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这都是与毛泽东的信任分不开的。“七大”之后，陈毅回华中工作。临行前毛泽东与他谈话，陈毅关心自己同饶漱石的关系，说：回华中局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陈毅就答应了。为此，中央发电报给华中局，其中说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并分工饶漱石为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及华中局副书记。1954年，野心家饶漱石被揭露。陈毅并没因此忘乎所以，而是写诗《手莫伸》等以自惕自励。后来，毛泽东看到送来的陈毅在华东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之后，叹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呀！”似乎对此事打了个句号。

访问人：原来中央是把陈毅和林彪作为主持东北军工作的人选的，后来林彪去了东北，陈毅回了华中。这也说明毛泽东是信任陈毅的。

吴克斌：陈毅和林彪、肖劲光是乘一架飞机于8月25日离开延安的。26日那天，军委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外，还任命林彪和肖劲光为山东军区正、副司令员。可是走到冀鲁豫军区，就收到中央的电报，叫林、肖到冀东去，命陈毅不去华中而直接到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工作，以便罗去东北，陈毅就这样到了山东。不久就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了。

毛泽东的哀悼之词，是对陈毅的最后结论

访问人：陈毅与毛泽东由在井冈山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那段时期两人的一些摩擦是否也给他们后来三、四十年的交往投下了

些阴影呢？

吴克斌：我想还是有的。“黄花塘事件”的处理说明了毛泽东对陈毅的信任与工作能力的肯定，但这个事件的由起也正说明红军时期他与毛泽东之间产生摩擦的影响仍然存在着。毛泽东的感情非常丰富，常常是爱亦深恨也深，他看人全面而又深刻，但同时他的脑海中也记存某个人的历史档案，这种档案并不一定产生成见，但会产生对人的基本印象。“文革”中，陈毅的这块“伤疤”也屡屡被人揭开，中共“九大”时张春桥说他是“右派代表”，“九大”后，在一个专案小组会议上康生还说到陈毅红四军“七大”时要夺毛泽东的权，把毛泽东的枪都给缴了。康生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也还是他揣摩毛泽东记得这事，想迎合毛泽东。陈毅也是个敏感的人，他的心里也明白，毛泽东在其他方面都会对自己好，但这个事的疙瘩没解开。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对陈毅怀有很深的个人感情，不影响他们彼此间的欣赏。1971年冬，陈毅在病榻上已难以言语，但还是设法叫家人去做寿面吃，说是毛主席的生日到了，他要祝毛长寿。相应的是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临陈毅追悼会。这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我想，这是哀悼之词，也是毛泽东与陈毅自1928年结识以来，交往44年作出的最后的结论。

1992年8月30日于北京总政招待所

